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BOOK
内容资料 中华版

序

这或许是一种巧合，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我几乎一直与城市历史地理打交道。五天以前，我接待了我的老朋友、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先生，他是一位城市历史地理学家。那天，地理系和城市科学系的数十位教师及研究生与章先生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由我主持的，一开始我就向与会者介绍：这是大名鼎鼎的城市历史地理学家，是《有城墙的都城形态》（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一文的作者，这篇精湛的论文是收编在一本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之中的。“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城市的特色。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不论其研究的是历史城市或是现代城市，大家都熟悉这篇论文，而这天的与会者，除我以外，几乎都没有见过此文的作者。与慕名的同行学者见面，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座谈会开得很好，而所谈的，主要就是历史上的城市。

三天以前，我的另一位老朋友，英文《中国日报》总编陈砾先生惠临舍下，他不是一般作客，而是特地转道杭州来帮助我解决一个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困难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的出版问题。提起此书中译本的沧桑经历，不禁令人怅然，所以必须多说几句。

此书原本是施坚雅在70年代末期寄赠给我的，当时，世界各国的城市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书评。我选择了美国和日本学者的书评各一篇，请人译出，并由我加上一个引言，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得到了不少城市学者的好评。接着我和施坚雅见了面，商量把此书进行中译的问题，于是，我组织了几位擅长英语的朋友动手翻译此书，施坚雅立刻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全书基本译成以后，应他的要求，我为此书写了长篇书评。记得这是1985年春季，当时，我在国立大阪大学任教，而施坚雅则在东京庆应大学任教，我们的一位日本朋友，也就是此书中的一个名篇《宁波及其腹地》的作者斯波义信教授，当时也任教于大阪大学。2月16日是施坚雅的生日，他们夫妇特地从东京来到大阪，邀请斯波夫妇和我们夫妇在大阪市中心梅田的一家著名的餐馆共进他的生日晚宴。席间，我把即将在《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发表的我为此书所写的书评《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文的内容告诉了他。我的书评并不是一篇捧场文章，书评肯定和赞赏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我对施坚雅提出的关于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观点，我作了充分的肯定。又如对斯波的《宁波及其腹地》一文，施坚雅在此书《导言》称赞：“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中国城市的英文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我在书评中则补充了施坚雅的话：“在我所读到的有关宁波城市研究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实在也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也批评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芮沃寿（A·F·Wright）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和牟复礼（F·A·Mote）的《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两文中都论及的所谓《宇宙论》，我认为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懂得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又如对拉姆科（H·J·Lamley）的《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一文，我认为作者没有学过地理学，不懂得地理环境在城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的这些言论，施坚雅听得十分出神。不久《杭州大学学报》出版了，而且，《新华文摘》在当年第8期基本上全部转载了这篇书评。说

明学术界对此书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出版界并不完全这样。

由于此书的名声确实很大，所以有一个出版社知道我们翻译此书，立刻欣然接受，并且列入他们的所谓“重点书”。但是当全部译稿到达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出版以后不会有很大的销路，“商品意识”促使他们把此书的出版拖下来，而且一拖十年。由于我自己没有参加此书的翻译，交稿以后，以为迟早总要出版，一直没有再关心此事。直到不久以前，朋友们下决心从出版社索回译稿与我商量之时，我才明白，此书名声在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先生眼中，毕竟敌不过“商品利润”。于是我才写信求助于陈砾先生。陈砾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并非历史地理学家，但是我深知他知识广博，眼光远大，又是多年与外文打交道，或许能够给我帮助。果然，在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刻挂电话给我，由他负责联系出版。接着，趁一次因公南下的机会，到舍下走访，说他已经找好了出版社，把译稿和原书一起带走。在搁置了十年以后，此书与中国读者见面，总算有日可计了。

就在陈砾先生离杭北返的次日，我收到马正林教授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校稿，要我为此书作序，这就是如前所述的在几天之中我和城市历史地理的第三次交道。接待章生道先生和陈砾先生的造访，应该说都是使我愉快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完了马先生的大作以后，我的愉快心情确实远远超过前述二者。因为这不仅是马先生的一种专著，而且更恰如其分地说，是一部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高等学校教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这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又一重大进展。因为大凡一门学科的形成，开始总要经过许多学者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积累起许多研究成果，然后再由若干学者，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总结，编写出有关这门学科的通论性著作，于是，这门学科就趋于成熟，从此可以加速发展。马正林教授从事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科研已经二十多年，而他之所以能编著成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除了他个人的非凡努力以外，同时也依靠这门学科领域中的许多学者，上述章生道教授的《有城墙的都城形态》当然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的一项杰出研究，而施坚雅教授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早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空前杰作。但是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马正林教授的皇皇巨著正是以许多前辈学者的专题研究为基础而编著出来的。上述我在这几天之中经历的这三件事，相互之间其实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实在是一种学术上的令人高兴的巧合。

我之所以认为马先生的这一成就，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进展，这是因为，在历史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城市历史地理学显然是一个热门，不论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我在拙作《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5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在中国，50年代以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曾经一蹶不振。正如我为侯甬坚先生所著《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提到的：“人文地理学被批判、排斥。学者们对此不仅裹足不前，而且视作畏途。”作为人文地理学成员之一的城市历史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先生的《丰镐——长安——

—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当时，城市历史地理著作在国内还相当少见。到80年代初期，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于1983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接着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于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似地萌发出来。这些研究成果仍然是专题性的著作和论文，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所以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通论性的著作，在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中，由城市历史地理学率先编著出版，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前面已经指出，此书是马正林先生在高等学校执教二十多年的成果，所以在我看来，它完全适宜于作为一种高等学校教材。作为一部教材，此书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至少具有完整、严密、创新三个特点。当然，这也是作为一部优秀教材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首先，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教材必须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的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前面已经指出，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熟。所谓学科的成熟，主要指的是这门学科，从理论到方法，从抽象的逻辑思维到具体的资料内容，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就是为这门学科编著教材的基本条件。否则，凑合若干专题研究的材料，那就只能称为“讲座”。现在，我所看到的这部教材，从绪论开始，内容包括十章。在论证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任务以后，分别讨论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墙、类型、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作为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这些章节，已经具备了学科的基本内容，可以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完整而系统的知识。以第七章《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为例，作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这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最具体和最基本的知识。教材把这一章分成著名都城和著名地方城市两类加以论述。前者包括13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7处著名都城；后都分成37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16处著名地方城市。学生学习了这二十多处历史城市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则中国历史上的最主要的著名城市已经基本包罗无遗。这样的教材，如能使用得当，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是完整而系统的，而且是扎实和巩固的。

作为教材，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科学上的严密性。因为教材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提供学生以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并且还应引导学生日后在城市历史地理方面的继续深造，让他们懂得在这门学科中做学问的方法，所以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对于学生来说，实在至关重要。而此书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赞许的。例子很多，不妨从卷首的《绪论》中举出一个。因为这部教材的内容集中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城市，而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实体，正如我为张步天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引述的、我于1983年在日本关西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话：“除了地理以外，以区域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学科又如此之多，在一个区域里，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比二三十年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城市也是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人文景观特别复杂的区域。研究城市的学科及其成果，真是汗牛充栋。为此，教材必须严格区别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和其他城市历史研究的不同，让学生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至于面对浩瀚的城市历史资料而手足无措。现在，教材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中，一开始就指出：“历史学所研究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着重于城市兴

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接着，教材在详细阐述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所研究的城市内容后，专门论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指出：“城市历史地理学既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所研究的城市就只能是地理实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城市区分开来。”

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开宗明义，是必须让学生彻底了解的问题。编著者在这方面的确下了极大的功夫，而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也就充分地体现。

最后，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而且也受编著出版时间的限制。在一门学科中，有的专著对其中某一问题研究得特别精深，另外，学者们每年每月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但教材属于通论性的著作，在学科领域中，它有面面俱到的任务，并不是一本论文集，不可能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某一专题。同时，教材的更新也显然跟不上学术界随时发表的成果。不过，由于教材供教师在课堂讲授之用，所有上述缺陷，都可以通过讲授加以弥补，每一门课程都是如此，毋需赘述。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着重说明，我把马先生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视作一部教材，绝未忽视他在这方面的创新。尽管作为一部教材，此书以后需要不断更新，但应该说，从现状来看，这是一部有创新意义的教材。这中间的不少创新内容，对我来说，也受到很大的启发，不妨也举个例子。

历史城市的研究者，不论是研究城市史、城市地理或其他方面，长期来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什么是历史城市？所谓城市，其本身不过是一种聚落，这种聚落能冠以城市之称，现代各国都有明确的指标，而这种指标基本上都是计量的。譬如人口指标是目前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城市的指标之一。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都有人口的计量数值。但对于历史城市，要获得各种计量数据，实在十分困难。施坚雅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计算，也无非得出了8世纪的长安（今西安）人口达100万，北宋的东京（今开封）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85万，南宋的临安（今杭州）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120万（《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导言》）。中国历史悠久，城市众多，要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城市的人口计算出来，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困难。在拙编《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引用日本学者狩野千秋综合西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意见，把古代城市形成的条件归纳为七个方面：即一、最原始的国家组织与王权的确立；二、稠密的人口；三、社会阶级的分化与职业的专业化；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建造；五、文字、金属器的发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六、由于剩余物质的生产而出现了有余暇从事知识性的活动；七、商业与贸易组织的发达。这七条，其实都是定性指述，完全没有计量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者，常常采用一种不得已的历史城市标准，即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就作为历史城市。我曾经在拙作《聚落、集镇、城市、古都》（《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一文中，无可奈何地抱怨这种标准，我说：

一般而论，这种标准或许可以作为权宜措施，但其实存在不小的偏差。例如，40年代初期，我曾到江西省东部的一些地方居位过，在那里，浙赣铁路线上有一个很小的县份横峰县。当地民谚说：‘小小横峰县，

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这个民谚显然是从明、清流传下来的（横峰原名兴安，明代始建县）。像横峰这样一个弹丸小邑可以称为历史城市，而附近存在着全国四大镇的景德镇和江西四大镇的河口镇，却因没有一个县政府而只能称为历史集镇，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其实，像横峰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并不罕见，清佟世恩所撰的《鲈话》一书中所描述的清广东恩平县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此县：城甚小，周围只有六百四十步，仅有两个城门，城内除县衙和学宫两座砖木建筑外，其余悉是草舍。就是因为有了一栋县衙，恩平就算一个历史城市。这就是这种行政标准所存在的明显缺陷。不过，在统计资料十分缺乏的古代，要在数量庞大的县邑之中区别哪些是历史城市，哪些不是历史城市，现在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在马正林教授的著作中，让我看到了，他已经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撇开这种被我所抱怨的“很不合理”的标准。他在第七章《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中，把“明清武汉三镇”作为历史上中国著名的地方城市加以论述。这中间的关键当然是汉口，这个所谓明清四大镇的著名聚落，按照行政标准，它一直要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脱离汉阳县的管辖而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但是马先生断然把它作为历史城市，写了二千字文章详细地记述了它在明清时代的平面布局及其发展变迁。对于历史城市的这个所谓行政标准，施坚雅实际上承认了它，而我虽然抱怨了它，却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它。是马正林教授首先突破了这个传统的框子，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创新。

所以，《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这本专著，按照我的体会，它完全称得上是一部高等学校的优秀教材。几天以后，我将出国作一次比较长期的访问，近来公私事务都比较繁忙，但在远行前夕，能够读到这样一部书稿，并且执笔撰写这样一篇拉杂的序言，令人不胜愉快。

陈桥驿

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绪 论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研究城市的论著相继问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中国城市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指导今天的城市建设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阐明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引导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就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城市兴起、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历史上的城市。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因此，也是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或者是重要方面。尽管如此，城市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城市，也是可以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有它明确的对象，这就是地理实体的城市。城市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各个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城市的形态也就有了差异。不过，只要它符合地理实体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指它要解决什么矛盾的问题。城市历史地理学就是要解决城市职能、结构、规模、风貌、总体布局与地理条件之间的矛盾，即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基础。地理空间是城市兴起的基本条件。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正是各类城市兴衰的地理特征。也只有这样，城市历史地理学才能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独立于其他城市科学之外。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必然会降低它的科学价值，影响它的发展。城市历史地理学虽然是历史地理学中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但还没有专篇文章来阐述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尽管牵扯到许多城市，也出了一批成果，但严格说来，许多文章都超出了城市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范围。这就无法使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文化史上的城市相区别，降低了它的科学价值和冲击了它的主要任务。

1. 历史学研究的城市

历史学所研究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着重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后者则着眼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历史学研究的城市加以分类，说明它与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可以区分，也应该加以区分的。

政治史上的城市或政治史所研究的城市，偏重于这个城市的政治职能，说明它是全国政治中心，或是省、府、州、县的政治中心，以及政治机构的设置与演变，政治机能的加强与衰退，政治势力所能到达的地区与范围，在

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等。当然，也会涉及到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状况，但不占主要地位。国都是以政治职能为主的都市，作为政治史研究的都市，就要首先阐明它是那些朝代的都城，建都时期的政治机构、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等，其次才谈到都市的经济、文化。那么，都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都市也有国都，但着重于国都盛衰的地理基础，政治机构、政治事件的地理空间，即使涉及到政治机构、政治事件本身，也要以地理特点为落脚点。不然，就和政治史上的都市毫无区别，失掉了都市历史地理学的价值。

经济史上的都市 经济史所研究的都市，主要阐明都市的经济职能，即工业、商业、交通、金融等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全国所处的经济地位。上海、天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商业都市，它们的迅速发展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有密切关系。从经济史上研究，就要首先说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上海的经济机构、经济实体（工厂、商行、银行等）和经济势力，以及对天津、上海经济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至于天津、上海的政治、文化状况，则只能占次要地位。都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都市，以经济职能为主的都市占相当比重，但它主要说明生产配置和各种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即工商金融业的布局，交通道路的干线与支线等，并从空间概念来分析是否合理、有无利弊。就是在分析经济状况的时候，也是以地理因素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显示都市历史地理学在都市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否则，就使都市历史地理学成为经济史的附庸，失掉了研究的意义。

文化史上的都市 文化史所研究的都市，主要说明这个都市的文化机构、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的状况，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文化影响的范围。同时，还要研究文化渊源、文化特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个都市文化水平的高低，主要表现在科研机构、各类学校、文化团体的多少，人才素质、论著和创造发明。也就是说，必须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分析属于那一级的文化都市，在文化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历史文化名城各有特点，但都以某个或某几个突出的特点跃入历史文化名城之林。像北京、西安以建都时间最长和文物古迹最多取胜，杭州、苏州以都市秀丽和园林闻名为优，泉州、广州以海路发达和海港历史悠久见长等等。这些都市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然对象。都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都市，历史文化名城也不少，但透过文化发展的状况，阐明地理条件对文化特点形成的影响和作用，使文化区空间明晰，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华清池是西安城东久负盛名的游览区，历史悠久，风景秀丽，如果只说明它是周、秦、汉、隋、唐诸王朝的游乐场所，不知道骊山和温泉，就会使华清池的文化特征顿时失色，园林风光也就无所附丽了。仅此一端，就可以说明文化史上的都市与都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都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不相同。

军事史上的都市 军事史所研究的都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设防的都市，或者具有防御条件和能够防御的都市。都市的山川形势、地形特征、城墙、城河、炮台，即所有的防御工程和军事设施，都在研究范围之内。就是这些工程和设施的质量、数量和防御能力，也无不受到重视。也就是说，和军事攻守有关的都市部位，都是军事史上都市的研究对象。由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都市都是政治中心，因此，往往建城设防，城墙、城河、城楼等，都是军事防御工程。这样说来，中国历史上的都市，也大都是军事史研究的对象。就是近代兴起的工商业都市，虽然没有坚固的城墙作为凭藉，但往往也

有军事设施，作为防御的基地。在战争年代，争城掠地比较频繁，每当发生巷战的时候，每座楼房、每条街道上的障碍物，也都可以作为防守的必要条件。因此，军事史上的城市，其着眼点就在于城市的军事价值和作用。至于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则在其次，并不占主导地位。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属于战略要地和军事攻守重心的也不在少数，但它的侧重点在于军事设施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分布状况，与其他设施的关系等。像西安城保存了全国最完整的城墙、城河等古代城堡设施，当然是军事防御工程。作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西安城，虽然也要涉及到古城堡，但侧重点并不是城墙的质量和防御能力，而是城墙的长度、宽度、高度和具体位置，城墙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开发利用的前景等。由此可见，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军事史上的城市，都要涉及军事设施，但着眼点不同，结论也就有了差异。

2.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

在说明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上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有本质的区别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论述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不然，同一个城市，为什么会成为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城市历史地理学又怎样与它们区分？就会使人困惑不解。城市历史地理学既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所研究的对象就只能是地理实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区分开来。所谓地理实体的含义，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城市兴起、发展与变迁离不开地理环境，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城址选择，也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原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上岗还是下原，平川还是丘陵，港口还是河湾等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选择是否正确，能不能使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会长期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许多城市的城址都在不断转移，而转移的主要原因则是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所造成的。西安、北京的城址转移，除人为的破坏外，也同争取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人们对城址的选择就十分重视。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在瀍水东、西实地勘察来选择城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城市，其城址都经过了精心选择，并不是随意定点建成的。另外，城市的土地利用类型、人口的地区分布、工商业的配置、文化设施的布局、政治机构网的位置、街巷格局和辐射地区、同周围市镇和乡村的联系等，都有其地理特点。这些地理特点的形成固然有其历史渊源，但它们都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产生的地理景观。这些景观，有些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有些则违背了城市发展的规律，给城市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今天的许多历史名城都有改造旧城区的任务，因为历史上的地理景观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极大障碍，不改造就无法前进一步。甚至有些县城还干脆抛开原来的老城，另辟新境，河南省濮阳市就是例证。

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城市基本特征的地理条件，既区别于其他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又使自己有了明确的对象，有利于本学科的发展，并大大提高了它的科学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就把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看成捉摸不定的东西。地理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综合性、区域性，城市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必须从综合、区域的特点来把握城市的发展，探讨城市演变的规律，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明确研究对象是学科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城市历史地理学已有了很大发展，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势在必行，笼统地讲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显然是不够的，也无益于本学科的发展。城市历史地理学只能把城市兴起、演变的地理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舍此而外，就会误入歧途，降低它的作用和价值。

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

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促进城市规划、城市布局、城市职能和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这一任务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完成的，而城市历史地理学则责无旁贷。

1. 研究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为城市规划服务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综合体，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它与乡村相对立，是一个地区、甚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处于领导或支配的地位。各个国家城市出现的时代不同，职能和结构也不一样。

《史记·货殖列传》精彩地描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和它们兴起的地理基础。《货殖列传》记载的城市共有 25 处，除大梁在秦国统一战争中遭到河水灌废，未被提及外，其他都是秦汉时代十分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之上，都有自己繁荣的地理基础。咸阳（今市东）、临淄（今淄博市）、蓟（今北京）、洛阳、温（今沁阳）、轵（今济源）、蜀（今成都）等，都是陆路交通的中心，而荥阳（今县东北）、彭城（今徐州）、睢阳（今商丘）、陈（今淮阳）、陶（今定陶西北）等，则是水路交通的枢纽，特别是陶，位于菏水运河岸上，交通发达，被誉为“天下之中”。范蠡曾弃越来陶经商，19 年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可见交通方便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故中国早期的城市多兴起于江河沿岸，或平原的中心。平原地区物产丰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交通四通八达，又使城市有了广阔的腹地。江河有舟楫之利，又可以为城市提供丰富的水源，故中国的城址就多选择在江河的沿岸。一般位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既可以解决城市供水，又不至于被洪水所冲没，所谓“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即指此。对于具体的城址，都要经过精心选择，“因天材，就地利。”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时，就对当地山川形势进行了勘察，并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图呈献给成王。对于城市的平面布局，也要事先进行量算，确定宫、市、坛、庙和居民区，一般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虽然是指国都，但对一般城市也有指导作用。随着社会经济、交通道路和自然条件的变迁，城址也经常转移，总体布局也不完全一样。西安地区最早兴起的大城市就是西周的丰镐，位于沣河两岸；再次兴起的大城市就是秦都咸阳，位于渭河两岸；第三座大城市就是汉都长安，位于渭河以南、龙首原以北；第四座大城市就是隋代大兴城，唐改名长安城，位于龙首原以南、少陵原以北。今天的西安城就是在唐长安城的行政中心——皇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秦、汉、隋唐有四次大规模的城址转移，除了人为的因素外，地理条件

《管子·乘马》。

《尚书·洛诰》。

的缺陷实在不容忽视。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愈有利于城市的发展。隋唐长安城所选择的城址平原开阔，水源丰富，又有“六坡”地形作为总体布局的骨架，是周、秦、汉三代的都城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选择了最有利的地理条件，后来的城市就在这里继续向前发展，再未移动过。北京、芜湖、临淄等城址的转移，也都与当地自然条件的变迁、经济发展与交通道路的演变有密切关系。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这些城市的兴起和变迁，对当前的城市规划、城市布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西安市的城市规划，就继承了唐长安城和明清西安城均衡、对称、棋盘式格局的基本特点，保持了古城的风貌。

2. 研究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

城市虽然是一个综合体，具有多种职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会以某种职能为主，影响城市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许多都是国都和地方的政治中心，以政治职能为主，像国都、省、府、州、县首府等，只有海港、码头和运河沿线的城市，虽然也具有某些政治职能，但毕竟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像泉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等。真正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城市，几乎是找不到的。当然，在许多城市中都规划了专门的文化区，像西安南郊、北京中关村等，但只是整个城市的一部分。只有陕西省的杨陵区，虽然尚未设市，但却是真正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县级区。这里是西北农业科学研究基地，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当然，城市的职能也有它形成、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职能的形成演变中，除人为因素外，地理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城市历史地理正是研究城市职能发展演变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

城市的不同职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地理原因也不能低估。在中国历史上，被选作国都的城市，其政治职能应该发展到了极限。国都选择在什么地方，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可是，山川形势险要、交通方便、物产丰盈却是选择国都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著名的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地理环境优美，只有开封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它是四大运渠的中心，交通上的优势却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随着国都地位消失，地理条件的变化，政治职能也就减弱。除北京外，六大古都中的其他城市已成为地方性的经济都会或政治中心。在六大古都中，开封的变迁尤为剧烈，最能显示出地理条件对城市政治职能的影响。由于开封位于汴河岸上，是隋唐漕运的咽喉，北宋统一全国后，就只能建都开封，使它由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一跃而转变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繁荣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北宋亡国后，开封失掉了国都地位（金迁都开封时间很短），运河也淤塞不通，它就迅速衰落下去，终于成为一个地方性的都会。开封政治职能的升格同运河有密切关系，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当然也同运河的淤塞有一定瓜葛。尤其是黄河养育了开封，但又经常威胁开封的安全，限制了它的发展。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除郑州铁路交通方便外，显然也同开封经常受到黄河的威胁有一定关系。直到现在，开封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洛阳，黄河的威胁自不待言。

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随着地理条件的变迁，盛衰也十分明显，扬州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唐代扬州的繁盛有似于今天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

城市。“扬州雄富冠天下”，“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都是对扬州繁荣的生动写照。唐代扬州繁荣的基础是长江和运河，因此，它是盐铁转运使的驻所，又是港口城市，海舟河船云集于此，扬州就繁盛无比。唐代以后，除政治原因外，港口地位的消失，实在是扬州衰落的重要原因。扬州城南的一段长江，宋代以前江岸南移，宋代以后江岸北移，造成扬州港口不是淤涨，就是崩坍，终于失掉了对外贸易的地位。加之运河的淤塞与变迁，扬州就不能不衰落下去。今天，扬州仍然是长江岸上的重要城市，扬州经济的起飞依然要靠长江和运河。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扬州市东边流过，如果能恢复扬州海舟河船的港口地位，扬州经济的迅速发展指日可待。将来东线调水成功，山东运河沿线的济宁、临清等城市又会重新兴盛起来，成为运河岸上的明珠。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城市经济兴衰的地理基础，能够为当前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城市文化区以文化职能为主，必须选择在地理形势最为优越的地方，以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西安南郊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地区，文化职能最为典型。这里北对古城，南望秦岭，环境优雅，实在是读书、科研的理想所在。城市历史地理学可以从城市文化区形成的地理特点及其演变诸方面，为今天城市文化区的设置提供依据。

城市的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城市历史地理学可以为确定城市的主要职能，发挥其优势服务。

3. 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服务

城市结构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指城市的地域结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也是城市发展中地理空间最突出的问题。一个城市在某个地区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腹地，又与周围城镇相联系，从地域结构研究它的特点，才能确定城市的地位。同时，阐明布局是否合理，有无地理上的优势。城市规模结构主要指人口多少，因为城市人口数量是城市分级的主要标志。在我国，100万人以上为特大城市，50至100万人为大城市，20至50万人为中等城市，20万人以下为小城市，具有10万人的城镇才能升格为城市。就一个地区来说，城市的规模结构应该是大、中、小相结合，相互促进，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国家对城市的规模结构，采取“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物质资源不可能承受许多大城市，只能大、中、小相结合，而且以中小城市为主。历史上西安是长期建都的地方，是关中地区唯一的大城市，然而整个关中地区却供养不起这座城市，必须从关东（函谷关以东）或江南转运漕粮，才能维持它的生存和发展。今天的宝鸡市只能发展成一个中等城市，绝不允许发展成一个大城市。因为宝鸡地处山原之间，土地窄狭，严重缺水，地理上的缺陷显而易见。关中平原土地面积有限，城市规模结构只能以中小为主，不能再搞大城市。

城市本身的人口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业结构也都有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根据人口分布和结构，探讨地理特点，促进合理布局，也是城市历史地

《新唐书》卷244下《高骈传》。

张祐：《纵游淮南》，《全唐诗》卷511。

王建：《夜看扬州市》，《全唐诗》卷301。

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职能结构既有城市之间的分工问题，也有城市本身布局是否合理的问题。一般说来，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和商业区都在市中心或交通方便的地区，而工业区则多集中在铁路沿线、江河两岸的码头地带，蔬菜、蛋、奶基地都在近郊区。土地结构是每个城市都会遇到的问题，合理安排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否则，就影响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工业、商业、交通、绿化、居住和蔬菜用地，必须要有适当比例，并严格控制。土地是城市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科学的土地结构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现在许多城市都感到土地紧张，正是失去控制、没有合理结构的结果。

历史上的城市与今天的城市有一定差异，但城市结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同样可以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做出贡献。

4. 研究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为建设城市新貌服务

城市风貌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除刚刚兴建的城市外，绝大多数都保留有历史风貌。长期建都的历史名城，保留有宫苑、庙坛、仓廩、市场、居住区等遗迹，甚至连城市的建筑风格、社会风尚、衣食住行都渊源流长，别具一格；运河沿岸的城市则与运河的开凿、变迁相依为命、盛衰与共，保留有漕运的许多遗迹，诸如航道、仓廩、码头、闸坝、船只、漕运机构驻地等，无不显示出水上运输的壮丽景象，扬州、淮安、济宁、临清等都是例证；海港城市总是围绕港口不断扩展，与港口有关的设施比比皆是，广州、泉州等正是如此；工商业城市的早期发展，都在水路码头、陆路枢纽地区首先打开局面，然后再不断扩展，上海、天津、武汉、郑州等城市都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上述城市各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历史悠久，未来的城市风貌也难于与历史渊源割断关系。

城市既然有它的发展史，在不同时代，其风貌也不尽相同。别的不论，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城市风貌就有明显的差异。宋代以前的城市多为封闭式，交易市场被限制在固定地方，居住区就是里坊，街道犹如胡同，显得死气沉沉。宋以后的城市趋向开放式，商店沿街布设，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凡是有居民的地方，也大都有交易市场，而交通要道一带则更是商贩云集、手工业兴盛，不仅人烟稠密，生意兴隆，就是街市风貌也与众不同。封建社会前后期这种明显的变化，除社会经济发展外，城市风貌的地理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唐长安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全国最大的城市，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宋代开封城和明清北京城相比，就显得呆板、封闭、落后和先天不足。这主要是唐长安城的位置偏西，距海较远，水路交通不发达所造成的。而开封、北京距海较近，水路交通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城市风貌就不能不具有水乡的特征。就南北城市而言，北方缺水，城市水域狭小，显得干燥无味；而南方多水，城市傍河依湖，水域广阔，生机盎然。不难看出，城市风貌的形成，除表现出它的时代特征、经济特征外，地理特征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安是一座历史名城，又是当前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它的城市风貌既有历史特点，也有现代文明，如何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建设西安新貌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西安市 1980—2000 年的总体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执行，未来的城市新貌是：“应在保持古都风貌的基础上，逐步把西安建设成为以轻工、机械工业为主，科研、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文明整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显然是古今有机的结合，作为未来

城市新貌的总体指导方针。西安城市规划处处体现了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基本特点，保护、利用文物古迹在西安城市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文物古迹都有它独特的地理基础，把它们连接成线，扩大为面，使城市风貌丰富多彩，可以为发展旅游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西安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古城风貌早已焕发了青春，旧貌换新颜，将长期得到保存。

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城市风貌形成的地理特点，使每个城市都具有完美的新风貌，这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5. 研究都市化的地理特点，为合理的都市化服务

都市化主要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过程。都市化的水平以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标志。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市化的水平很高，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像美国的城市人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76%（1985年）。我国人口众多，都市化的水平比较低，城镇人口仅有2.05亿人（1983年），占全国总人口的20%。近年来，都市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不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当掌握都市化的进程，已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多、面积扩大、人口增加也是很自然的。假若盲目加速都市化的进程，势必会给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困难。党中央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国情是底子薄、人口多、平原少、多大山，中国都市化也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才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把握中国都市化的进程，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有裨益。研究中国城市的地理特点和地域结构，就会为都市化的进程提供明确的目标，指导都市化的发展。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个城市的土地资源、供水条件、环境质量、物质供应、区域范围，才能确定它的等级，即人口多少和在一定地区的地位。根据多山、少平原的地理特点，可以预测未来中国都市化的水平，适当掌握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比例。

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少，数量也不多，还谈不到都市化的过程。不过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的地理特点，可以为合理的都市化服务，避免失误和不走弯路。

综上所述，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城市兴起、变迁的地理条件，它可以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服务。大力开展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促进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势在必行。

一、中国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城市出现的时代也就有了差异。

1. 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

关于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仍是目前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是中国城市出现的具体时代，因为考古上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古城，城也就是中国城市的雏形，或早期的城市。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之后，城市是由市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最早筑的城，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村落，具有真正规模的城市出现于春秋后期，战国时才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和市都兴起比较早，原始社会后期都已经出现。《黄帝内传》、《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古籍，都记载黄帝“筑城”或“鯀作城郭”。而且还特别说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显然是防御工程。这种防御工程并不是城市，和城市没有任何联系。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不仅文献记载“黄帝筑城邑”，“夏鯀筑城”，而且已得到考古上的证实。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筑城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分别在山东、河南和湖南发现了这样的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距今已有四千年之久。该城面积仅 0.17 平方千米。1994 年，又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屈家岭文化中期古城遗址，距今已有 4800 年之久，出土文物极其丰富。这座古城遗址的发现，不仅为长江流域人类文明史增添了光彩，而且把中国古城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一千年。接着，又在河南省郑州市北发现了距今 5300 年前的古城，把中国古城的历史推向了近 6000 年左右。尽管中国古城出现的很早，但仍然是防御工程，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城，就是用夯土筑成的高大墙体，展成一线称长城，围成一圈就是城。《墨子·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城是以防守为基本功能。城市则不然，它必须有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城市。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当在城中或城的附近设市，把城和市连为体的时候，就产生了中国早期的城市。

市是货物交换的地方，开始时物物交换，货币产生后就成为买卖的场所，即市场，和城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说是城市。《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卦名，设法以合物也）。”《世本·作篇》，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就说明，市与城也没有关系，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很相近。这种市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也并

杜瑜：《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 8 - 11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教学与研究》1962 年 2 期。

《专家认定我国最早古城》，《西安晚报》1994 年 3 月 16 日新闻报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95 年 9 月 16 日晚新闻广播。

不都是中国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国城市的时代认定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是不对的，当时虽然有城、有市，但并没有什么关系，前者为了“盛民”，后者为了“买卖”，毫不相干。这样的“城”和“市”早就存在，但各有自己的功能，二者之间也没有任何连系，只能看作原始社会的“城”和“市”，不能称之为城市。

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因为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在中国，只有到了城内或城的附近设市的时候才出现了城市。因为人口众多和有市场是城市的基本标志，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之为城市。仅有市而无集中的居民，或者仅有集中的居民而无市，仍然只能是单个的城或市，都不是特定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并不一定有城，但必须有市，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体，往往先筑城而后设市，城的地位和作用比市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中国城市的独有特点，不能以一般城市形成的规律来解释。西周的首都设市，一般诸侯国的都城也应该设市。《周礼》就有司市，市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市场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市有市门，定时交易，“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证明市区狭小，必须分次聚合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当然，设在中小城市的市，入市交易的人数有限，未必都如《司市》所言，分次聚合。西周时已形成早期的城市，但城市的称呼却出现很晚。日本人认为“‘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当时有商贾‘集中之地’、‘市’、‘都’的意思”。

2. “城市”名称的来源

中国城市出现于西周，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城市”一词。不难看出，城市兴起在前，概念形成在后，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出现城市的概念势在必行。《诗·邶风·定之方中》首先记载了春秋时卫“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的事，这应该是春秋时代最早出现的“城市”一词。不过，根据孔颖达的疏文，不应“城市”连读。他说：“文公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处，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始筑城立市，故连言之。”尽管筑城立市符合中国早期城市兴起的特点，但仍为单个的“城”和“市”，还不是我们所说的有关城市的特定概念。

关于中国城市的概念，出现于战国。开始称“置社有市之邑”，也就是指城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在游说齐缙王时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战国策》和《资治通鉴》中都有“城市邑”的称谓，也同样指城市。《战国策·赵策一》，赵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为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三年》，韩国为了阻挡秦国，愿献城于赵，“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促使秦、赵交战。胡三省说：“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大邑才具备城市的资格。《韩非子·爱臣》才明确提出了城市的概念，他说：“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城市一词终于

《周礼·司市》。

《城市问题百科全书》（日巩村英一主编，王君健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成为反映特殊地理实体的准确概念，一直延用至今。由此可见，直到战国后期，才有了城市的概念。当然，城市产生在概念之前，前到什么时代，笔者认为就是西周。西周的城市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还有一间之隔，由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程度和人口多少不同，城市的形态也就有了差异。概括地说，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城内设市以后产生的。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交叉路口、水路码头、军事要塞，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众多定居的人口，又有市场，符合早期城市的基本条件。

二、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

城址是指城市的具体位置和活动的空间。在建城以前，都要进行精心的选择，然后才划定区域，规划设计，修筑高大的城墙，圈定为城市的具体位置。被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中国早期城市的城址。

1. 城址选择的原则

平原广阔 平原是中国城市的摇篮。平原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水源丰富，物产丰盈，能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仅土地资源一条就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物产丰盈更使城市的发展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不在平原之上，《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货殖传》中以“都会”相称的城市，共有 13 处，即长安、洛阳、邯郸、燕（今北京）、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吴（今苏州）、寿春（今寿县）、番禺（今广州）、宛（今南阳）、江陵（今湖北江陵）、合肥、睢阳（今河南商丘）、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就是典型例证。不难看出，中国早期城市是平原孕育起来的灿烂明珠，犹如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闪闪发光。中国的大平原都在东经 110° 线以东，只有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例外。实际上，关中平原在自然区划上属于华北区的范围。这样说来，上述 13 个城市没有一个不在中国著名的平原之上。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洛阳、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宛、寿春、合肥都在华北大平原上；江陵、吴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只有番禺位于华南沿海平原。东北平原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平原，由于经济开发较晚，中国早期的城市没有一个首先在这里兴起。正如范蠡对越王勾践所说：“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证明平原自然环境优越，为中国城市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三大农业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也是中国城市最早兴起的地区，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水陆交通便利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必须考虑水陆交通条件，即交通方便。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涉及到一个广大的面，交通方便就必然成为城市兴起、发展的支柱和杠杆。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一例外，都选址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正如桑弘羊所说：“燕之涿（今河北涿州）、蓟（今北京），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齐之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阳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中，跨街衢之路也。”这段话极其精确、科学地解释了中国早期城市选址与交通道路的关系。

中国早期的城市大都是政治统治的中心，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春秋战国各国的国都，以及秦汉王朝的首都，如咸阳、长安、临淄、郢、新田、大梁、邯郸、阳翟、蓟等城市，无一不在交通要道之上。这些城市，像咸阳、长安是全国统治的中心，那么，全国的交通网也就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秦代通往全国各地的十条干线，就是以咸阳为中心伸展开去。

《越绝书》卷 8。

《盐铁论·通有第三》。

实际上，秦选择咸阳作为都城时，就是因为咸阳是控制关中东西大道的咽喉。关中地区的东西大道必须从咸阳渡过渭河，“咸阳古渡几千年”就是明证。属于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在选择城址时也是以它的交通地位为出发点。譬如，齐国占有今山东广大地区，临淄虽然偏处淄河的西岸，但却是古代东西大道的必经之地。由临淄向东，可直达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向西，可与邯郸、洛阳相通；向南，可与彭城相连；向北，可直达渤海湾，由此出海。临淄实际上是山东地区交通的中心。

城市是商业中心，只有把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才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形成经济都会。上述著名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邯郸、蓟、临淄、宛等城市，都位于陆路交通干线之上；陶、睢阳、江陵、吴、寿春、合肥、番禺等城市，都位于水路交通干线之上。春秋战国、秦汉以后的城市，其城址选择也都与交通便利有密切关系。

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也有利于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西汉长安城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不仅有全国最多的藏书，而且有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太学规模宏大，其遗址就在今西安西郊高压开关厂附近，汉长安城南安门之外。西汉末年，太学弟子增至三千人。这些人由地方考察，随上计吏进京，其进京路线，恰好就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水陆交通网。齐国临淄的稷下之学也有类似情况。

城市不仅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必须有广阔的腹地，才能够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中国早期的城市均选址于水陆交通干线上，就是为了就近解决供养问题。也就是说，城市需要农村供养，而提供供养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水陆交通方便。上述著名经济都会无一例外位于水陆交通干线之上，就是明显的例证。

地形有利，水源丰富 地形指城市周围的地形和城市内的微地形。就周围地形而言，城址必须选择在地形险要的地区之中，能够充分防御，以利于城市的安全。因为中国早期城市多因政治中心而兴起，城址选择对能否防御尤为重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建都关中平原，就是因为关中平原三面环山、东临黄河，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一座宏伟的城市从关中平原的中央拔地而起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其他城市的城址选择，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微地形往往是城市选址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把城址选择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之中，使城市处于有利地位，即即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能高低错落，宏伟壮观，同时引水也很方便。隋唐长安城选择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六坡”地形作为城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六条东西向的高坡并不是什么优点，但经宇文恺精心规划设计以后，却使长安城大放异彩，增大了长安城的立体空间，居然使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立体化，收到了奇异的效果，气势磅礴，绝无仅有。唐以前的扬州城也倚蜀冈（位于今扬州西北）而立，南临长江，既水路交通便利，又地形高亢，据险而守，雄峙于长江岸上，是重要的经济都会和军事重镇。苏州城址从选定之日起，再未变动过，就是同城址所在地的微地形有利密切相关。苏州位于太湖平原上，水网密集，城址依运河而立，三横四直的运河线就成为苏州城址的基本骨架，前临街、后临河就成为苏州城的基本特点，城址自然再无

法转移。

城址虽然受微地形的制约，但必须引水方便。扬州城高居蜀冈之上，前临大江，当长江南移后，商业罗城即转移到蜀冈之下，除平原广阔外，显然同引水方便有密切关系。隋唐长安城虽然有“六坡”地形作为骨架，但冈与冈之间的低地却是开渠引水的理想所在。尤其是低洼地带，更是开辟湖泊的良好湖址，像曲江池、大明宫太液池、兴庆宫龙池等都是例证。苏州城选址于水网中心，引水方便，自不待言。其实，每座城市在选址时，都要考虑到地形有利和引水方便这一基本原则。否则，就是选址不当，影响城市的发展，甚至于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好废弃，另选城址。

地形高低适中 《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也就是说，城址选择要注意地形高低得宜，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不是引水不便，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地形高低得宜，既可省去修筑沟防，又能引水方便，解决城市供水问题。《管子》虽然只就选择都城而言，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城址的选择。这样的城址，对城市布局也极为有利，台地可选作住宅，低地可作为市场、工厂、仓库区。大山之下的洪积扇，既有广阔的平原，又是水源最丰富的所在。北京的选址就是一个典型。北京城址就位于永定河的山前冲积扇上，平原开阔，水源丰富。因为山前洪积扇恰好是高低地形的结合部，为潜水溢出带，水源最为丰富。大川之上，也就是指河流的二级阶地，一般距河岸 20 米左右，既高而平坦，不易遭受洪水的袭击，又距河岸较近，引水方便，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都毫无例外地处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证明在人类文明开始时，选择居住地就离不开河流的二级阶地。后来的城址选择，虽不尽然，但河流的二级阶地仍是选择城址的理想所在。西汉长安城就位于渭河的二级阶地之上，发展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都城之一。

地形高低得宜，应该是自古以来选择城址的基本原则。因为它具有地形高而平坦，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城市用地问题，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同时，水源丰富，能充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为城市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气候温和，物产丰盈 气候条件是人类生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人们都愿意生活在气候条件优越的地区，即气候温和，冷热得宜，雨量充足，干湿适中。城址选择更应该如此，因为城市是人口集中的所在，更需要优越的气候条件。根据对全世界 20 万人以上城市的统计，热带城市占总城市的 7.6%；干燥带占 5%；温带占 72.6%；冷带占 14.8%；寒带 0%。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城市分布在温带上，证明温带气候冷热得宜，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可见气候条件也是影响城址选择的重要原则。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只要具备选择城址的基本条件，当地又有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出现城市。

物产丰盈指农、林、牧、副、渔、矿、水等各种物质资源，它们既能为城市的兴起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又能因分布地区不同，影响城址的选择。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占有城市的绝大多数，它们都分布在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中，而且往往处于中心地位，成为农产品集散的所在。这类城市，

其城址必然选择在农业地区的中心，既能使城市最大限度地得到供养，又能使农产品迅速集散。矿业城市的选址必然距离矿产资源很近，因为它是指挥机关的所在地，又是矿工的居住地和满足矿工生产生活的供养地，不能距离矿区太远。海港城市的选址，必然离不开优良的港口，因为这是海港城市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优良的港湾为港口城市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港湾都能形成港口城市。这主要取决于广阔的腹地、丰富的物产和海路交通路线。当然，优良的港湾是港口城市选址的基本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其他各类城市而言，城址的选择也必须具备物产丰盈这个基本条件，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会昙花一现，或始终处于落后的地位。

2. 城址的转移

城址选择得当与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也就是说，选址得当，有利于城市的发展，相反，就限制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性质不同，选址的要求也就有了差异。譬如，以防御为目的的城市，城址就必须选择在地理形势险要的地区；以航运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选择在江河沿岸或港口码头地区；以采矿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靠近矿区；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选择在交通要道之上；以旅游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选择在风景区的近旁，或具有多种名胜风景功能的地区等等。当然，一个城市具有多种职能，城址选择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尽管城址的条件千差万别，但城址选择得当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即规模大小、发展快慢、环境质量优劣等。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初选择的城址未必都是恰当的，因此，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址转移。在中国历史上像苏州、成都这样城址从未转移的城市，数量并不很多，而大多数城市都有过城址转移。其原因是最初选址不当，或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城市得到更大的发展。

由于选址不当而使城市终于废弃的也为数不少。这类城市有些因水源难于解决而废弃，有些因受沙漠威胁而废弃，有些则被河流圯毁或被湖泊所湮没，终于成为废墟。西汉的美阳县位于今陕西扶风法门镇，东临美阳河。由于河流下切，地下水位下降，用水困难而废弃。实际上美阳县城选址于今法门镇，当初选址就不大妥当，恰好位于山前水流溢出带的空白地带，地下水位深，打井本来就很困难。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北的白城子，是十六国时期夏国的都城统万城的遗址，后来曾是唐宋夏州城的所在地。夏国当初建都于此，证明当地水草丰茂，具有建都的有利条件。然而，这里地下沙源丰富，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势必风沙漫延，成为风沙区。到了宋代，终因夏州深处沙漠之中，随时都有被沙漠埋没的危险，才不得不下令放弃。位于山西万荣县的宝鼎镇，也就是唐代的宝鼎县和北宋荣河县的所在地。1923年，荣河县迁至宝鼎镇以东的荣河镇，就是因原来的县城不断遭到黄河的圯毁，才不得不迁移。今宝鼎镇已被黄河圯毁一半以上。荣河县在建国后与万泉县合并，称为万荣县，县治东移解店，而新的县城又受到沟头的威胁。唐代的泗州城位于今安徽盱眙县北，为漕运咽喉，汴河与淮河在此相汇，商业十分兴盛。明清两代不断加高高家堰，以抬高洪泽湖的水位，使洪泽湖迅速膨胀，淮、湖也合为一家，不分彼此了。位于淮河岸上的泗州城，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终于被汹涌的洪泽湖所吞没，沦入湖底。近年来，每当淮河流域天旱少雨时，洪泽湖水位下降，泗州城垛仍可露出水面。位于黄土高原上的许多州县城，都因水土流失严重被沟冲毁而废弃。位于今陕西洛川县东北的旧县，也就是原来的洛川县城，已被沟头所冲毁。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刘渊所建都的左国城，

位于今山西方山县峪口乡北川河东，城址已被 12 条大沟所分割。位于甘肃庆阳西峰市东北的唐彭原县城，已三面临沟，并有一条大沟冲进城内，长达五六十米。陕西神木县北的杨家城，即唐宋麟州城，为一座军事重镇。该城址位于窟野河东岸，河岸陡峻，沟头已严重威胁它的存在。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比比皆是。上述被废弃的城市，不管何种原因，都和当初选址不当、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有密切关系。

当然，许多城址的转移，则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城市继续向前发展，人为地放弃旧城，另选新址。西安城址曾有四次转移，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西周的丰镐城是西安地区最早的城址，位于沔河两岸。丰京位于沔河西岸，镐京位于沔河东岸，相距甚近。

丰京位于沔河西岸，由于年代久远，对于它的具体位置，历来都有争论。根据考古发掘，在今沔河西岸的客省庄、马王村、曹家寨、张海坡、大原村、冯村、东西石榴村等，东西长 5 千米，南北宽 2.5 千米的范围内，西周遗物特别丰富，除铜器、陶器以外，还在沔西乡所在地发现了多处西周车马坑。既然当地有丰富的西周遗物出土，又有许多车马坑，丰京应该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从丰京所在地区的地理形势来看，这里恰好位于沔河的二级阶地之上，符合古代选择城址“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原则。根据实际踏勘，沔河西岸的地势略高于东岸，而且水源丰富，东有沔河，西有灵沼河，还有灵沼等湖泊，使丰京可以得到充足的水源。

周文王迁都丰京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又把国都从丰迁到了镐。镐京位于沔河东岸，史称宗周。武王迁都的原因，是由当时政治发展的形势和地理上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就地理条件而论，丰京范围较小，又受到沔河、灵沼河的限制，无法进行扩建，只有向沔河东岸发展，才是它的唯一出路。因为沔河以东地势更为开阔，并有高阳原（今斗门镇东北）可以选作城址，既使都城有回旋的余地，又接近漕池和漕水，使城市供水更为方便。镐京就是因漕池、漕水而得名的，其城址选择当然与二者有密切关系。根据考古发掘，今沔河东岸的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洛水村、上泉北村、白家庄等，东西长 1.5 千米，南北宽 4 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西周遗物和墓葬，镐京遗址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在斗门镇的西周遗址中发现了板瓦，完全证明与都城的建设有关。由于汉武帝时开凿昆明池，破坏了镐京遗址，致使镐京遗址的大部分沦入池底，已难于找到它的踪迹了。在开凿昆明池时所发现的人类活动的遗物和灰烬，正是镐京遗址的铁证。

西周末年，由于犬戎入侵，周平王迁都洛邑，丰镐终于被废弃。

秦国有九次迁都，最后定都咸阳。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 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由栎阳（今临潼东北武屯一带）迁都咸阳，有利于秦国东出函谷关与六国争锋。咸阳位于渭河中下游分界处，是控制关中

中科院考古所沔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 年 6 期。

中科院考古所沔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 年 6 期。

徐锡台：《论周都镐京的位置》，《陕西师大学报》1982 年 3 期。

《汉书》卷 65《东方朔传》。

《观堂集林》第 529 页。

《史记》卷 5《秦本纪》。

地区东西大道的咽喉，自古以来，凡东来西往的人都必须从这里渡渭，“咸阳古渡”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东西大道是关中地区交通的主干道。由于咸阳以东的渭河北岸有泾河、石川河、洛河等大川，横渡上述河流并非易事，故东出的道路就必须从咸阳渡渭，沿渭河南侧出函谷关；与此相反，咸阳以西的渭河南岸有涝河、黑河等大川，而渭北的咸阳原东西二三百里却没有一条河流，地形平坦，从咸阳西行，当然以走咸阳原最为理想。同时，咸阳附近的渭河河势顺畅，两岸土质坚硬，有“十里长峡”之称，河道很少摆动，容易建立渡口或修建桥梁。秦国选择咸阳建都，主要是为了发挥水陆交通上的优势，使咸阳成为居中指挥的司令部。

秦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以东的长陵车站、窑店镇和萧家村车站一带，遗址清晰可辨。它背原临河，地形十分有利。也就是说，既有雄伟宽广的咸阳原修建宫殿，又有一平如砥的渭河川道布设居民区，地理上的优势显然胜过丰镐。当然，秦咸阳横跨渭南北，渭北部分属于今咸阳市，而渭南部分则属于西安市区。因为秦咸阳的建设经过了几个时期，规模不断扩大，终于把渭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也囊括在内。渭河以南有皇帝游猎的上林苑，又有著名的阿房宫、章台宫、信宫和兴乐宫（汉长乐宫），已成为秦咸阳另一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由此可见，秦咸阳在发展过程中，向渭南扩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因为咸阳倚原临河，使城市发展受到了限制，“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室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就是指此而言。渭河以南地势低平，水源丰富，与渭北的缺水状况形成鲜明对照。“二川溶溶，流入宫墙”，说明阿房宫的供水十分充沛，是咸阳诸宫无法比拟的。直到现在尚未发现秦咸阳的供水渠道，仅有排水管道。城市供水困难可能是秦咸阳逐步移向渭南的重要原因。秦咸阳的城市供水主要依靠井水，有已经发现许多密集的水井为证。当然，咸阳原上缺少河流，也无法引水入城。原下地势低平地区则可能引用兰池水。兰池遗址就是今杨家湾和肖家村车站之间的一大片洼地，秦代在兰地附近修建有兰池宫。《秦记》云，秦始皇“引渭水为池……逢盗之处也”，足以证明兰池是为解决咸阳的城市供水而开辟的人工湖。咸阳规模宏大，仅靠井水显然无法解决供水问题，更不用说开辟风景区了。

秦代末年，咸阳迅速毁灭，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整个咸阳处于火海之中，堂堂一代帝都，顿时化为灰烬。今天的咸阳市仅沿用了咸阳的名称，位置向西移动了15千米。

刘邦迁都关中以后，并没有去清理咸阳的余灰，而是暂住栌阳，另择新都。新都城址被选择在秦咸阳渭河以南宫殿群中的长安。长安本来是秦咸阳郊区一个乡聚的名称，自从西汉建都这里以后，才成为都城的称谓。西汉长安与秦咸阳的关系十分密切，“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即指此而言。但汉长安城所选择的城址比秦咸阳要优越得多，平原开阔，地形高低得宜，水源丰富就不能不成为它的特色。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西北郊的汉城乡一带，城墙断续存在，各种遗迹也随处可见。

由于秦岭山脉在西安城南折向东北去，造成西安地区的地形东南高而西北低。发源于秦岭山地的灞河、泾河和泾河等，均受到这种地形特点的制约，

《三辅黄图》卷1引《秦记》。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三辅黄图·序》。

纵贯西安东南地区，趋向西北入渭。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区的平原，使其成为东南、西北向的长条形。比较而言，只有灞、浐与潏河（下游即今泾河）之间的这块平原最为开阔，东西宽约 17 千米，南北长约 40 千米，以龙首原为分界线，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单元。龙首原位于西安城北，头起广泰门，尾至三桥车站一带，呈西南、东北走向，犹如一条长龙横卧在那里，故有此名。原头高 20 丈，尾高五六丈，东西长约 60 里。西安北门外的龙首村，恰好位于龙首原顶上。汉、唐长安城就兴起于龙首原的两侧。龙首原以北，地势低平，向渭滨倾斜。汉长安城南倚龙首原，北濒渭河，西临潏河，东近灞、浐，选择了西安地区地势最为平坦的一块。这块平原坦荡无垠，东西宽 17 千米，南北长 10 千米，为兴建规模宏大的都城提供了优越的地理基础。它既有龙首原设置宫殿，又有广阔的平地布设居民区。同时又能从西南方向引泾河、潏河解决城市供水问题。汉长安城周长 25.7 千米，面积 36 平方千米，几乎是西安城的 4 倍。汉长安城的规模之所以胜过丰镐、咸阳，显然同它所选择的有利地形有关。当你进入汉长安城，向四面瞭望，真是渭河如线、秦岭直上云端，而脚下的平原一眼看不到边，实在平坦而广阔，西汉选择城址当然舍此而无他。整个地形由南向北微微倾斜，直达渭河之滨，因此，从城西南引水，可以纵贯全城，自流而北，排入渭河。这不仅对城市自流供水十分有利，而且对防汛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长安城的宫殿规模宏大，占地广阔，正是土地资源丰富的必然结果。西汉时政治斗争的重心在西北，把都城城址选择在渭河以南，除平原广漠外，渭河为关中大川，横贯长安城北，也为长安城增加了一道重要防线，使它更加安全。城址紧濒渭河，也有利于发展渭河水运，解决长安城的粮食供应问题。当然，由于受到渭河和龙首原的制约，也为汉长安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汉长安城的北墙缺其西北角，呈西南、东北走向，就是受到渭河流向制约的结果。城市供水也只能从西南方向导引，显然同龙首原的阻隔有一定关系。

灞、浐与潏、沔之间的这块平原，汉长安城占据了它的北部，而南部则地势起伏，愈向东南，地势愈高。可是原面开阔，使都城有足以回旋的余地。隋文帝既然要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汉长安城，就只能在龙首原以南选择新都城址。隋代终于选择了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一块平原，建设新的都城。这块平原也就是今西安城及其附近郊区所在地，大致在 400 米与 450 米等高线之间。因为除此而外，再很难找到与此相仿佛的一块平原。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翻开西安地区的地形图，就可一目了然。譬如，灞河以东也有一块平原，但逼近秦岭，面积狭小，不宜于选择城址，潏、沔以西平原开阔，但却有几条小河把平原切割成南北向的长条，使都城难于有回旋的余地；少陵原原面广阔，但地形高亢，选作城址，会使城市供水发生困难。那么，长安附近唯一能够选作城址的就只有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这块平原。这里平原坦荡，六坡起伏，使宇文恺的设计理想能与现实地形达到奇妙的统一，又能从东西两面引水入城，其有利条件远远胜过了汉长安城。尽管在 400 与 450 米等高线之间仍有不少高地和低地，但基本平坦，高低差很小，像 400 与 410 米等高线之间的距离就宽达 2~3 千米，这在西安地区是独一无二的。隋代新都的总设计师宇文恺，所以选择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平原作为新都的城址，除平原开阔、引水方便外，也同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大致有六条东西向的高坡有密切关系。因为宇文恺以《周易》的乾坤理论作为新都设计的指导思想，就一定要在现实地理环境中找到对应物，这就是“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

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龙首原所以在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上久负盛名，就是由于它的名称和形状被神化了的缘故。宇文恺把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乾之六爻，并按“九一（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上九）”的顺序排列下来，布设不同的建筑物，以体现《周易》的指导思想。经过他的精心选择，终于在长安地区找到了一个地形最为优越，引水最为方便，又能体现《周易》乾坤理论，使都城有足以回旋余地和高低错落布设建筑物的最佳地理位置，即隋唐长安城的城址。

今天西安城的城址也就是唐代的皇城，是在皇城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的。唐末，长安城废不为都，失掉了国都地位。然而，长安城仍是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都会。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以皇城为基础，重建长安城，这就是唐末五代和宋元的长安城。皇城所以能成为重建长安城的基础，是因为它的面积小于外郭城，大于宫城，面积适中，又占据“九三”高地，形势险要，足以作为固守的阵地。同时，从东、西两面引水都很方便，使新的长安城有充足的水源。明初改长安为西安，扩大了它的范围，把北墙、东墙向外展出了三分之一左右，修建了坚固的城墙。现存的西安城就保持了明初的规模，城址再无任何变化。唐代以后的长安城和西安城，在隋唐长安城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证明隋唐长安城选择的城址最为优越。今天的西安城又占据了隋唐长安城中的精华地区，地理形势最为有利。西安城位于400米等高线以上，而在400米与410米等高线之间，平原最为开阔，使整个城址位于最为平坦的地区。正因为如此，西安城雄峙于关中平原的中部，得天独厚，城址再未转移，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

西安地区的城址选择经历了由西南到东北，又折向东南的转移过程。周丰镐占有沔河两岸的低平之地，秦咸阳横跨渭河南北，以渭北为主体，地形有高有低，汉长安城又转移到渭河以南，以龙首原为依托，处在西安地区高低地形的过渡地段，只有隋唐长安城转向东南，地势愈来愈高。这种转移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规律的。西安地区的地形特点是东南高而西北低，与关中平原西高东低的地形特点略有差异。城址由低地向高地逐步转移，是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提高有密切关系。早期的城址地势较低，是因为容易开发利用和解决城市供水问题，晚期城市向高地转移，使城市范围不断扩大，立体空间更为突出。特别是能够开凿渠道，从较远的地方引水入城，使城市供水更为充沛。汉长安城的供水状况胜过周丰镐和秦咸阳，而隋唐长安城的供水状况又胜过汉长安城，都是明显的例证。就四处城址比较而言，以隋唐长安城选择的城址最为优越，既有平原开阔，使都城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可从东、西两个方向引水入城，左右逢源。同时，距沔、渭较远，可以不受洪水的威胁，使城市处于安全地带。另外，城址移向东南，靠近灞浐，接近东出大道，对水陆交通都极为有利。隋唐长安城选择的城址，地形有一定起伏，既有高地布设重要建筑物，又有凹陷地带凿成湖泊，开辟风景区。而冈原之间的低地，更是布设渠道的理想所在。隋唐长安城水域广阔，湖泊星罗棋布，渠道密如蛛网显然是城址优越的必然结果。不难看出，尽管历史上的西安城址不断变迁，但越变越有利，终于选择了西安的最佳城址。

北京、洛阳、临淄、芜湖、兰州等城市的城址转移，也有类似情况，即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由于人为的破坏，太原城址的转移则恰好相反。

北京最早的城址即春秋战国时代燕国的首都蓟，位于北京小平原上。这里三面环山，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并有许多湖泊沼泽，分布在北京小平原的东南一带，永定河则从它的西南穿行而过。古代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大道，只有渡过永定河以后，大道才形成分岐点，即通过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三条大道的分岐点，这就是最早的北京城的城址，位于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永定河的渡口所以未被选为城址，就是由于永定河经常泛滥，城址只能选择在距离渡口不远处的大道分岐点上。秦广阳郡、汉广阳国、隋涿郡、唐幽州，以及辽的南京城、金中都城，都是蓟城的延续和发展。元代的大都城则以金代中都东北的离宫——大宁宫为基础，另选新址，为今天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元代所以放弃中都，除中都城早在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已被蒙古骑兵焚之一炬、残破不堪到了极点外，也同中都东北水源丰富、宜建新都有密切关系。尽管中都与大都之间的距离并不很远，但从城市供水的角度看，变化却是很大的。北京最早的城址之所以选择在广安门一带，因为这一带是由莲花池等大小湖泊和由莲花池发源的一条小河（即洗马沟）组成的莲花池水系，水源丰富，能够满足一座城市的需要。元代大都城选址于中都东北的高梁河水系，意义重大。莲花池水系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初期，确实满足了城市供水的需要。但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规模的扩大，莲花池水源有限，已不能满足一个新的城市的需要了，选择新址，势在必行。鉴于金代解决漕运的失败，必须选择更丰富的水源，建设新的城市，而高梁河水系正是这一选择的理想所在。一座新的、规模更大的城市终于拔地而起，这就是元代的大都城。水利专家郭守敬是解决大都城供水和漕运的主要奠基人。元代重开金代运河时，郭守敬改由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会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东南流入大都，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然后循金代运河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既解决了大都城的水源，又开通了运河，使大都城成为一座水源极其丰富的大城市。明清北京城就是元代大都城的延续和发展，城址再未转移，证明元代所选择的新城址，地理条件是最为优越的。

洛阳最早的城址就是周公营建的成周城，因为后来成为王都所在，故又称王城。它位于洛河北岸、涧水与瀍水之间，或者横跨瀍水。在今洛阳市中州路王城公园一带已发现了东周王城遗址，也可能与西周成周城有继承关系。

汉魏洛阳城是成周城的郊区，被称为下都，位于今洛阳市东15千米处，即白马寺东1千米。这座城是秦相吕不韦修建的，吕不韦被封为洛阳10万户侯，即为此邑。西汉时宫殿仍在，刘邦曾“置酒洛阳南宫”。东汉光武帝即位后，正式定都洛阳，后来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均建都于此。东汉所以选择洛阳建都，一方面是西汉的都城早已破坏无余，另一方面也同洛阳的地理条件优越有密切关系。这里背靠邙山，面对伊阙，“形胜甲于天下”，是邙山、洛河之间地形比较开阔的所在，能够南临河，北倚山而建城，故汉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魏洛阳城就选址于此，而不在西周的成周（王城）建都。

隋大业元年（605年），改营东京城，放弃汉魏洛阳城，把城址西移18里，即今洛阳市及附近郊区所在地。隋代洛阳城址所以西移，主要是为控制伊、洛、瀍、涧四水，使城市供水更为丰沛，交通更为便利。隋代的洛阳城规模宏大，背靠邙山，面对伊阙，东过瀍水，西踰涧水，洛河横贯其中，为四河纵横交错的中心。隋代的南北大运河就是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南、东北辐射出去，使洛阳成为全国水运的中心。洛阳城址西移后，控制了伊、洛、瀍、涧四河的谷口，也成为洛阳平原陆路交通的枢纽。由于隋代选择的洛阳城址最为优越，使河南、洛阳“合二为一”，唐亦称为东都，武则天更名神都，长期居住于此。今天的洛阳市就是隋代东京城的延续和发展。今天的洛阳老城，是金代利用隋唐洛阳城内的东城向东扩展而建成的。

今天的芜湖市起源于汉武帝所设置的芜湖县。其城址就是位于芜湖市以东40里的鸠兹城，当地群众称为“楚王城”。城址位于一片侵蚀残丘向北延伸的尽头，地势高峻，周围原来是一片沼泽地带。它北临古代的中江，中江东连太湖，西通长江。鸠兹正是能够控制东西水路交通而兴起的一座城市。

三国时，孙吴设置的芜湖县，城址已转移到今芜湖市区东南隅的鸡毛山。鸡毛山紧傍青弋江北岸，西去青弋江入长江口不到10里。由于东汉以后中江地位的降低，青弋江为长江支流，反而后来居上，水路交通地位日益重要，芜湖城址就不能不向青弋江转移。尽管5世纪以后，由于战乱，芜湖县曾被撤销，但作为一座城市的芜湖却继续向前发展。10世纪再设芜湖县，仍以鸡毛山为城址。

芜湖城址定于鸡毛山以后，虽然再未转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江航运的发达，城区则不断沿青弋江向长江口岸发展，形成了所谓十里长街的带状城市。1840年鸦片战争后，芜湖城外沿长江一带被划为租界区，使芜湖城区由青弋江岸上迅速转移到长江岸上，形成新的市区。

临淄城址的转移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临淄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从兴起到发展，城址并未转移，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一座新的城市兴起，取临淄而代之，临淄则衰落下去。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城址转移的另一种类型。

临淄位于鲁中山地北麓的淄河西岸。早在殷商时期，从中原通往山东半岛的东西大道，就是沿鲁中山地北麓东西一线展开。临淄不仅位于这条大道之上，而且控制淄河的渡口，因此就发展成为山东地区最早的城市。

西晋末年，随着山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的开发，通过鲁中山地北麓的大道南移，临淄远离交通大道，位于这条交通大道之上的益都（今青州）反而兴盛起来，后来成为唐代青州的治所。

清代初年，通过鲁中山地的东西大道，原来经过白云山（或称长白山）北麓，后来穿过白云山南麓的谷道则成为捷径，位于这条谷道口的周村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

清代末年，胶济铁路（胶州湾到济南）利用山南谷道，周村的地位就更

《读史方輿纪要》卷48《河南府》。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4期。

加重要。位于胶济线上的张店，又是通博山铁路支线的起点，建国后又把这条支线向北伸延，张店遂成为十字形铁路线的中心，地位甚至超过了周村，一跃而成为今天淄博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与张店、周村相类似的就是辛店。辛店位于临淄城南 20 里，正好是东西大道南移后的必经之地，胶济铁路建成后地位更加重要。近年来又修建了从辛店向南的铁路支线，辛店遂取临淄而代之，成为淄博市临淄区的行政中心，临淄就显得十分偏僻。

今天的兰州市兴起于西汉的金城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 31 年）置金城郡。据说金城郡治金城县，县城为李息所筑，大约位于今兰州市的西固区。这就是今兰州最早的城址。金城县恰好处于羌戎之间，西控河湟，北扼朔方，“陇右安厄，常系此地”。由于这里群山环峙、“控河为险”，易守难攻，又是控制河湟和河西走廊的咽喉，地理位置优越，山川形势险要，终于成为中原王朝控制西北的重镇。尽管后来金城郡治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不断迁移，但金城县却一直存在，只是西魏时曾改金城县为子城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年）改郡为州，置兰州总管府，并把子城县（大业时改名金城）迁至今兰州市城关区。兰州之名始见于此。这次城址迁移，除适应政治斗争的形势和交通道路的变迁外，主要是为了把兰州城址迁移到兰州盆地的中心，使兰州成为控制大西北的前哨阵地。这里群山环抱，平原开阔，土地资源丰富，黄河横贯其间，有建成大城的一切有利条件。隋代以后兰州城市迅速发展，政治、军事地位不断提高，而城址再未转移，正好证明隋代所选择的兰州城址，地理条件是最为优越的。

太原城兴起很早，位于今太原市西南的汾河以西、晋祠以东地区。公元前 497 年，赵鞅命董安于修建晋阳城，后来尹铎又继续修筑，称为晋阳城。

晋阳城建在汾河以西、晋水之北，郦道元说：“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城址在今天太原晋源一带。这里西有悬瓮山，西北有蒙山，山环水绕，易守难攻。赵鞅所以选择太原盆地修建晋阳城，从春秋时晋国的形势看，晋阳城远离当时晋国国都新田（今侯马西北牛村），偏居晋中，在这里选址建城，首先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其次，赵鞅以晋阳为基地，向北拓展疆土，扩大赵氏的势力范围。赵襄子时赵国逐渐强大，于是兴兵西北部，赵国的势力达到雁门、平城一带，解除了“戎狄”的威胁。“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三家分晋后，晋阳是赵国国都，是赵国早期政治、军事中心。苏秦说赵王，“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实践证明，赵鞅选择太原盆地建城，以及把晋阳作为基地向北开拓，对山西中部、北部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这座城市选址得当，地形有利，水源丰富，是开发太原盆地的适中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 年 4 期。

《汉书》卷 7《昭帝纪》、卷 28 下《地理志》。

王宗维：《汉朝对金城的开发与建设》，《兰州学刊》1988 年 1 期。

《隋书》卷 29《地理志》。

《论兰州城市兴起的地理基础》（油印稿）。

《水经注》卷 6《晋水注》。

《战国策·赵策》。

地点，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年，历时达 1470 余年之久。尤其是在隋唐时代，晋阳城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以及著名的经济都会。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由于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建立了唐王朝，太原的地位更加重要，武则天时代曾在晋阳设北都，后称北京。太原一名是战国以来太原郡名称的延续，唐置太原府，并置晋阳县和太原县。

唐代晋阳城市建设发展很快。贞观十一年（637 年）并州长史李绩主持修建汾河以东的东城。武则天时，崔神庆“跨水连牒”，修建中城，将西、东二城“合而一之”，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晋阳三城。晋阳城规模空前，周回 40 多里，跨河而建，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观。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以兵攻与水淹相结合，历时五个多月，才攻下晋阳城。宋太宗以晋阳“本维藩镇，曾以山川险固，城垒高深，致奸臣贼子违天拒命，因其悖逆，连误军民”，下令彻底破坏晋阳城，改为平晋县，将并州治所迁至榆次。“遣使分部徙民居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为了彻底杜绝晋阳城的复兴，第二年又引汾、晋水灌冲城垒。晋阳城遭火烧、水淹，成为一片废墟，唐代的晋阳三城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北宋不得不重建晋阳城，但城址已向北移动 45 里，位于汾河东岸，为今天的太原城奠定了基址。

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潘美在晋阳城北 45 里处的阳曲县唐明镇修筑了一座土城，并将并州治所从榆次移于此，成为宋以后太原城发展的基础。潘美所筑的城，规模很小，周围仅有 10 里。到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 年），才重新设立太原府，为河东路治所。

唐明镇位于太原盆地的北端，夹处两山之间，汾河纵贯其中，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宋史·地理志》说：“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太宗平太原，虑其恃险，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这里地理形势险要，当交通之咽喉，在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处在三国边界的联结点上，“其地控扼二虏”，对维护长安和都城汴梁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潘美在阳曲唐明镇筑城，一开始便给这座城市带上了军事色彩，唐明镇处在太原盆地的北端，东山西河，着眼防备辽兵的南下。

由于新的太原城军事地位重要，又无法被其他城址所取代，宋、元、明、清的太原城就一直延续发展，终于成为山西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尽管北宋的太原城址不如原来的晋阳城址优越，平原狭小，地面水源也不甚丰富，而且容易受到汾河洪水的威胁，但毕竟还有延续发展成为大城市的有利地理条件。这就是地下水源丰富，交通方便，可以充分利用山区提供的矿产资源。然而，两相比较，晋阳城平原舒展，汾晋交汇，西倚悬瓮山，有“山环水绕，原宽平”之称。而北宋选择

《隋书》卷 30《地理志中》。

《新唐书》卷 109《崔神庆传》。

《宋会要辑稿》方域六。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嘉靖《太原县志》卷 1。

的太原城址，位于太原盆地的北端，处于“多山多水，东、西、北三面皆山，中间汾流为闾邑”，显得平原狭小，缺少开阔的地理形势，为后来太原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最明显的就是山洪的袭击和城市用地的不足。今天的太原市区早已扩展到汾河以西地区，而且使城市明显的分割为两大块，呈南北向长条状发展。

中国城市的城址转移十分频繁，受到多种地理条件的制约，以上仅举数例，以窥豹之一斑。

三、中国城市的城墙

城墙为防御工程，本来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和城墙是两回事情，城市可以有城墙，也可以没有城墙。因为城市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非农业人口集中，工商业繁荣，并与农村相对立而存在的特殊区域，有无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必备标志。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城墙就成为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而且促进和限制城市的发展。

1. 城墙的起源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人类就开始了征服自然的斗争。为了生存，除采集食物和学会生产外，还要维护自己的安全。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和不同部落的骚扰，就在自己居住区的周围挖掘深沟，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西安半坡新石器村落周围就挖有深、广各六七米的深沟，可以作为代表。所以先挖沟，因为挖沟比筑城容易。开挖壕沟作为防御手段，在龙山文化、商代遗址中曾普遍存在。这就说明，从挖沟到筑城经历了很长时间，就是筑城技术兴起后，挖沟并未绝迹，仍然是防御的一种手段。譬如，金代的界壕就是巨大的壕沟工程，其作用与万里长城相似。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筑城兴起以后，城墙的修筑越来越广泛，不仅首都、省、府、州、县衙门所在地修筑城墙，就连一般的村寨、堡寨也往往修筑城墙。尽管挖沟防御的技术并未绝迹，但却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壕沟再宽、再深，也容易架桥横越，而且守卫困难，使自己充分暴露在敌人面前。城墙则不然，它有一系列防御设施，不仅攀登困难，而且易守难攻，能充分保护自己和杀伤敌人。正因为如此，尽管城墙修筑困难，但终于取壕沟而代之，成为防御工程的主要形式。

中国的城墙起源很早，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据文献记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鯀作三仞之城”，“鯀作城郭”，“夏鯀筑城”，“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这些记载虽然比较简单，但都证明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发现了中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先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距今已有四千年之久。该城南北宽约 450 米，东西长约 390 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面积约 0.17 平方千米，折合 257.5 亩，几乎与后来小县的县城相当，从建筑如此规模的城墙来看，筑城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以此推论，我国城墙的起源可能更早，只是尚有待于考古发掘罢了。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一座古城，属屈家岭文化中期，建造年代距今已有 4800 余年，专家认定为我国最早的古

《商周考古》第 57 页，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轩辕本纪》，转引自《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 年 1 期。

《黄帝内传》，转引自《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淮南子·原道训》。

《世本·作篇》。

《吕氏春秋·君守》。

《吴越春秋》卷 5。

城遗址之一。这次重要发现，可能要把我国城墙出现的时代，推移到距今5000年以前。接着，考古学者又在河南省郑州市北发现了距今4800—5300年前的古城，可见中国的城墙在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城墙的起源并不比壕沟晚，据说在埃及就发现了8000年前的古城。

2. 奴隶制时代的城墙

这里说的奴隶制时代，以夏、商、周三个朝代为主，也就是由城墙到城市的过渡时期。现在发现的夏代古城，最典型的有河南登封告城镇西约1千米处台上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东城东墙北段、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从残存南墙西段30米、西墙南段65米来看，可能为方形。大约在东城被毁后，又紧靠东城西墙修筑西城，其南墙长82.2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残长约29米，接近正方形。夯筑比较原始，若按正方形计算，两城合计面积0.016平方千米，折合24亩，范围比较小。 C^{14} 测定为 4000 ± 65 年，树轮校正为 4415 ± 140 年，相当于夏代初年。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可能为禹都阳城遗址。河南淮阳东南约4千米的平粮台遗址，平面呈方形，每面长约180余米，面积0.032平方千米，折合30余亩。现在墙体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残高3米。从筑墙技术看为小版筑堆筑法，即先筑成宽0.8—0.85的小版土墙，以此作为城墙内壁，然后在墙的外侧堆土夯实，略成斜坡，层层修筑，逐层加高。这种小版筑堆筑法比较原始，但却为中国早期筑城的办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平粮台城址的路基下发现陶水管，说明已注意到城内排水问题。 C^{14} 测定距今 4335 ± 175 年，也是夏代初期城址，是不是夏代的都城之一，无法判断。

到了商代，随着筑城技术的提高，筑城次数显著增多，除首都外，一些诸侯国也在筑城。已发现的商代都城，最典型的就 是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诸侯国城最典型为湖北盘龙城和山西夏县涇掌乡东下冯古城。从商代都城城址看，不仅规模大，而且有专门的宫殿区，街道整齐，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城的作用不仅仅是政治中心，已向经济、文化中心过渡，具备了城市的某些影子。偃师商城位于偃师城西，平面呈方形，西墙长1700米，北墙长1200米。东南角内收，东墙更长。南墙被洛水冲毁。墙厚18米，残高1—2米。东西墙各开三门，北墙一门，各门之间有大道相通，形成棋盘式格局。面积2.04平方千米。在城的中部有小城三座，居中一座为正方形，两边的城较小，当为宫廷区。学术界认为，这座古城也就是汤都西亳。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城址，比郑州老城大出将近一倍，整个城址都被郑州市占压。经过部分钻探和发掘，城墙周长6960米，其中东、南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3.02平方千米，比偃师商城大出近1平方千米。在城内东北部6万平方米内发现几处大型夯土台基和房

《专家认定我国最早古城》，《西安晚报》1994年3月16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5年9月16日晚新闻广播。

刘式今：《试论中国最早的城址》，《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1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年3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黄石林、赵芝荃：《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1987年。

基，最长的达 60 余米，显然为宫殿区。城墙发现 11 处缺口，可能与城门的设置有关。郑州商城采用大版修筑法，每段长约 3.3 米，夯土层厚 10—20 厘米不等，底宽 20 米，顶宽约 5 米，高约 10 米。从修筑方法看，层层平筑中部的“主城墙”，然后还要在两侧斜筑“护城坡”，使城墙成为△状的梯形。这大概是尚未发明以绳悬系横木不断加高“主城墙”的方法，只好用斜坡墙来支撑“主城墙”的横木，以便继续加高“主城墙”。这种方法虽仍带有原始性，但与夏代相比，已大有进步，表现在大版筑和在“主城墙”两侧均加筑“护城坡”，不仅增加了城墙的厚度，而且使城墙更加坚固、匀称。郑州商城 C¹⁴测定距今 3570±135 年，树轮校正为 3545±135 年，有人认为就是汤都亳。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殷墟为商代后期的都城，直到现在尚未发现城墙，仅在宫殿区附近发现宽 7—21 米，深 5—10 米的巨大壕沟。这可能由于城区范围太大，难于修筑城墙，也可能是盘庚迁殷以后，为稳定政局就没有设计城墙，只在宫殿区周围挖掘壕沟。

商代的诸侯国也开始筑城，已发现的古城有湖北黄陂滠口乡叶店盘龙城，山西夏县埕掌乡东下冯古城和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盘龙城座落在盘龙湖滨一个小山丘上，三面环水，北面与另一山丘相连，城墙残高 1—3 米，城南北长 290 米，东西宽 260 米，平面接近方形，面积 0.075 平方千米，为商代早期城址。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城内东北部高地上为宫殿区。东下冯古城已全部埋入地下，经钻探，南墙总长 400 米，宽约 8 米，残高 1.8 米，其夯筑法与郑州商城和盘龙城相似，为商代前期古城。若按方形计算，面积约 0.16 平方千米。琉璃河古城东西长约 850 米，南部由于大石河泛滥，南北长度不详。但从城角判断，南北长约 600 米，面积 0.51 平方千米。其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这是商末作为方国的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城址很有代表性，分别代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商代诸侯国古城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范围在 1 平方千米以下；形状为方形或接近方形；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即仍带有原始性。商周之际，在我国北方还出现另一种筑城方法，即石砌的“山城”。譬如，内蒙古赤峰市西山根夏家店文化城址，就座落在英金河西岸，为石砌不规则石城。

西周建立以后，实行大分封，推行种族奴隶制的统治。西周共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各家说法不一。《吕氏春秋》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说：周“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实际上，见于《春秋》经传的一百七十余国。西周的封国都有自己的统治据点，也就是说，无不建城立国，西周初年

《商周考古》第 57—61 页，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商周考古》第 63—64 页。

《商周考古》第 61—62 页。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 2 期。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4 页，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吕氏春秋·观世》。

《荀子·君道》。

《晋书》卷 14《地理志》。

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筑城高潮，筑城数量当以数百计。西周的筑城技术也达到成熟阶段，能“其绳则直，缩版以载”。孔颖达解释说：“绳者，营其广轮方制之正也。既正，则以索缩其筑版，上下相承而起。”也就是说，已学会用绳索悬版的技术，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近，省去了商代的“护城坡”。

周文王迁都今西安地区以后，首先“作邑于丰”，作邑就是筑城。“筑城伊洑，作丰伊匹”，“维丰之垣”，就是记载文王修筑丰京城。洑为城沟，匹，配也，即作城大小适中，大于诸侯之城而小于天子之城。丰京位于沔河西岸，其城墙有待于考古发掘。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又把国都迁到沔河东岸，修建了规模更大的镐京城。镐京建成以后，丰京并未废弃，因此，西周的国都可以丰镐相称。丰镐的城墙虽已湮没无闻，但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是镐京”，“武王成之”，证明都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城墙。依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西周的国都城墙周长达 13 千米，面积达 10 平方千米左右，比商代的都城大出三四倍。这在筑城史上实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说明筑城技术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因此，西周初年才能每封一国必建一城，使城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由此可见，中国筑城兴起于原始社会中后期，成熟了西周初年，发展演变达二千余年之久。

3. 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筑城最多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大发展的时期。当然，这也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形势相吻合。

西周的城市，从天子到公侯伯子男均有定制，不能逾越。《周礼》规定，王城方九里，《疏》曰：“侯伯子男五里。……或云周已九里之城，则公七里，侯伯五里。”若按周尺 19.9 厘米计算，一里为 1800 尺，则九里之城边长 3222 米，七里之城边长 2500 米，五里之城边长 1790 米，三里之城边长 1074 米。西周的丰镐尚未发现城墙，但从东周王城来推断，也为九里之城。诸侯依次减杀也符合西周的等级制度和当时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首都均已突破成规，成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足以代表中国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东周王城位于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名义上为天子之城，是全国的首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诸侯国都城地位。由于考古工作者在涧水东岸发现了一座 1485 米×1410 米的古城，即汉河南县城，为寻找王城提供了线索。后来在河南县城外围，发现了周王城，北墙长 2890 米，墙外有 5 米深的护城河。城墙分段夯筑，每一方块 1×0.4 米到 1.7×0.8 米的见方。面积为汉河南县城的四倍。齐国首都临淄城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有大小二城，小城镶在大城的西南隅，大城周长 14 千米，小城周长 7 千米，平面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城墙夯土遗迹宽 20 米左右。小城为宫殿区，以“桓公台”为主体。鲁国首都曲阜城，位于山东曲阜市区，东西长约 4 千米，南北宽约 3 千米。赵国首都邯郸，位于邯郸市，由宫城和大北城构成。宫城呈品字形，由三个小城组成，每个长宽 1 千米左右，墙基宽 16 米左右，群众称为赵王城。位于宫城东北的大北城，为不规则长方形，东

《诗·大雅·绵》。

《诗·大雅·文王有声》。

中社科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2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西长 3 千米，南北宽 4.8 千米，墙基宽 20 米左右，两城相距 100 米左右。燕下都亦称武阳，位于河北易县东南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平面构成罄形，东西长 8 千米，南北宽约 4 千米，由东西两城连接而成，东城完整，南北两侧滨临中易水和北易水，东西两侧有城壕和古运粮河。西城建成较晚，显然为附郭，城内发现的建筑遗址较少。晋国首都新田，亦称新绛，位于侯马市西北汾、浍二水之间，已发现六座大小不等的城，除白店城较早外，牛村、平望、台神三城应为晋都新田遗址。在牛村、平望、台神三城之东 1 千米处，又有马庄、呈王二城，在这六座城中，以牛村城最大，呈梯形，墙宽 4 - 8 米，城外有护城壕。魏国旧都安邑，位于夏县西北，城有三重，小城居中，应为宫殿区。外城东西长约 3.8 千米，南北宽约 4.6 千米。魏惠王时迁都大梁，即今开封市。大梁城址东、南两面与今开封城重合，西、北两面越出了今开封城。郑、韩都城新郑，即今河南新郑县，韩灭郑后迁都于此。新郑城位于双洎河与黄水河的交会处，东西长 5 千米，南北宽 4.5 千米左右，墙基宽近 40 米。楚国首都郢，也就是湖北江陵以北的纪南城，东西长 4.5 千米，南北宽 3.5 千米，城墙残高 4—7 米，上部宽达 14 米。秦国首都雍城，位于陕西凤翔县南，东西长 3.3 千米，南北宽 3.2 千米。秦献公迁都栎阳，栎阳位于临潼县渭河以北武屯镇一带，东西长 1.801 千米，南北宽 2.232 千米。

除上述大国的都城外，一些小国都城的城墙也比较长，一般周长在 5—10 千米左右。

春秋战国时代，相当于县级的城邑很多，城墙的长度有限，一般周长 4 千米左右。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不断筑城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据说《春秋》、《左传》、《国语》中的城邑地名有 1016 个，从方志等文献中则可找出近 600 个城邑，因此，推论春秋城邑在 1 千以上。战国时筑城更多，春秋战国合计当在两千数以上。战国时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已成为真正的城市。千丈之城，每边长 2300 米（以每尺 23 厘米计）。根据《墨子·杂守》，“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可见千丈之城并非万家之邑，而为数万家之邑。因为三里之城，每边长 1035 米，面积 1.06 平方千米，以 1 平方千米之城可容万家，那么，5 平方千米当然为数万家了。

4. 秦汉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一统的王朝，把郡县制度推行于全国，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又一次筑城高潮。也就是说，伴随这次筑城高潮，形成又一次城市的大发展。秦在全国设立了 48 郡。秦王朝到底设置了多少县，历来有争论，杨守敬《秦郡县图·序》认为秦县在 800—900 左右，可能接近实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5 - 276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3 页。

《商周考古》第 242—244 页。

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第 206—208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4 页。

《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第 121 页。

《战国策·赵策三》。

际。秦王朝在关中地区设置 36 县，由内史管辖，内史虽掌管京畿，但地位与郡守相当。根据考古发掘，秦代县城城墙周长也就是 4 千米左右。江苏盱眙发现的秦东阳县城，城垣大部分保存完整，内外城东西并列相连，周长 5 千米左右。作为关隘的城范围较小，因为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以驻军为主，谈不上是城市。譬如，秦虎牢关城位于大伾山上（今荥阳西北），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就是例证。秦代郡级城市的面积稍大，周长 6 千米左右，蜀郡成都城可以作为代表。秦代全国最大的城市就是首都咸阳。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以东 15 千米处的窑店镇、长陵东村和萧家村一带。由于咸阳经过三次大规模营造，是否有横跨渭河南北的城墙已不得而知。但咸阳有城，史有明文，白起就是出咸阳城西门十里，被赐死于杜邮亭（今咸阳）。据说在秦咸阳宫殿区以北，已发现一小段城墙，在咸阳原上还发现一条东西干道，宽达 50 米，也可能是通向城门的干道。秦咸阳的宫殿区主要位于咸阳原上，与《史记》记载相符。经过发掘，西起毛王沟，东至柏家嘴，东西长达 6 千米的原区，建筑遗址鳞次栉比，构成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仅从宫殿区的长度来看，咸阳城墙的长度绝不少于数十千米。

咸阳既是首都，也是秦代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平面布局、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建筑状况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中国城市已向规模宏大、建设壮丽的方向发展。

西汉承秦制。西汉时全国所有的县都要建城，汉高帝六年（前 201 年），“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邑，即皇后公主的食邑，与县的地位相当。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全国有县、邑、道（少数民族地区）、侯国共计 1587 个。也就是说，西汉末年，全国有县级城市 1587 个。当然，有些边远地区的县经济落后，可能只是一个统治据点，与县级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汉代符合县级城市的数量当在一千以上，超过了秦代。

西汉的县级城市，内地的县城一般范围较大，城墙的周长多超过 4 千米。如汉河南县城（今洛阳），平面接近方形，墙基宽 6 米以上，残高 0.4 - 2.4 米。周长超过 4 千米。河北磁县讲武城，平面为方形，周长也超过 4 千米。当然，有些县城范围较小，如成固城的周长就不足 4 千米，有的甚至更小。郡级城市规模较大，琅邪郡治东武城（今山东诸城），“周冈为城，周三十里”，代表了西汉郡城的规模。位于边远地区的城，一般范围都比较小，林邑国都浦西城（广西黔江沿岸），城“周八里一百步”；林邑城，“周围六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204 页。

《水经注》卷 5《河水注》。

《史记》卷 73《白起列传》。

《汉书》卷 1《高帝纪》。

《汉书》卷 28《地理志》。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397 - 398 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45 页。

《水经注》卷 32《洧水注》。

《水经注》卷 26《淮水注》。

里一百七十步”；福建崇安的城村古城，为不规则菱形，长约 800 米，宽约 500 米。长城沿线的城，为了安全，多回字形，中为子城，边长 1 千米。若无子城，不论方形或长方形的城，边长 320—600 米左右。这些边远地区的城，是否都发展成为城市，不得而知，而内地的郡县级城均已发展成为城市，其城的大小也就是地方城市的大小，城区尚未突破城墙的限制。

西汉首都长安城和著名王国的都城，可以作为西汉城市发展的标志，因为城的空间大大扩展，城市的范围愈来愈大。

长安城位于西安西北郊 5 千米处，城周长 25.7 千米。城墙断续存在，夯土层次分明，墙基宽 12 - 16 米，高度当在 12 米以上。经过实测，东墙长 5940 米，南墙长 6250 米，西墙长 4550 米，北墙长 5959 米。除东墙为一南北直线外，其他三墙多有曲折，为不规则正方形，故“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被称为“斗城”。汉长安城平地拔起，创立了中国都城的新规制，无论规模、布局、建筑、经济、文化和人口众多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把中国都城和城市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峰。元始四年（公元 4 年），“又为方市闾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证明商贾已定居市场。商贾定居市场是亘古以来未有的事情，说明汉长安城的商业十分繁荣。

西汉长安城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规模最大的首都和城市，城区范围大出郡县级城市数倍或数十倍，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的经济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城区向郊外扩展。雍门外有函里，雍门也有函里门之称。便桥（西渭桥）以东有交道亭市，渭桥以北有直市、交门市，证明市区已扩展到渭河以北。

在王国都城中，以梁孝王之都规模最大，位于今河南商丘。因“土地下湿，东都睢阳，又改曰梁”。梁孝王“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使睢阳城竟比首都长安还大。睢阳城的范围如此之大，显然同它位于睢水、睢水运河之间，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奠基时期，那么秦汉就为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样板，使后来城市的模式很少变化。首都如此，地方城市也不例外。州县以上衙门所在地必然筑城，城墙范围的扩大也就是城市的扩展，几乎毫无例外。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新的工商业城镇兴起之后，这种格局才被打破。也就是说，新的工商业城镇是由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

5. 秦汉以后的城墙与城市

秦汉以后，中国省级政区不断变迁，州县政区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城市是随着州县政区设置的多少而增加或减少的。每一个朝代设县的多少，几乎就是当时城市的多少，除南北朝时代的侨州郡县外，二者很少有大的差异。

《水经注》卷 36《温水注》。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398 - 399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403—405 页。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 4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三辅黄图》卷 1。

《太平御览》卷 827 引《三辅黄图》。

《三辅黄图》卷 1、卷 6。

《水经注》卷 22《渠水注》。

《水经注》为6世纪时的作品，它所记载的自古以来的城邑有3000余处，首都180余处，总结了6世纪以前中国城市的数量。6世纪以后，尽管各个王朝继续建城，但有许多都是在原址上重建，数量变化不大。譬如，《水经注》记载的国都180余处，《水经注》以后又有许多王朝，但国都的数量增加甚微，也就是200处左右。援例计算，《水经注》以后的中国城市也就是一两千数，不会太多。

魏晋南北朝时代滥置州郡县，州郡县的数量剧增，十分混乱。隋统一后大加省并，以郡统县，全国有190郡，1255县。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有328府、州，1533县。宋代全国有297府、州，1816县。当然，北宋实际上只有半壁河山，若要加上西夏和辽，全国的府州县显然比《宋史》统计的要多。元代有158路，33府，359州，4军，15安抚司，1127县。明代有140府，193州，1138县，羁縻府19、州47、县6。另外还有卫、所等。元、明两代县数较少，是由于府州多有直辖地所致。清代全国府州厅县1700有奇，县的数量也就是1500左右，与汉代相当。由此可见，两千年来中国县的建置比较稳定，县城的多少变化不大。正因为如此，县级以上的城市也就是一两千之普，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相对稳定，极少变化和发展缓慢的态势。

秦汉以后，从已发现的城址来看，城的大小变化不大，仍然是首都最大，府州县依次缩小。当然，也要考虑建城地区的地理条件，并非整齐划一，大小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一般说来，府州城和边远地区相当于府州级的城，范围都比较大。譬如，孙吴的建平郡治巫城（今四川巫山），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蜀汉巴郡城（重庆），周十六里。唐太原府城晋阳，称为北都，为河东节度使驻所，城周长15.15千米。扬州城仅罗城南北十五里一百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龟兹城（今新疆库车东北）、庭州城（今新疆吉木萨尔东北）、太和城（南诏城，今云南大理南）等，其城墙的周长都在6千米左右。北宋大名府称为北京（今河北大名县），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郓州城（今山东东平）咸平三年（1000年）被黄河圯毁，移东南十里高岗重建，周十六里。吉林省中部平原的西部草原上有百余座辽代城址，凡府城周长都

《隋书》卷29《地理志》。

《新唐书》卷37《地理志》。

《宋史》卷85《地理志》。

《元史》卷58《地理志》。

《明史》卷40《地理志》。

《清史稿》卷61《地理志》。

《水经注》卷34《江水注》。

《水经注》卷33《江水注》。

刘志宽等主编：《十大古都商业史略》第46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8—209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628页。

《宋史》卷85《地理志》。

乾隆《东平州志》卷6。

在 4 千米以上，明显的大于县城。明清西安府城周长 13.7 千米，开封府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九十步，可见作为省会级的府城范围更大。县城的大小与秦汉相仿佛，周长 4 千米左右。陕西佳县城，上海市奉贤县城，浙江镇海县城，山西平遥、太谷城，都可以作为代表。秦汉以后的都城，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和经济活动的增加，以及工商业的发展，范围都比较大。东汉洛阳城位于洛阳市东，周长 14.34 千米。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西南，东西长 3.08 千米，南北宽 2.20 千米。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北齐邺都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隋唐长安城周长 36 千米。隋唐东都洛阳城周长 27.5 千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仿唐长安城修建，周长 16.29 千米。北宋开封城内外三重，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辽上京临潢府（巴林左旗），周长 14 千米。中京大定府，周长 15.4 千米。元大都城（今北京）周长 28.6 千米。明南京城周长 67 里。后来加筑外城，周长 120 里。明清北京城，内城（北部）周长 45 里，外城（南部）周长 28 里，合计 73 里，超过了明代的南京城。由此可见，凡是作为首都或陪都的城，范围都比较大，往往要大出府州城数倍或二三十倍，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汉以后，城的范围较大，也是城区不断扩大的结果。唐扬州城本来位于蜀冈之上，由于江岸南移，蜀冈上的扬州城已远离长江，江船海轮已难于到达扬州城下，商业区就向蜀冈之下推移。后来才修筑商业罗城，而蜀冈上的小城则成为官衙所在。扬州城的扩展，也就是扬州城市的扩大。唐代的晋阳城，本来位于汾河以西，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又在汾河以东建立东城，后来又跨水为城，修建中城，形成著名的晋阳三城。扬州城展为二城，晋阳城展为三城，代表了唐代城市扩展的基本形式。唐代前期的苏州城范围较小，在安史之乱中毁于战火。后来重修的苏州城扩大了范围，面积 27 平方千米左右，比后来宋代的平江城还要大。唐代宝历初年，由于今武汉屯驻重兵，牛僧孺遂把武昌城改为砖城，同时也扩大了城垣的范围。苏州城和武昌城的扩大，是唐代城市扩大的另一种形式。唐长安城范围很大，但城区仍在扩展，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108 页。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33、131、129、151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156、623—625 页。

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第 137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

《洛阳伽蓝记》卷 5。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287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156、623—625 页。

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第 17 页，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78、77 - 78、7 - 8 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78、77 - 78、7 - 8 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78、77 - 78、7 - 8 页。

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第 233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年版。

叶骁军：《中国都城发展史》第 258—259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文物》1979 年 9 期。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曲江池至春明门之间人来人往，形成新的市区，胡人在沿途开设酒店就是例证。北宋时迁城新建，是城市扩展的重要形式。祁州城迁治蒲阴县（今河北安国），广蒲阴城西、北两面各三里，以旧城为子城，“旧城百姓并令于新城及草市内外分布居止”，可见草市仍在新城之外，但也成为市区。前举郓州城迁址重建，也扩大了范围，城周16里。另外就是扩大城关，把城外居民包入城内。雄州（今河北雄县）城北门外，居民稠密，城中地狭，故展北城。保州（今河北保定）加筑关城，营建1500余区。其扩展方向可能主要在城南。因为城南为漕船码头。北宋的开封城沿运河向郊区扩展，城东南7里的虹桥一带就是最繁华的所在。明清两代，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大都突破城垣的限制，向郊区发展。扬州城东、南两面滨临运河，城东、城南发展成为新的市区，货栈、旅店比比皆是，明末筑新城，就把新市区包入城内。临清城沿运河扩展，后来增筑新城，也把新市区包入城内。而汉口的崛起更是一个典型例证。汉口本来是武昌、汉阳郊区的荒僻之地，明代前仅建有汉口堡。由于明代汉水改道龟山以北入江，汉口的水路交通大大改善，遂成为重要的商业集镇，城市沿长江、汉江迅速扩展。鸦片战争前，拆除汉口堡，城区面积扩展到11.2平方千米。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芦汉、粤汉铁路的通车，汉口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城区迅速扩展到28平方千米，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大镇。另外，兰州城沿黄河形成新市区，明代增筑城垣，其范围比老城大出两倍，形成“关大城小”的格局；成都城四门外沿交通线形成长条形的新市区，尤以东南部两江交汇处最为繁华；淮安北辰镇为运河码头，商业繁荣，形成新市区，后来加筑城墙，与旧城连为一体；天水城市沿渭河扩展，形成东西向新市区，不断加筑城墙，终于成为五城相连的城市等等，也都是沿江河扩展的例证。当然，开辟商埠，更使一些城市的扩展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济南城近郊向市区转化，但以西郊最为繁华。清代末年济南开埠，就以西郊为基地，到1921年，城区扩展到纬十路。清代末年，苏州盘门（南门）外青阳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租界，同时也形成新的市区。

明清北京城，所以成为凸字形，也是市区扩展的结果。北京城南为运河必经之地，商业发达，人口稠密，明代决定加筑外城时就先筑南部。后因财政困难，其他三面作罢，遂使北京城成为如此形状。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西市胡店与胡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二》。

《梦溪笔谈》卷13。

《宋史》卷308《李继宣传》。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47、151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47、151页。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09、105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09、105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09、105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38、141—142页。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从以上事例可以说明，明清两代，城市向郊区扩展已成为必然之势，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不再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终于要与城市脱离关系。

6. 城墙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筑城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称得上城市的城起源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奠基于秦汉，消亡于建国初期。自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无不筑城，一直到民国时期，尽管现代火炮广泛使用，筑城的事仍不乏其例。1949年建国后，才彻底结束了筑城的历史，为中国城市发展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筑城，劳民伤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对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如何估价，也就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筑城与建国几乎是同义语，所以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城是统治阶级下令修建的，是为了统治者的安全。因此，城初产生时只是防御工程，与城市毫无关系。但它终究是亘古未有的新生事物，使人们找到了保存自己的最佳手段。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为中国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即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城作为城市的标志，确实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以城为代表的城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气象。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各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政权机构，并能得到安全保障，充分行使政治权力。

不管什么形状的城，土城还是砖城，都有具体的位置和范围，终于形成城市。城市一旦出现，就立即显示出不同于农村的特殊功能。这就是中心地位的确立和辐射作用的发挥，使城市处于领导和统治地位。因为它是一个地区的行政中心，发号施令，领导和统治农村，役使农村供应城市。为了便于推行政令，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大都处于交通便利的地区。甚至有些就是水陆交通枢纽。这种交通上的优势，也为当地农产品的集散和货物交换提供了方便。因此，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往往又是经济中心，是工商业最发达的所在。城市这种经济中心的地位，既为城市生活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也为它所辐射的农村提供了必需的商品和生产工具，支援了农村。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能供养大批士人，即文化人，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使城市又成为文化的中心。城市有各种教育机关、文化设施，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上领导农村。城市这种文化辐射力量的强弱，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先导和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由此可见，城市的中心地位和辐射能力，标志着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发展状况。

中国城市这种优越的地位，是靠官府的力量支撑的，从建城到发展为城市，样样都要依靠于官府，为了官府和城市的安全，就必须修建牢固的城墙。因此，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这一整套行政机构主宰中央和地方，为了安全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修建牢固的城墙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由于统治者凭借强大的统治机器和牢固的城墙，任意欺压百姓，阶级斗争一直比较激烈。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反抗与镇压反抗的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尽管中央集权比较强大，但由

此而产生的离心力和分裂割据也时有发生，统一与分裂、集中与分散的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此起彼伏，十分激烈。这些社会矛盾必然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无计其数，其规模之大、损失之惨重，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仅有的。而战争中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城市，所谓攻城掠邑就是指此而言。攻城、守城之法也是军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墨子时代就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而且不断付诸实施。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数量可观，除天灾，如山崩地裂、暴雨成灾、河流圯废、瘟疫流行、沙暴埋没、自然环境恶化而废弃的外，绝大部分毁于战乱。然而，在近代火炮兴起以前，城墙守卫城市，使许多城市免遭战争破坏，能够存在很长时间，或者一直幸存下来。这种例证不胜枚举，俯拾即得。譬如，战国时，秦国准备攻打大梁城，须贾曰：“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费易攻也。”秦遂解大梁之围，使大梁城免遭战争破坏。就是近代火炮出现以后，城墙对守卫城市的安全仍起着重要作用。1926年春天，河南军阀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10万人西进祸陕，把西安城包围得水泄不通。杨虎城、李虎臣镇守西安，刘镇华围城达八个月之久，终于未能攻破西安城。这主要是西安城墙十分坚固，刘镇华用大炮轰击城墙，由于火炮威力有限，城墙巍然不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能够一直延续发展或在原址上重建，正是城墙发挥维护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火攻也是战争中常常使用的手段。但由于有坚固的城墙，才使许多城市免遭兵燹。另外，城墙在维护城市秩序、免遭盗匪之祸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城墙犹如保护神，能使城市免遭灾难，因此，各个城市都有城隍庙，以祈求城市的安全。

由于中国的许多城市是沿江河湖海而兴建的，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即防洪。尤其是南方地区的城墙更是如此。

武汉三镇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临江城门特别少，正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明洪武年间，周德兴拓修武昌城，城垣东南高2.1丈，西北高2.9丈，紧临长江的西北部城垣高出东南八尺多，显然是防洪的需要。汉口城堡只有西北城垣，而缺失东南城垣，是因为汉口地势低洼，东部在此以前已有堤防防洪，在西北方向筑堡以防御来自汉水上游的洪水。汉阳城也曾把临江的东南城垣加高数尺，同样是为了防洪。而洪水的长期侵蚀，又对城墙本身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一点在汉阳城市发展表现得最为突出。明弘治年间，汉阳朝宗门外“去江岸数十丈，沿岸有短墙横亘数十丈，迤北迤南一带有民居，深者房二层……去江又数丈，为洗马口，临江民居，屋后可驰马……今渐圯没，有逼城脚者。”但到嘉靖年间时，汉阳东门外的江岸已逼近城墙。明弘治年间汉阳南门外“自江岸至城，计五百余丈，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芦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蚁聚……至嘉靖末年以来，洪水泛涨，江岸崩卸，自城去水不满丈余”，汉阳南门外的江岸已坍塌殆尽，汉阳城面临着被水冲圯的命运。只是由于不断修葺加固，才勉强维持下来。康熙六年，知府杨必达修葺汉阳江岸城脚17处，计长近80丈，高17.8丈，宽15.4丈，足以说明

《战国策·魏策三》。

《古今图书集成》卷1127《汉阳府城池考》。

《古今图书集成》卷1127《汉阳府城池考》。

汉阳城墙被侵蚀的严重程度。

太原城位于太原盆地，由于临近汾晋诸河，也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城墙同样具有防洪作用。唐代以前的晋阳城，东滨汾河，南有晋水，城墙的防洪作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区的扩展，特别是唐代建成晋阳东城、中城后，晋阳城横跨汾河，东城一带地势又低，城墙的防洪作用尤为重要。另外，晋阳城位于山前洪积扇上，山洪对城市的威胁更为严重。

晋阳城外罗城，除军事防御外，就是防御山洪。晋阳城“西面外有罗城，以御西山之水，俗呼长龙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北部罗城也具有防止沙河泛滥的作用。北宋攻下晋阳城，在毁坏城池的同时，也将城周围的罗城设施毁坏殆尽，所谓“顽民尽迁高垒削”，宋太宗“亲总统师，削平多垒。”金代，城北沙河泛滥，冲掩晋阳城北玄武楼之基，九龙庙“祠屋漂溺，栋宇檐楹扫地俱绝，而被瓦颓垣。”到明代，沙河“遇夏暴雨每坏城郭，县民谷口筑堤障之，遇旱则涸。”

宋代的太原城位居太原盆地的北端，临近盆地东西两边向北合拢的山地，向北不远便是汾河狭长湍急的峡谷地带。宋太原城东、西、北三面环山，西临汾河。唐明镇地势低洼，潘美所筑的城位于低洼之处，城市供水虽不成什么问题，但却给后代城市的防洪带来了诸多不便。

宋以后太原城面临汾河和东边山洪的威胁。自宋建城以后，洪水泛滥屡有发生，太原城频频被淹。城区西半部和南关一带是洪水主要冲击的地方。宋熙宁年间“汾河大溢”，洪水冲向城西，由于筑堤及时，才免去洪水的冲淹。嘉靖末年，汾河泛滥，洪水夺阜成门冲入城内，城区西部首当其冲。嘉庆二十年（1815年），太原东山暴发洪水，水从东关而入，乘势向西，东关的大南街，南起五龙口北至万寿庵相继被冲。大南关一带积水很多，洪灾严重。光绪十二年（1886年），汾水暴涨，冲决了城西堤堰，拐角村、旱西关、水西关、大南关皆被水淹，洪水自大南关入城内向北冲，城西半部顿成水乡泽国，满城等建筑荡然无存。据有关史料统计，自1884年至1949年的六十多年中，发生较大洪水15次，差不多每四年就有一次。

宋代太原城城址选择时没有注意防洪问题，“当始经始者，乘用武之后，虑不及远。”城址靠近北部峡口一带的汾河河道拐弯处，这是“汾河由烈石口迤迳而至会城之西，其地北高南低，势如建瓴，一遇夏秋雨潦，冲激之害时所不免。”另一方面，城址本身地势低洼，大南关一带常有积水。明代城区向南拓展后，太原城西临汾河岸线随之延长，而城市受洪水威胁的机遇也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嘉靖《太原县志》卷1。

《宋史》卷4《太祖本纪》。

欧阳修：《游晋祠》，雍正《山西通志》卷222《艺文》。

《宋会要辑稿》方域八。

《重修九龙庙》，嘉靖《太原县志》卷5。

嘉靖《太原县志》卷1。

雍正《山西通志》卷29《水利》。

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巨变中的太原》（未刊本）。

韩琦：《并州新修庙学记》，道光《阳曲县志》卷15。

道光《阳曲县志》卷11。

就增大。后来城区继续向南发展，给城市的防洪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历史上洪水对太原城的威胁主要来自汾河和东山山洪。由于有坚固的城墙，才使太原城市避免了灭顶之灾。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太原城墙在城市防洪中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

城墙在早期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显著，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墙才逐渐成为限制城市扩大和城市发展的障碍。

城墙的范围是固定的，而城市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城墙阻碍和限制城市的发展。城圈一旦划定，城市的范围和活动区域就基本上固定不变，对不断发展中的城市来说，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城市人口增加，工商业发展，文化教育设施增多，都要求扩大活动空间，但城墙不能移动，人们活动的空间始终有一定限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一般来说，每个城市的城区就是指城内与关厢，城外基本上是农田，城市很少向郊区发展。只有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才向郊区推进，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像武汉、济南、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这种情况。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阻挡的。然而，城墙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确实延缓了城市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城墙高大，无法逾越，所有的人只能从城门出入，而城门的数量有限，开闭有时，势必阻塞交通，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古代城市人口较少，但数十万人口的城市代代都有，城墙的阻隔作用不言自明。正因为如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是多开城门，就是拆除城墙，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条件。辛亥革命后，南阳就拆除了城墙，西安开辟了玉祥门、中山门、勿幕门、中正门（今解放门）等，增加了东、西、南、北出入口。建国后，几乎各个城市都在拆除城墙，使城市有了宽松的发展环境。由于城墙的封闭性，不仅限制了城市的范围，而且使城内外的联系严重受阻，为了城市的发展而拆除城墙也无可厚非。但盲目的乱拆除，破坏了文物古迹，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城墙是劳动人民建造的，表现了极高的建筑艺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有些已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千余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建筑工程水平，可以为发展旅游和研究工程技术服务。譬如，明清北京城，就代表了封建社会后期工程技术的极高水平，是巨大的文化宝库。但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声令下，迅速拆除，人们再也看不到如此伟大的工程了。当然，城墙是防御工程，对城市的保护也表现在防御方面，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种防御作用已失去意义。按理说，拆除多数城墙也是应该的，但绝不应该拆除有保存价值的历史名城，破坏文物古迹。也就是说，对有保存价值的历史名城，能保存的还是应该尽量保存，以显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高超，增强民族自豪感。长城也是防御工程，与城墙的结构和作用相似，只不过前者展成一线，后者围成一圈，略有差异而言。长城也早已失掉防御作用，但仍然加以保护，就是为了显示伟大的建筑工程和研究古代攻守战术，以及开发利用等。当然，保存了有价值的城墙，势必影响城市的发展，那就只有多开城门，向郊区发展，或干脆在它的近傍开辟新市区，似解决城市发展和城墙的矛盾。西安就是这样做的，既保存了历史名城，又开辟了新的市区，使古城与新市区协调发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合理地解决了城墙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应该是一个典型。由此证明，对城墙的阻碍作用要准确估价，不拆除历史名

城，也能找到合理的途径，为城市的发展开辟道路。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利有弊，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应该进行研究。建国后的盲目拆除城墙，确实造成了一些损失，尤其是一些重要历史名城遭到灭亡的命运，损失更为严重。这就说明，尽管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研究它的兴起和发展，为城墙开辟新的途径，以及探讨它与城市的关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中国城市的类型

城市分类主要指城市的功能分类、结构分类和地位分类等，另外还会有历史分类、法律上的分类、对策上的分类等。功能是城市的基本特征，以什么功能为主，就应该属于什么样的城市。结构则主要指地域结构，即带状城市、多中心城市，还是中心城市，反映城市在一定地域所处的地位。地位分类主要指是首都，还是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即城市的地位高低。其他分类均因城市的不同特点而异，如法律地位不同，也可以确定不同的类型。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分类主要指城市的功能分类，即政治城市、经济城市和文化城市、军事城市等。

1. 政治城市

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在中国城市中占绝大多数。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后，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统治机构，而且这些政治机构所在地也就是中央或地方的行政中心，即形成不同等级的城市。按照政治权力的大小，这些城市大致可以分为四级，即中央、省、府州、县四级城市。尽管城市的等级不同，但为了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城市，都有坚固的城墙作为凭借，以及其他统治机构。

中国的都城，从一开始就修筑城墙，现在已发现夏代初年的城墙，即禹都阳城的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登封告城镇。郑州商城据说就是汤都亳，比郑州老城大出将近一倍，面积达3.02平方千米。西周的都城丰镐，直到现在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但文献记载丰镐有城毫无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首都修筑有坚固的城墙，而且规模宏大，大都在10平方千米以上，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秦统一全国以后，各个王朝的首都修筑城墙已成定例，而且都城的范围愈来愈大，城墙愈来愈坚固。明清北京城就完全是砖砌的高大城墙。

作为地方性的统治中心，从汉代起，普遍筑城也成为定制。《汉书·高帝纪》：“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张宴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筑其城也。”师古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从此以后，县级以上的城市就无不筑城。自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以后，县一直是最基层的统治中心，县的管辖范围也一直比较稳定。《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也就是说，从秦代起，县的大小就方方百里左右，只是由于人口多少不同，略有差异而已。在方方百里之内，形成一个统治中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便于行使统治权力，容易进行货物集散的县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一直比较尖锐，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安全，修筑坚固的城墙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城市中，政治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有坚固的城墙就成为一大特色。城墙也成为这类城市的保护神，各级政治中心所在的城市，也无不修建城隍庙，以祈求神灵的保佑。

政治城市以政治功能为主，都设有森严的衙门，也都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或制高点，既雄伟庄严，又安全可靠。首都是全国的统治中心，皇宫和中央政府机构多占据要害部位，或雄踞全城的位置。秦咸阳皇宫位于咸阳原上，汉长安皇宫位于龙首原上，东汉洛阳皇宫位于全城中央，隋唐长安皇宫位于龙首原上，北宋开封皇宫位于全城中央，元明清北京皇宫位于全城中央偏南处，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除首都外，就是省、府州、县的衙门设置，也要考虑到地形有利和便于行使统治权力。明清的成都城，衙门居于全城的中央，太原城的衙门居于全城中央偏东处，西安城的衙门居于全城的东北隅，均占据有利地形。西安城的东北隅，是西安城内面积最广阔的一块，又接近东出大道，先后成为秦王府和满城的所在。

明代太原城区东部和东北部地势较高，城外一带村庄“半居冈阜”，城区西南多洼地积水，地势较低。城区东北俯视西南犹高屋建瓴。鼓楼东北即太原城区东北方向，明初在这里修筑了规模宏大的晋王府城，位于今太原市精营街一带。晋王府城最初选在太原城外北部古城一带，地势较高，符合宫城占据高地的原则，也顺应了中国古代自曹魏以后宫殿从城中央逐渐北移的趋势。但由于太原城一带西北风较大，城北风势强劲，宫城在这里无法营建。“宫殿木架已具，一夕大风尽颓，遂移于府城。”

鼓楼北部，自元至明清都是政府衙门机构主要分布地区，元代的冀宁道署、行中书省署，明代的布政司、太原府，清代的巡抚部院，以及阳曲县衙都集中于此，其位置大约在今山西省人民政府和法院一带。明清时期这些政府机构以太原府治为中心，呈环状分布。明代的布政司署在太原府治之东，即元代行中书省治所；按察司署在太原府治西南，后移鼓楼东南；清代都察院署在太原府治东。鼓楼北部是明清太原城的政治中心。

明清太原城的宫殿区位于城的东北部，地势高爽，容易形成气势宏伟的建筑。官衙区主要集中在鼓楼之北，位于城的北部，不仅地形有利，而且便于控制全城。

明清的淮安府城，为漕运咽喉，商业十分兴盛。城区位于运河岸上，水域广阔，老城的西部和城北都是多水地区，只有城的中部南北一线地势较高，故府衙就设置在中部偏北地区，漕衙设在全城的中部，府学设在中部偏南地区，都占据高地，而且居中指挥，形势有利。

明清的大同城，位于山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历来为北方军事重镇，明代又为九边镇（实际上有十三镇）之一。城为方形，十分坚固。明初封代王于大同，在城中部偏北处修建代王府，西临南北大街。在代王府之西修建总兵衙门，在总兵衙门西南修建府衙，整个城的北部大都为重要机关所在地，除地形有利外，就是为了便于军事防守。

泉州为海港城市，由于城区位于晋江冲积平原上，整个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使城市平面布局就有了明显的差异。城市北部鼓楼附近高地一直是历代行政官署所在地，显然地形有利，能够高屋建瓴，控制全城的制高点。因此，尽管城区不断向东南方向扩展，而衙署的位置始终没有迁移，正好说明地理上的优势是无法取代的。

扬州城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也曾经是重要的海港城市，一直为苏中地区政治统治的中心。最早的扬州城兴起于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之上，官府军衙也无不设置于此。蜀冈是苏北平原上隆起的一条黄土冈，绵延于六

光绪《山西通志》卷 163《祥异》。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40 页、114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40 页、114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合、仪征与邗江境内，是扬州市西北和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相对高度 10 米左右，海拔高程也不过三四十米。愈向东去，冈身愈低，至运河附近消失。唐代时尽管在蜀冈下已建成扬州大城，即商业罗城，但官衙仍设在蜀冈之上，故称子城或衙城。从北宋起，蜀冈上的衙城才废弃不用，政治机构才转移到蜀冈下的罗城之中。但当南北分裂、军事吃紧时，在蜀冈上仍不断建立军事要塞，以抵抗企图渡江南下的强敌。宋代的扬州官衙转移到商业大城的西北隅，仍占据有利地形。明清的扬州新、旧城，分别占据宋大城的东南和西南，而官衙主要集中在旧城的西部，有扬州府、察院、扬州卫镇抚司等重要军政机关，证明地理上的优势依然存在。

明清的南阳城，既为军事重镇，也为控制南阳通道的枢纽。明代的唐王府在南阳城内通渚街，永乐二年（1404 年），以南阳卫改建。明代的通渚街即今天的和平街，唐王府正好位于南阳城的中心，南有南阳府、县治所，东邻商业大街，尽占地利。王府城地势较高，面积广阔，几乎占有南阳府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以高临下，居中指挥，形势险要。

以上虽然仅举出几个府州城为例，已足以证明衙门所在地地形有利，或位置适中，能够控制全城就成为政治城市的基本特色。

实际上，县城也不例外，虽然每个县城的衙署未必都占有地利，但多数县城还是要把衙署设置在有利的位置上。明清的临榆县城，也就是山海关城，城北部倚山，地势较高，故重要的军事机关把总署、都司署、守备署、副都总署，无不设置在城的北部。清代的陕西佳县，位于黄河、葭芦河的交会处，三面临水，一山耸峙，县城踞于山颠，形势险要，有“铁葭州”之称。县衙设在城内正街西，便于居中指挥。高陵县衙在城内正中，眉县县衙在城内正中，扶风县衙在城内十字街西，都是为了居中指挥方便。宝鸡县衙在城西街北半原上，为了占据城内高地。统观各县县衙的设置，不是居中，就是占据有利地形，几乎毫无例外。

仅从上述举例可知，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市，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统治中心，其统治机构无不占据有利地形或居于中心位置，以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

政治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都设防，驻扎军队。首都戒备森严自不待言。汉长安城有南军、北军，北军守卫京城，南军把守宫门。唐长安城有禁军 12 万人。北宋开封城有禁军 82 万人。清代的北京城也就是八旗的驻防城，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皇帝亲兵，其余下五旗，即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由诸王、贝勒、贝子分统，驻守京师。到咸丰三年（1853 年）时，“京师各旗营兵十四万九千有奇”，军队人数已十分可观。中国的首都，实际上就是一座大兵营，充分体现了它的政治功能。

《扬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南阳城市历史地理述论》（油印稿）。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25 页《图》。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33 页。

《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

《新唐书》卷 50《兵志》。

《宋史》卷 187《兵志》。

《清史稿》卷 136《兵志》。

省、府州城也无不驻兵，只是因形势不同而略有差异。元代的安西路城（今西安城）为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安西王所部士卒达 15 万人之众，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县城数量众多，每个县城并不一定驻扎军队，但属于军事要塞的县城则必然驻扎军队，像明代长城沿线的县城，也无一不是一座大兵营。

正因为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各种政治功能都表现得十分充分，城门的开闭有时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如《唐律疏议·卫禁下》：“若擅开闭者，各加越罪二等，即城主无故开闭者，与越罪同。”疏议曰：“擅谓非时而开闭者……加越罪二等，处徒二年……城主无故开闭者，谓州县城戍等长官主执钥者，不依法式开闭，与越罪同。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亦同城主之法；州县镇戍城门各徒一年，自县城以下，悉与越罪同。”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对城门的管制十分严密，任何人不得违章开闭，以维护城市的安全。

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也有工商业，但不占主要地位，市场往往被禁锢在一定地区，集散货物也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商品为主。像唐长安东、西市，北宋开封大相国寺万姓交易，明代北京东华门外的内市等，其交易的商品就多珠宝、皮货、名贵药材、名贵古玩、字画等，显然不是一般人需要和能买得起的。当然，城门开闭有时，市场管制甚严，也影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府州县衙门所在的城市，虽然不如首都的地位重要，但经济功能的发挥均受到限制，经济发展缓慢则是普遍现象。

2. 经济城市

中国的经济城市往往也有政治功能，但终究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都会无计其数，它们大都位于水陆交通道路之上，或处于海港、河港的地位，有发展成为著名经济都会的一切有利条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以前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共计 13 个城市。有些虽然是首都，但由于经济发达，也被划为经济都会。下面仅以《史记》、《汉书》列举的经济都会为主，说明中国早期经济都会的基本特征。

长安（今陕西西安城西北）汉长安城不仅地处关中平原的中央，是关中地区自然环境最优越的所在，而且“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而发达的水陆交通网就是支撑这座宏伟城市的杠杆。著名的函谷关道、蓝武道、临晋关道、大散关道、直道、回中道，以及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都是以长安为起点的。同时，渭河、黄河也曾经成为运道，而全国的运河网则以关中漕渠为归宿，西通长安。加之西汉政府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迁天下富豪于长安附近诸陵县，形成了以长安和陵县为主体的特殊的经济区，“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富商大贾无不麇集于此。正如司马迁所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长安诸市，就是富商大贾周流的中心，豪杰强族出没的场所。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洛阳恰好位于洛阳小平原的西端，成为控制东西大道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被称为“天下之中”。周平王东迁以后，洛阳就成为东周的首都。由于“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澠，据关河之胜”，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正是凭借地处全国中心的优势，“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商业最为发达。富商师史“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以及市民“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都是对洛阳繁荣的生动写照。

邯郸（今河北邯郸）邯郸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中部偏西地区，处在黄河下游最富庶的农业地区之中。“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也就是说，邯郸恰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来北往的大道之上，是渡过黄河、漳河北上的必经之地，是控制南北干道的枢纽。南北交通干道是邯郸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支柱。郑、卫两国是黄河下游商业兴盛的国家，两国的商人沿南北干道北上，必经邯郸；而燕国商人的南下，邯郸也是必经之地。加之“齐、赵设智巧，仰机利”，南北商人云集邯郸自不待言。

蓟（今北京）蓟是燕国的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或者说北京小平原的中心。苏秦在游说燕文侯时，就称燕“民虽不细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可见燕国虽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但物产丰盈，与关中平原一样，可以“天府”相称。北京小平原的西、北两面有大山环绕，只有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由于蓟城东南有一片广阔的沼泽地，因此，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大道，在渡过永定河以后才歧分为三条大道，分别出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趋向蒙古高原和东北大平原。蓟城就是绾毂三点的咽喉。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蓟城很早就成为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蓟城“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是渤海、碣石（今河北昌黎）之间的重要都会。它“北邻乌桓、夫余，东馆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能得到少数民族丰富的畜产品和海产品。

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临淄是齐国的都城，位于渤海南侧、淄河的西岸，是关东繁荣时间最长的经济都会。由于临淄是齐国手工业的中心，“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成为海、岱之间的著名经济都会，“其中具五民云”。同时，临淄也是东西干道的枢纽，东达山东半岛成山角，西通洛阳、长安；又有连接济水、淄水的淄济运河，水运交通也很发达。战国时代，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

《史记》卷4《周本纪》。

《读史方輿纪要》卷48《河南府》。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下《地理志》。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史记》卷69《苏秦列传》。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第4、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汉书》卷28下《地理志》。

《史记》卷29《河渠书》。

汗成雨，家殷人足”，显然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临淄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宛（今河南南阳）宛位于南阳盆地，是楚国北争中原的孔道和秦国南下长江中游的必由之路。宛兴起于南阳盆地，与南阳盆地优越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不过更为重要的则是这种特殊的交通地位，即“西通武关、郟关，东南受汉、江、淮”。也就是说，它是通向关中蓝武道的必经之地，又可把蓝武道分歧于汉江、淮河和长江流域，联系更为广阔的地区。富商大贾正是利用宛交通上的优势，奔波于秦、楚和中原各国，宛“好商贾”、“业多贾”，就是指此而言。

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陶位于鲁西南，春秋时曹国国都。春秋末年，宋灭曹，陶又成为宋国国都。战国时，宋被齐、魏、楚三国瓜分，陶入齐。后来，陶即成为秦、齐争夺的焦点。战国末年，陶终于为秦国所占有。陶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东最繁荣的经济都会，被誉为“天下之中”。实际上陶偏处东方，并不是全国的中心，但“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范蠡“之陶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陶所以称为天下之中和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是由于春秋末年吴国开凿了邗沟和菏水运河，把江、淮、河、济四大渎连成一体，形成了全国的水运交通网。陶恰好处于这个水运网的枢纽地位，货物周流，经济繁荣就不能不成为自然之势。菏水运河连接济水和泗水，而济水是黄河的支流，泗水又是淮河的支流，沟通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交通。江淮之间又有邗沟。这样以来，南北水运畅通，位于菏、济分流处的陶，其政治、经济地位日益重要。秦国拼命争陶，不仅因为它是重要的经济都会，而且是为了攻打齐国，震慑六国，在东方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据点。

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位于华北大平原最早的经济地区之中，宋国曾建都于此。在鸿沟以东，“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司马迁把陶与睢阳并列，说明二者兴起和繁荣的地理基础是一致的。陶处在菏、济分流处，而睢阳更位于鸿沟系统运河的中心，南滨睢水运河，北近汜水运河（下游为获水），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尽管睢阳不在汜水运河岸上，但汜水运河向南有一条支渠，“余波南入睢阳城中”，实际上沟通了睢水和汜水。睢水又与涣水、蕲水相沟通，使睢阳处于水运的中心。睢阳城的水运码头也就是睢水所积的逢洪陂。

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位于淮河南岸，战国时楚曾迁都于此。楚相孙叔敖在寿春以南修建了芍陂，灌田万顷。陂周百二十里许，设有五门，吐纳

《史记》卷 69《苏秦列传》。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水经注》卷 8《济水注》。

《水经注》卷 25《泗水注》。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水经注》卷 24《睢水注》。

《水经注》卷 24《睢水注》。

《后汉书》卷 106《王景传》。

川流，沟通肥水。在肥水以北，又有鸿沟系统运河与淮水相会。寿春正好处于淮南北水运的中心，“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就是指的这种形势。

合肥（今安徽合肥）合肥位于江淮之间，为南北货物集散的中心。“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正好说明南北货物会集于此。水运交通为南北货物会集合肥创造了条件。肥水和施水在合肥附近分流南北，会入淮河和巢湖，巢湖又有濡须水与长江相通。合肥正好位于水运的中心，就不能不成为江淮之间的重要经济都会。

江陵（今湖北江陵北纪南城）江陵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的近旁，楚国长期建都于此，称为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江陵凭借长江一线，西通巫、巴，东连吴、越，成为长江中游兴起最早的经济都会。江陵地处三峡之东，必然会成为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换的中心。楚国曾在江陵附近开凿沟通江、汉的扬水运河，成为楚国“漕运所由”的主要通道。这对楚国北争中原和南北货物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江陵地处东、西、南、北物资交流的中心，必然会发展成为“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的著名经济都会。

吴（今江苏苏州）吴位于太湖之滨的长江下游三角洲，河网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春秋时吴国建都于此。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铜又是制造武器和货币的重要原料，自然会成为吴兴起的经济支柱。三江五湖之利，不仅昭示物产丰饶，而且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吴枕江倚湖，“食海王之饶”，尽管土壤的优势尚未发挥出来，但水运四通八达，物产丰饶，已足以使它兴盛起来，成为长江下游最早的经济都会。

番禺（今广东广州）番禺位于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它滨临南海，又有珠江流域作为广阔的腹地，自古以来海运发达。由此沿海北上，可到达中国大陆海岸诸港口；而南下，可通今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港口，海上航线十分遥远。由于“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海路交通发达是番禺兴起和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经济都会的重要原因。从上述货物品种也可以看出，海上交通与番禺的兴起息息相关。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首先在南海岸上兴起，也同南海海域深广、终年温和多雨有密切关系。

《水经注》卷 32《肥水注》。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湖”应为“潮”之误。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水经注》卷 32《肥水注、施水注》。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水经注》卷 28《沔水注》。

《新论》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读史方輿纪要》卷 24《苏州府》。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秦汉以后，上述著名的经济都会，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有些衰落了，有些则继续向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政治上不统一，但南北各有自己富庶的经济地区，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经济都会。江淮流域以南主要有建康、江陵、成都、京口（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江苏扬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广州、山阴（今浙江绍兴）等城市。建康是六朝的都城，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洛阳）”。城内有四市，秦淮河以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成都、江陵、京口、广陵等都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沿岸，处在长江流域经济地区之中，交通便利，自然会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山阴是两浙绢米交易的中心，街市繁荣，商旅会萃也是很自然的。寿春是淮水与颍、肥交会的地方，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南北互市的场所。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海外珍奇异宝，无不由此而进，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之说。

北方地区的经济都会主要是几个朝代的国都，如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长安和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平城地高气寒，出产很少，仅靠政治力量维持一时的繁荣，当迁都洛阳以后，自然衰落。北魏的洛阳街市整齐，商业兴盛，“屠贩为生，资财巨万”，仍为重要的经济都会。长安再次作为国都，自然也会逐渐繁荣起来。邺处在富庶经济地区之中，经过曹魏的经营，已“郭三市而开廛”，“百隧毂击，连轹万贯”，后来又成为东魏、北齐的都城，交通便利，商贾自然云集。

唐宋时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经济都会遍及全国。唐代著名的经济都会有长安、洛阳、成都、扬州，另外还有太原、岐（今陕西凤翔）、凉（今甘肃武威）、汴、宋（今河南商丘）、魏（今河北大名）、贝（今河北清河）、润（今江苏镇江）、广、登（今山东蓬莱）、泉、楚（今江苏淮安）、洪（今江西南昌）、荆（今湖北江陵）、明（今浙江宁波）等州。长安为首都，洛阳是陪都，成都一贯繁荣，扬州为盐铁转运使的驻所，它们都具备着繁荣的条件。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整齐的城市，与世界上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联系，其繁荣昌盛，可想而知。扬州的繁荣还超过了成都，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雄富冠天下”，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有似于今天的上海。“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都是对扬

《太平寰宇记》卷 90 引《金陵记》。

《隋书》卷 31《地理志》。

《太平御览》卷 827《资产部·市》引《丹阳记》。

《隋书》卷 24《食货志》。

《南齐书》卷 46《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魏书》卷 110《食货志》。

《南齐书》卷 32《王琨传》。

《洛阳伽蓝记》。

左思：《魏都赋》。

《中国六大古都》第 95—105 页。

《资治通鉴》卷 259《景福元年》条；《容斋随笔》卷 9《唐扬州之盛》。

《新唐书》卷 224 下《高骈传》。

张祐：《纵游淮南》，《全唐诗》卷 511。

州繁荣的生动描写。上元元年（760年），田神功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胡商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外国商人之多，由此可见一斑。汴、宋、魏、贝、润位于运河岸上，交通方便，自然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广、泉、登都是重要海港，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助长了它们的繁荣。广州外国商船很多，“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凉、岐、太原等是陆路大道的必经之地，前二者位于丝绸之路上，后者是通往北方军事重镇蓟城的要冲。唐代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凉州十分繁盛，“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宋代的城市规模更大，商业更为兴盛。开封和杭州先后成为国都，人口众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除此而外，宋代时全国著名的通都大邑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十万贯以上的就有52个城市。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运河沿线，以及入川和通往河北的大道之上。这显然同宋与西夏、辽金的对峙和互市有密切关系。运河沿线的城市如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楚州、扬州、苏州等；入川大道上的城市如京兆（今陕西西安）、兴元（今陕西汉中）、利州（今四川广元）、梓州（今四川三台）、成都等；通往河北大道上的城市如太原、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另外就是一些重要海港，如广州、泉州和福州等。盱眙和襄阳，由于宋金贸易也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开封既是北宋的国都，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城内城外市场之多，以及州桥夜市、相国寺前万姓交易等，其盛况都是空前未有的。南宋的杭州更超过开封20倍，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商业市场到处皆是，“客贩往来，旁午于道”，夜市更为热闹。杭州市上有414行，围绕杭州的还有15个市镇。南宋时的泉州也驾临于广州之上，成为全国第一大港。这是由于泉州一带物产丰盈，造船业发达，以及浙闽陆路贯通，距离临安较近，又是南宋一个安全的海上门户的缘故。

元明清时代的经济都会已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这同我国东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密切关系。北京为元明清的首都，其经济实力虽然不能与东南地区的城市相抗衡，但商业兴盛也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马可·波罗所见到的汗八里城（大都）商业发达，豪华壮丽无与伦比。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内

王建：《夜看扬州市》，《全唐诗》卷301。

《旧唐书》卷124《田神功传》。

《唐国史补》卷下。

张籍：《凉州词》，《全唐诗》卷386。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全唐诗》卷199。

《宋史》卷85-90《地理志》。

《文献通考》卷17《征榷四》。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第29—30、84—9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东京梦华录》卷2、3、4。

《都城纪胜·序》。

《梦粱录》卷13《铺席》、《夜市》；《都城纪胜·市井》。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本书编写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第68—72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马可·波罗行记》（冯译本）中册，第379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外形成了许多著名大市，热闹异常。仅崇文门一处，清代时每年额征正税银就达 94483 两。元代的杭州、泉州、松江等就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使镇江、扬州，淮安、济宁、临清、河西务（置漕运司于此）、通州等皆舟舫辐辏商业兴盛，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明代的经济都会遍及全国，仅征收市肆门摊税和船钞的城市就有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今江苏）、杭州、嘉兴、湖州（今浙江）、福州、建宁（今福建）、武昌、荆州（今湖北）、南昌、吉安、临江（今江西）、广州（今广东）、开封（今河南）、济南、济宁、德州、临清（今山东）、桂林（今广西）、太原、平阳、蒲州（今山西）、成都、重庆、泸州（今四川）等，共计 30 余处。而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又是江南最繁荣的城市。入清以后，不仅上述城市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各省省会和一些著名的府、州、县治，也都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尤其是沿海城市发展更快，天津、上海后来居上，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天津，元代称为直沽，是接转运粮船的重要枢纽。明初设天津卫，据说因明成祖由燕起兵，从此渡河南下，后来在置卫所时赐名天津。由于它是漕运的枢纽，又是北京的门户，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海港城市。当然，长芦盐场的经济实力也支持了天津的繁荣。1860 年被辟为商埠以后，遂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中心和工商重镇。直到建国前夕，天津一直与上海相伯仲，仅次于上海而成为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上海得名始于南宋，因上海浦而定名为上海镇。元代始设上海县。明清两代，上海得到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已成为拥有 20 万人的大城市。1842 年被辟为商埠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强行开辟“租界”，遂成为外国资本家的“乐园”和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最大的侵略据点。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具有一条“黄金水道”和最大的腹地。侵略者可以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的广大地区。上海处于长江航运交会的枢纽地位，具有发展成为海港城市的一切有利条件，能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上述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尽管形成的时间不同，但均设有市场，或设有四处市场，作为交易的中心。

中国的都城设市始于西周的丰镐，所谓“前朝后市”就是证明。秦咸阳市有市史有明文，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秦公子 12 人被戮于咸阳市，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汉长安城有 9 市，

《帝京景物略》卷 2、4。

嘉庆《一统志》卷 3《京师三·课税》。

《元史》卷 94《食货志·市舶》。

《读史方輿纪要》卷 11、22、23、25、33、34。

《明史》卷 81《食货志·商税》；《文献通考》卷 18《征榷一》；《明会典》卷 35《课程·钞关·商税》。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 129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中英北京条约》第四款。

《近代天津经济概况》，《文稿与资料》1980 年 5 期。

尚思棣等编：《上海地理浅话》第 7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

《史记》卷 85《吕不韦列传》、卷 87《李斯列传》。

一般认为即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孝里市、交门市、交道亭市、柳市、直市。东汉洛阳有金市、马市、南市。六朝时的建业和建康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隋唐长安有东市和西市。宋元明清的开封、杭州和北京，市场更多，沿街布设，各有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已沿街设置，与今天各个城市的商业街十分相似。

西周以后，中国的都城不仅设市，而且管理甚严，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周礼》就有司市，专门管理市场。规定“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由于交易定时，交易者“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西汉长安市场设有市长，京兆尹领长安市。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从汉代末年，商贾定居市场，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为方市闾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陈直先生认为，“方”为“九”字之误。由于商贾定居市场，管理的任务更大，制度更加严密。六朝的建康大市“备置官司”。隋唐长安市场设置东市局、西市局、东平准局、西平准局，均隶属于太府寺。两市还有市署令，“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泄，平货物为三等之直，十日为薄”。北宋开封设置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易务、杂买务、杂卖物皆隶焉。”尽管从宋代起，市场已沿街布设，但由于税利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市场的管理一直是很严格的。元明清的北京，对市场管理和征税的制度更加严密。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提举”，每个市场都设专官管理。元代还在大都、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设警巡院，有102个城市设录事司，使中国城市有了自己的建制，即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府一样。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更是一件大事，证明中国城市已向政治独立、经济完善的方向发展。明代初年，在南京设置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迁都北京后仍沿用这种办法，对物价管理极严，“每三日一次校勘”。清代北京市场管理和征税，先归户部，后归地方官兼领，即归顺天府所辖之大兴、宛平二县分管。中国的首都尽管以政治功能为主，但市场既关系到

《隋书》卷24《食货志》。

《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三辅黄图》卷2。

《太平御览》卷827引《三辅黄图》。

《隋书》卷24《食货志》。

《长安志》卷8、10。

《新唐书》卷48《百官志》。

《宋史》卷165《职官志》。

《元史》卷85《百官志》。

《元史》卷58《地理志》、卷91《百官志》。

《明史》卷74《职官志》。

《清史稿》卷120、122《职官志》。

京城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又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受到重视，《周礼》规定的管理机构及职能一直延续下来。像《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即管理与平准物价，一直是市政机关的主要职能。过去所谓的“质剂”，也就是平准物价。

各地的经济都会，同样设有管理机构，司马迁的祖先就作过汉市长，“成都市官本有长，建武十八年省”。《晋书》中也有“市长沛国赵元儒”这样的记载。除明代“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外，唐以后，市场管理一直由地方官兼任。唐代大都督府有市令，都督府、三都、诸州各有市丞一人。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废州县市印，由地方官兼任。地方官既是政治上的行政长官，也是一个城市经济管理的指挥者。

由于各个经济都会形成的地理基础不同，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运河沿岸的商业城市、海港城市、陆路上的商业城市，以及近代的工商业城市。

由于中国的运河兴起很早，随着运河的发展，在运河沿线兴起了一批著名的经济都会。譬如春秋战国时代的陶，西汉的睢阳、荥阳、彭城等，唐代的扬州、京口、泗州、贝州等，明清的杭州、苏州、镇江、扬州、淮安、济宁、临清、河西务、通州等，都人口众多，商业繁荣，以运河为生命线。

中国的海路交通也兴起很早，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海港城市。秦汉时代的番禺，唐代的广州、登州、明州，宋元的泉州，明清的广州，近代的上海、天津等，都是对外贸易的商港，港口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兴盛与衰落。

随着陆路交通线的变化，各个时代的主要陆路交通线上都有著名的经济都会。譬如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通往河北大道上的定州（今河北定县）等，都显得十分繁荣，就是典型例证。

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使城市分类出现了新的变化，可以把经济都会分为工业城市、商业城市、海外贸易城市。工业城市又可分为纺织工业城市、钢铁工业城市、陶瓷工业城市、化学工业城市、煤矿工业城市、石油工业城市等等，或者称为轻工业城市、重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又可分为综合性商业城市、单种商品为主的商业城市。海外贸易城市也可按交易对象或商品种类，分成不同类型的贸易中心城市。当然，不管如何分类，各类城市都有自己的地理优势，可以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

3. 军事城市

军事城市指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或主要的设防城市，城市的政治、经济功能都比较薄弱。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城市的数量也不少，尤其是边防线上的军事重镇更是如此。中国的长城兴起很早，长城线上的军事堡垒大都为军事重镇，也就是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

既然是设防的城市，就必然有坚固的城墙和一整套军事防御工程，并驻扎重兵。秦汉的虎牢关城位于今河南荥阳西北的大伾山上，萦带伾阜，绝岸

《周礼·地官·司市》。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太平御览》卷813引《晋书》。

《明会典·户部》。

《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

《唐会要》卷86《市》。

峻周，高四十许丈，面积仅 0.14 平方千米。秦汉长城沿线的边城遗址有 100 处左右，主要古城有 46 座，最著名的有准格尔旗纳林古城、清水河的上城湾古城、托克托的古城村古城、宁城县的黑城子城址等。城的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回字形、城中有子城和形状不规则等四种形态。城用夯土筑成，除个别外，城门都设在南垣的正中。唐代的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龟兹城（今新疆库车东北）、庭州城（今新疆吉木萨尔东北）等，都修筑得非常坚固，驻扎重兵。尤其是碎叶城，为庭州刺史王方翼修筑，城“面三门，纒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城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碎叶城位于中亚托克玛克，为唐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之一，均驻扎重兵，为唐代典型的军事城市。明代的边防城市更多，九边镇就是代表。一般所谓的九边镇就是指辽东镇（先驻今辽宁辽阳，后迁今辽宁北镇）、蓟州镇（驻蓟州，今河北遵化东）、宣府镇（驻今河北宣化）、大同镇（驻今山西大同）、山西镇（驻今山西太原）、延绥镇（驻今陕西绥德，后迁今陕西榆林）、宁夏镇（驻今宁夏银川）、固原镇（驻今宁夏固原）、甘肃镇（驻今甘肃张掖）。宣化在明初即设左、右、前三卫，并为谷王封地，城内筑有王府。永乐时置总兵官，军籍户口达 23 万户。城为方形，开有 7 门，东西各一门，北二门，南三门。谷王府位于全城北部中央。正统五年（1440 年），城墙用砖包砌。大同城历史悠久，明初为代王封地。城内有代王府，位于全城北部偏东处。城为方形，四面各开一门，洪武五年（1372 年）徐达即把土城包砌为砖城。榆林原为一个小村庄，永乐时置榆林寨，正统时建榆林堡，成化九年（1473 年）才移延绥镇于此，把城向北扩展，旧城称“南城”，新城叫“北城”。成化、弘治时分别修“北城”和“南城”，万历年间砌砖。该城呈西北、东南向的长方形，东倚驼山，西滨榆溪河，北有红石峡，南临泥沟河，形势险要。除九边镇城外，长城沿线的县城也修筑得非常坚固，像右玉城、左云城等，均为砖城，并筑有瓮城、翼城（瓮城门外）和月城（右玉城城外）。著名的山海关城、嘉峪关城，更固若金汤。山海关城依山傍海，形势险要，为扼控东北的咽喉，有“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洪武年间筑城，由七个堡城、十大关隘、数座敌台和一线长城共同组成的防御建筑群。以关城为中心，城外有护城河，设四门，门外有瓮城。在东西门外还筑有东罗城、西罗城，罗城与关城只有一孔之道。在关城南北各建翼城一座，其主要作用为屯贮粮草、军械和驻兵。在这个防卫圈之外，还有外圈防御设施。譬如，在喜峰岭上筑有威运城，高屋建瓴，在海滨筑有宁海城，重炮虎踞等。嘉峪关城建于洪武五年（1372 年），嘉靖时重修。城南倚祁连山，包有清泉。关城呈梯形，西宽东窄。城楼、敌台、垛口包砖，余为夯土筑成，西、北、南筑有罗城，西边的罗城为凸字形，建有三层雄伟的高大城楼。城的四角建有砖砌的角楼和角台，东西城门外有瓮城。嘉峪关城防御体系严密，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清代设伊犁将军，伊犁筑有九城，即绥定、广仁、瞻德、

《水经注》卷 4《河水注》。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403 - 405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新唐书》卷 111《王方翼传》。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13、115、121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25 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23 页。

拱宸、塔勒奇、惠远（将军驻地）、惠宁、宁远（今新疆伊宁）、熙春，均驻扎军队，互相支援。

仅从以上数例不难看出，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都有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驻扎重兵，设置军事机构，其主要人口也以军事人员和与军事人员有关的人口为主，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实在微不足道。当然，中国的政治城市也往往设防，但军事功能并非居于主要地位。

4.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指以文化功能为主的城市。但文化机构不能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必须依附于政治和经济，在地域分布上，不是位于政治城市之中，就是建于经济中心之内。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单一的文化城市，但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区，形成特殊的文化区域。齐国临淄的稷下之学，久负盛名，就是以稷门（南门）学宫为中心，形成重要的文化区，有“数百千人”。西汉长安城安门外，设有太学，“太学，贤士之关，教化之本原也”。王莽执政时，“建弟子舍万区，起市郭上林苑中”，可见到西汉末年时，太学的规模很大，已形成专门的文化区。东汉洛阳的太学也位于城南开阳门外，其遗址在今洛阳城东洛河南岸的太学村附近。东汉太学的规模比西汉更大，“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学学生最多时达3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曾于太学门前立石经46块，为著名书法家蔡邕用八分体所书写，称为“熹平石经”或“一体石经”，成为经书的规范化教本。每日观碑摹写者车马填塞，盛况空前。曹魏正始年间又立石经28块，称为“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即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直到西晋时，洛阳太学仍十分兴盛，学生仍“万有余人”。也就是说，洛阳城南这个特殊的文化区历经东汉、曹魏、西晋三个朝代，不仅时间长，而且规模宏大，成为洛阳城市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唐长安太学设在务本坊，隶属于国子监。务本坊位于皇城南安上门外东南，即今西安大南门外东南，恰好也位于西安城南。太学有博士6人，助教6人，五分其经，每经百人。另外，还设有国子监学、四门馆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均位于务本坊。不难看出，务本坊就是唐长安城内的专门文化区。就连唐代的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和思想文化的最高象征孔子庙，也都设在务本坊。国子监领国子监、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北宋开封城的国子监、太学，设在朱雀门（内城正南门）外，过龙津桥向南东侧。龙津桥即朱雀门外蔡河桥。宋代的国子监所辖除太学外，还有武学、律学、小学、宗学、书库官等，均位于朱雀门门外，同样是北宋开封的文化区。除此而外，北宋开封还有许多文化市场，热闹非凡。像每月五次开放的相国寺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等，以及遍及全城热闹去处的“京瓦伎艺”，都是特殊的文化区。

《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

《三辅黄图》卷5《太学》。

《后汉书》卷90下《蔡邕传》。

《新唐书》卷48《百官志》。

《长安志》卷7《务本坊》。

《东京梦华录》卷2《朱雀门外街巷》。

《宋史》卷165《职官志》。

《东京梦华录》卷3、5。

元明清的北京，国子监仍是最高教育机关，位于城的东北部，即今天北京安定门内仍命名为国子监街的附近。明永乐元年置国子监于北京，利用元代旧址，设有博士、学正、学录、掌饌、助教等，以国子学为最高学府。清代的国子监仍依明代，设有博士、学正、学录、助教等，使安定门内成为北京城主要的文化区。明清时代，北京外城有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即琉璃厂。位于西河沿南杨梅竹斜街的西面。这里以经营珍贵古旧书籍、文物字画、古碑拓本，石砚笔墨而闻名海内外。像最著名的荣宝斋就设在这里，同时还有裱画店、帖套作、刻碑、刻图章等店铺。

地方城市中，凡省、府州、县衙门所在的城市，都有省、府州、县学，也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像明清时代的西安城，书院门就是文化区。这里有关中书院（今西安师范）、西安府学、长安、咸宁县学、义学、文庙、碑林等，形成西安城内的文化区。这个文化区还向东伸延到今东厅门街一带。这一带有长安、咸宁考院、西安府考院、崇化书院、社学等，都位于今端履门街以东。清代末年的关中大学堂，后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就是利用西安府考院建成的，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高级中学所在地。省会城市如此，府州、县城也不例外，都有自己的文化区。明清时的凤翔府，府学位于府治东南，凤翔县学位于府学之西，岐阳书院位于府治东，另外还有凤翔书院、凤起书院等，即凤翔城的东南部，形成凤翔府的文化区。明清时的扶风县学位于县治东，即文庙，也就是今天东街的初级中学，形成县城内的文化区。由此可见，只要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各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文化区。

现代城市都辟有专门的文教区，成为科研、高等学校集中的所在，北京北郊、西安南郊都可以作为代表。北京北郊有中国科学院等全国最高的科研机构，西安南郊有数十所高等学校，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尽管全国还没有单一的文化城市，但陕西省的杨陵区则是一个县级文化科研城市，尽管还没有建市，但按照历史上县级以上城市对待，它是真正的文化城市。这里有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等许多大型研究机构，并有陕西省最大的农业科学会堂。

当然，城市分类除按职能划分外，还可以按政治权力的大小划分，即首都、地区统治中心城市、府州县城市等。还可以按地形特征或城市形态划分，即山区、河岸、湖畔、海滨等，或方形、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即按城市形成的地形特点或城市形状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城市。目前比较流行的就是按城市的规模结构把全国城市区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单一职能的城市是不存在的。只有按人口指标划分大小比较合适。在我国，100万人口以上为特大城市，50万至100万人为大城市，20万至50万人为中等城市，20万人以下为小城市，具有10万人的城镇才能升格为城市。就一个地区来说，城市的规模结构应该是大、中、

《明史》卷73《职官志》。

《清史稿》卷121《职官志》。

刘德岑：《古都篇》第262页，西南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9《学校》。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5《凤翔府》。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58-162页。

小相结合，即“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五、中国城市的形状

中国城市的形状，在历史上也就是城墙的形状。因为中国城市大都有城墙，长期以来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也就是市区，市区很少越出城墙。近代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和铁路、公路、航运的发展，市区多沿交通线发展，城市的形状也迅速突破城墙的限制，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比较而言，不规则形已占多数。

1. 方形城市

《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指国都，也就是说国都应该是方形的城市。每边长九里，按周尺 19.9 厘米计算，一里为 1800 尺，则九里之城边长 3222 米，周长 12.8 千米，面积 10 平方千米左右。《周礼·考工记》指周代的都城，但对后来都城的形状也有一定影响。洛阳发现的东周王城，北墙长 2890 米，面积为汉河南县城的 4 倍，即 8.3 平方千米，也应为方形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第二次筑城高潮，标志着中国城市的大发展。城的形状已趋于多样化，但仍不乏方形的城市。魏国的安邑城、鲁国的曲阜城、楚国丹阳城（今湖北秭归），都接近方形。西汉的首都长安城南北 6.4 千米，东西 6.15 千米，接近方形。北宋开封城外城为后周所筑，北宋展筑，周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也是接近方形的城市。明代北京的内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发展的，北墙内缩，南墙展出，使原来南北向长方形的城，变成东西长 7 千米，南北宽 5.7 千米的接近正方形的城。总之，都城的形状比较规则，方形的城市占有一定数量，因为方形方方正正，显得庄重大方，具有端正、威严的形态，作为首都城市的外形，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然而，由于这种城市对地形的要求比较严格，必须有一块广阔平坦的平原作为基础，故在都城的形状中并不占主流。

在省、府州、县城中，方形的城市也占有相当数量，尤以县城最多。这是因为一般县城的范围比较小，筑方形的城也比较容易的缘故。明代的成都城，由于受河流的制约，即府河与南河在此相会，城的方向不正，呈西北、东南向，东西略长，南北略窄，接近正方形。太原城方向正南北，为方形城市。兰州内城也接近方形，后来加筑外城，才使城市成为不规则形。明代的宣化、大同、安阳、保定、扬州新城等府州级城市，也多为方形，或接近方形。方形的县城更多，像山西左云，陕西神木，上海奉贤、南汇，山西平遥、太谷等都可以作为例证。奉贤、南汇位于平原地带，修筑方方正正的城比较容易，而陕西神木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上，西临窟野河，东倚高原，就只能利用河谷这块小平原，建成一个范围很小的方形城，面积仅 0.25 平方千米。山西太谷城也位于黄土高原上，但由于地处汾河盆地，又在交通要道之上，是清代票号中心，商业兴盛，面积达 2.7 平方千米，而且南关、东关的

《玉海》卷 174。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01 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06 - 109 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06、107、109、113、115、137、141、146 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18、122、131、132、150、151 页。

范围也很广阔，城市不但为正方形，而且布局也很整齐。

2. 长方形城市

长方形城市在中国城市形态中是比较多见的一种，大约同不受正方形的限制，便于利用地形有关。这种长方形城市可因地制宜，建成东西向长方形或南北向长方形。也有方向不正，呈现斜形的长方形城市。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都城，既有东西向的长方形，也有南北向的长方形。齐临淄城，东临淄河，小城镶嵌在大城的西南部，整个城市形状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大城周长 14 千米，小城周长 7 千米。河北易县的燕下都，东西两城相连，东城斜向东南，东西总长 8 千米，南北宽约 4 千米，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南北两侧临近中易水和北易水。侯马古城为晋国的新田遗址，有“平望”、“牛村”、“台神”三个小城构成“品”字形，就每一个小城来说，“平望”城、“牛村”城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台神”城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由此可见，该城可能建于不同时代，各依其地形特点修建了不同形状的城市。因为这三座古城的东南就是浍河，西北则为汾河，城市的形状当与两河附近的地形有关。赵国的邯郸城，由两城构成，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二城相距不到百米。大城缺其西北角，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小城也呈“品”字形，由三个小城构成，北面的小城和东南的小城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只有西南的小城为正方形。湖北江陵以北楚国的纪南城，东西长 4.5 千米，南北宽 3.5 千米，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秦都栎阳位于阎良镇东南 10 千米的武屯镇一带，东西长 1.801 千米，南北宽 2.232 千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秦都雍城位于凤翔县南，东西长 3.3 千米，南北宽 3.2 千米，略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秦雍城一带地形平坦、开阔，有建成方形城市的一切有利地理条件，因此，也可以视作正方形城市。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第二次筑城高潮，城的形状已多样化，各国都城的形状已不具一格，突破了《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模式。

从此以后，在南北向长方形的都城中，东汉洛阳，东魏、北齐邺都南城，元代的大都城都可以作为典型代表。东汉洛阳城北倚邙山，南临洛河，经实测，西垣残长 4.29 千米，北垣长 3.7 千米，东垣长 3.895 千米，南垣长 2.46 千米，周长 14.345 千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这显然是为了南临洛而北倚山，有意建成南北向的长方形，不建成东西向的长方形。或许与“九”、“六”这样的数字有关，因为洛阳城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称为“九六城”。当然，东汉洛阳城的北、东、西墙均有曲折，南墙被洛河冲毁，形状并不规则，这种不规则的形状也是受当地地形制约的结果。东魏、北齐的邺城南城，紧附于曹魏邺城之南，其遗址就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17.5 千米处。据《邺中记》记载，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以西晋尺计算，六里为 2.646 千米，八里六十步为 4.41 千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漳河之南地形平坦，东西向或南北向建城都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形成南北向的城市，主要是为了把宫殿区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2-276 页。

陕西省文管会：《秦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 年 1 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 年 2 期。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516 页。

《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晋元康地道记》。

摆在全城北部中央，居中指挥，并东西对称布局，只有建成南北向的长方形城市才显得均称、大方。元代的大都城，是刘秉忠依据《周礼·考工记》精心设计的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大都城东西长 6.65 千米，南北宽 7.4 千米，周长 28.6 千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十分整齐。按照《周礼·考工记》，首都应该是方形的城市，北京小平原也有建成方形城市的一切有利条件。然而，刘秉忠并未完全按《周礼》设计，自然是因地制宜的结果。因为北京地区寒风凛冽，只有把大都城设计成南北向的长方形，才能少开北门，以适应北京地区的气候特点。

东西向长方形的首都，以曹魏邺都北城、北魏洛阳外城和隋唐长安城最为典型。曹魏邺都城，《水经注》记载“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为东西向的长方形，而且为中国最早的砖城，“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若亭，巍若仙居”，修建得非常辉煌壮丽。直到现在还留有金虎、铜雀、冰井三台，成为邺城的主要标志。北魏迁都洛阳后，仍依汉魏洛阳旧城，后来加筑外城，其方向与内城相反，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北魏洛阳外城所以一反汉魏洛阳城的基本形态，显然是受邙山、洛河之间地理形势的制约。因为山、河之间东西宽而南北窄，既然要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洛阳城，其形态就只能是东西向的长方形。隋唐长安城是宇文恺设计的。他先到北魏洛阳和北齐邺都南城去参观，吸收这两座古都的优点，再结合长安地区的地形特点进行设计。也就是说，宇文恺既熟悉东西向的城市，又了解南北向的城市，其设计的主要依据就是当地的地形特点。隋唐长安城城址选择在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并有六条大体上东西向的高坡作为骨架进行设计。经实测，长安城东西长 9.721 千米，南北宽 8.651 千米，周长 36.7 千米，为东西向的长方形。隋唐长安城所在地，地形开阔，既可建东西向长方形的城市，也可建南北向长方形的城市。宇文恺所以选择东西向长方形，显然是为了适应六坡地形的特点。因为如果把长安城建成南北向的长方形，必然增大每一个坊内高低地形的差距，难于布设街道，为整个城市的总体布局带来困难。

在省、府州、县城，长方形的城市更多。既有东西向的长方形，又有南北向的长方形。明清的西安城，东西长 4.2 千米，南北宽 2.65 千米，周长 13.7 千米，为东西向的长方形。这是明初在唐皇城的基础上修筑的，把唐皇城的北墙、东墙向外展出，其形状仍依唐皇城，为东西向的长方形。为什么不展成南北向的长方形或方形的城呢？同样是受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因为城西地势较低，城南地势愈来愈高，只有向北、向东展出最为有利，而且更接近东出大道，交通方便。明清的苏州城为元代所重修，东西长 9 里，南北宽 12 里，周长 34 里 53 步 9 分，城内运河三横四直。与宋平江城相比，范围增大，形状未变，仍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宋平江城东西长 3.5 千米，南北

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第 147 页《图》。

《水经注》卷 10《浊漳水注》。

《洛阳伽蓝记》卷 5。

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 年 6 期。

《西安环城建设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20 - 21 页。

宽 4.5 千米，周长 16 千米，略小于元明清的苏州城。尽管苏州城多次重筑，其形状都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其原因就是受三横四直运用框架的制约，只能修筑为南北向长方形的城市。明代的宁夏镇城，东西长 2.6 千米，南北宽 1.75 千米，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宁夏镇城东为红花渠，西为唐徕渠，只有东西向布设最为有利，既可解决城市供水问题，又可防止洪水的袭击。明清时代的南通城（即通州），虽然方向不正，呈西北、东南走向，东西长 0.86 千米，南北宽 1.1 千米，基本上也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由于河流的影响，南北平原开阔，东西略窄，就只能建成南北向长方形的城市。明中叶，为抗击日本海盗的侵扰，又在城南加筑新城一座，由于城南平原面积有限，就只能筑成东西向长方形的小城。明清的榆林城，也是方向不正，与南通相似，东西长 0.775 千米，南北宽 2.125 千米，基本上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因为东有驼山，西有榆溪河，只能建成南北向长方形的城市。在县城，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城市更多。陕西岐山县城、眉县城，方向均为西北、东南向，前者建于唐，元重修，周五里一百二十步，后者建于元，明重修，周三里，基本上都是东西向的长方形。方向所以不正是受当地高低地形和东西向交通道路制约的结果。高陵县城建于隋，明增筑，周四里二百二十步，户县城建于隋，金重筑，周六里七十四步，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城市。从当地地形特点看，建成东西向城市也有条件，所以选择南北向，显然与河流和交通道路的走向有关。

3. 圆形城市

在中国历史上长方形城市居多，正方形的城市也占一定数量，但唯独圆形的城市较少。原始社会的房屋结构，除长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房子。像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圆形的房子就占有相当比例。现已发现了圆形的古城，这就是城头山古城。中国城市中的圆形城市，也可能同古老的圆形房子有关，或天圆地方的传说有关。既然圆形是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形状，那么，建成圆形城市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江苏省常州市西南的周代淹城，就是由三道城墙、三道护城河构成的圆形城市。这是西周淹国的都城，分王城、内城、外城。王城呈方形，周长 0.5 千米；内城为不规则圆形，周长约 1.5 千米；外城也是不规则圆形，周长约 3 千米。三道城墙都只有一个旱路城门，且不在一个方向上。据遗物鉴定，为战国时代的城市。城东西直径约 1 千米，南北直径约 0.74 千米，接近圆形。上海市的嘉定城、青浦城、上海城，浙江省嘉兴城，河南省罗山城，安徽省合肥城等，都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城市。北方地区的一些小城寨也有圆形的。从全国城市的分布看，圆形的城市多在南方，北方甚少。这是因为南方为水网地带，河流多弯曲，旁河依湖筑城，其形状就不能不受河流的制约，建成圆形城市应该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因地制宜的结果。在河网地带，要找到像北方地区那样整块平坦的地区建城，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44 页《图》。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36 页《图》。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21 页《图》。

雍正《陕西通志》卷 14《城池》。

《六千年前古城横空出世》，《南方周末》1997 年 1 月 31 日第 2 版。一说为 4800 年前。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7—19 页。

当然比较困难，依据河网筑城就成为必然之势。

不过从总体来说，圆形的城市终究居于少数，因为建筑城墙比较困难。从中国筑城技术的发展来看，先是小版筑城，而且为小版筑堆筑法，即先筑内壁，然后在墙的外侧堆土夯实，略成斜坡，逐层加高。商代开始采用大版筑城，中间为主城墙，两侧加筑“护城坡”，层层加高，使城墙成为梯形。周人筑城不仅继续使用大版修筑，而且“其绳则直，缩版以载”，学会了缩版技术，即今天筑城的方法。也就是说，大版筑城，每段长约3.3米，作直角形曲折比较容易，围成圆形就比较困难。因此，从筑城技术的发展来看，修筑圆形城比较困难，也是圆形城市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犹如圆形房子基本上被淘汰是一样的道理。

4. 不规则形城市

不规则形城市指城市的形状既非正方形，也非长方形，其形状带有随意性，不是沿河发展，就是受地形的制约，随意展布，因地制宜，没有整体的完整形状。

在这类城市中，沿河发展的城市如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沙市，湖南的株洲等。有些则位于两河交汇处，如江西的弋阳、赣州、会昌、婺源，四川的宜宾、泸州、重庆，湖南的岳阳，湖北的武汉，广东的肇庆，广西的梧州等。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位于昌水之南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因烧制了一批瓷器质量优越、全国竞相效尤而闻名。后来由于瓷业的发展，城区即沿昌江东岸成长条形发展，并向东边山地的窑场区推进，未形成中心区域，后来围绕建成区修筑城墙，城墙也成为不规则形，终于发展成为不规则的城市。

天水位于渭河支流藉水河谷的北岸，呈五城并列的带状城市。先修大城，再修东、西关城，然后才有小西关城和中城，形成五城相连的不规则带状城市。

山城也往往成为不规则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会处一个半岛上，城市建于山上，城墙周十二里六分，门十七，九开八闭，俗以为九宫八卦之形，环江为池，形成不规则的城市。像重庆这样的不规则形山城，完全是受两江和山地地形制约的结果。今天的重庆市更沿长江、嘉陵江发展，形状愈加不规则，体现了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重庆相似的还有四川万县、江西石城等。纯粹受山地地形限制的城市有四川西昌、雅安，山西石楼等，也都是不规则城市。石楼城周三里三十步，建于唐代，明重修，沙河绕城以为池，完全依河而筑，弯弯曲曲，说不上是什么形状。

在不规则的城市中，还有一种类型，即两城并列，从单独一个城看，形状是规则的，把两个城合起来看，形状就不规则了。譬如今天的呼和浩特，是由历史上的绥远、归化二城演变而来的，二城基本上都是方形，距离甚远，连为一个城市就成为不规则形。绥远城在东北，归化城在西南，前者大而后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62页、154页、141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62页、154页、141页。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87《重庆府一》。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4《汾州府》。

者小，后来归化城外发展较快，使该城成为不规则形。归化城也就是明代时蒙古俺答汗所修建的板升，是蒙古地区最早出现的城郭之一。板升即蒙语屋、建筑物的意思。类似这样的城市还有甘肃夏河、平凉，陕西安康等。

到了近现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代城市多成为不规则形，几乎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今天的西安市本来是东西向的长方形，直到建国初期，除四关外，市区仍未超出城墙的范围，建成区仅 13.2 平方千米。经过建国后 40 余年的建设，东、西、南、北郊都有很大发展，东到纺织城，西至三桥镇，南逾电视塔，北超龙首村，东、西、南、北各数十里，已经很难说它属于什么形状，只能说是不规则形。而且，今天的西安市还有飞区阎良，更使它的形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清代太原城基本上维持明代的规模，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顺治六年（1649 年）在城西南角划出一块地方修筑满城，南北长二百六十七丈，东西宽一百六十一丈六尺，周围共八百四十三丈四尺。明代的南关城在明末战争中遭到一定破坏，顺治十七年（1660 年）巡抚白如梅“修筑东西墙接大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官府在小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一带设机器局，北门外一带形成了新的城区。这说明由于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城区拓展速度加快，并逐渐冲破城墙的束缚。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正太铁路通车，铁路线穿过太原城区东部，车站设在承恩门外（又称新南门、首义门）。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铁路沿线城区迅速拓展，居民点迅速增多，城墙内的街道从南、北、东三个方向伸展出去。火车站附近的首义关街、晋西路、桥头街日益兴盛起来。城市人口也迅速增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太原城四关之内共有 3 万人，到清末时已发展到 5 万人。到 1936 年，太原市辖区东至把儿沟，西至汾河边，南至大营盘，北至新城，总面积约 15 平方千米。1949 年，太原房屋建筑面积为 300 万平方米，人口 21 万。1949 年后，太原城区在继续向南北推进的同时，城区迅速拓展到汾河以西，逐渐形成一座跨河而建的城市。

今天的太原市，其建成区早已越出城墙的范围，向南、北、东三个方向发展，尤以南北伸延最远。老城区只有 8 平方千米，而今天以老城区为中心的汾河以东建成区，大约 7 倍于老城区，形状为南北向的长条形，极不规则。由于汾河以东可利用的土地已基本被全部利用，太原市只能向汾河以西发展，今天汾河以西的建成区已三倍于老城区，也是沿汾河作南北向展开，从而使太原城跨河而立，汾河纵贯市区，形状更加不规则。

明清的济南城，形状接近方形。明洪武四年（1371 年），包砌砖石，城周十二里四十八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济南城区向四郊扩展。

济南的四座城门在城区拓展中，由于受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并不处于相等的地位，西郊的发展最早也最快，北关的发展则是相当缓慢。由于城内大明湖的存在，北门是水门，“启以季春，闭以孟冬”，不利通行。

《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海申报馆，1934 年。

雍正《山西通志》卷 8。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北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湖泊沼泽区，“多陂泽，多斥卤，多砂砾”，故开发较晚，直到清朝末年仍然人口稀少，经济萧条。济南座落在东西交通大道上，东门和西门在城市对外交通中地位重要，尤其是西门，由于泺水连通大清河，后来又是小清河的源头，有舟楫之利，因此西门可以说是城市对外交通的水陆枢纽。元初大批西域穆斯林商人来济南经商和定居，西郊是穆斯林的一处聚集地，杆石桥东建有清真大寺，形成了“回回街”。明代济南成为省会后，由于官署衙门大量迁入济南，特别是明德藩王宫的修建，使城内空间拥挤不堪，一些住户、商人、官僚，甚至行政机关，只好在城郊选址建房，致使城郊迅速形成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对济南城来说，以东、西、南城门为中心形成三条关外大街，然后又以关外大街为主轴，形成次级街巷。离城门愈近，交通愈方便的地方形成居民区也越早，反之，居民区形成就比较晚。在西郊，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趵突泉，这里水源丰富，航运方便，风景秀丽，又距西门较近，因此很快形成以趵突泉为中心的稠密居民区。明末趵突泉周围居户已达数百家。在康熙九年（1670年）的一次大风雨中，“趵突泉水溢，飘没庐舍无算”。乾隆中叶趵突泉周围有20条街巷，达到1208户，4738人。人口稠密，可见一斑。西郊地理条件优越，是济南市最早转化为市区的地方。由于明清时为安插官署而迁出的寺观多数都建于南郊，济南南郊居民虽少，但寺观之多却为四郊之首。尽管南郊近南山，地势高亢，道路坎坷崎岖，但也少有水患，并且北有城河，东有黑虎泉群，水源也容易解决，具有定居的许多有利条件。加之南门是南山木材、薪柴、山货等进城的主要孔道，更加促进了南郊的发展。而且南关还是驻军区，营房密集，人数也很可观，乾隆中叶，南郊有21街巷，1117户，4851人。东关发展缓慢，据记载宋人曾在东门外建净居寺，明末刘敕在东门外建有别墅一瑞园。但直到乾隆中叶，东郊只有7条街巷，不足600人。这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特别是东南山区山水冲沟经过东关，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洪水的冲没，发展缓慢也很自然。另外，东门外偏北靠近人烟稀少的湖泊沼泽地带，门内又有大明湖，也是城内居户稀少的地区，这都制约着东郊的发展。清咸丰年间，捻军围攻济南，团练大臣杜鄂，“因关厢无障碍，督绅董筑土圩以环之，周四十里”。这就把东、南、西三城郊以及北郊的大片土地围进圩内，大致北到水屯，东到柳行头。同治时为加强防御改筑石圩，“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面，减圩之三”。石圩的修筑，标志着城郊已经成为市区的一部分，石圩也就是城区扩展的边界。

光绪三十年（1904年），经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同山东巡抚周馥奏准，在济南自开商埠，奏文称：“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在又为两路（胶济、津浦）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运输至为便利，亟应援照……开埠成案，

乾隆《历城县志·总志》。

叶承宗：《历城县志》：“此堤（二里坝）一溃，趵突泉数百家必遭飘没之灾害”。

康熙《济南府志》。

乾隆《历城县志》卷24。

乾隆《历城县志》卷54《里社》。

乾隆《历城县志》卷54《里社》。

《续修历城县志》卷3《地域考》。

《续修历城县志》卷3《地域考》。

以期中外商民咸受利益”。勘定商埠界址在旧城西关外，东起十王殿，西抵大槐树，南到长清大路，北以铁路为限，南北长2里，东西宽5里。商埠选在旧城西部，同样是济南西部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因为南有群山，地势崎岖不平，北为沼泽，又限于黄河，难以扩大市区，开辟商埠。而城西水陆交通方便，地势平坦，面积广阔，是理想的开埠地区。至1916年，商埠建成区的范围为经一路、经二路、纬一路至纬五路，人口达到15万。以后又向西展至纬十路，向南展至纬七路。到1921年，人口达到20万。津浦、胶济两线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埠的推进方向。宣统元年（1909年），以修建一大马路和二大马路可以看出东西街市平行于津浦线，由近而远，从北向南的推进次序。同时受东西老城区的制约，从纬一路开始，渐次修建纬二、纬三……纬十路，可见纵向街市以老城区为基点，由东向西推进。从总的方向看，则表现为从东北向西南推进。“千余年来古坟荒郊之草地”，迅速变成建筑华丽，马路纵横，中外商人渐藏于市的繁华世界。津浦、胶济两线是支撑济南老城和商埠的杠杆。因此，商埠区、老城区和铁路线之间的地段，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商民聚集区。商埠区和老城区之间的地带，在抗日战争前夕，已完全连成一片。“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嗣后开辟了南商埠和住宅区。到建国前夕，市区建成面积为23.2平方千米。建国后，城区除继续保持沿胶济、津浦线推进的趋势外，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区拓展以东部为主要方向，因为东部的土地面积比较广阔。

今天济南的建成区面积已10倍于老城区，主要市区在胶济铁路、京沪铁路以南和京沪铁路以东、以北地区，形状极不规则。因为它以铁路为骨架，铁路伸延的方向，也就是市区扩展的方向，城市的形状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不规则形。

武汉三镇原有三城，明代中叶以后的武昌城接近南北向的长方形，汉阳城接近圆形，只有汉口堡城仅有西北城垣，而缺失东南城垣，谈不上是什么形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江航运的发达，武汉三镇的地位迅速提高，尤其是汉口更后来居上，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镇之一，市区扩展与日俱增。

明代曾对武昌城，汉阳城扩建、修葺，使武昌城囊括蛇山，汉阳城地跨凤栖山东部，但最突出的扩展是汉口的崛起。明代中叶，汉水自郭师口直冲入江，汉水主泓改经龟山北麓，使汉口的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汉水南道的大部分仍以湖泊（月湖）形态存在，在月湖入江口与汉水入江口之间的滨江地带，靠近汉口港口，成为船舶舟楫停泊之所，逐渐发展成为城区。汉口在明洪武年间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芦洲，在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后短短数十年，就发展成一个拥有数千人口的商业集镇。汉口市区顺长江、汉水沿岸的自然堤伸展，并向西北方向推进。汉水改道也对武昌城区产生了间接影响，因为汉口港口条件改善后，商舟多泊汉口汉阳。尤其是明末鹦鹉洲被冲蚀掉，更使武昌的港口条件丧失殆尽，遂导致了南市的衰落，但南市地域仍为武昌市区的一部分，鹦鹉洲、金沙洲上的建筑则沦于江流。清初在武昌城北开凿新河，企图以此来挽救武昌业已丧失的港口条件，又导致了塘角市场的兴盛，使武昌城区自草埠门外沿长江之滨向北推进到今三层楼一带。清初在靠近汉阳的江面上，新淤成一个洲（即新鹦鹉洲），后来修筑拦江堤，它被拦隔在

《续修历城县志》卷4《地域考三·里社》。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堤外，与河漫滩连接在一起，逐步演变为汉阳城区的一部分。

汉口城区的扩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明末崇祯年间在汉口上起硤口、下至堤口（即今长堤街）一线修筑袁公堤，消除了来自汉水硤口上流的洪水威胁，民居市肆迅速集中，到鸦片战争前汉口城区已延及袁公堤内，面积约11.2平方千米。后来玉带河因泥沙淤积，阻塞不通，当地居民便架屋其上，使原玉带河河面也成为城区的组成部分，城区继续向西北扩展，最终导致了汉口堡的撤除；1905年修筑张公堤，自广福寺至岱家山，全长30余里，防止了后湖水向汉口城区的倾泄，使堤内数万亩洼地变为良田，为汉口城区继续向西北方向扩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汉口城区又得到很大发展。到清末民初，汉口城区已扩展到28平方千米，其中包括方圆数千亩的原租界区。当时的租界区位于汉口镇以下沿江七八里的地方，本为田野荒地，在设立租界的数十年间，迅速演变为新的市区。

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武汉城区没有大的扩展，甚至原有城区还有荒废现象，如武昌徐家棚一带，曾辟有公路，但到建国前夕已荒草没胫。建国后，武汉的城市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区才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规模和态势。从整体上看，武汉城区的主体呈微微北偏东的大十字形，长江沿线城区与汉水及其延伸线武珞路，珞瑜路沿线城区在龟蛇二山附近交叉。武汉城区这种格局是由于城区顺长江、汉水沿岸伸展所致。宋代著名的南市就是在武昌城南沿江伸展的，后来由于新河的开凿，武昌城区又自武昌城北门外起沿长江之滨延伸到三层楼一带。汉阳南郊的两湖一路、两湖二路、两湖三路、新五里等街巷名称的命名，就是汉阳城区沿长江之滨向南展布的生动证明。迟至晚清，汉口城区沿汉水沿岸还只扩及到硤口一带，但后来汉口市区自硤口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古田一路、古田二路、古田四路先后成为城区，并向陈家墩以远发展，表现出沿汉水北岸展布的规律。此外汉口各国租界的布设，在汉口老城区以北长江西岸呈线状分布，也体现了这一规律。

武汉三镇位于汉江与长江的会合处，汉江、长江航道的变迁对武汉三镇的布局影响极大。也就是说，武汉三镇是沿汉江、长江布设的，市区愈扩展，形状也愈不规则。尤其是把武钢摆在青山区，避免了环境污染，但现在已与市区连成一片，使武汉的形状就更加不规则。

除上述省会城市随着城区的扩展变成不规则形状外，一些地区性的城市也有类似情况，而且作为形状不规则的城市也很典型。

泉州城位于晋江平原，唐代首先筑城。唐代的泉州城后来称为子城，位于今泉州的中部，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随着社会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泉州城区不断向西部、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发展，形成新的市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经商的蕃坊就在城南一带，成为最繁华的商业区。唐开元时修建罗城，由于城墙随新扩展的市区修筑，成为不规则形，西南、东南向外突出。唐末王延彬扩展西北罗城，使城西北向外凸出。宋代陈洪进扩泉州城，包崇福寺于松湾，使泉州城又向东北方向突出。南宋时游九宫增筑东南一带翼城，“东起吾浦，西抵甘棠桥（临漳门外第一桥），沿江为蔽”，把城东南一带的新

周兆锐：《武汉历史地理》，《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2期。

《武汉区域规划初步研究报告》第10页，1946年。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市区包入城内。元代修筑新罗城，使城区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向外突出，泉州城市更加成为不规则形。明清的泉州城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城，但泉州已失掉了第一大港的地位，商业已经衰落。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泉州的城墙已被全部拆除。泉州城区不断向晋江方向扩展，显然是与晋江航道和港口有关。当然，最早的城门是城市出入的主要通道，市区沿出入城门的干道发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的泉州城区仍为不规则形，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区扩展仍以南部、东部为主要方向。随着泉州、晋江、石狮高新技术走廊的建成，泉州城市会更加繁荣，城市的不规则形状也就更加突出。

苏州城由于受三横四直运河的限制，不仅城址稳定，形状也很少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区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城市也发展为不规则形。因为各个方向发展的快慢不同，建成区的面积大小不一，很难构成规整的形状。

清代的苏州，贸易繁盛，工商业人口迅速增加，市区向城郊扩展。“阊门外南濠之黄家港，古名雁岩里……明朝……烟户甚稀……（今）人物殷富，阊阖且千，鳞次栉比矣。”阊门外上下塘街是踹布坊的集中地，城东是纺织业的集中地。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苏州的城市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例如，甲午战争后，盘门（南墙西边城门）外青阳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苏州的租界地。租界地内设有领事馆、警察署和邮政局等，形成新的市区。

民国时，苏州市继续向城外西部一带扩展。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苏州城市规划规定，“苏州市北自陆墓，西连虎丘、寒山寺，沿运河至横塘，此等天然界线适形成新苏州市之半圆形。南部则绕辖租界之河道为分界。东部则根据原有市区界限形成约二十余里直径之圆形”。也就是说，苏州城将向西北和南部发展，成为不规则形城市。现在的苏州城，在北部沿陆墓方向，东北部沿娄江方向，东南沿运河方向，西南沿胥江方向，西部沿枫桥方向，以及西北沿山塘河方向等向外伸展。尽管苏州城从六个方向不断向外延伸，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向西发展。根据“古城新区”规划布局方案，在城市西部开发新市区，逐步由单一结构向二元结构发展。天平、灵岩风景区是新区的后院，狮子山和石湖，是新区西部和西南部的屏障，中间有京杭大运河贯通，新区规划面积26.48平方千米，接近古城面积的2倍。自1985年起，经过五年的努力，从姑胥桥向西，已经开发了13.2平方千米，占整个新区的一半左右。在彩香新村和二元新村之间，规划建设现代化的新区中心，宽330米，长1千米，面积33万平方米。这里将成为苏州传统的商业、金融、服务中心，科技信息中心，以及大型图书馆、剧院、书场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大的工业区在新区的西北角，面积3.76平方千米，占新区总面积的11.2%，相当于古城区的四分之一强。这里将安排无污染的工厂企业。大型仓库区也设在这里。白洋湾码头设在城市西北角，年吞吐量达200万吨以上，离工业区近，水陆储运十分便利。由于新的城市规划以城西为主，新市区沿铁路线、上塘河、山塘河迅速展开，使苏州市的形状早已不成为南北向的长方形，而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78—80页。

徐熙麟：《熙朝新语》卷16。

陆启东辑：《一九二七年苏州城建规划与实施》，《苏州史志》1989年第1、2辑。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成为向西突出的不规则形。

南阳为控制中原通往长江中游交通大道的咽喉，很早就成为地区性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的发展，市区也不断向城外扩展，使城市的形状由原来的南北向长方形，变为不规则形。

明代，南阳城周长六里二十七步，城内几乎全为王府所占，大部分居民被迫迁往城外，城区渐渐向四关扩展。尤其是嘉靖以来，南阳四关修建、重建了众多的寺庙，像弥陀寺、崇善寺、文殊寺、广教寺等，加快了城区向四关扩展的速度。东关因紧靠水陆交通要道，又是南北使节的官驿住所，商业发达，建筑密集，人口众多，扩展速度最快，在短短的 200 年时间里，其规模几乎可以与城内相比，南滨白河，东至温凉河，北界魏公桥。在这个新建区内，出现了南以官驿街、北以豆腐街为主的商业点。官驿街即今天的外号街，附近有白河码头，客商众多，客栈、小吃馆林立，为明代南阳城东南部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豆腐街，今天仍沿用其名，它是明代南阳城区专门经营豆腐的地方。南阳城南关因紧靠白河码头，商业也很兴盛，但城区扩展远不如东关迅速。城的西、北两关几乎没有扩展，只有一些寺观和学校，民居甚少。

南阳城区虽然同时向四关扩展，但西、北两关地势较高，主要是把一些军事据点圈进来。东、南两关由于商业发展，人口众多，城区呈不规则形状，依白河、温凉河走向布设。明末，南阳城区呈“梅花状”分布格局。

清代的南阳，城东关仍为官驿所在，又有白河码头，商业发达，城区迅速恢复到明代规模。南关有三个白河码头，是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南船北马，盛况空前，扩展更为迅速。从南关小砦门和南关大街向西延伸出一条新的街道，称良贾店街。城区大大向南扩展，但由于白河的影响，南关扩展受到限制，城区形状也因白河及温凉河的走向而成为倒立的三角形。南阳城区的这种扩展方向，是同南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同治二年（1863 年），南阳知府傅寿彤环城修圩（寨垣）一周，周长一十八里，并划廓为六段，俗称六关，加快了南阳城向四关扩展的速度。

近代，南阳偏居内陆堂奥，资本主义工业对南阳影响甚微，城区没有大的扩展。1905 年京汉铁路通车，南阳仅为豫西南的一方小镇，商业萧条，人口减少，城区萎缩。至解放前，南阳仅有人口 5 万，城区面积 3.5 平方千米。建国后，南阳日新月异，特别是 1970 年，焦枝铁路通车，南阳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商业趋于活跃，城区不断扩大。特别是城区的西北、西南因靠近焦枝铁路，发展比较快。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到 1985 年，南阳市区面积已达 17.4 平方千米，人口达到 29.5 万。整个城区大体以梅溪河为界，以东为老城区，以西为新城区。老城区主要为商业区，新城区为工业区。

由于河流、铁路线的走向不同，直接影响到南阳市区的扩展方向。明代时南阳四关均向外扩展，由于白河从东、南两面环抱南阳城，南关的扩展最

王兵翔：《南阳文化史薈》，《南阳师专学报》1985 年 2 期。

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卷 2《建置》。

米玉亭：《南阳中学乡土地理》。

《南阳新志》卷 1《总述》。

《南阳城市历史地理述论》（油印稿）。

不规整，完全依白河走向布设。现在的焦枝铁路距离南阳西南、西北较近，南阳的西南、西北发展较快，城市形状就更加不规则。

扬州城区的扩展，使扬州城市的形状不断发生变迁。最初的扬州城在蜀冈之上，接近东西向的长方形。唐代时江岸南移，蜀冈之下已成为繁荣的商业区，即子城东南沿运河发展起来的居民区和工商业区。唐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乱，朱泚称帝长安。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自盱眙还至扬州，拥兵观望，“修、堑、垒，缮甲兵”，并在蜀冈下修筑城墙。这次新修堑垒，也可能就是“罗城”。罗城的范围，东界靠近今东风砖瓦厂、高桥、五台山；西界与子城的西壁线同在一条延长线上，即由观音山向南到双桥之南。1973年在汶河路（原为唐代运河）一带发现了唐代居民区和工商业区。1975年在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发现了唐城遗址、手工业作坊及生产工具，1977至1978年再次发现大量瓷器。罗城东界应在黄金坝南北延长线上。从地面遗迹看，从子城的南线向东，自桑树脚至东风砖瓦厂，至今还残存有2米高的土岗土垣，在小茅山附近城垣遗迹清晰可辨。则顺这一段城垣向西与西界相交一线当为罗城北界。其南界在渡江桥一线。1984年在南通西路一带发掘出唐南门遗址，它位于明清扬州旧城南墙外缘。在这里还发现了唐瓮城及砖包城垣遗迹。

从以上子城与罗城的范围来看，唐中晚期的扬州城应是“北抱雷陂，西据蜀冈，东临黄金坝，南界今城南运河”。子城为曲尺形，罗城则略似南北长、东西狭的长方形。但因唐中后期坊市向城外不规则的扩展，故文献对扬州城垣周长的记载多有分歧。日僧园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称：“扬州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北宋沈括曾在扬州任司理参军，在所著的《梦溪补笔谈》中云：“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唐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南宋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又称：“……其城即今宝祐城，周三十六里”，当包括宋大城及夹城。以上记载，略有差异。据李廷先推测，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唐扬州城在文宗开成元年（838年）之后又向南水门外发展的缘故。则园仁、沈括的记载当为高骈在乾符元年（879年）扩城后的扬州城。由此可见，唐扬州城繁盛无比，“坊市半长安”，建成区面积达18平方千米以上。不管怎么说，新修的商业罗城，其形状则为南北向的长方形，与蜀冈上的子城相比，则方向相反，由东西长变成了南北长。当然，这是为了使城市更加靠近长江，进一步发挥长江航运的优势。

五代宋元时期，随着扬州城市的盛衰，城区的范围不断变迁，形状也随之改易。

周世宗于显德五年（958年）进驻扬州，命韩令坤重修扬州城。韩令坤认为南唐未平，扬州为前沿阵地，城大虚旷难守，于是在故城东南隅筑小城，即“周小城”。它与宋、元的大城位置和范围大致相当，北界大约在今小金山至高桥一线，西、东、南界与明清的扬州城一致，其形状仍为南北向的长方形。这时的扬州城已完全移至蜀冈下平原地带。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条。

李廷先：《唐扬州城区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4期。

《旧唐书》卷182《高骈传》。

960年，淮南节度使李重进镇守扬州，“复葺旧南半为城”，城周十二里。即把扬州城缩小到原周小城的南半部分，其北界横穿今扬州市区，使扬州城变成了东西向的长方形。

北宋时扬州蜀冈上的子城已完全废弃不用，城区已全部转移到蜀冈下的平原上。

南宋建炎初年，命吕颐浩缮修城池。次年又命扬州浚湟修城。乾道三年（1167年）又再修，宋大城至此全部建成。城周长2280丈（约合15里）。其北濠即今漕河，北界大致在长春桥、凤凰桥、高桥一线，西墙以保障河为界，至虹桥附近南折，与明清扬州城西界重合；东界和南界为今之古运河。

淳熙二年（1175年），知州郭棣以为宋大城地势卑渫，不易据守，而蜀冈上的汉唐故城据蜀冈“凭高临下，四面险固”，可防范来侵的金兵。于是在蜀冈废弃的古城遗址上重新建城，与宋大城南北对峙，以备战争需要。他在冈上所建之城称“堡城”或“堡砦城”，后又称“宝祐城”。同时，他还在两城之间，筑土夹城二里，疏两濠，以使缓急足以转饷。从而形成蜀冈上堡城，冈下夹城，大城三城高低错落，上下相互呼应的军事城池格局。其中堡城依唐故城遗址所建，当与唐衙城的范围一致。

宋三城并没有全部包括唐子城和罗城，故形状也就不同。蜀冈上堡城既然依唐子城而建，其形状应与唐子城相似。而蜀冈下的夹城和大城，则为一大一小两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当然蜀冈上的堡城还有多次变迁，但始终是军事堡垒，谈不上有多少建筑物。

扬州历经宋金对峙和元、明争战之后，城邑荒芜，民多流亡，朱元璋取得扬州时，“按籍城中，仅余十八家”。佥院张德林在1357年奉命筑城，他以旧城虚旷难守，乃截元扬州城西南隅筑而守之。城周1751丈5尺，高2丈5尺，上阔1丈5尺，下阔2丈5尺。明初所以在宋大城西南角筑新城，是因为宋大城之西有南北向的市河相通，就近河道筑城，既便于用水，又有利交通运输。而且西部地势稍高于东部，便于布置衙署。张德林所筑之城，后又称“旧城”，其北界在今外城河一线，东界为今小秦淮，西、南界与宋大城一致。其形状为南北向的长方形。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犯扬，“外城萧条，百八十家遭焚劫者”。为确保安全，知府石茂华于旧城外环河增筑新城，又称“东城”或“石城”。它位于宋大城东南隅。东、南、北三面城周长约八里有余，计1542丈，有7门，它的东南与南面以运河为城濠，北面挖濠与旧城濠及运河相通，西面与旧城共用一道城墙。城为砖砌。新旧两城连为一体，总长为17.5里，东西长约4.4里，南北宽4里，扬州城又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城区面积约

《扬州水道记》。

雍正《扬州府志》。

嘉庆《扬州府志》卷15《城池》。

嘉庆《扬州府志》卷15《城池》

《洪武实录》。

《洪武实录》。

嘉靖《维扬志》卷10。

《扬州画舫录》卷9。

乾隆《江都县志》卷3。

5 平方千米左右。

清扬州城沿袭明城之旧，仅于旧城南门（安江门）外增筑了一段城墙，设置了通江门。民国初年于新城之南增设了福运门。1916 年，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拆除了新旧城之间的隔墙和大、小东门。1951 年，拆除了全部城墙，改建环城马路，扬州城墙不复存在。

自唐代以后，扬州城区的空间变迁最为频繁，但城市的形状则以南北向或东西向的长方形为主。这是由于蜀冈之下的长江冲积平原十分平坦，城区向东西或南北发展均比较有利，加之运河的走向也多为东西，南北向，故城市的形状就以东西向长方形或南北向长方形为主。

今天的扬州市区已远远超出旧城区，向四周发展。由于京杭大运河在东，长江在南，市区主要向东、向南发展，使扬州城也变成不规则形。为了争取更大的地理空间，扬州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主要在城的西、北方向，使未来的扬州城成为东南、西北大发展的不规则形。

首都、省、府州城，随着城区的扩展多为不规则形，几乎成为普遍的规律。实际上县城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不如上述城市变化剧烈和明显罢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县城都有自己的新建成区，使古老的县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状也成为不规则形。例证俯拾即得，不胜枚举。

六、中国城市的规模

城市规模指城市大小上的差异，即城市的等级划分。现代城市规模是按人口多少来分级的，百万人以上称特大城市，50万至100万人口为大城市，20万至50万人口为中等城市，20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由于各国人口的多少不同，城市分级的人口标准也不一样。然而在古代，城市人口很少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不可能用人口多少作为城市分级的标准，只有用城的大小作为分级的标准。当然，城的大小也是不断变化的，但作为全国或地区一级政治中心的城都比较大，其他则等而下之。所以，从城的大小也可以区分城市的大小，而且也比较准确可靠，这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城市分级体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中国古代城市分级的根据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这里的国指国都，因为西周的许多封国也就是一个城圈子，城既是国，也是国都。《疏》云，周亦九里城，则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诗·大雅·文王有声》篇《疏》云，《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皆以命数为节。”《注》云：“国家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则天子之城为十二里矣。”《书传》云：“古者百里之国，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国，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国，三里之城”。《注》云：“……或者天子实十二里之城，诸侯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这里的十二里之城，九里之城，七里之城，五里之城，三里之城，就是指的城的大小，即城的规模。同时也显示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奴隶主的地位越高，都城的规模越大，反之则越小。所谓十二里、九里、七里、五里、三里，都是指方形城的边长而言。按照周尺19.9厘米为一尺计算，一里为1800尺，则十二里之城边长4298米，面积18.47平方千米；九里之城边长3222米，面积10.2平方千米；七里之城边长2500米，面积6.25平方千米；五里之城边长1790米，面积3.2平方千米；三里之城边长1074米，面积1.15平方千米。西周的丰镐尚未发现城墙，城的面积尚难知晓。但东周王城的面积达8.3平方千米，接近10平方千米，也就是九里之城，可以证明丰镐的面积也为10平方千米左右，《周礼》王城九里的记载是正确的。

西周是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奴隶制的等级制确实是存在的，反映在城市规模的大小上也就有了严格的区分，各个奴隶主都城的大小自有定制，不能僭越。然而，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地理条件有异，各个诸侯国的都城未必都如《周礼·疏》所言，略大或稍小都有可能，很难做到整齐划一。不过作为一种等级制度在城市规模上的反映，应该承认它基本上符合西周时代城市等级的划分与规模的大小。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的都城都已突破成规，向规模宏大、壮丽辉煌发展，成为当地经济、文化的中心。

2. 城区范围广阔

从春秋战国起，中国城市的规模愈来愈大，主要表现在城区范围广、面积大，显示了中国城市的新规制。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即近代大工业、商业城市兴起以前。尽管持续的时间很长，但城市规模仍然

《周礼·春官·典命》：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三五等之命。也就是说，“命”为同等级的礼仪。

有等级之分，并不都是整齐划一的大城市，而是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城市最多，大城市较少。虽然西周的城市等级制早已抛弃，但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都以政治功能为主，政治权力的大小自然使城市就有了等级之分。凡是作为首都的城市，规模都大，其次才是省、府、州、县的中心，依次递减。这种等级制的存在，虽然不像西周时代有严格的规定，但它都是客观存在，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基本特点之一。

东周的王城位于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面积 8.3 平方千米。齐国首都临淄城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有大小二城，小城镶在大城西南隅，合计面积 15 平方千米左右。鲁国首都曲阜城，位于山东曲阜市区，面积 12 平方千米。赵国首都邯郸城，位于河北邯郸市，由宫城和大北城构成，合计面积 17.4 平方千米。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东南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由东、西两城构成，面积在 30 平方千米左右。魏国旧都安邑，位于山西夏县西北，外城面积 17.4 平方千米。郑韩新郑城位于河南新郑县，面积 22 平方千米左右。楚都郢也就是湖北江陵以北的纪南城，面积 17.75 平方千米。秦都雍城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面积约 11 平方千米。除此而外，一些小国的都城规模也很可观。位于河北平山县的中山古城，面积 8 平方千米；位于山东滕县的滕国古城，面积 6.25 平方千米；位于河北蔚县的代国古城，面积 34 平方千米左右；位于山东莒县的莒国古城，面积 25 平方千米左右；位于绍兴市的越国古城，面积约 5 平方千米，位于山东邹县的株国古城，面积 5 平方千米；位于河南固始县的蓼国古城，面积 8.7 平方千米；位于河南上蔡县的蔡国古城，面积 6.7 平方千米等等。这些小国，虽然国力有限，但首都的范围都不算小，多数都在 5 平方千米以上。

春秋战国时代，相当于县级的城邑很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只有大县和郡城的范围比较大。位于成都市区的成都城，面积 2.25 平方千米；位于郟县的郟城，面积 0.76 平方千米；位于邳崮的临邳城，面积 0.56 平方千米；位于河南宜阳县的宜阳城，面积 1.9 平方千米；位于山西芮城的魏城，面积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2 页、275—276 页、273 页、274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2 页、275—276 页、273 页、274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2 页、275—276 页、273 页、274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2 页、275—276 页、273 页、274 页。

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第 206—208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2 页、275—276 页、273 页、274 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191—192 页、300 页。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 年 2 期。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44 页。

《水经注》卷 25《泗水注》。

《水经注》卷 13《灋水注》。

《水经注》卷 26《沐水注》。

陈桥驿：《论绍兴古都》，《历史地理》第九辑。

《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第 206—208 页。

詹汉青：《固始县北山口春秋战国古城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3 年 1 期。

尚景熙：《蔡国故城调查记》，《河南文博通讯》1980 年 2 期。

《华阳国志》卷 3《蜀志》。

1.26 平方千米(11)；位于河南扶沟县的曲洧城，面积 0.38 平方千米；位于河南濮阳附近的戚城，面积 0.09 平方千米(12)；位于湖北秭归的夔城，面积 0.029 平方千米；位于河南修武县的颍城，面积 0.026 平方千米，犢茅城，面积 0.04 平方千米等等。不难看出，郡和大县城的范围多在 1 平方千米以上，而小县城的面积多数不足 1 平方千米。

从汉代起，中国城市的规模和分级已经趋于定型，即首都最大，省、府州、县依次减小，下一级城市超越上一级城市规模的状况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城市的地位升格，城市的规模才会随之升格。这是因为政治级别较高的城市，城内人口较多，机构复杂，需要修筑较大的城市。另外，城墙是一宗巨大的工程，修筑城墙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城市的政治等级愈低，财力也就有限，修筑大城既无必要，也无力量，故城市政治地位的高低与城市规模的大小基本吻合。

秦咸阳城未发现完整的城墙，其规模大小尚难知晓。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城的西北，面积达 36 平方千米，为中国统一王朝都城的宏大奠定了基础。东汉洛阳位于今洛阳市东，即白马寺东 1 千米处，面积 11.16 平方千米。曹魏邺城位于河北临漳县西南 17.5 千米处，面积 6.8 平方千米。北魏洛阳外城位于洛阳市东，面积 75 平方千米左右。北齐邺都南城，位于曹魏邺城之南，面积近 10 平方千米。隋唐长安城即今西安城及其附近郊区所在地，面积 84 平方千米。隋唐东都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面积 47.29 平方千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面积 16.11 平方千米。北宋开封城的外城，位于今开封市区，面积 37 平方千米。辽上京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面积 12.25 平方千米。元大都城位于今北京市，面积近 50 平方千米。明南京城位于今南京市，面积 55 平方千米。明清北京城，即现在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内城（北部）面积 35.52 平方千米，外城（南部）24.64 平方千米，合计 60.16 平方千米。由此可见，凡是作为首都或陪都的城，范围都比较大，往往要大出省、府州城的数倍或二三十倍，而且还有逐步增大的趋势，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在统一王朝的都城中，隋唐长安城的规模最大，其原因是隋初修城时，可能准备迁徙人口以实京城。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经常迁徙人口充实京城，强本弱枝，以削弱地方势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全国的统一。但隋初并未向首都迁徙人口。炀帝即位以后，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炀帝迁“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

《水经注》卷 34《江水注》。

《水经注》卷 9《清水注》。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156、623—625 页。

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第 137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

《洛阳伽蓝记》卷 5。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287 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156、623—625 页。

李长付：《开封历史地理》第 17 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78、77—78 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78、77—78 页。

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第 233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年版。

贾数万户以实之”。因此，隋唐两代，长安城南部“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被称为“围外地”，显得空旷、闲僻。如果除去城南三坊（东西尽郭）之地，长安城的面积并不是中国都城中最大的，而实际建成区面积最大的仍然是明清的北京城，可见首都越来越大毕竟是一种趋势。其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京城人口愈来愈多，增大空间势在必行。

汉代以后的省、府州、县统治中心，由于政治权力的大小不同，城市的规模也就有了差异。凡是省、府州级的城，范围都大，县城的范围一般都比较小。这是因为省、府州级的权力变化较大，而县的辖区却十分稳定，作为县的统治中心的城，范围也就比较稳定，变化很少。

蜀汉的巴郡城，位于今重庆市区，面积4平方千米。唐代的晋阳城，位于今太原市区西南，面积13.49平方千米。扬州城位于今扬州市区，仅罗城面积达27平方千米。北宋大名府称为北京，位于今河北大名东北，面积34平方千米左右。郓州城位于今山东东平，咸平三年（1000年）重建，面积4平方千米。明清西安府城即今西安城，面积11.1平方千米。开封府城位于开封市区，面积6.56平方千米。彰德府城位于今河南安阳市区，面积2.19平方千米。南阳府城位于今南阳市区，面积3.5平方千米。苏州府城位于今苏州市区，面积14平方千米左右。不难看出，作为省、府州的统治中心，城的规模都比较大，多在5平方千米左右。尤其是作过省会的太原、西安、苏州，其城区的面积都在10平方千米以上。唐代扬州城的范围比较大，显然是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

县的辖区有限，县城的范围一般都比较小。明清时的陕西佳县位于山上，面积仅0.75平方千米。上海市奉贤县位于长江三角洲，面积0.4平方千米。浙江镇海县位于甬江口，面积1.29平方千米。山西平遥、太谷位于南北大道之上，为明清时代的票号金融中心，前者面积2.7平方千米，后者面积1.57平方千米。仅以上数例，已足以证明县城的面积也就是1平方千米左右。因为在方方百里地区，1平方千米的县城已能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充分行使统治权力，并形成地方的经济、文化中心。

当然，从城墙发展的历史看，西周时才完全学会了筑城，但城的规模一开始就向宏大的方向发展。春秋战国时代，10平方千米以上的城已比比皆是，更不要说两千年以后的明清时代了。筑城技术的成熟是城区规模宏大的基础。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专制主义，无偿剥削劳动力，是城越修越大的基本条件。中国人口多也为建城提供了众多的劳动力，供统治阶级调发和使用。

3. 城市人口众多

人口是城市分级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城市人口愈多，城市的等级也

《资治通鉴》卷180《大业六年》条。

《唐两京城坊考》卷2。

《水经注》卷33《江水注》。

刘德宽等主编：《十大古都商业史略》第461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8—209、180页。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628页。

乾隆《东平州志》卷6。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33、131、129、151页。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

就愈高，反之，城市的等级也就愈低。就是近现代的工商业城市，尽管经济实力雄厚，但由于人口较少，城市的等级仍然比较低。现在看来仅以人口多少作为城市分级的标志并不科学，将来要不要以经济实力划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人口的国家，尽管在城市兴起发展的初期，城市的数量并不很多，但城市的人口数量都相当可观，这应该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作为首都的城市，由于有庞大的政治机构和驻扎军队，一开始人口就比较众多。商、周都城有多少人口已不得而知。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首都的人口都比较多，最典型的莫过于齐国的临淄和魏国的大梁城。苏秦说齐宣王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之中七万户，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如果以每户五口计，战国时临淄的人口已达 35 万。因此，尽管临淄城的规模很大，由于人口众多，几乎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出于策士之口的人口数字当然不是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在没有人口统计数字的情况下，苏秦的话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魏国的大梁城，城墙高大坚固，守城士卒众多，“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可见魏国的大梁城也是以人口众多闻名于世。大梁城处于中原水陆交通要道的中心，临淄城位于东西大道之上，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位于长江流域物资交流中心的楚都郢，人口稠密，被称为“车毂击，民肩摩”的地方。实际上，战国时代各大国都城的面积多在 10 平方千米左右，都已成为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国都以下的地方城市也都向人口众多的方向发展，名城大邑比比皆是。赵奢说：“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若按战国尺每尺 23 厘米计算，则三百丈之城，边长 0.69 千米，面积 0.47 平方千米，一家按五口计，则三百丈之城有人口 15000 人。千丈之城边长 2.3 千米，面积 5.29 平方千米，其人口也就是五万口左右。根据《墨子·杂守》，“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则千丈之城并非万家之邑，而是数万家之邑。因为三里之城边长 1.035 千米，面积 1.06 平方千米，以 1 平方千米之城可容万家，即 5 万口左右，5 平方千米之城，人口当在 20 万以上。那么各国国都的人口当在 50 万之普。当然，仅按城的面积来计算人口并不科学，但城大人口也就多却是基本事实。由此可见，战国时代各大国的都城人口都在数十万以上，奠定了中国都城人口众多的基本格局。

秦咸阳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从城区规模、秦国原有的人口和迁徙富豪来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秦咸阳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至今尚无定论。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发现完整的城墙，范围大小也就不好下结论。根据考古发掘，仅宫殿区就东西长达 6 千米，其城市范围之大可想而知。秦咸阳确实宫殿林立，居室栉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宏伟壮观的大城市，人口众多，自不待言。据范文澜先生推论，

《战国策·齐策一》。

《战国策·魏策三》；《史记》卷 72《穰侯列传》。后者记载的城墙高度为“七仞”。

《新论》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战国策·赵策三》。

战国时代全国有人口 2000 万左右，秦国的人口当在二三百万之数。既然如此，咸阳人口较多也是完全可能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数字相当可观。若一户按五口计，仅这次迁徙的富豪就有 60 万人，更不用说咸阳原有的人口了。秦咸阳大约有 60 万人口已被大家所公认，以战国人口为基数计算，则咸阳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直到 14 世纪，伦敦才 4 万人，汉堡才 7 千人，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已出现了 60 万人的大城市，其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城市人口不仅仅是城市等级的标志，而且与城市建设、城市布局、城市管理、城市供应都有密切关系，很值得研究。

西汉长安城的人口没有准确记载，《汉书·地理志》仅记载长安县户 80800，口 246200。长安城在长安县的辖区内，上述人口数字当然包括城区人口在内。由于长安城郊区属于上林苑，人口稀少，上述人口数字可以代表城区人口数。不过从长安城的范围来看，上述人口数字显然是太少了。就是每户按五口计，其人口数字也应该在 40 万以上。若再加上皇族、禁军、流动人口，汉长安城的人口当在 60 万左右，绝不会比秦咸阳的人口少。

东汉洛阳有多少人口，不得而知。北魏洛阳外城的范围远较内城为大，人口自然众多。北魏末年，孝武帝受制于高欢，西奔长安宇文泰，高欢另立孝静帝，魏分东、西。后来高欢又强迫孝静帝迁都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可见洛阳及其附近有 40 万户，如果洛阳城内按 20 万户计，洛阳的人口也在百万左右。无独有偶，六朝时代的建康城，到了梁朝时，市区范围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人口 28 万户，成为全国第一大城。28 万户也就是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

唐代的长安城范围广阔，一般认为有 100 万人口，也有人估计七八十万，或五六十万。我们认为至少有 100 万人。尽管《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府天宝元年领户 362921，口 1960188，领县 20。如果用 20 个县去平均，则每县只有 18146 户，98090 口，长安城由长安、咸宁两县分管，则两县合计有户 36292，有口 196180，而且还包括郊区人口在内，显然是太少了。《长安志》记载，长安、万年两县领户 8 万余，多于《地理志》，但仍然是太少了。唐长安城为国际性的大都会，禁军如云，商业发达，人口众多才是基本事实。贞观时迁突厥族近万家至长安，也就是 5 万口左右，开元时“长从宿卫”达 12 万人，若再加上皇族、佛道僧尼、商人、留学生、留学僧和文武大臣的家族，长安的人口绝不少于 100 万。汾阳王郭子仪的住宅占有亲仁坊的四分之一，家人 3000，“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隋唐以后，商品经济愈来愈发达，统一王朝的首都或陪都，其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就连一些偏安王朝的首都，人口也超过了 100 万，繁盛无比。北宋开封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是第一个开放形的城市，十分繁荣昌盛。《宋史·地理志》记载开封崇宁户 261117，口 442940，平均每户才 1.6 人，显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 168 页，人民出版社 1953 年上海重印三版。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北齐书》卷 2《神武帝纪》。

《唐会要》卷 73。

《新唐书》卷 50《兵志》。

《长安志》卷 8。

口数偏少。开封府辖有 16 县，如果按户计算，每县平均有户 16319，开封、祥符两县合计，也不过 32638 户，以每户 5 口计，两县的人口才 163190 人，而且还包括郊区人口在内，显然偏低。实际上北宋东京的人口超过了 100 万，比唐长安城的人口要多。因为社会经济、文化发达，又是中原地区水运的中心，仅从每年消费的粮食达 600 万石就可以证明开封的人口超过了长安，加之太学学生人数众多，崇宁时达到 38000 人，而禁军之多更是空前的，北宋末年禁军到达 82 万，《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东京 80 万禁军的教头。《东京梦华录》从各个侧面记载了开封的繁荣，也反映出开封已成为百万人以上特大城市的独有风度，即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南宋虽只有半壁河山，但它的首都杭州却繁盛无比，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也超过了百万。据《咸淳志》，两赤县（指钱塘、仁和两县）城主客户有 186330，有口 432046，平均每户只有 2.3 人，显然口数有误。若按每户五口计，则杭州城的人口有 931650，也就是 100 万人。即“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户”。《都城纪胜·序》更说：“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而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认为杭州比开封要繁荣数十倍，其人口也肯定超过了开封，当在 150 万左右。这与“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有密切关系。明初的南京城，据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统计，人口 473200 人。后来迁都北京，虽然失掉了首都地位，但仍处于陪都地位，估计终明一代，南京的人口也超过了 100 万。明清的北京城，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它的人口当也超过了 100 万。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全国人口超过 3 亿，首都的人口自然增加。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腐败，但官僚机构庞大，禁军更多，京城的人口也就相应增多。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也会越来越多。

中国首都规模宏大，人口众多，自不待言。就是一般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都会，也是人口集中的所在。战国时万家之邑已比比皆是，万家之邑也就是 5 万口了。譬如，智伯向韩康子请地，韩康子“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就是典型例证。宜阳城方八里，材士 10 万，粟支数年。秦末，高帝过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这里的三万户到底指县城人口还是县境人口，已不得而知，但从刘邦的口气看，应该指县城的人口。果真如此，则曲逆县城的人口已达到十几万，证明秦代有些县城的人口也是很多的。西汉时陵县的人口也很多，主要是人为的迁徙天下富豪

《宋史》卷 187《兵志》。

《梦梁录》卷 18《户口》、卷 16《米铺》。

《梦梁录》卷 18《户口》、卷 16《米铺》。

《梦梁录》卷 13。

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第 282 页。

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第 185、261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战国策·赵策一》。

《战国策·东周策》。

《史记》卷 56《陈丞相世家》。

于陵县，以强干弱枝的结果。西汉共设有七个陵县，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县，均在咸阳原上，只有霸陵、杜陵县在渭河以南。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 5 千户。实际上，武帝于槐里茂乡徙户 6 万 1 千置茂陵县。《十道志》，旧志，茂陵宣帝时置，按武帝时已徙户居之，至宣帝时为县。《汉书·地理志》，长陵县有户 50057，口 179469，茂陵县有户 61087，口 277277，则上述万户之说当为县城人口，即长陵、茂陵县城各有 5 万左右。

秦汉以后，县的辖区已趋于稳定，县城的大小也就是 1 平方千米左右，人口万户上下，三五万人。府州、省会城市的范围广，人口自然较多。清代末年，西安府城的人口 11 万多，太原府城人口有 5 万左右。工商业城市人口更多，清代的景德镇，“工役人夫不下数十万”，扬州的人口也应在数十万以上。尤其是汉口镇，清代末年已逾 80 万，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不难看出，省、府州城的范围较大，人口也就比较多，而工商业城市，则主要和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商业的继续兴盛，人口会不断增多，甚至有些会迅速膨胀。

中国城市从它的产生到发展，一直以人口众多闻名于世。这一方面同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城市一开始就规模宏大的重要标志。

4. 城市规模宏大的原因

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是造成城市规模宏大的根本原因。城市一出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中心，建有一整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和驻扎军队，需要有规模宏大的城池。城墙是防御工程，是统治者安全的基本保障，其范围的圈定，也就确定了城市的基本规模。由于要把与城市有关的人口都圈在城内，城的范围就不能不划得很大，城市规模大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作为首都和地方政治统治的中心城市，设置有完整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均有自己规模宏大的衙门和附属机构，占地广阔，自不待言。像汉长安未央宫达 5 平方千米，长乐宫达 6 平方千米，唐长安的宫城达 4.2 平方千米，皇城达 5.2 平方千米，北宋皇宫 0.375 平方千米，明清北京紫禁城 0.7 平方千米，它们几乎与县、府州城的面积相当，加上其他附属机构，仅各级官僚机构衙门所占的地盘就十分广阔，城自然要修筑得很大才行。

与此同时，皇族人口众多，王府林立，也必须在城内占有地盘。佛道僧尼、传教士云集，各有自己的寺庙，占据的地盘之广更为可观。唐长安城有多种寺庙 150 余座，像慈恩寺分为 10 大院，章敬寺分为 48 院等等，都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其气魄几乎与皇宫无异。北魏洛阳城有佛寺 1367 座，占地之广就更可想而知了。驻军众多，也需要建立许多兵营，像唐长安城禁军 12 万，北宋开封城禁军 80 余万，都需要占据一定的地盘。

《长安志》卷 14 引《关中记》、《三辅旧事》。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 8《衙署志》、卷 4、5《地理志考》。

《长安志》卷 14 引《关中记》、《三辅旧事》。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08、155、149 页。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08、155、149 页。

《汉口小志》引《懒园杂俎》。

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工商业者政治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视为末业，但他们都是真正的富有者。由于有金钱作后盾，富商大贾交通王侯将相，“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其政治地位不亚于王侯将相，“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因此各个城市都有大批的手工业作坊和广阔的商业市场，工商业者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清代苏州城的东半部，机户就不少于万家，织机约 1.2 万余台，加上机工，其人口约有数万。商业利润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正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由于商业利润丰厚，出力少而获利多，自古以来经商的人数就十分可观，不畏艰险，走遍天下，形成庞大的商人阶层。就一个城市来说，商人在城市人口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市场的范围也比较广阔。唐长安城有东西两市，各占有两坊之地。每个市大约占地 1.4 平方千米，两个市就将近 3 平方千米，几乎与府州城的面积相当。市场繁荣，人口众多，西市“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由于工场、市场广阔，工商业者众多，又必须把它们包入城内，城也就不能不建得很大。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旧的城区已被突破，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后来加筑城墙，使城区不断扩展。清代时济南城关厢商业发展较快，城外人口不断增多，咸丰年间，因捻军围攻济南，遂把东、南、西三面及北郊的大片土地圈进圩内，扩大了城区的范围。同治年间，为加强防御能力，改筑石圩，“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面，减圩之三”，使城区大约扩大了一倍左右。明代的北京城南为运河必经之地，商业发达，人烟稠密，为了首都的安全，嘉靖年间决定加筑外城，先筑南面。后来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也只完成了南面外城，也就是明清时北京的外城。明代加筑外城，使北京城区向南扩展了三分之二以上。可见商业发展是城区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城市规模宏大的基本因素。尤其是近代工商业占地广阔，规模较大，更需要修筑规模宏大的城墙。

中国城市是从农村派生出来的特殊的地理空间，始终与农村未能割断关系，城市居民中有相当数量就是农村人口，增大了城市的居住区，城区规模也就相应的增大。战国时，齐国的临淄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但城内居住有大批农民，而且多居住在城门附近，便于到城外去耕田。实际上，就连统一王朝的著名都城，如汉长安、唐长安、宋开封、明清北京城内，都居住有农业人口，然后到郊区去耕田。这就是“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老传统。唐长安城内南部“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自然是城内的农民去耕种。省、府州、县城中的农民更多，自不待言。像建国前扶风

《汉书》卷 76《王尊传》。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长安志》卷 10。

《续修历城县志》卷 3《地域考》。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附图》（油印稿）。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科学研究》第 125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管子·大匡》。

《唐两京城坊考》卷 2。

县城北街、南街和西街，大都居住着农民，分别出北门、南门、西门去耕田，就是典型例证。正因为城市人口并非单一的居民，而有大批的农业人口，增大了城市人口数量，城的范围也就相应的增大。

当然，造成中国城市规模宏大的原因很多，除上述原因外，也同中国统治阶级不爱惜民力、好大喜功的主观因素有密切关系。

七、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

中国的城址都是经过精心选择以后才建城的，而大多数城市的平面布局也是经过了专门规划，因此，显得整齐大方，宏伟壮观。所谓平面布局，就是指城市总体结构的不同分区，即各个不同功能区之间的比例大小，占地多少，也就是一个城市的平面形态。城墙圈定的区域也就是城市的总面积，对这一总面积划分成不同性质的小区，以显示城市各个功能区占地的多少和具体位置，也就是城市的平面布局。近代城市突破城墙的限制，不断向郊区扩展，但仍要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平面图，使城市的平面布局井然有序，有计划地向前发展。城市的平面布局是城市的整体形象，对指导城市的顺利发展有重大意义，绝不能随意布局，制约城市的发展。

1. 中国著名都城的平面布局

在中国历史上建过都的城市以数百计，但著名都城却屈指可数，现在有所谓六大古都与七大古都之争，但多数人认为应以六大古都相称为宜，因为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直到现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电台的对外宣传中，仍以六大古都相称。为了叙述方便，下面按历史顺序分别介绍在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和北京等地区建都时期著名朝代的都城布局，可以代表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总特点和基本趋势。

(1) 周丰镐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位于西安西南沔河的两岸，丰京在西，镐京在东。具体来说，丰京在沔河西岸的马王镇一带，镐京在沔河东岸的斗门镇一带。尽管经过考古发掘，尚未发现丰镐的城墙，但丰京和镐京的具体范围已经确定，证明丰、镐二京相距甚近，实际上一桥相通，是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完全可以以丰镐相称。

关于丰镐的平面布局，虽然考古上尚未证实，但文献记载的却十分具体，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视作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经典。这就是《周礼·考工记》。关于《周礼》的成书时代，一般认为在战国，但这并不否认它记载了西周以来最完整的典章制度，开创了中国典章制度的先河。《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总体布局为城的每面有3个城门，即都城12门。有南北向的街道9条，东西向的街道9条，即九经九纬。也就是说，通向每个城门的有3条平行的街道，构成左出右入，车从中央的街道格局。经涂9轨，指经纬之途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凡八尺……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二步也”。一步按1.4米计，则每条街道的宽度为16米左右，也是相当宽畅的。左祖右社，指祖庙建在东边，社稷坛建在西边，左右对称。面朝后市，指朝廷要建在王宫南面，或指宫殿大门向南，市场要建在王宫北面，即朝廷在前，市场在后。市朝一夫，指市场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由此证明，周代对市场的设置已极为重视，划出一定区域作为交易市场，面积达0.02平方千米左右。据说这种布局是最理想的制度，即“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

立国社于王宫之右；朝者义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于王宫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后而背之，故立市于王宫之北”。除上述街道、祖庙、社稷坛、王宫、市场外，其余的地区应该就是居民区。对居民区如何称呼，怎样划分，《周礼》并未提及。按照方形城市的惯例和周原考古所挖掘的早周的房屋遗址看，应该是方形的小区，可能以里相称，因为闾里是中国人居住区的最早称谓。《说文解字》：“闾，里门也，从门，吕声。《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也。”就是指居住单元而言。秦末，二世尽发“闾左”，以戍渔阳，汉长安城的居住区以闾里相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司马贞《索隐》，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可见闾里是最早的居住区的名称。

丰镐的平面布局是否如此整齐，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实。不过，从东周王城的平面布局和后来中国都城总体布局的特点看，《周礼》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东周王城遗址位于洛阳市中州路王城公园一带，南临洛河，西跨涧河（古名谷水），呈不规则方形。城西南部地势较高，可能为宫殿区，其总体布局与齐国首都临淄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宫殿位于西南，市场、手工业和居民区都在全城的北部，符合“面朝后市”的原则。西汉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也都是“面朝后市”，尤其是元代的大都城，就是完全按照《周礼》的原则设计的，证明《周礼》记载的中国古代城市平面布局的原则影响十分深远。事实上，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树立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总规制，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

（2）秦咸阳

咸阳是秦国和秦王朝的都城，位于今咸阳市东 15 千米的窑店镇、长陵车站和萧家村车站一带，遗址清晰可辨。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 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经过秦惠文王和秦始皇时代的迅速扩建，咸阳的范围不断扩大，终于成为横跨渭河南北的大城市。秦咸阳最初圈定的范围就在今窑店镇一带，如何布局不得而知。秦惠文王时“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咸阳的范围仍在渭北的泾、渭之间。总体布局可能仍依当初成规，只是修建了不少新宫殿。到了秦始皇时代，咸阳已横跨渭河南北，除在咸阳原上兴修了“六国”宫殿外，还在渭河以南陆续修建了阿房、章台、兴乐、信宫，以及诸庙等，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经过考古发掘，这时的咸阳，除渭南部分外，渭北的平面布局是宫殿主要屹立于咸阳原上，原下主要为手工业区、市场区和居民区。原上的宫殿区，西起毛王沟，东至柏家咀，东西长达 6 千米，建筑遗址鳞次栉比，显然是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已经发掘的一号宫殿主体建筑遗址，由殿堂、过厅、居室、浴室、回廊、仓房和窖穴等部分组成。在宫殿区以西还有墓葬区和冶炼中心等。原下主要为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卷 17《城池部·汇考一·考工记》引易氏曰。

《史记》卷 48《陈涉世家》。

《三辅黄图》卷 2《长安城中间里》。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71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史记》卷 5《秦本纪》。

《三辅黄图·序》。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 年 11 期。

居民区和手工业区，长陵车站、长兴村、店上村一带就是居民区住宅和制陶作坊集中的所在，秦代文化层厚达2米左右。居住区划分为里，咸阳遗址出土陶文中仅咸亭下的里名就有33个之多，像阳里、屈里、蒲里、安阳里、泾里等。至于各个里的具体位置已难确指。咸阳的市场分布在原下，与《周礼》的“面朝后市”恰好相反，这应该是因地制宜规划布局的结果。咸阳市市场的具体位置，由于尚无出土遗物，无法断定，但咸阳有市场却毫无问题。吕不韦就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秦公子十二人被“戮死于咸阳市”，丞相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都可证明咸阳有市。咸阳的市场可能有多处，直市在渭桥北，秦文公造。另外还有平市、奴市、军市等，或者统一叫作咸阳市。由于尚未发掘出秦咸阳完整的城墙和城门，街道格局也无从知晓。现在仅在咸阳原上发现一条东西向街道，宽达50米，可能是通向东西城门的干道。

秦咸阳的总体布局虽然一反“面朝后市”的原则，但却充分利用了咸阳地区的地理优势，宫殿雄踞原上，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市场区位于原下，井井有序，十分壮观。然而，原区与低平之地高差过大，也为咸阳的街道布设和开渠引水带来困难，直到现在尚未发现咸阳的供水渠道，仅有排水管道，证明咸阳供水困难是促使咸阳向渭南扩展的主要原因。

（3）西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位于西安市西北的汉城乡一带，东南距西安城大约5千米，城墙遗址基本完好，夯土层次分明，异常结实。根据实测，城的周长25.7千米，合汉代近63里，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其中东墙长6千米，南墙长7.6千米，西墙长4.9千米，北墙长7.2千米。用今天的地名来说，城的西北角在六村堡，东北角在三官庙，西南角在朱雀门，东南角在阁老门，范围极为清晰。城的形状为不规则的正方形，南部为宫殿区，北部为居民、手工业和市场区。城内槐、榆成荫，松、柏茂盛，景色葱郁，十分壮观。

汉长安城墙所以不规则，完全是受渭河、泾河、地形高低和未央、长乐宫位置的影响，并非有意把城修成“北斗星”和“南斗星”的形状。北墙达6处曲折，与渭河的走向完全一致。西墙1处曲折，受泾河和未央宫的制约，南墙作直角形曲折，除受两宫位置影响外，主要是为了把高地圈进城内。汉长安城的形状完全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因地制宜是修建汉长安城的基本原则。

经过考古发掘，已经找到了汉长安城各个城门的具体位置，证明城墙每

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11期。

何汉南：《秦汉咸阳和长安的乡亭里》，《陕西地名》1982年3期。

《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

《史记》卷87《李斯列传》。

《三辅黄图》卷2。

王学理：《秦都咸阳》第9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5期。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三辅黄图》卷1。

马正林：《汉长安城形状辨析》，《考古与文物》1993年5期；《汉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4期。

面各有三个城门，都城十二门的记载是不错的。并对东墙的宣平门（东出北头第一门，亦称东都门）、霸城门（东出南头第一门，亦称青门），南墙的西安门（南出西头第一门，亦称平门）和西墙的直城门（西出南头第二门，亦称龙楼门），进行了发掘，证实每个城门都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各宽 8 米。由各个城门通向城内的街道，都以三条平行的街道组成。街道的宽度一般为 45 米左右，中间的一条宽约 20 米，两侧各宽约 12 米，以两条平行的排水沟为分界线。像这样宽畅的街道实际上只有八条，均为南北、东西向，十分端直，显然同地形平坦有密切关系。由于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距离宫廷太近，通向城内的街道不被列入大街之数。中间一条宽约 20 米的大道被称为“御道”或“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连皇太子也不敢横绝。汉成帝为太子时，元帝曾急召入宫，住在桂宫（未央宫北）的成帝，出龙楼门后，由于不敢横绝“驰道”，一直向西到直城门，才横过“驰道”，“还入作室门”进未央宫。由此证明西汉一代对“驰道”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连贵为皇太子也不敢行“驰道”。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许多“丁字路口”和“十字路口”。最长的是安门大街 5.5 千米，宣平门大街 3.8 千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 850 米。其余大街多长 3 千米左右。这些大街除以门相称外，安门大街为章台街，直城门大街为稿街，清明门大街为香室街，横门大街为华阳街。由于各条大街纵横交错，把全城分为大小不等的区域，也就是一般史书上所说的闾里。

汉长安城内共有 160 个闾里，“居室栉比，门巷修直”。最著名的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汉宣帝在民间时，曾住在尚冠里。另外还有五里、穷里、南里、宣里、假阳里、有利里、梁陵里、当利里、孝里、安阳里等，也分别见于文献或《居延汉简》。陈直认为，文献中的陵里即梁陵里之省称，宣里、棘里也分别为宣明、黄棘里之省称。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如果为五个里，则每里四十区左右。由于城的南半部基本上被宫殿所占有，一般居民只能住在城的北半部或城门的附近，只有少数权贵才能在未央宫北阙附近居住，故有“北阙甲第”的称谓。宣平门附近居住有不少权贵，被称为“宣平之贵里”。正是由于城的北半部为主要居民区，许多交易市场也就分布其间。

据说汉长安城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步。九市主要夹横桥大道设置，“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即横门）”，“市楼皆重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 80 页，文物出版社 1961 年版。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 年 5 期。

《汉书》卷 10《成帝纪》。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 5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三辅黄图》卷 2。

《秦汉咸阳和长安的乡亭里》，《陕西地名》1982 年 3 期。

陈直：《汉书新证》283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汉书》卷 12《平帝纪》。

《西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哀江南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

屋”，说明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具有中国古代城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基本特点。为了管理市场交易，“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当市楼有令署”。今见于记载的市名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和高市等八市。文献中还有四市的名称，显然是指四个市而言。一般认为汉长安九市指东、西、南、北市和柳市、直市、孝里市、交门市和交道亭市。其中孝里市在雍门之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之东，直市和交门市在渭桥之北，证明汉长安的市场主要分布在城的西北部和横桥附近。这是因为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即丝绸之路）被开辟以后，从西域来的商人首先从便桥或中渭桥（即横桥）渡过渭河进入长安城的西北部，长安城的西北部既然成为商贾云集的场所，商业发达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另外，横贯关中平原的东西大道也是从横桥、便桥渡过渭河，横桥、便桥附近交易市场众多，商业发达，也正是交通便利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汉长安城市场繁荣，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东市万城，柳市（西城）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为方市闾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证明从汉代起，商人定居市场，开创了中国城市商业贸易的新局面。

宫殿建筑是都城的核心，汉长安城的宫殿几乎占了长安城的一半地方。如果按照宫殿所在地区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未央宫区、长乐宫区和建章宫区，它们都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体，不仅占地广阔，而且高殿低宇，鳞次栉比，各有特色。

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部，壮丽辉煌无比。由于位置在西，又有“西宫”之称。未央宫有43所台殿，周匝22里。实际上见于记载的大殿名称有前殿、高门、猗兰、承明、清凉、宣室、温室、金华、玉堂、白虎、麒麟、椒房殿等50处，台名尚不在其数。未央宫规模之大，殿宇之盛，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它以前殿（位于今西安西北郊的西马寨村北）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使宫殿布局协调大方，整齐美观。前殿居于全宫的最高处，其基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部最高处约15米，是利用龙首原上的山丘有意造成凌空之势，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1981年在未央宫前殿遗址北侧大约200米处，发现了一座大殿遗址，占地达40亩，清理了房屋基址和铺地砖、台阶、水井等，以及其他遗物，曲廊回径，建筑物很多，据说可能是未央宫中皇后居住的椒房殿。组成未央宫建筑群体的除宫殿外，还有许多台、阁、阙、室等。收藏天下秘书的有天禄阁（今小刘寨村北）、石渠阁（今柯家寨西北）和麒麟阁；掌管图籍秘书的御史中丞住在兰台，皇帝和群臣登高瞭望于柏梁台，沧池中还有渐台；专为宫廷制作美丽丝织品的有织室，暴晒

《三辅黄图》卷2。

《三辅黄图》卷2。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阎文儒：《西京胜迹考》，西安新中国出版社印行，1948年版。

《汉书》卷92《游侠列传》。

《太平御览》卷827引《三辅黄图》。

《长安志》卷3。

《长安志》卷3。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

织染物的有暴室，收藏冰块有凌室等。据勘探，全宫为一规整的方形，四面有围墙，周长近9千米，合汉代21里，面积约5平方千米，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未央宫是汉初宫殿建筑的典型代表，规模宏大，历时长久，对当时和后世的宫殿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长乐宫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部，今西安市西北郊的阁老门村就是它的所在地。它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葺而成的，由于位置在东，故有“东宫”之称。汉初刘邦曾在此“视朝”，后来即为皇太后居住的处所。兴乐、长乐都是取其吉利的名称命名。长乐宫周回20余里，有大殿14座。实际上见于记载的殿名有前殿、宣德、高明、通光、长秋、永寿、永宁、温室、椒房等17座。探测结果证明，长乐宫的形状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周长10千米，合汉代20多里，面积约6平方千米，占长安城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建章宫是汉武帝时修成的，位于长安城西建章乡，宫以乡名。据说由于未央宫柏梁台发生火灾，复起大屋以厌胜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建章宫所以建在城外，是因为未央宫“营造日广”，城中实在无地可容的缘故。所以摆在城西，则是由城郊的地形特点和供水状况所决定的。建章宫周回20余里，规模宏大，并有跨越城垣的飞阁与未央宫相连。它由骀荡、馱娑、杕诣、天梁、奇宝、鼓簧等宫，玉堂、神明堂、疏圃、鸣銮、奇华、铜柱、函德等26殿，太液池、唐中池，凤阙、神明台等高大建筑物所组成。

除宫殿建筑外，前殿西北有太液池，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西有商中（商庭也）、虎圈，东有凤阙等，与殿堂交相辉映，十分壮观。太液池周回10顷，碧波荡漾，并起“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是皇帝游乐的胜地。池西北还有高达50丈的神明台、井干楼，是皇帝祭祀神仙的地方。

汉长安城的宫殿建筑，除上述三大宫外，还有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城东北隅）等，皆金铺玉户，壮丽无比。这些宫殿所以主要占据城的南半部，是因为汉长安城南倚龙首原，南部地势较高的缘故。

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符合《周礼·考工记》的基本原则，即南部为宫殿区，北部为市场、居民、手工业区，十分整齐。应该说，它第一次完整地体现了《周礼》规定的城市布局原则，开创了中国都城总体布局的新规制，为后来都城的规划设计树立了样板。这就是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规划出功能不同的区域，使各种地形特点都能发挥作用。尤其是广开水源，开凿完备的供水渠网，为中国都城的供水打开了新的局面。

《三辅黄图》卷3、5。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

《长安志》卷3。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

《秦汉咸阳和长安的乡亭里》。

《汉书》卷25下《郊祀志》。

《三辅黄图》卷2。

《汉书》卷25下《郊祀志》。

《三辅黄图》卷4。

《汉书》卷25下《郊祀志》。

《汉书》卷25下《郊祀志》颜师古《注》引《汉宫阙疏》。

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城址保存最完整的大城市，探讨它的布局特点，对解剖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规律能提供一把金钥匙。

（4）东汉洛阳城

东汉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东 15 千米处，也就是白马寺东 1 千米处，它背靠邙山，面对洛河，形势十分险要。这里原来是西周成周的一部分，东周时漚水以西成为王城，漚水以东称为下都，也就是王城的郊区。东汉洛阳城就是在下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汉洛阳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或“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称为“九六”城。经实测，东墙残长约 3900 米，西墙残长 4290 米，北墙全长 3895 米；南墙已被洛河圮毁，不复存在。西、东、北墙均有曲折，平面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面积 11.16 平方千米。城墙为夯土筑成，宽 14—30 米不等，十分坚固。

东汉洛阳城有 12 个城门，南墙 4 门，北墙 2 门，东西墙均为 3 门。经过探测，已发现 10 座城门遗址。在现存城门遗址中，以大夏门的规模最大，有三个门洞，其他各门则仅有一个门洞。大夏门为北出西头城门，紧临北宫，宏伟壮观自不待言。通向各个城门的街道，均为南北、东西向。由于城门不对称，形成许多“丁”字形和“十”字形街道，最长的街道达 3 千米，但两个路口之间的段落，一般长 500 米，最长的也不超过 1.5 千米。街道一般宽 40 米，分为三条平行的道路，用土墙隔开，中间一条称为“御道”，是供皇帝和高级官员使用的。现在大体上可以划分出有东西、南北向的干道各 5 条，也可以各自的城门命名。南北向的干道有“开阳门大街”、“平城门大街”、“小苑门大街”、“津门大街”、“谷门大街”；东西向的干道有“上东门大街”、“中东门大街”、“上西门大街”、“雍门大街”、“旄门—广阳门大街”。被这些干道所分割的区域就是居民区和市场。东汉洛阳的居住区共有多少里，已难知晓，贵族多居住在上东门内，称为步广里、永和里。因为这里既接近东出大道，又靠近北宫的缘故。城的东北角谷门以东为太仓和武库，东南角旄门以北为太尉府、司空府和司徒府，西北角上西门以北为皇家禁苑濯龙园，均位于交通便利的地区。

洛阳的经济活动中心主要集中在三市，即金市、马市和南市。《洛阳记》：“大市名金市，在城中；南市在城之南，马市在大城之东。”金市位于“公观之西城中”。也就是说，除金市在城内西部外，其他二市均在城外。金市在北宫西南。马市可能在中东门外的干道之上，与金市东西对称。南市则在

《后汉书》卷 29《郡国志》引《帝王世纪》、《晋元康地道记》。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516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516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水经注》卷 16《谷水注》；《读史方舆纪要》卷 48《河南府》。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518 页。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 年 5 期。

《太平御览》卷 195 引《洛阳记》。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 19—20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元河南志》卷 2 引华延俊《洛阳记》。

《文选》卷 16 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

《汉代考古学概说》21 页。

城南洛河岸上，可能位于津门外干道之上，与金市南北呼应。三市均占有地利，商业兴盛，“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宫殿为政治中心，占据全城的主要位置。东汉洛阳有南北二宫，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区。北宫在北部中央偏西地区，南宫在南部中央偏东地区，两宫相距7里，有复道相通。据说7里为1里之误。南宫在今龙虎滩村西北，这里地势隆起，当地群众称为“西岗”。其范围当被东西、南北向的四条大街所框定，应为南北长约1.3千米，东西宽约为1千米，面积约1.3平方千米。这是东汉初年的政治中心，光武帝就住在南宫却非殿。根据《永乐大典》和《元河南志》的记载，南宫有五排宫殿，位于全宫中轴线上的有却非殿、崇德殿、中德殿、千秋万岁殿和平朔殿。另外，在中轴线两侧各有两排殿，约30余座，十分壮丽。南宫四面有门，以四方之神相称，即南为朱雀门，北为玄武门，东为苍龙门，西为白虎门。汉明帝以后，政治中心又转移到了北宫，“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宫及诸官府”。北宫位于今金南村南面高地上，呈长方形，地势高出附近4米左右，群众传为“金銮殿”。位于中轴线上的大殿有温谿殿、安福殿、和欢殿、德阳殿、宣明殿、平洪殿。另外，在中轴线两侧，还有殿观近20座，同样是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其四门名称与南宫相同。北宫经过大加修造后，宫殿雄伟，门阙高峻，气势磅礴。北宫的范围应为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2千米，面积约1.8平方千米，大于南宫。由于北宫占据有利地形，又宏伟壮观，并接近太仓、武库和濯龙园，终于成为东汉一代主要的政治中心。

东汉太学、辟雍、明堂位于开阳门外，形成洛阳独特的文化区，这里北对城墙，南临洛河，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东汉洛阳城充分利用了邙山、洛河之间的有利地形，把皇宫布设在高地上，市场鼎足而立，街道宽畅笔直，居民区井然有序，虽然面积较小，但布局整齐、宏伟壮观，不亚于西汉长安。

（5）曹魏邺城、东魏北齐邺都南城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17.5千米处。它北临漳河，南望广漠无垠的大平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黄河下游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漳河南移，曹魏邺城已被冲毁，仅留下金虎（南）、铜雀（中）、冰井（北）三台台基和部分建筑材料，其他已荡然无存。

《水经注》记载的邺城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城市，“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苍亭，巍

仲长统：《理乱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注》引蔡质《汉典职仪》。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

《洛阳历代城池建设》第23页，1985年。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

《洛阳历代城池建设》第23页，1985年。

《洛阳历代城池建设》第23页，1985年。

《后汉书》卷2《明帝纪》。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

若仙居”。邺城有七门，南面三门由东向西为广阳门、中阳门、凤阳门；北面二门，由东向西为广德门、阊门；东西各一门，为建春门、金明门。若按1尺24厘米来计算，1里为432米，则邺城南、北垣各长3024米，东西两垣各长2160米，面积为6.53平方千米。日本人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和当地地理形势，复原了邺城想象平面图，可以看出邺城的平面布局十分整齐。

从平面图可知，通向东西城门的干道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皇宫、禁苑和贵族居住区，南部为官衙和居民区。市场可能设在城内，十六国时，张豺被斩于平乐市就是例证。另外，“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闾闾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百隧毂击，连辘万贯”，商业十分兴盛。皇宫位于北部偏东地区，主要有文昌殿、听政殿等。皇宫之东为戚里，即贵族居住区，后来戚里就成为贵族的代名词。皇宫之西为铜雀园，为皇家禁苑，渠水清流，楼阁争辉，景色如画。其西墙北段还有高大的金虎台（南）、铜雀台（中）、冰井台（北），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显然是防御工程。因为这里有粟窖、盐窖，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南部被街道分割为方块，也就是居民区，称为里。除戚里在北部外，见于《魏都赋》的还有长寿、吉阳、永平、思忠等里。皇宫之南的南北干道即广阳门大街，其衙署就布设在该道北段的左右两侧，隔横街与皇宫相望。广阳门大街实际上就是全城的中轴线，只是位置略偏东罢了。

曹魏邺城在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开创了城市平面布局的新规制。首先表现在宫殿、官署、市场、居民区各划定一定区域，井井有序，比汉长安城的布局要整齐得多。其次是宫殿北移，有丁字形干道布设于宫殿之南，有了明显的中轴线，为中国城市的对称布局树立了样板。第三是园林占有广大地区，把园林建设摆在城市建设的重要地位，铜雀园设在宫殿之西，其范围还大于宫殿区。

东魏、北齐邺都南城紧附于曹魏邺城之南，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高欢以“北城窄隘”，故筑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以晋尺计算，六里为2.646千米，八里六十步为4.41千米，面积为11.64平方千米，比北城宽畅。其形制由东西向的长方形变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布局整齐甚过北城。全城有11个城门，南3门，东西各4门。实际上为13门，在北城南墙上开有2门，作为南城的北门。城门对称设置，东、西4门相对应，由于宫城在北，北面2门与南面3门中的左、右2门对应。宫殿位于北部中央，其南面正门闾阖门与南墙正南门朱明门之间的干道就是全城的中轴线。宫城正中南

《水经注》卷10《浊漳水注》。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1期。

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中国之都城遗迹》第34页，1983年版。

《读史方輿纪要》卷49《怀庆府》。

《魏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

《水经注》卷10《浊漳水注》。

《魏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

《水经注》卷10《浊漳水注》。

陆翊：《邺中记》，《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门有3道门，即阊阖门、端门、止车门，开创了宫城正门由多门构成的先河。宫城南半部也有由大殿构成的中轴线，即太极殿、昭阳殿，昭阳殿东有宣光殿，西有凉风殿。北部称为后宫，大殿很多，可能因地制宜，自由布设，最北部则为后园，即御花园。由此可见，邺都南城的宫殿布局，也为后来唐、宋、元、明、清都城的宫殿布局开创了先例。由于有明显的中轴线，全城里坊、市场完全左右对称布局，十分整齐。“南城自兴和迁都之后，四民辐凑，里闾填溢。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其有可见者有东市（东郭）、西市（西郭）、东魏太庙、大司马府、御史台、尚书省卿寺、司州牧廡、清都郡、京畿府……”坊也就是居民区，北城称里，南城称坊，从此以后坊名就成为居民区的称谓。四百余坊自然是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布局。东、西二市的具体位置虽难确指，但对称布局却毫无问题。邺都南城这种完全对称布局的新格局，开创了中国都城整齐划一的新规制，隋唐长安城和元明清的北京城，其布局特点，都渊源于邺都南城。尽管“邺都南城，其制度盖取诸洛阳与北邺”，但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开创了一代都城的新模式。“自高欢善之，高洋饰之，卑陋旧贯，每求过美，故规模密于曹魏，奢侈甚于石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都城之一，承前启后，为中国都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6）北魏洛阳城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仍然以汉魏洛阳为都。但这时的洛阳城已荒废了180年之久，残破不堪到了极点。孝文帝到洛阳后竟无立足之地，只好住在金墉城。为出入方便，在金墉城南新开一门，即承明门，使汉魏洛阳城成为13门。

北魏洛阳城实际上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分为宫城、内城和外城。在重建以前，曾派蒋少游等访问南齐建康城，“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故南朝人认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实际上北魏洛阳城也是创新，并非简单模拟。

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中央偏西处，废除原来的南、北二宫制，设置了单一的宫城。东西宽660米，南北长1398米，面积0.92平方千米，被阊阖门与建春门之间的东西街道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宫殿区，北部为苑区，以太极殿为正殿。“在今金村南，以俗呼‘金銮殿’的南北60米、东西约100米的高地为中心，围绕成组的基址，这里应是北魏主要殿堂的所在”。“金銮殿”南500米处，称为“午门台”，“应是宫城南门阊阖门的遗址”。直通宫城南门的干道称铜驼街，因“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故有此名，这也就是全城的中轴线。在宫城之南还有一条横线，与西阳门、东阳门

嘉靖《彰德府志》卷8。

嘉靖《彰德府志》卷8。

《洛阳伽蓝记·序》。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7期。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7期。

《水经注》卷16《谷水注》。

相通，使宫城处于丁字形干道的北端。重要衙署都布设在铜驼街的北段，隔横街与宫城相望。御道西还有永宁寺，寺塔高 90 丈，耸峙入云。宫城以北为华林园，景色如画。

内城也就是汉魏洛阳城，除重建宫城外，又兴建了许多寺庙，著名的永宁寺就在铜驼街之西，其他基本上依如汉魏之旧，变化不大。

外城是北魏新建的。“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对于北魏洛阳外城的大小，历来都有争论，主要是杨炫之所说的 20 里和 15 里之里，到底是道里之里还是闾里之里。一种意见认为即道里之里，一种意见认为即闾里之里。按照考古发掘所复原的北魏洛阳城图，应为道里之里。也就是说，北魏洛阳外城与里城的方向相反，由南北向的长方形变成了东西向的长方形。对北魏洛阳城里的多少也有不同记载，除杨炫之的 220 里外，还有景明二年（501 年）“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的记载。据宿白先生估算，按东西 20 里，南北 15 里的规模，也只能布设 300 个里坊，除去道路、宫殿、庙社、府曹，以 220 里之说比较接近实际。这 220 个里坊主要分布在外城，十分整齐。其称呼可以里相称，也可以坊相称，均见于文献记载。里为方形，方 300 步，或周长 1200 步，开四门，有十字形街道。里坊整齐，有里正二人管理，制度严密，其目的就是便于维护社会治安，使“奸盗永止”。

北魏洛阳设有三市，东西两郭的市都设在距离洛阳旧城 3 里外的地方。西郭市“周回八里”，名大市，在白马寺东。经考古发掘，大市范围内的瓦片堆积层，有的地方厚达 2 米，证明大市十分繁荣。“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輶车为事。”

可见大市的繁荣带动了周围里坊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以大市为中心的经济繁华区。西郭市即汉魏马市，亦称小市。建春门外石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即中朝牛马市”，证明马市在北魏时称牛马市，为牲畜交易市场。南郭的市名四通市，在旧城宣阳门外。“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

《水经注》卷 16《谷水注》。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 5《城北》。

劳干：《北魏洛阳城的复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廿本上册。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 350 页《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洛阳历代城池建设》第 34《图·北魏洛阳城复原图》。

《魏书》卷 8《世宗纪》。

《北史》卷 16《魏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子嘉传》。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注》。

《北史》卷 16《魏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子嘉传》。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

《洛阳伽蓝记》卷 4、2、3。

《洛阳伽蓝记》卷 4、2、3。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80 页《校》。

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由于四通市位于洛水浮桥永桥之南，水路交通方便，又靠近四夷馆，来洛阳经商的各国商人无不云集于此。伊、洛之间为四夷里，主要居住外国客人，“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已成为洛阳城南最繁华的所在。

北魏洛阳城既改造了汉魏洛阳旧城，又新建了外城，宏伟壮观，布局整齐，开东魏、北齐邺都南城和隋唐长安城宏大、整齐之先河，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里、外城的佛寺达 1367 所，皆建筑宏丽，也为洛阳城增添了光彩。其具体位置，见《洛阳伽蓝记》。

（7）六朝建康城

建康即今南京市，孙吴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位于今南京市区。今日南京市最早称为金陵邑，据说楚灭越后，为镇压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金陵。六朝在建康城位于今玄武湖以南地区，为孙吴所建。孙权自武昌（今鄂州）迁都秣陵，改为建业，即建功立业之意。诸葛亮使吴至建业，称这里“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证明建业山川形势险要是孙吴迁都的主要原因。“其建业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以孙策府第改为太初宫，“自武昌城建业太初宫居之”，位于大城中部偏西地区。在城西南凿渠，引秦淮河北抵仓城，仓城位于东晋南朝建康宫西华门内道北。

太初宫周回五百丈，正殿曰神龙，南面开五门，正中曰公车门。东西各三门，北一门，共开有 12 门。孙皓建昭明宫，周五百丈，以赤乌殿为正殿，位于太初宫之东，即大城中部地区。东晋时，苏峻之乱，“宫室皆焚毁”，重修新宫，“署曰建康宫”。这就是东晋南朝的皇宫，位于建康城中部偏北地区。宫有五门，南面正中为大司马门，正对大城宣阳门，两门之间为御道，即全城的中轴线。建康宫一名苑城，亦称台城，京都有事，以台城为固。台城内有华林园，位于北部，风景如画。

由于孙吴建业城和东晋建康城均恃大江为固，并未建成坚固的城墙和城门，直到南齐时才有所改变。建元二年（480 年）“五月，立六门都墙”，从此以后，建康城才固若金汤。在此筑城以前，不仅城不完固，城门也多为竹篱门，缺少防御能力。“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六门指建康城的六

《洛阳伽蓝记》卷 4、2、3。

《洛阳伽蓝记》卷 3。

《建康实录》卷 1。

《建康实录》卷 2《太祖下》。

《建康实录》卷 2《太祖下》。

《建康实录》卷 2《太祖下》。

《建康实录》卷 4《后主》。

《建康实录》卷 7《显宗成皇帝》。

《太平寰宇记》卷 90《升州》。

《南齐书》卷 2《高帝下》。

《南齐书》卷 23《王俭传》。

个城门，南面三门，西曰陵阳门，后改名广阳门，世谓之尚方门。正中宣阳门，本吴所开，世谓之白门，晋为宣阳门。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这条御道，实际上就是全城中轴线的延长，两侧槐柳成荫，十分壮观。东为开阳门。东面二门，南为清明门，门三道，门东出青溪港桥。北（正东）为建春门，后改为建阳门，门三道。西面一门，正西南西明门，门三道，东对建春门，两门之间即宫城大司马门前横街。正北面用宫城，别无门。苑城即吴之后苑，一名建平园。

“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晋江左所筑，但有宣阳门。”从《地輿志》的记载可知，城为方形，边长5里余，即边长2.077千米，面积4.31平方千米，范围比较小。由于宫城南有南北向干道和东西向干道，又可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和南北两部分，布局整齐。主要政府机关都布设在宫城南御道的两侧，有“府寺相属”，“屯营栉比，廨署棋布”之称。在建康城外，还有许多小城，以东府城、西州城最为著名。东府城位于大城东南，宋武帝初领扬州，筑东府城。元嘉中彭城王义康更开拓之，自后常为宰相府第。西州城位于大城西南，为扬州刺史治所。另外还有丹阳城（大城西南）、白下城（大城北）、江乘城（大城东北）等，证明建康城的范围比较小，许多重要机关在城外各自为城。当然，也有加强防御的意义，战争年代可以互相支援。不过这种形式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同时也说明建康城区不断向城郊发展，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实际上，早在孙吴时，“京师鼎族，多在青溪左及潮沟北”，青溪即东渠，通城北至潮沟。也就是说，孙吴时许多名门大族多居住在城北至潮沟外和城东北青溪附近。青溪在城北，“以泄玄武湖水，南入秦淮”。另外，城南秦淮河一带也是人口稠密区。“横塘（秦淮河堤）、查下（巷名，横塘西），邑屋隆夸；长干（里名，秦淮河岸山岗间的平地称为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文綉）魏（周）之昆，顾（雍）陆（逊）之裔。”也是名门望族，证明从孙吴起，有权有势的人就多住在水路交通发达、经济繁华的地区，这也是六朝建康城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城小市区大，贵族多居住在城外。城东南的东府城，也就是东晋简文帝和会稽王道子的私宅，南朝时才成为宰相办公的所在。

孙吴建业城有二市，即建初寺前的大市和东市。而凿句容（今江苏句容）中道，至云阳（今江苏丹阳）西城，以通吴、会的破岗渚，为建业东南的主要水运交通线，沟通了长江和秦淮河，上下14埭，“通会市，作邸阁”，也是主要的商业区。市场兴旺发达，“开市朝而并纳，横闾阖而流溢”，“轻

《建康实录》卷7《显宗成皇帝》引《地輿志》。

《读史方輿纪要》卷20《台城》、《东府城》、《丹阳城》、《白下城》、《江乘城》；《吴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

《读史方輿纪要》卷20《台城》、《东府城》、《丹阳城》、《白下城》、《江乘城》；《吴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太平寰宇记》卷90《升州》。

《吴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

《读史方輿纪要》卷20《东府城》；《太平寰宇记》卷90。

郭黎安：《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輿案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乘时射利，财富巨万”，货物繁多，人流如潮，一派繁荣景象。

东晋南朝称建康市。刘裕破后秦，“执姚泓归于京师，斩于建康市”。这里所说的建康市是指哪一个市，已不得而知。据说城内有四市。孙吴时从御道南端的朱雀门南渡淮（秦淮河），“名为大航门”，朱雀桥“亦名大航桥”，就是商业兴盛之区。东晋时“新作朱雀浮桁”，也就是以舟船所做的浮桥，证明这里仍为交通要道，商业依然兴盛。到了南朝梁时，建康城达到鼎盛时期，其市区范围东西南北各40里。“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方山北），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钟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其市场区主要在秦淮河沿岸，“市廛列市，埒于二京（长安、洛阳），人杂五方”，“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其各津渡处大致都是市场区。淮水即秦淮河，为通长江的重要航道，又横贯建康市区，自然形成重要的商业市场区。六朝时的建康城，市场已分散分布，数量众多，证明自东晋南渡以后，长江下游的社会经济已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繁华区域。

一般居民区也称作里，建康到底有多少里，如何划分已不得而知。梁大通三年（537年），分建康之同夏里置同夏县，证明建康城外的里范围很大，可以划分为一个县。

南朝在建康城与北魏的洛阳城一样，也是佛寺林立。梁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成为建康城的一大特色。这些寺庙都分布在什么地区，难于备述，而梁武帝舍身的同泰寺，也就是今天南京市的鸡鸣寺，位于鸡笼山下，即南朝建康宫以北。另外还有栖霞山的栖霞寺、城南花濠岗的瓦官寺和道场寺也很有名，法显就曾在道场寺译经。

经考古发掘，六朝宫殿台城，位于鸡笼山南乾河沿北，其范围大约在珠江路（南）、北京路（北）、中山路（西）与成贤街（东）之间，周长4千米左右。

（8）隋唐长安城

隋称大兴城，唐改名长安城，也就是今西安城及其附近郊区所在地。下文一律以唐长安城相称。

唐长安城是一个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长方形，非常规则和整齐。它的这种形状同汉长安城一样，也是受当地地形影响的结果。因为唐长安城所占

《吴都赋》。

《建康实录》卷10《安皇帝》。

《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市》引《丹阳记》。

《建康实录》卷9《烈宗孝武皇帝》。

《晋书》卷7《成帝纪》。

《太平寰宇记》卷90引《金陵记》。

《隋书》卷31《地理志》。

《隋书》卷24《食货志》。

《太平寰宇记》卷90《升州》。

《南史》卷70《郭祖深传》。

郭黎安：《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

据的这块平原，恰好是东西开阔，南北却受到少陵原和龙首原的制约。根据实测，从东墙的春明门到西墙的金光门之间，东西宽为 9721 米（包括东西二城墙厚度在内），从南墙的明德门到北墙的玄武门偏东处之间，南北长为 8651 米（包括南北二城墙厚度在内），两相比较，则东西长出 1070 米。

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严格的東西对称。宇文恺首先确定了全城的中轴线，然后以它为中心向左右展开。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是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为南北一线，即承天门街（亦名天街，承天门和朱雀门之间）和朱雀门街（朱雀门和明德门之间）。由于有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平面布局井井有序。

宫城是全城的核心，位于城内北部中央，周长 8.6 千米，面积约 4.2 平方千米，没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作为中轴线，以区别于皇城和外郭城。这在设计上也是费过一番心思的。因为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总要处处表现它至高无上的特点。它的中轴线是由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略偏西）所构成，压在全城中轴线北段的中央。这些建筑物高大雄伟，承天门大街和朱雀门大街虽然宽畅笔直，但与宫城的中轴线相比，仅仅是它的附属物而已。宫城中的建筑物也基本上保持东西对称，只是后来不断增添新的大殿，才使这种格局有所变化。

皇城紧附宫城之南，周长 9.2 千米，面积约 5.2 平方千米，南北 7 条大街，东西 5 条大街。承天门大街（亦称天街）把皇城分为东西两半，所有建筑物也是以它为中心东西对称布设。承天门大街东西两侧从北到南，东边有东朝堂，西边有西朝堂；东边有门下外省，西边有中书外省；东边有左武卫，西边有右武卫；东边有尚书省，西边有司农寺；东边有左领军卫，西边有右领军卫；东边有太仆寺，西边有宗正寺；东边有太常寺，西边有鸿胪寺等，基本上东西对称。至于安上门街以东和含光门街以西，由于布设的机关不大重要，故并未遵守东西对称的原则。

外郭城是一大长方形，周长 36.7 千米，面积 84 平方千米，完全采取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内东西 14 条大街，南北 11 条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里坊，“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描绘。由于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轴线和主干道，把全城分为东西两半，因此，城的东半部和西半部各有 5 条南北向的大街，构成街道的对称格局。根据实测，朱雀街宽 150 米（最宽处 155 米），其以东的五条南北街道，依次宽为 67 米、134 米、68 米、68 米和 25 米（东顺城街）；以西的五条南北向街道，依次宽为 63 米、108 米（残存宽度）、63 米、42 米（残存宽度）和 20 米（西顺城街）。从实测结果不难看出，尽管朱雀街以西 5 条南北街的宽度均比以东的 5 条街略窄，但应该承认仍然是严格保持了东西对称的格局。这表现在通向南墙城门的街道都宽，而启夏门街、安化门街的宽度则大体相当；其他通向北墙城门和皇城城门的街道宽度也都在 60 米以上，唯有通向光化门的大街残存 42 米，应该不代表它原来的宽度；东西顺城街都窄，宽仅 20—25 米。这样设计不仅保持了对称布局的特点，而且也完全符合城市交通的需

中科院考古所：《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 11 期。

嘉庆《长安县志·图》；《唐两京城坊考·图》。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 11 期。

要。唐长安城的核心是在北部中央，因此南墙上的三个城门向中间紧缩，通向它们的街道宽度在 108 米到 155 米之间，应该是十分合理的。这三条平行的大街宽敞豁达，笔直端正，绿树成荫，可以更加陪衬出皇城、宫城的雄伟。东西顺城街很窄，那是愈靠近城墙，行人愈少的缘故。东西向的 14 条大街，通向东西城门的街道也比较宽，其中皇城南面的横街直通春明门（东出中门）、金光门（西出中门），宽达 120 米，但从设计布局来看，东西向的街道均不作南北对称。唐长安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宛似一块棋盘，两边还挖有排水沟，以及种植槐树、榆树和柳树，高大翠绿，把长安城装扮得十分壮观。

这些纵横排列整齐的街道把所有居民区划分为大小不等的里坊，分归长安、万年两县管辖。以朱雀街为界，长安县管理西城 55 坊，万年县管理东城 55 坊。因城的东南角作直角形曲折，实为 54 坊，后因兴庆宫占据一坊半之地，又成为 53 坊。但大明宫丹凤门街把两坊分割为 4 坊，城东部仍为 55 坊。这些整齐划一的里坊，以朱雀街为界，严格东西对称布局。皇城以南东西九排坊，每排 10 坊（一、二排各 8 坊），南北分为 10 列，每列 9 坊（朱雀街以东第四列和以西第四列各为 7 坊），共计 86 个坊。以朱雀街为界，向东 5 列坊的东西宽度分别为 562 米、700 米、1022 米、1032 米、1125 米；向西 5 列坊的东西宽度分别为 558 米、683 米、1020 米、1033 米、1115 米。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皇城以南朱雀街东西诸坊完全是对称布局，相对应的诸列坊东西宽度相差无几，基本吻合。宫城皇城东西的 24 坊，虽然仅实测了西边的居德坊（金光门北），其东西宽为 1115 米，与朱雀街西第五列坊的宽度相当。这就证明，由于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的宽度已经查明，宫城、皇城东西诸列坊也是东西对称布局。由于唐长安城内诸坊完全东西对称排列，就显得特别整齐划一。真是“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比也”。诸排坊的南北长度也已探明，但从测量数字可知，南北诸坊并不对称，只是根据地理特征划定诸坊长度，尽量使各排坊保持单一的地形。诸坊均有高大围墙环绕，一般都开辟东西南北十字街，四面各开一门。除过特殊情况外，不准再向大街开门，只有“三绝者”例外。也就是说，三面受到阻隔，无法向坊内开门的住户，才允许向街开门。皇城以南 36 坊只开辟东西街和东西门，不开南北街和南北门。这是由于宫城在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应该同地理上的原因有密切关系。皇城以南诸坊面积较小，居民人口也少，只开东西街已能满足需要，无须再开南北街。凡有十字街的坊，十字街的宽度均为 15 米。被十字街隔开的四区，又各有十字街巷，把全坊分为 16 个小区。这些巷的宽度，一般为 2 米多。按照唐人习惯称呼，对坊的四角都使用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的名称；对靠近东、西、南、北四个坊门的部位，则称为某门之南、某门之北、某门之西、某门之东；对靠近坊内十字街中心路的区域，则称为“十字街东

《唐两京城坊考》卷 1；《唐会要》卷 86《街巷》；《长安古意》，《唐诗选》上；《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全唐诗》卷 235 页。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 11 期。

《长安志图》卷上。

《唐会要》卷 86《街巷》。

《长安志图》卷上。

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 年 6 期。

之北”、“十字街东之南”、“十字街西之北”、“十字街西之南”。

这些十字街的坊，也是东西对称布局，从十字街东西四个小区的称谓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也说明，在一坊之内同样遵循着东西对称的原则。当然，一坊之内除十六个小区外，还有被许多微径小蹊分割的巷曲，数目之多，竟然可以使人入曲迷途。唐长安城内的这些里坊，就是达官贵人和一般居民的住宅区，也是诸教僧徒、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活动的场所。坊内榆柳成行，苗圃果园繁多以及私人宅第中的茂林修竹之胜，使诸坊景色迷人，让人留恋而忘返。然而，长安城内的街道和里坊却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坊有墉（围墙），墉有门，捕亡奸伪，无所容足”。坊门启闭有时，每天夜间街鼓鸣后，行人必须回到坊内，否则就是犯夜，会受到巡行武士的严厉惩罚，甚至于杖杀。“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就是反映这种夜夜宵禁的情况。只有每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夜间例外，全城士女可以自由出入街巷，玩赏花灯。实际上，唐长安城内坊坊有墙，街道犹如胡同，与今天城内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的情况迥然不同。这种坊设围墙和严格的管理制度，除整齐划一外，显然也是为了加强统治。

唐长安城内经济活动的中心就是东西两市，也完全按照东西对称的格局布设。东市位于皇城东南角（今西安交通大学西边），西市位于皇城的西南角（今西北工业大学的西边），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各开井字形街道，每条街宽达16米，每面也各开两个门。两市各有220个行业，向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市东北隅有放生池，引泔水渠西流汇注，“俗号海池”。后来在西市西北隅也开凿了一个放生池，引永安渠水汇注，与东市池保持东西对称。管理市场和平准物价的机构也对应设置，如东市局、东平准局，西市局、西平准局等，它们均隶属于太府寺。市内被井字形街道分割的九个区，四面临街，各行各业的店铺也均临街开设，铺面一般为6米许。在每个小方之内，还有许多小巷道。从对西市发掘的情况看，市内除商店外，还有手工业作坊。西市设有大衣行、秋簪行、秤行、绢行、卖腊烛的羹家店、侯景先当铺、张家楼饭店、陶氏饭馆、珠宝商店、波斯邸、羹义柜枋等。东市的商行与西市相仿，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失火，一次烧毁“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店铺之多，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比较而言，西市比东市繁华，“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因为东市靠近三大宫，

段浩然：《北里志中的‘三曲’》，《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2期。

《唐两京城坊考》卷2、3、4。

《长安志图》卷上。

《唐两京城坊考》卷2。

《唐两京城坊考》卷1。

《长安志》卷8。

《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6期。

《唐两京城坊考》卷4。

《南部新书》。

《续玄怪录》。

《太平广记》卷243引《乾子》。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

《长安志》卷10。

王公大臣多在东市附近居住，宅第“勋贵”，占地广阔，商贾无处落脚，不得不“多归西市”贸易。当然，西市靠近永安渠、漕河，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方便也是它胜过东市的重要原因。另外，“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更助长了西市的繁荣，因为从西域来的商人大都从开远门（西出北头第一门）或金光门（西出北头第二门）进城，西市就成为他们首先落脚的地方。西市胡商很多，经商的业务也很广泛，都同西市地理位置的优越有密切关系。每年正月十五日观赏花灯，西市是最热闹的地方，对王公贵族也有最大的吸引力。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东市就不繁华，只是“繁杂稍劣于西市”。

唐长安城的宫殿也有三组，这就是宫城内的太极宫，龙首原上的大明宫和春明门内的兴庆宫。由于方位的差异，一般称太极宫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兴庆宫为南内。

宫城的太极宫也就是隋代的大兴宫，是隋代和唐初政治统治的中心。它位于全城北部中央，占据“九二”高地，殿宇林立，气势雄伟。除作为中轴线的几座大殿外，其他殿、台、亭、阁，基本上围绕中轴线作对称布局。根据《长安志》的记载，太极宫中共有21座大殿，楼台亭阁无计其数。宫的北部有东、西、南、北四大海和山水池，与楼台亭阁相辉映，景色绚丽如画，是皇帝游乐的场所，也就是御花园。太极宫东边是皇太子居住的东宫，西边是妃嫔居住和宫人学艺的掖庭宫，均有大门与太极宫相通，实际上构成整个太极宫的组成部分。

龙首原上的大明宫本名永安宫，是贞观八年（634年）为太上皇李渊清暑而修建的，次年改名大明宫。高宗因患风痹病，恶太极宫“潮湿”，龙朔二年（662年）号曰蓬莱宫，大加修建，遂成为唐长安最辉煌壮丽的一座宫殿。大明宫仅大殿就有33座，楼台亭阁更是无计其数。经过考古发掘，证明它的南半部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北半部由于东墙向西移动，并斜向西北，形状略呈梯形。今实测大明宫周长7.6千米，面积达3.2平方千米。大明宫南面5个门，正中为丹凤门（遗址在今自强东路以北的二马路）。丹凤门街把原来翊善、永昌二坊分割为4坊，街道宽达176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街道。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大明宫的平面布局也是左右对称，有明显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就是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和玄武门。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其遗址就在今含元殿村之南，今实测东西11间，进深4间，每间广5米。它耸立在龙首原顶上，殿下即龙首原的南坡，被布设为长达70余米的龙尾道。龙尾道是三条平行的斜坡台阶级道，中间的一条宽25.5米（即御道），两侧的两条各宽4.5米，距中间道的间隔8米许。殿的东西两侧有对称的回廊和翔鸾、栖凤二阁，与大殿共同构

《长安志》卷8。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西市胡店与胡姬》，三联书店1979年版。

《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

《长安志》卷6。

《唐两京城坊考》卷1。

《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6期。

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7期；《含元殿外观复原》，《考古》1963年10期。

《长安志》卷6。

成一组严格对称、布局协调、气势雄伟的庞大建筑物，站在龙尾道之下仰视含元殿，犹如天宫降临云端，十分壮观。宫的北部有太液池，池中心有蓬莱山。它的周围大殿环绕，耸峙入云，与清波涟漪的湖水交相辉映，相谐成趣。接待外宾和举行宫宴的麟德殿布设在太液池西隆起的高地上。麟德殿以麟德年号命名。它是前中后三殿相连，并以中殿为主殿。中殿与后殿之间有很厚的隔墙，并无间距，与前殿之间也仅有很窄的间距。中殿高出前后两殿，利用高空采光，雄伟明亮。整个殿的周围绕以回廊，惟东西两侧的回廊被后殿左右突出的两间耳室隔断。后殿的东西两侧有郁仪楼、结邻楼，中殿左右有对称的东亭和西亭，整个建筑庄严大方，别开生面，显示了唐代建筑艺术的新风格。麟德殿气魄之大，超过了今天北京故宫的太和殿。

春明门内的兴庆宫是唐玄宗一朝政治统治的中心，开元二年（714年）改旧宅为宫。它原是唐玄宗为临淄郡王时住宿的地方，位于隆庆坊。唐玄宗名李隆基，遂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以避其讳。开元二年以坊名宫，称为兴庆宫。开元十四年（726年）又把永嘉坊的一半并入宫内，扩大了兴庆宫的范围。经过多次大规模修建以后，一座新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拔地而起，开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就把政治中心从大明宫移到了兴庆宫。根据探测，兴庆宫的范围比较小，它的东界在今佘家堡西106米处，西界在今经九路（兴庆公园西门外）东90米处，南到今纬十街（咸宁路）北84米处，北到长乐坊附近的东窑坊，东西宽1075米，南北长1250米，面积约1.4平方千米，接近于正方形。从探测资料证明，吕大防的《兴庆宫图》（残石存西安碑林，编号775）基本接近实际，仅与探测数字略有出入而已。吕图及其题记对兴庆宫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从平面图可知，兴庆宫的正门也叫兴庆门，开向正西，位于西墙的北段。由此可见，兴庆宫的建筑并非采用对称布局，这可能同该宫为旧宅所改建，本无中轴线有关。兴庆宫的正殿就是兴庆殿，位于兴庆门里北侧，其南为大同殿，均居于兴庆宫的西北隅。宫的北半部偏东还有南熏殿、新射殿、金花落等。兴庆宫的主要大殿均在它的北半部，南半部中间为龙池（亦名兴庆池）。在龙池西南有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正南为龙堂，东南有长庆殿，东北有沉香亭。这些建筑物以龙池为中心，共同构成了兴庆宫的园林风景区，是唐玄宗游乐的场所。除吕图上的殿、亭、楼、堂外，见于记载的还有文泰殿、咸宁殿、义安殿、积庆殿、冷井殿、会宁殿、飞仙殿、同光殿、荣光殿和五龙坛等建筑物。可是与太极宫、大明宫相比较，殿庭还是比较少。兴庆宫的建筑物虽然较少，但多为高楼大厦，气势磅礴，“东北何霭霭，宫阙入烟云”，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记录。

唐长安城的风景区除城内的住宅园林小巧玲珑、景色别致外，还有位于

《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刘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7期。

《长安志》卷9。

《唐会要》卷30。

《大唐六典》卷7；《兴庆宫图·题记》（碑石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会要》卷30。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资料》，《人文杂志》1958年1期。

《唐两京城坊考》卷1。

白居易：《登乐游原望》，《全唐诗》卷424。

城外规模宏大的园林区，这就是位于城北的禁苑、城东南的曲江池、城东的华清宫和城南的樊川，都景色壮丽，各有特点。禁苑“东距浐，北枕渭，西包汉长安城，南接都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苑中楼阁相望，渠水清流，湖泊棋布，林木葱郁，景色宜人。曲江池水面达0.7平方千米，少陵原紧环四周，秦岭突兀耸起近在眼前，不似西湖而胜似西湖。华清宫以骊山、温泉为依托，“温泉迸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尽有河山之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是一座人间天宫。樊川也就是今长安县杜曲与韦曲之间的带状盆地，为唐代达官贵人的别墅区。这里南望终南，挺拔秀丽，北倚少陵，雄伟壮阔，神禾原青翠起伏，瀋河宛似银链，真是江山美如画。

唐长安城不仅规模宏大、布局整齐，而且风景区的发展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即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以人工雕凿，使其巧夺天工。

（9）北宋开封城

北宋开封城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城及其附近郊区所在地，分内外三重，即外城、里城和宫城。

外城是利用后周都城外城加以展筑，由原来的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展至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按正方形计算，面积27.37平方千米。南三门，北四门，西三门，东二门，共计12个城门。南墙正中为南薰门，与里城正南门朱雀门，宫城正南门宣德门构成全城的中轴线，称御街。御街宽约二百步，折合280米（一步为1.4米），两边为御廊，中心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行人皆在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磬砌御沟水两道，尽植莲荷，近岸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这条御街设置的很宽，从宣德门到朱雀门里的州桥（汴河桥）之北的一段御街，实际上是宫廷前南北向的广场，扩大了宫城前的视野，以显示宫城的高大雄伟。而中央官署也多布设在这段御街的两侧。大相国寺就位于它的东侧，即州桥的东北方向。北宋外城亦名国城，城壕曰护龙河。

里城即今开封城的前身，明代包砌青砖以后才形成今天的开封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唐建中初，节度使少勉筑，皇朝曰阙城。”面积4.49平方千米，南北各三门，东两各二门，共计10门，南面正中为朱雀门。里城仍保留原来城壕，并经广济河与外城城壕相通。宋徽宗时，在里城东北隅仿杭州凤凰山修筑人工山，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周回十余里，主要是用太湖奇形怪状之石堆积而成。因山在国之艮，故名，穷极巧妙，“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

《唐两京城坊考》卷1。

《玉海》卷158《华清宫》。

《玉海》卷174《元丰修都城记》。

《东京梦华录》卷2《御街》。

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3期。

《玉海》卷174；《东京梦华录》卷1。

《玉海》卷174。

《玉海》卷174。

《宋史》卷85《地理志·京城》。

宫城亦名皇城、大内，周回五里，位于里城北部中央，接近正方形，面积仅 0.26 平方千米。宫城六门，南三门，正中为宣德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拱宸门。其正殿为大庆殿，位于宣德门之里，也正好压在全城的中轴线上。“殿九间，挟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有龙墀、沙墀”，修建得非常壮丽。而且规模很大，“殿庭广阔，可容数万人”。宫城大致可分为三区，宣德门至宣祐门之间以大庆殿为主可称前区，即正至朝会、册尊号、飨明堂恭谢天地的场所。宣祐门至迎阳门为中区，以崇政、垂拱殿为主，是皇帝住宿和处理朝政的地方。迎阳门以北为后苑，即后区，以崇圣殿、太清楼为主，是皇帝游宴的地方，殿台亭阁林立，与金水河、五丈河渠等交相辉映，景色绮丽。迎阳门“俗号苑东门，召近臣入苑由此门”。此门即宣和门，亦称开曜门，《宋史·地理志》称为宁阳门。

北宋开封仍沿用坊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坊制度终于崩溃。封闭性的坊已被冲破，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渐形成。尽管至道元年（995 年）“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如有雍洛之制”，也不过空有其名而已。由于坊制的崩溃，宋代在城市管理上开始设置厢，即按地段、街道实行管理。里城“内左一厢二十坊，二厢十六坊；右一厢八坊，二厢二坊。新城内（即外城内）城东厢九坊；西厢二十六坊；南厢二十坊；北厢二十坊……京东一厢一坊，二厢一坊，三厢一坊；京南厢二坊；京西一厢二坊，二厢一坊，三厢二坊；京北一厢二坊，二厢一坊”。其中里城内 4 厢 46 坊，外城 4 厢 75 坊，城外 9 厢 13 坊，合计 17 厢 134 坊。这时的坊仅仅为居住区的名称，坊墙的限制已被突破，厢才是真正的管理单位。从坊的分布可知，里城内人口重心在东半部，坊的数量占 70% 以上；外城恰好相反，人口重心在西部，坊的数量占东、西、南、北的 30% 以上，几乎是东部的 3 倍。城外坊的分布以东、西郊区最多，南、北郊较少。人口分布所以不均称，主要是里城西部多为政府机关所在地，像尚书省、御史台、开封府等都在御道以西，居民自然多归东部。外城西部是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蔡河入城的地方，水路交通最为方便，人口也就较多。汴河是东京的生命线，由西而来横贯全城，出城后趋向东南，汴河两岸人口稠密，故城东、西郊坊数也较多。

北宋初年仍设东、西两市，市坊崩溃后，市场完全沿街道布设，有如《清明上河图》所示。主要繁华街道有州桥南街、东西街，相国寺内万姓交易，大内东南潘楼东去十字街，东华门外“市井最盛”，主要供应皇宫必需品。“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闐如此”，使街道更加热闹非凡。城东、城西、城北都有许多著名的酒楼、商店、药店、旅店，形成

《宋史》卷 85《地理志·京城》。

《宋会要辑稿》卷 7699《方域一之三》。

《东京梦华录》卷 10《车驾宿大庆殿》。

《宋史》卷 85《地理志·京城》；《宋会要辑稿》卷 7699《方域一之三》。

《玉海》卷 174；《宋史》卷 94《河渠志·金水河》。

《玉海》卷 174。

《玉海》卷 174。

《续资治通鉴》卷 2、3《建隆二年、三年》。

《东京梦华录》卷 1、2、3。

许多专业市场，城东南7里的虹桥附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商业街代替商业区的市，虽不是始于北宋开封，但在中国都城史上开封确已转变为开放式的城市，证明作为都城的城市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城市风貌。

北宋开封城是四大运河金水河（亦名天源河）、五丈河（亦名广济河）、汴河、蔡河（亦名惠民河）通过的地方，不仅航运发达，而且水源极其丰富，在城郊形成许多著名的风景区。城西顺天门外有金明池（路北）、琼林苑（路南），殿楼台亭与古松怪柏、奇石异桥交相辉映，金明池“周围约九里三十步”，一泓荡漾，别有情趣。宜春苑在城西金耀门（固子门）外，玉津园在城南南薰门外，与金明池、琼林苑号称皇家四大园。除此之外，私家园林也很兴盛，“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到处“粉墙细柳”，“芳草如茵”，“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景色如画，升平欢乐至极。开封公、私园林之盛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显然是地形有利、水源丰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开封平面布局的特点和地形平坦，水源丰富，交通方便密切相关。

（10）南宋杭州城

南宋杭州城位于今杭州市区，是利用吴越首都杭州城改建的，形状为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地处西湖与钱塘江之间。皇宫位于城的南部凤凰山麓。

南宋杭州城“旱门仅十有三，水门者五”。“城南门者一，曰嘉会……城东南门者七……城东门者三……城北门者三……城西门者四……”在这18个水旱门中，除南门嘉会门为“诸门冠，盖此门为御道，遇南郊，五辂从此幸郊台路”外，还有东南候潮门，东面东青门，北面余杭门，西面钱塘门比较重要。城的范围东西窄，南北长，西临西湖，东濒钱塘江，南过凤凰山，北到武林门。据说庆元间“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成为全国第一大城。“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城外有护城河。“水门皆平屋”，旱门“皆造楼阁”，十分壮观。

宫城亦称大内，位于凤凰山东麓，考古工作者已在这里发现了南宋皇宫部分遗迹，在距地面3米多深处，发现一处古建筑地基，保存了大量青砖、南宋宫窑瓷片，一个残破的瓷碗，碗底上还印有“内苑”字样。大内有四门，以南门丽正门为正门，北为和宁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丽正门内为大庆殿，即正殿，为正朔大朝会的场所。若遇百官听麻、圣节上寿、进士唱名、明禋等，则可改为文德、紫宸、集英、明堂等名称，一殿多用。北为垂拱殿，为“常朝四参起居之地”。另外还有延和、崇政、福宁、复古、缉熙、勤政、嘉明、射殿、选德、奉神诸殿，天章、宝瑞诸阁，以及皇太后坤宁殿、

《东京梦华录》卷2。

《清明上河图》。

《东京梦华录》卷7。

《东京梦华录》卷6。

《梦梁录》卷7《杭州》。

《西湖老人繁胜录·街市点灯》。

《梦梁录》卷7《杭州》。

《南宋皇宫真貌初露端倪》，《西安晚报》1989年12月21日。

皇后和宁殿等，与丽正、和宁诸门，“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壮丽辉煌无比。凤凰山麓地势较高是皇宫雄伟壮丽的主要地理基础。

南宋杭州的居民区仍保留了坊的名称，但仅标志居民区的方位，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前期封闭式的居住区。其管理单位划分为厢，城内共有九厢，即宫城厢、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左为东，右为西，其厢的划分可能以纵贯全城的御街为界，分东、西两部分管理。杭州城的附郭县为钱塘、仁和两县，前者在西，后者在东，上述诸厢自然分属于两县管辖。两县所管诸厢，除上述9厢外，城外还有4厢，即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城西厢和城东厢，也属两县管辖范围。南宋杭州繁盛无比，“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杭州城的人口当在百万以上，咸淳《临安志》“两赤县城主客户186330，口432046，”显然偏低。不然，“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就不好解释。

纵贯全城的大街亦称天街，是全城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这条大街自大内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沿线商业十分兴盛。也就是说，这条大街“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而且供给禁中食品。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自和宁门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整个杭州城四方辐辏，“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其余坊巷市井……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杭州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市非常兴盛，与“日间无异”。全城有四百十四行。另外，城外也市镇林立，商业兴盛。仅钱塘、仁和两县所管市镇就有15个，即浙江省（嘉会门外）、北郭市（北关门外）、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市、赤山市、龙山市、安溪市、范浦镇市（艮山门外）、汤村镇市、临平市、南土门市（崇新门外）、北土门市（东青门外）等。实际上城南、西、北各数十里，“市井坊陌，数

《梦梁录》卷8《大内》；《武林旧事》卷4《故都宫殿》。

《梦梁录》卷7《禁城九厢坊巷》。

咸淳《临安志》卷19《厢界》。

《西湖老人繁胜录·街市点灯》。

《梦梁录》卷16《米铺》。

《梦梁录》卷18《户口》。

《梦梁录》卷10《防隅巡警》。

《都城纪胜·铺席》。

《梦梁录》卷13《铺席》、《都市钱会》、卷8《大内》。

《都城纪胜·铺席》。

《梦梁录》卷13《铺席》、《都市钱会》、卷8《大内》。

《都城纪胜·市井》。

《梦梁录》卷13《夜市》；《都城纪胜·市井》。

《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

《梦梁录》卷13《两赤县市镇》。

日经行不尽”，城郊尽成市区。并有“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的专业市场，形成专门的经济区域。

由于经济繁荣，城内外文化娱乐市场也到处皆是，成为杭州城市发展的一大特色。当时称为瓦舍，即“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城内外合计有17处（一说20处），最著名的有清冷桥西熙春楼下的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子，市西坊内三桥巷的大瓦子，众安桥南羊棚楼前的北瓦子，盐桥下蒲桥东的东瓦子，其中以北瓦子规模最大。娱乐项目除杂剧外，还有说书、小唱、相扑、傀儡、说经、打谜等，应有尽有。瓦子内又分为许多勾栏，如北瓦子内有勾栏13座最盛，即分门别类的游乐场地。这些瓦子勾栏也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瓦子勾栏既是娱乐场所，也是商业最兴盛的地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杭州园林之盛也达到高峰。杭州最大的园林风景区就是位于城西的西湖，也是全城的主要水源地。西湖旧名钱塘，“湖周围三十余里，自古迄今，号为绝景”。著名诗人白居易、苏东坡等都对西湖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白堤、苏堤就是为纪念他们而命名的。今实测西湖面积6.03平方千米，水面5.66平方千米，周长15千米。西湖风景区山青水秀，景色媚人，群山环抱，一泓荡漾，湖光山色，交相辉映，“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令人美不胜收。“且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摹焉”。南宋统治者也陶醉在西湖秀色之中，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说。南宋时已有西湖十景的称谓，景景相连，各有特色。今天的西湖仍然是全国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

除西湖外，杭州公私园林遍及城内外，最著名的有在城万松岭内贵王氏富览园等10园，城东新开门外有东御园（即富景园）等，城西清波、钱湖门外聚景御园（即西园）等，南山长桥有庆乐御园（即南园）等10园，钱塘门外有凝碧园等9园，孤山路口有内贵张氏总宜园等4园，苏堤有先贤堂园等3园，涌金门外有环碧园（即清晖御园）等4园，嘉会门外有玉津御园等，北关门外有赵郭家园等。各个园林都有自己的特色，尽有河山之胜。大内的大龙池、万岁山更拟西湖冷泉、飞来峰，胜似西湖。

南宋杭州城的平面布局虽不如北宋开封城整齐划一，但也尽量利用群山、河湖、平原等地理优势，使城市布局美观大方、壮丽雄伟，大内的选址就是典型例证。大内位于凤凰山麓，占据高地，俯瞰全城，既控制制高点，又发挥了高台建筑的艺术，殿庭巍峨自不待言。殿前司就设在凤凰山八盘岭上，三省六部在和宁门以北，显然都是依据地形特点有意安排的。

（11）元大都城

《都城纪胜·坊院》。

《梦梁录》卷19《瓦舍》；《都城纪胜·瓦舍众技》；《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

《武林旧事》卷6《瓦子勾栏》。

《梦梁录》卷12《西湖》。

《梦梁录》卷12《西湖》。

《梦梁录》卷12《西湖》。

林升：《题临安邸》。

《梦梁录》卷9《三省枢密谏官、六部、三衙》。

元代的大都城位于今北京市区，今天北京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也就是元代的大都城。它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周长“六十里……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今实测周长 28.6 千米，面积近 50 平方千米。这是刘秉忠依据《周礼·考工记》的理想制度设计的整齐划一的伟大都城。其总体布局也就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由于今北京地区寒风凛冽，北墙只开两门，其他三面均开三门，也大体上符合都城十二门的规定。以宫城南门崇天门、红门阑马墙南门灵星门和大城正南门丽正门之间的南北向御道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十分整齐。元代的大都城虽然也是夯土筑成，但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在夯土中使用“永定柱”（竖木）和“经木”（横木）作为骨架，使城墙坚固异常。

宫城位于全城中部偏南地区，“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砖甃”。面积 0.57 平方千米，略小于今天的明清北京故宫（0.72 平方千米）。宫城南三门，正中为崇天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凡诸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檐脊”，壮丽辉煌无比。宫城内的主要大殿有前后两组，即大明殿和延春阁，均为“工”字形结构，也就是以柱廊与后边的寝殿相连。只是大明殿后的柱廊深 240 尺，广 44 尺，高 50 尺，而延春阁后的柱廊深 140 尺，广 45 尺，高 50 尺，略有差异而已。两座“正衙”均压在中轴线上，其他大殿左右对称布局，共有大殿二三十座。

宫城以西有太液池和西御苑，太液池之阳有琼华岛，元改名万寿山，亦名万岁山。池西有兴圣宫（北）、隆福宫（南），与宫城三足鼎立，隔池相望。太液池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北海和中海。万寿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山顶之上有广寒殿。兴圣、隆福二宫之西就是西御苑，楼台亭阁林立，倒映清池渠水之中，景色绮丽。石假山前有圆殿，“圆顶上置涂金宝珠，重檐，后有流杯池”，别有一番情趣。

三宫之外就是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阑马墙”。这也就是后来明清北京城的皇城。萧墙南门为灵星门，门内即金水河，河上建有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北二百步即为崇天门。

元大都城的街道排列整齐，依《周礼》之制，按经、纬设置，即南北 9 街，东西 9 街。“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其中长街有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24 步为 33.6 米，12 步为 16.8 米，证明大小街道都比较宽畅。正如马可·波罗所说：“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

《辍耕录》卷 21《宫阙制度》，《丛书集成初编》0219。

《辍耕录》卷 21《宫阙制度》，《丛书集成初编》0219。

《辍耕录》卷 21《宫阙制度》，《丛书集成初编》0219。

《辍耕录》卷 21《宫阙制度》，《丛书集成初编》0219。

《辍耕录》卷 21《宫阙制度》，《丛书集成初编》0219。

《辍耕录》卷 21《宫阙制度》，《丛书集成初编》0219。

《元故宫遗录》，《丛书集成初编》3223。

《元故宫遗录》，《丛书集成初编》3223。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远望彼门也”可见街道宽直是大都的一大特色。但由于北风寒冷，所有纵横交错的街道都以东西向的横街为主，而且距离较近，胡同的宽度仅有六七米。今东四北的若干条胡同仍为元代规模。

大都的居民区仍称作坊，也就是被街道所分割的区域。据说共有 50 坊，今见于记载的坊名有福田坊、阜财坊、金城坊、玉铉坊、保大坊等 40 坊。

《北京历史地图集》标出方位的为 46 坊。元代的坊只是居民区的称谓，与宋以前封闭形坊的性质完全不同。大都的居民区主要以胡同命名，整齐地排列在南北向大道的两侧，呈东西向布设，宽约六七米。胡同一名起于元代大都，经考证，即蒙语“水井”的意思，也就是《析津志》中的“弄通”。《析津志》指名“弄通本方言”，即蒙古方言。胡同中的居民点，大体上也是四合院式的庭院。马可·波罗说：“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圃而有余。以方地赐各部落首领，每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这不仅证明元大都规划整齐，街道犹如棋盘，而且居民区为方形，排列也十分整齐，开创了明清北京城四合院居住区之先河。

元大都城归警巡院管辖，有似于今天的市政府，成为中国最早的建制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初设警巡院三，至元四年省，其止设左、右二院，分领坊民事。”尽管大都置大都路和大兴、宛平二县，由二县分管郭下，但警巡院与二县平级，显然大都城由左、右警巡院管辖。

大都城内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但最繁荣的为斜街市（积水潭北侧，积水潭即今什刹海）、羊角市（今西四牌楼附近）、旧枢密院角市（今东四牌楼西南）三处。积水潭为运河码头，斜街市繁华自不待言，而羊角市、旧枢密院角市，也因位置适中，成为货物集散的中心。羊角市一带共有 7 处市场，即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等，实际上是重要的牲畜交易市场。旧枢密院角市则主要为柴炭集市。除上述市场外，还有菜市、珠子市、鹅鸭市、穷汉市、鱼市、车市等专门市场二三十处，都十分繁荣。仅每天进入大都的丝车就有“千车”，“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当时与大都有商业往来的城市有“二百”处，大都为“商业繁盛之城”。

元大都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是继唐长安城之后又一个规模宏大、布局非常规整的城市。而且三宫鼎立，与风景区相结合，独具匠心，充分利用了一切有利的地理条件，显得雄伟壮观，庄严大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郭守

《马可波罗行记》（冯译本），中册第 335 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 70、7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科院考古所等：《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 年 1 期。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北京史大事纪年·北京胡同丛谈》46 页，《北京史研究通讯·增刊》1981 年。

《马可波罗行记》（冯译本）中册，第 339 页《注七》引刺木学本第二卷第七章。

《元史》卷 58《地理志》。

《北京史话》第 71 页。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马可波罗行记》（冯译本）中册，第 379 - 380 页。

敬开辟水源，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供水和漕运问题，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2）明南京城

明南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城垣残存部分清晰可辨。明初定都南京后即开始兴建，把南唐的江宁府城加以拓展，建成规模宏大的南京城，亦称京师。分为宫城、皇城、京城、外城几部分。

京城即今南京城，为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形，南北 20 里，东西 11 里多，周长 67 里，面积 55 平方千米。《明史·地理志》、《大明一统志》记载南京城周长 96 里是不正确的。南京城有 13 门，南 3 门，正门为正阳门；西 5 门；东 1 门；北 4 门。城墙用大石条奠基，完全用青砖包砌，有垛口 13616 个，藏兵洞 200 座，平均高度 12 米左右。城墙依山带水，尽占地利，十分坚固。北起狮子山，南到聚宝山，西包清凉山（石头城），东尽钟山之麓，“皆据岗城之脊”，犹如蟠龙。城内平面布局大体上可分为三区，即军事区、商业区和行政区。

军事区位于全城西部，即紧邻玄武湖的城墙以西地区。这里有十数个军卫和军仓，以密集的岗阜作为凭藉。商业区位于全城中部和西南部，即旧城区和秦淮河沿岸。这一带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店铺多沿街道布设，城中部的成贤街、北门桥，城南部的中大桥、镇淮桥、聚宝门、三山门、石城门一带，都是热闹的去处。城东部的钟山之阳就是皇城、皇宫所在地，皇城之南御道东侧为五部（礼、吏、兵、工、户），西侧为五府，即五军都督府（左、右、前、中、后），只有刑部、都察院在京城北门太平门外以西地区，不在城内。城内东部处于钟山之阳，地势开阔，“以乘王气，殿宇宫阙规模宏壮，象法天地，经纬阴阳”，故以东部为皇宫和行政区。由于明南京城有明显分区，功能各异，街道布局也就各有特点。

当时的街道为分三等，即官街、小街、巷道，三大区相对独立。西东二区与市的联系主要为洪武街和长安街。尽管从皇城南侧的长安街可以向西出西城门三山门，但终究偏南，说明东西联系并不方便。其中以东西向官街与皇城的连系最为方便，体现了以皇宫为中心的布局特点。估计当时路面宽度不少于 20 米，加上两侧官廊和廊外道路，总宽度当不少于 30 米。

南京城的居民区域内“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基本上按职业分类居住。仅城南 18 坊中，就居住有 10 余万手工业工人，包括织锦坊、鞍辔坊、弓匠坊、箭匠坊、铁作坊、银作坊、毡匠坊、杂役坊等。全城由附郭县上元（管东北部）和江宁（管西南部）两县管理，前者县治位于城的中部，编户“二百三里”，后者县治位于城的南部，编户“三十六坊厢，七十四里”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大明一统志》卷 6《南京》。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明太祖实录》卷 135。

叶骁军：《中国都城发展史》第 253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明史》卷 40《地理志》。

，可见并非城内置坊，近城置厢，离城较远才置里。明代南京城还设置五城兵马司，目的是“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后来还兼理“市司”。永乐以后才专理“刑名盗贼，如两京知县”，证明明代的五城兵马司管理的事情很多，接近于今天的市政机关。中城兵马司在内桥北（城中部），东城兵马司在太医院南（皇城东南），西城兵马司在三山门外，南城兵马司在聚宝门外，北城兵马司在鼓楼北（神策门西南）。

宫城和皇城的选址，既要讲求“风水”，选在钟山之阳，又要避开市区和亡国之宫，就只能选择在城的东部。这里本来有燕雀湖，亦名前湖，为了修宫城而填平此湖，后来大殿地基下沉，后果十分严重。宫城亦名紫禁城，设置六门，即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宫城内有前三殿和后二殿，均压在南北中轴线上。前三殿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后二殿为乾清宫、坤宁宫。其余大殿以中轴线为中心，对称布局。后来改建大内，又在午门之南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宫城之外为皇城，设置四门，正南门为洪武门，正对正阳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

明初为了南京城的安全，还修建了外郭土城，“因山控江”，把南京附近的所有高地都圈入城内，“周回一百八十里，别为十六门”。实际上大约120里左右，今仍可根据城门名称复原其范围。

明初崇尚节俭，南京园林较少，最著名的有漆园、桐园和棕园，均位于钟山之阳。私家园林主要集中在今中华门内西南隅，即凤凰台、杏花村一带。这一带宋时为教场，又有低地清水可用，故私家多在此造园。

（13）明清北京城

明清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唯一继承首都地位的城市，集中国都城建设之大成。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筹建北京宫殿城池，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告成”，历时15年，正式定都北京。明代的北京城也就是元大都城的改建，北墙南缩5里，南墙向南展出2里，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重建了宫城和皇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修筑外城，仅筑成南侧一面。至此，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已经构成，即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

《大明一统志》卷6《南京》。

《明史》卷74《职官志》。

《大明一统志》卷6《南京》。

嘉庆《一统志》卷73、74《江宁府》。

《明史》卷68《舆服志·宫室制度》。

《明史》卷68《舆服志》。

《明史》卷40《地理志》。《地理志》所记宫城、皇城门名称错乱。

叶骁军：《南京明宫城门名考辨》，《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明史》卷40《地理志》；《大明一统志》卷6《南京》。

《大明一统志》卷6《南京》。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

《明史》卷40《地理志》。

《明世宗实录》卷395、396。《明史·地理志》二十三年误。

宫城即紫禁城，也就是今天北京明清的故宫，位于内城中部偏南地区，周长六里一十六步，南北长 960 米，东西宽 760 米，面积 0.72 平方千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宫城设置八门，南五门，即承天门（清改为天安门）、端门、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玄武门（清改为神武门）。宫城内压在中轴线上的有七座主要建筑物，以乾清门为分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即前朝后庭。前三殿为奉天殿（嘉靖四十一年改为皇极，清改为太和）、华盖殿（同上改为中极，清改为中和）、谨身殿（同上改为建极，清改为保和），后三殿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宫城周围有护城河，宽达 52 米，称为御河（清称筒子河）。清代紫禁城的建筑物多有重建，名称也有变迁，但基本上维持了明代的规模。

皇城在宫城之外，周长十八里有奇，缺其西南角，南北长 2.75 千米，东西宽 2.5 千米，面积 6.87 平方千米。东部为宫城，西部为西苑（元为西御苑），中部为太液池（即元太液池，增开南海）。皇城有六门，“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西转曰长安右”。清改大明门为大清门，北安门为地安门。

内城即元大都城改建而成，周长 45 里，9 门，东西长 6.65 千米，南北宽 5.35 千米，面积 35.57 平方千米。正南为正阳门（即前门），左崇文门，右宣武门；东之南为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之南为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之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

嘉靖时筑“重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门七，正南曰永定，南之左为左安，南之右为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清称广安），西之北曰西便”。今实测东西长 7.95 千米，南北宽 3.1 千米，面积 24.49 平方千米。内、外城面积合计为 60.06 平方千米，大于明初的南京城，在中国首都中，仅次于唐长安城、北魏洛阳城为第三大城。

北京内外城的街道格局，以通向各个城门的街道最宽，为全城的主干道，大都呈东西、南北向，斜街较少，但内、外城也有差别。外城先形成市区，后筑城墙，街巷密集，许多街道都不端直。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也多以城门命名，如崇文门大街、长安大街、宣武门大街、西长安街、阜成门街、安定门大街、德胜门街等等。被各条大街分割的区域，又有许多街巷，根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统计，北京内、外城及附近郊区，共有街巷村 1264 条左右，其中胡同 457 条左右。比较而言，以正阳门里，皇城两边的中城地区街巷最为密集，达三百余条。这是由于中城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全城的中部，又接近皇城和紫禁城，人口自然稠密。

居民区仍以坊相称，坊下称铺，或称牌、铺。居民住宅就是典型的四合院。中城区（正阳门里，皇城两边）有 9 坊，68 铺；东城区（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有 5 坊，朝阳、东直关外，郑村霸，37 牌，199

《明史》卷 40《地理志》。

《明史》卷 68《舆服志》；《日下旧闻考》卷 34《宫室》。

嘉庆《一统志》卷 2《京师》。

《明史》卷 40《地理志》。

嘉庆《一统志》卷 2《京师》。

《明史》卷 40《地理志》。

坊；西城区（宣武门里，街西往北，至城墙并西关外）有4坊，河漕西，朝天宫西，阜成、西直关外，20牌，101铺；南城区（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新城内外）有8坊，49牌，247铺；北城区（北安门至安定、德胜门里并北关外）有7坊，安定、德胜关外，90铺。全城及附近郊区共有33坊，106牌，705铺。以北安门街和棋盘街（正阳门里）为界，以西属宛平县管辖，以东属大兴县管辖。西城全属宛平，东城全属大兴，中、北、南三城两县分治。其中宛平县有坊13，胡同312条。由此可见，明代北京城西部坊少胡同多，东部恰好相反，坊多胡同少。

明代北京城除设置二县外，还设置与二县地位相当的五城兵马司，名为专理“刑名盗贼”，实际上其行政职能已接近今天的市政机构。中城兵马司在仁寿坊（东安门外东北），东城兵马司在思城坊（东安门外东南），南城兵马司在城外正阳街，西城兵马司在咸宜坊（西安门外西南），北城兵马司在教忠坊（北安门外东北）。

清代时北京的坊、街、巷、胡同多有变迁和易名，但大体沿袭明代规模。其管理除仍置宛平、大兴二县外，则划归八旗驻防。正黄旗居德胜门内，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分为左右二翼。

北京的市场沿街道布设，但形成几个主要的市场区。明初的市主要集中在皇城四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钟鼓楼，以及朝阳、安定、西直、阜成、宣武门附近。因为明初为了招商，在上述城门附近修建了民房、店房，称作“廊房”。从廊房的分布可知，商业市场区主要在城的西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区不断增多，而且地区分布也有变迁。最主要的有正阳门里棋盘街、灯市、城隍庙市、内市和崇文门一带的市场十分繁荣。大明门（皇城南门，清改为大清门）前棋盘街，“百货云集”，由于“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一派热闹景象。这显然是位置居中，又接近皇城、宫城和政府军、政机关，来往人多，商业自然繁荣。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街西，互二里许。南北两廛，凡珠玉宝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俱高楼……市自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罢”。在开市之日，“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闾城溢郭，旁流百廛”，也是热闹异常。清代的“灯市在东华门崇文街，今亦在琉璃厂”，可见，明清两代的灯市也在不断变迁，并非固定在一个地方。东华门外的灯市，今名灯市口（东西向街），琉璃厂在外城，

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沈榜：《宛署杂记·分土街道》。

沈榜：《宛署杂记·分土街道》。

《大明一统志》卷1《京师》；《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图》。

嘉庆《一统志》卷1《京师》。

刘德岑：《古都篇》第257页，西南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日下旧闻考》卷43《城市·内城中城一》。

《日下旧闻考》卷45《城市·内城东城一》、卷61《城市·外城北城》。

《帝京景物略》卷2《灯市》。

《日下旧闻考》卷45《城市·内城东城一》、卷61《城市·外城北城》。

也是一条东西街。以上所说的东华门，应为东安门，因为东安门外才是王府街。城隍庙市在西城西南隅，即今复兴门里以北，“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西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之旧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匣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证明这里是明清北京城的古董市场，规模宏大，生意兴隆。内市是皇亲贵族购物的市场，位于“禁城（紫禁城）之左（东），过光禄寺（东安门内街北）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三日，俱设场贸易”。也就是说，内市在东安门里，每月有三天的交易时间，多为高档商品，有貂皮、狐皮、平机布、棉花、酒、宝石、金珠、药材、犀象等。崇文门为里城南墙东边城门，为北京诸城门中征税最多的一处。尤其是万历初年规定，凡进城货物一律“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使崇文门一带也形成一个繁华的市场区。明清两代，运河进城也只有崇文门一线，水路交通方便，商业自然繁荣。清代时崇文门额征正税银 94483 两，为各个额征点之冠，就是典型例证。

西苑位于西华门之外，也就是元代的西御园。“西华门之西，为西苑。榜曰西苑门，入门为太液池。”“自金盛时，即有西苑太液池之称。名迹如琼华岛广寒殿诸胜，历元迄明，苑池之利相沿弗改，然以供游憩而已。”也就是说，西苑是皇帝游乐的场所，殿亭楼阁与太液池交相辉映，景色壮丽。清代进一步开发，并成为皇帝召见王公大臣和接见外宾的地方，像惇叙殿、涵元殿、瀛台、紫光阁等都成为皇帝休息和进行国事活动的场所。太液池也就是今天的北海、中海和南海，南海为明代所开凿。今天北海已经分出，中南海也就是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即南海的宝月楼。

清代北京的风景区也就是西郊的三山五园。三山即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五园即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杨春园、清漪园。圆明园之东有长春园，长春园之南有绮春园（后改万春园），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风景区，具有 108 景。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等被英法侵略军付之一炬。今天位于北京大学西墙外的圆明园遗址，仅有长春园西洋楼石雕清晰可辨。清代末年，西太后动用海军军费在清漪园旧址上修建了颐和园，也就是现存的北京西郊最大的园林风景区颐和园公园。

中国的都城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平面布局的特点十分明显。

首先是整齐划一。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导思想，上述著名都城的平面布局，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尤以邺城、长安、北京最为明显。

其次是中轴线纵贯全城。中轴线起源于人们的对称概念，以及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也为都城的整齐划一提供了条件。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元明清的北京城，中轴线都伸延很长，把全城一分为二，左右对称布局。

《帝京景物略》卷 4《城隍庙市》。

《日下旧闻考》卷 4《皇城》。

《明宫史·木集·宝和等店》。

《明史》卷 81《食货志》。

嘉庆《一统志》卷 3《京师》。

《日下旧闻考》卷 21《国朝宫室·西苑》。

嘉庆《一统志》卷 4《京师》。

第三是宫殿为主体结构。皇宫占据全城的关键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而且有宫城相护卫，使皇宫成为全城的主体。宫城不仅与居民区分离，而且宫城的布局也以正殿为主体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开，井井有序。

第四是宫殿建筑高台化。中国都城的宫殿无不修建在高台之上，除防潮外，主要是为占据制高点，维护皇宫的安全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高于一切。汉、唐长安城的宫殿位于龙首原上，元明清的宫殿人为地建造在高台之上，都是明显的例证。

2. 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平面布局

中国县级以上的城市数以千万计，平面布局也不具一格，下面仅介绍一些著名城市的平面布局，就可见一斑。

（1）战国时代的成都城

关于成都的得名和建城时代，目前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成都建城在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蜀之后，即公元前311年。这一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闾，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西汉时“州治太城，郡治少城”。由此证明成都有两城，也就是太城（大城）和少城（小城）。据说大城在东为官舍区，小城在西为商业区。如果此说不错，则成都的平面布局分为东西两部分，即东部为官府衙门，西部为商业市场。但成都县位于少城，可见少城并非没有官府衙门。按照《华阳国志》，成都城应为内外结构，即中间为小城，外面为大城，最早的官府衙门和商业市场均在小城之内。考古发掘证明，秦咸阳的宫殿区在原上，手工业、市场、居民区主要在原下。成都“与咸阳同制”，其布局特点当也相似，而大城只是护卫小城的防御工程。

（2）汉河南县城

汉河南县城位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它是在东周王城遗址的基础上重建的。城为方形，只有西城墙随涧河的曲折而向内凹，西北角成为抹角。城基周长5.4千米，中部遗迹属西汉，东部遗迹则多属东汉。从遗迹可知，城的中部可能是衙署区，中部以外则为居民、手工业和市场区。尤其是东部出土了许多铁农具、手工工具、纺轮、车器、石磨、杵臼等，显然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的居民区。

（3）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汉代古城

古城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南45千米处，接近方形，面积0.23平方千米。此城可能是汉代的一个军事城堡或县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既可控制北通阴山的孔道，又是发展农牧业的良好场所。城四面有门，但并不对称。城的西南隅利用大城西墙、南墙筑有小城，占有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小城东北角发现大型房基，可能是官署所在，恰好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区。大城内则

朱玲玲：《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的特点》，《历史地理》1986年第4辑。

《华阳国志》卷3。

谭继和：《成都城市历史概述》，《成都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9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39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为居民、手工业区，有无市场不得而知。

（4）汉定襄郡城

汉定襄郡城，也就是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 10 千米的土城子遗址。古城东西 1.55 千米，南北 2.25 千米，面积约 3.48 平方千米，西南部被宝贝河冲毁。城中部有所谓“皇城”、“煤山”等较大建筑遗迹，可能是当年的郡治所在。“皇城”有城墙，恰好位于全城的中央。在城的东南隅，发现两处窑址，并有大片居住遗址，文化层次叠压，证明为人类长时间居住的地区。

（5）秦汉吴县城

秦汉吴县为会稽郡治，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吴县城是在春秋吴国都城吴城的基础上重建的，大体上就是吴子城，周回五里，位于今苏州城的中部地区。秦统一六国后，吴县为会稽郡治所，城内新建了郡守衙门和吴县县署。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刘邦封刘贾为荆王，以吴县为荆国都城。由于子城范围太小，刘贾又在子城北市坊之西另筑小城，名曰“定错城”，东南与子城相连，北面直达平门，供王室贵族居住。秦汉时代在子城东北、西北辟有东、西两市，作为专门的商业区。东市在今临顿路和干将路联结点附近，西市在干将路西端和乐桥附近。这两处市场成为全市经济活动的中心。

（6）秦汉历城县城

秦汉历城县是一座纵横各约五六百步的方城，即今济南市的雏形。据孙进之先生考证，城开四门，均居中，东西、南北二门各有贯穿城区的大街相通，合看正成“田”字形。秦汉历城县城由历下古城堡发展而来，具有军事据点的性质，形势险要是选择城址的首要条件。县城夹河而立，靠山面湖，凭借天险，便于防御，但是复杂的地理形势却给以后布设新城区增加了困难。在局部区域内固然可以产生像秦汉历城县城这样严正对称的布局方式，可随着城区的不断展开，为顺应地形特点、河流湖泊等，城区布局必然日趋复杂和不规则。

（7）两汉宛县城

两汉的宛县为南阳郡治，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市。两汉南阳城是在秦代南阳郡城的基础上，经过高祖六年、建武十八年复修而成。《新修南阳县志》云：“南阳故郡城，秦建，汉曰南都”。又说：“宛城在县北旧郡城内”。酈道元《水经注》说，淯水“又南径宛城东……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今南阳郡治大城”。《括地志》也说：“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依据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宛城有两重，外城，即郡城，有“大城”、“郭城”之称。内城，即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隅。大城小城是相联结的，小城的西南两面都是大城。这种布局，和当时的临淄、邯郸等名城大体相似。小城是贵族和官僚的住所，大城则是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在郡城的北部。依据考古发掘可知，今环城乡小北关村附近为汉代铸钱作坊，汉代的冶铁作坊位于今天的汉冶村周围，总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在汉代冶铁作坊的南侧，为汉代的制陶区。手工业作坊聚集的汉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 63 页《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 69—74 页。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孙进之：《济南山水古迹考》，《济南市志资料》1981 年第 1 辑。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代宛城东北隅，同时也是汉代宛城人口的密集区，汉代宛城的商业区，也一定距此不远。

（8）魏晋南北朝历城县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水以东，修筑东城，与秦汉历城县城隔河相望。为顺应历水走向，并受东南山水冲沟的限制，东城为一长方形。所以采用双子城的格局，可以从两方面寻找原因。首先，座落在历水和泺水之间狭小地带的县城，城垣扩展的空间余地很小，跨河而城也不必要。其次，当时济南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战事频繁，双子城的格局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在战斗中可以相互呼应，彼此支援。《水经注》记载，北魏济南郡城外还有郭。公元468年，魏将慕容白曜围攻济南城，过了一年才攻下东郭，可见郭也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工程，但限于史料，城和郭的结合关系已不得而知。根据“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原则，两座子城内应以官衙和驻军为主，而外郭则是工商业者等平民百姓的居住区。但城区布局的详细情况已无从查考。

（9）魏晋南北朝晋阳城

西晋时，并州刺史刘琨在“府寺焚毁”的旧基上重建州城，周回27里，中有府、市、狱等建筑，也包括了春秋晋阳城的城基。北齐至隋晋阳城中出现了三组内城，即晋阳宫城、大明宫城和仓城。北齐高欢时建造的晋阳宫城，位于晋阳城西北部，周回7里左右，建造的目的是“以处配口”。晋阳宫城占据高亢之地，是晋阳城中最辉煌的建筑。据记载：晋阳宫南门曰景明门，次北曰景福门，门内景福殿、殿后门曰昭德门，次西昭福门，次西寝殿曰万福殿、殿北曰玄福门，又北曰玄德门，又北即玄武楼。殿西曰西闸门，次西曰威凤门，殿东曰东闸门，又一门昌明门，殿院东少阳院、殿西射殿、次西院太液池亭子，有宣德殿、崇德殿等。大明宫城位于晋阳城南郭，据记载晋阳宫“南面因大明城”。大明城周回4里左右，为北齐后帝所建。仓城位于晋阳宫城之西，周回8里，隋开皇年间筑。唐代以前晋阳城在布局上，以晋阳宫城为中心形成政治区域，文献记载，北齐时晋阳宫景福门西边是中书门下省，再西是内侍省，内侍省后是嫔嫱院、内库。仓城建在宫城之西，除了便于控制外，地势较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与隋洛阳含嘉仓位置靠近宫城相同。晋阳城有一个大的外城，内有晋阳宫城、大明宫城、仓城等，从城垣布局上看构成一座套城。一般居民散布于外郭城是没有问题的，也有固定的市场，但其分布地点已难确指。

（10）唐代广州城

《唐大和尚东征记》中称“州城三重”，即南城、子城及官城，大约相当于今广州市越秀山以南地区。自珠江岸登陆即为南城，穿过南城区即为子

《南阳城市历史地理述论》（油印稿）。

《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北齐书》卷2《神武帝纪》。

《永乐大典》卷5204《太原志》引《晋阳记》。

《元和郡县图志》卷13。

《永乐大典》卷5204《太原志》引《晋阳记》。

《永乐大典》卷5204《太原志》引《晋阳记》。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城，再入古越王宫的官衙区即为官城。清海军门位于番、禺二山间，形势险要，门外即为商业区，直至江边。今财政厅为隋唐广州刺史署，后为南汉宫殿区。今天的北京路即为唐城主干道，从刺史署直达江边。与此路相交叉的今东西向中山路，也是唐代以前的东西干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城西形成蕃坊区，成为外来商人居住和经商的主要场所。蕃坊的范围北到今中山路，南达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西城之西墙），东达解放路。在蕃坊内可以列出的街名有光塔街等 11 条。唐设置“岭南市舶司”，管理蕃坊事务。

（11）唐代泉州城

唐代的泉州城位于今泉州市区，为方形，周长仅 3 里，面积很小，设有四门。城内有东西、南北十字街，以钟楼前的十字路口为中心，政府机关设在钟楼以北地区，即唐“六曹新都堂署”。谯楼故址（北鼓楼）也就是唐代州治的所在。晋江县治位于城的东南部。工商业区位于十字路口钟楼以南坊内，称东坊、西坊。由于城北地势较高，政府机关设在城北，市场在南，呈前市后朝格局。这是泉州市区内最早兴起的城市，为今天的泉州市奠定了基础。

（12）唐代武昌城

唐代宝历初年修筑的武昌新城，不仅包括了夏口故城所在的整个地域，而且向东、向南有较大扩展，但城内房屋破乱不堪，街道坎坷不平，城内建筑、城区布局并没有大的改观。州吏将佐的官署和住地，因地势低洼，难免渍涝之患。唐代舒元舆《鄂政记》记载：城内“土势大凹凸，凸者颇险，凹者滞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议制度。”后来削凸堙凹，整修街道，扩宽闾巷，疏理沟渠，调整城市平面布局，“南面北向立射侯军容佐，西翼东向立牙门料将院，东翼西向立门佐六椽院”。城区布局的主体——射侯军容佐、牙门料将院、门佐六椽院等均为军事机构或军事设施，表明唐代的鄂州城（即武昌）主要是一个军事性城市。鄂州当时驻扎军队 3 万，为避水患，军队移驻武昌城东门外，选择高亢之地，修建营房 1500 所（合 3000 间），使东门外的城市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所以把军营设在城东，是因为武昌城三面环水，惟有向东陆地面积较广，地势也较平坦，既能防潮避水，又提供了充足的营房用地和军训用地。一般平民的住地，布设在城内北区，因为城南、东、西三面均为行政官署，及将佐府第，与平民住地严格区分。由于坊制的严格限制，城内市场深受抑制，当时武昌城的市场位于城南门外的套口附近，宋代的南市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武昌城的州署帅府也多以蛇山为依托，既高亢清爽，又能控制制高点。

（13）唐代苏州城

唐代的苏州城水陆交通便利，全城被划分为 60 坊。唐陆广微《吴地记》详细记载了各坊坊名。其中干将、吴趋、嘉鱼、黄鹂等坊是主要的居民区和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 223—237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乾隆《晋江县志》卷 2《规制志·旧署》。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新唐书》卷 174《牛僧儒传》。

舒元舆：《鄂政记》。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商业区。坊有围墙和坊门，由坊正管理。唐代的苏州东西两市仍在干将坊和平权坊（今大石头巷、乐桥之西一带）。由于人口增多，苏州的街巷日趋密集，“城中大河三横四直，郡郭三百余巷”。这些坊市、河道、街巷交错并行，形成了苏州独特的城市风貌。城中央的子城仍是郡守衙署所在地，是全城建筑的中心，只是子城四面城墙上新建了门楼，显得格外壮观。唐代苏州城市建设虽然超过了前代，但距子城较远的南北两端仍然是空闲地和农田。唐安史之乱暴发后，苏州城池也毁于战乱。唐末，刺史张搏重修城池，形成“亚”字罗城，南北长12里，东西宽9里。后来，吴越占据苏州，重修苏州城，以砖砌筑。新修的砖城高二丈四尺，厚二丈五尺，里外都有濠，不仅保持了“亚”字形的格局，而且使苏州城曲折迂回，水环河绕，固若金汤。

（14）唐代晋阳城

唐代晋阳城跨汾河而建，由西、东、中三城组成。从军事防御角度看，西、东二城跨河相连，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整体防御能力。从城市总体布设的形式上看，三城呈“回”形，中城在汾河之上，建有城楼、阁等，所谓“双城汾水流”，城市的自然景观与人工建筑浑然一体，增加了城市布局上的优美景观。

唐代晋阳三城共有24座城门，但能确指的有西城东北门名大夏门，东南门名延夏门，东有东阳门，北有玄德门，西有西门，此外西门有一水门，为晋水入城之通道。

唐代晋阳城与当时许多城市一样，城内采用坊市布局。城内各个地域之间界限分明、条块分割，高墙将坊与坊、坊与市之间彼此隔开。以街鼓为号，坊门、城门的开启关闭均有一定时限和规定。城中设有固定的市场，《资治通鉴》记载，僖宗乾符五年（878年）“昭义兵大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但市场位置已不得而知。

唐代晋阳三城在布局和功能上都不同。西城历史悠久，缺少总体规划，城市街巷窄小，难于分辨方向。据记载，北周军队攻晋阳，入东门，周武帝“崎岖仅得出”。西城是唐代晋阳城的主体，政府衙门机构主要集中于此，如河东都虞侯、并州长史等衙门，也是晋阳县治所在地。晋阳宫居城西北，唐代称“宫城”，仍是北都的政治中心。《资治通鉴》记载，李渊曾诏人密谋起兵，“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起兵后命齐王元吉“留守晋阳宫，后事悉以委之”。东城是太原县治所，中城是联结西、东二城的纽带，也称连城，即“跨水连牒”。中城跨汾河之上，由楼、阁、桥梁组成，水从中城流过，仿佛“吴阊”。中城直接沟通西、东二城的“巷市”、外郭，将隔河二城连结在一起，实际上是一座以桥梁为主的过渡城市。

（15）唐代扬州城

唐代的扬州“雄富冠天下”，有“扬一益二”之称。蜀冈上的小城称为“子城”或“街城”，在蜀冈下修建了商业大城，称为“罗城”。

光绪《苏州府志》卷4《城池》。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张南史：《送郑录事赴太原》，雍正《山西通志》卷223《艺文》。

《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条。

《北齐书》卷11《安德王延宗传》。

雍正《山西通志》卷223《艺文》。

子城仍沿用隋江都宫城，为军政机关所在地。城为曲尺形，环以深濠。衙署多设在城的中部，今子城遗址中心偏北处有一方形遗址，相传为唐帅牙所在，也是隋以前的官署旧址。街道多为东西、南北向，今遗址内的测字街村，正好是十字街的音转。今天东西向大道两端仍称东华门、西华门。

罗城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东西 3.12 千米，南北 4.2 千米。以运河和街道为框架，使罗城的平面布局井然有序。《梦溪补笔谈》记载的城内主要运河有南北向的两条和东西向的一条。纵贯南北的两条运河，据考证一条直对衙城南门、偏于宋大城之西，宽约 30 米，即官河；一条直对衙城东濠，纵贯宋大城南、北两门，宽约 15 米；东西向的一条紧邻蜀冈与古邗沟交汇东去，这三条运河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罗城有南北大街 6 条，东西大街 14 条，主要大街贯通城们，形成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今已探出罗城南门 3 座，西门 2 座，东门 1 座，北门 1 座。街道与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河道相平行，形成水陆并行的交通体系。

这种水陆交通网络把罗城分割成许多坊里。今天，仅从出土的唐人墓志来看，扬州的里坊分别由江都、江阳、扬子三县管辖。同时由于商业的发展，已突破城墙的限制。在城区，江阳尽有城内官河以东坊里，如端芝里、布改坊、崇儒坊、仁凤坊、延喜坊、文教坊、庆年坊、通化坊、孝儒坊、瑞改里、集贤里、来凤里、太平坊、会义坊等；江都县尽有城内官河以西的坊里，如赞美里、会通坊、通润坊、安邑里、崇义坊、怀德坊等。城郊的坊里主要设置在古运河沿线和驿道近旁繁华地区。罗城东郊运河南岸有属于江都县的弦歌坊、道化坊、临湾坊，北岸有属于江都县的章台乡和归义乡；罗城西郊，有属于江都县的来凤坊，属于扬子县的凤亭坊等。

唐代扬州的市场开始沿街布设，并且和里坊相连，有“十里长街市井连”之称。当时最繁华的是罗城的两条 10 里长街。一条东西走向，自禅智寺（城东墙北段外）月明桥抵西水门一带，长约 4.4 千米；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即指此街。另一条是与官河平行的商业街，起于罗城北壁，一直到南门，长约 4.2 千米。贞元时，侨寄衣冠工商业者在此侵衢造屋，行旅为之拥弊。与此同时，扬州的市场也扩展到郊外，尤以运河沿线最为繁华。

（16）唐宋济南城

唐为齐州，宋称济南府。唐元和十五年改筑的齐州城，城内保留了秦汉历城县城，称为“子城”，城市形态也由原来的“双子城”演变成“母子城”。沿袭以前的布局，州、府衙门在原来东城的范围内。当时的大明湖称“西湖”，就是相对州、府衙署的位置而言的。大明湖的形成深刻影响了城区布局，使之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

由于大明湖为城内之湖的独特魅力，城市园林建设和分布的重心由近郊转移到城内。特别是北宋曾巩在济南做官时，致力于开发济南的风景区，使济南的城市园林别具一格。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齐州城内出现商业市场。唐宋以前济南城内有无市场不得而知。到北宋，济南城内市场已相当繁华。

王勤金：《述论运河对唐扬州城市建设的影响》，《扬州文博》1992 年 1 期。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 12《江北运河一》。

《扬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三齐记》：“历下城俗呼子城”。

但限于史料缺乏，我们不能指明市场的具体位置，有可能是店铺沿街布设形成街市。

（17）宋代广州三城

宋灭南汉时只有唐子城一座，后来不仅维修这座子城，还修建了东、西两城，这座子城被称为“中城”，这就是宋代的广州三城。

宋中城比唐子城大，沿袭南汉兴王府修筑，并把南汉时凿平的番、禺二山包入城内。其范围大致北到中山纪念堂，西界西湖，东界文溪正流，南抵珠江岸边，为南北向的不规则形。中城内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即衙署区和商业区。北部为历代官衙所在，包括越王宫、南海郡和广州府治均设在这里，以今省财政厅为中心。具体说来就是今惠爱街（中山四路）以北地区。南部为商业区，以双门底为中心，直到西湖路附近。珠江沿岸即大市所在，也就是沿江商业区，包括河边码头，位于今惠福路一带。

宋东城即古越城遗址。东城的范围较小，紧附于中城之东，其东界至于番禺县学，即今农民讲习所西侧。因中城无郭而修东城，主要为官舍区。东城以番禺县署为中心，形成“丁”字形干道，东西干道直通中城，署前南北干道即德政街，向南直达城外。

由于中城以西形成繁华的商业区，故修西城。西城西界与今西濠相当，东界与西湖相当，北界与天濠街相当，南界与玉带濠相当。也就是说，西城大于中城，较之中城，其北界、南界均向外展出。周长6千米多，与文献记载的13里大体相符。西城为商业区，交通方便。街道格局与中、东城不同，呈方格状，以东西向的大市街与中城贯通。西城内蕃汉杂居，蕃商中以蒲姓巨商最为富贵，其中部有蒲宜人巷就是证明。该巷附近还有蕃巷等街巷。蕃商居室豪华也是西城的一大特色。

南宋时沿珠江一带又形成新的商业区，故筑南城，亦称雁翅城。南城紧附宋三城之南，为明代的广州新城奠定了基础，由高第街到卖麻街大致都属于它的范围。见于记载的有高第街、濠畔街、清水濠街、卖麻街、东横街、西横街、状元街（通泰坊）等。

（18）宋代泉州城

北宋时泉州城南一带已形成供外商居住的“蕃坊”，建有清净寺，接近码头和仓库区。南门内闾闾坊，连同唐代市场，“贾肆皆聚于此”，十分热闹。蕃坊之南聚宝街一带也是繁华的商业区。政府机关在子城（即唐城）北部一带，“州治在双门正北”，双门即城中部偏东处的十字路门，因有东、西二门，故名。其他官衙也设在州治附近，府治在州治东，晋江县在府治西，市舶司在府治南，节度推官厅、录事参军厅在州治西等等。由于商业发展，人口增多，北宋在子城外修筑罗城，南宋又在罗城南加筑翼城，市区不断沿晋江向南伸延，城周30里，80余坊，人口50万。

（19）宋代扬州三城

宋扬州三城主要指南宋的堡砦城（后改为宝祐城）、夹城和宋大城。堡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275 - 297页，281页《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乾隆《晋江县志》卷2《规划志·坊亭》。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砦城在蜀冈之上，宋大城位于蜀冈下的平原地带，二者相距 1 千米左右。冈下的夹城以长桥把二者联系起来，形成两头大、中间细似蜂腰的平面格局，故称为“蜂腰城”。北宋时，由于江岸南移，冈下平原广阔，城池重心已完全移到蜀冈之下。宋室南渡后，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先后在蜀冈上筑堡砦城和宝祐城。并筑夹城联结冈上、冈下二城。后来李庭芝为控制平山堂这一制高点，又筑大城包平山堂于城内。

蜀冈上的宝祐城是截唐子城西部改筑而成的略成正方形的城池。它的四周围有宽达 100 米的深濠，城垣也十分坚固。根据考古资料和《宋三城图》，设有五座城门和一座水门。城内有三条主干道，一条东西向和一条南北向道路仍沿用唐代道路。北城一条东西向的街道是新辟的道路。城内多为营寨，居民和工商业很少。

平山堂城在宝祐城西门南缘外，平面略呈圆形。从《宋三城图》可知，它有高墙和深濠各两重，外有月河围绕，城墙上有敌台。城内除营寨、仓库等设施外，还有一些居民区和工商业区。

夹城在宝祐城正南 150 米，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城。南北长约 2 里，东西约 55 米，四周有 100 米宽的深濠。城内与城门相连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道，南北两门有长桥与冈上城池及宋大城相通。

宋大城本名州城，位于夹城之南。平面形状为南北长、东西狭的长方形。北以柴河（今漕河）为界濠，东、西两面又以运河为城濠，城墙砌以青砖，十分坚固，共有城门 7 座。从图中还可见城内有连接东西和南北四门的两条干道，相交于开明桥东，把城区分成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部分。市河连接南北水门，与南北街道平行，纵贯西城。同时四个区域中心又有十字街交叉，并与不规则的街巷相通，形成扬州城内街巷曲折、密集的特点。城内西北区，主要为州衙等官署所在地，西北角还有许多军寨，如水军寨、装发营等，这与当地地势较高、便于防守有密切关系；西南区主要为文化教育机关，有教授厅、密儒坊、城隍庙等，沿城墙及市河附近为营寨、仓库所在地；东北区沿东西、南北大街分布着众多的酒楼、坊、市，为繁华的居民区和工商区；东南区中沿两条主干道也是繁华的工商、居民区。

宋代扬州城的功能分区十分明显，蜀冈上的城池只是军事堡垒，而大城的西北部为官衙所在，西南部则为文教、寺庙等，而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则沿东西、南北大街布设，已完全成为开放式的城市。城市重心向东部转移，也同运河东移有密切关系。

（20）宋代平江城

平江是南宋时苏州的名称。今存宋平江城平面图——《平江图》碑，高 2.48 米，宽 1.4 米，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 年），郡守李寿鹏所作，吕挺、张允诚、张迪刻石。《平江图》采用裴秀的制图六体，是我国最详细准确的城市平面图，为我们研究宋代平江城的布局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宋平江城是平江军、平江府及吴县、长洲县的驻地。从宋刻《平江图》来看，平江城有大城和子城。大城是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大修后的面貌，南北长约 4.5 千米，东西宽约 3.5 千米，周长约 16 千米，面积约 15.75 平方千米。城垣高二丈四尺，厚三丈五尺，因袭五代吴越城规模。宋平江城共开 5 门，门上有楼。东门为娄门、葑门，北门为齐门，南门为盘门，西门为闾

门，其中盘门设有瓮城。城西南的胥门因废弃改建为姑苏台。城墙四周还筑有向外突出的马面，墙外就是宽阔的护城河。另外，还有各城门旁的水门与城内的河道相通。

平江府所在的子城，仍修筑在阖闾子城的原址上。子城呈长方形，南北长 1.5 千米，东西宽 1 千米，周长约 6 千米。子城城墙与大城城墙平行，墙身里外，雉堞全用砖砌，南对平桥，北望阊桥，东临贤至桥，西近金母桥。子城的布局沿袭了唐代建制，分大厅、住宅、公干和郡圃四个部分。宅堂后是大花园及绍兴十四年（1144 年）王映重建的“齐云楼”，左右侧是府军政机构及库房、作坊、校场等。

平江城内道路为方格形，主要道路成井字或丁字形，纵贯的直街 7 条，西城 4 条，东城 3 条。其中以比较居中、靠近子城的第四直街（今人民路）最为繁华，是全程的干道。第四直街北起香花桥，南对报恩寺。此街乐桥东西有东市和西市。乐桥以南至饮马桥之间有市楼 5 处。饮马桥南是沧浪亭、韩园和府学。第四直街，从北到南，有许多“河桥、塔、坊、楼、庙宇、商店和园林建筑物，左右前后，错落布置，变化多端，组成立体轮廓极为丰富的城市街景”。以第四直街为枢轴，向东西两侧延伸，则直街的繁华程度递减。如第五直街（今临顿路）兴起较晚，北端的临顿桥一带，晚唐时“旷若郊野”。第七直街（今谷仓街）已临护城河，是军营所在。城内横巷多濒河修建。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把全城分割为大小不等的居民区，称作“坊”，宋时有坊 60。北宋时期，坊制衰落，许多坊名逐渐被巷名所取代。从平江图碑看来，大多数坊都横跨大街，显然是一个地区的名称而已。横巷既然是居民住宅集中区，因此也形成一些商业性大街。但这些商业性的横巷，因缺乏支巷，其吸引范围远不及南北向的直街广，大部分后来终于衰落下去，转变为居住区，如乐桥、绣锦坊等。只有个别的几条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依旧繁荣。如观前街、干将坊的东市，铁瓶巷的西市。

据《宋平江城坊考》记载，宋时苏州城内一条街或一个坊常是同一行业、手工业聚居地，交通便利的地点则设有固定的集市场所。从《平江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行”往往座落在横巷中，如和平坊（今西美巷）的半行等。

苏州城内的南北两隅，历来比较空旷。从宋《平江图》来看，在第一横街以北，除齐门大道两侧外，没有什么建筑物。城南第四直街南段，名园相望，人烟比较稀少。

（21）宋代静江城

宋代的静江府，原称桂州，也就是今天的桂林市。现存镌刻在桂林城区鸚鵡山南崖壁上的《静江府城池图》，与现存苏州文庙的《平江图》齐名，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图之一。从城图可知，静江府城在南宋时有四次修筑，四

《吴郡志》卷 6。

余绳芳：《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一个杰作》，《建筑学报》1980 年 1 期。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桥梁》。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坊市》。

[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256 页，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王澐：《宋平江城坊考》附《吴中故市考》。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次修的城与旧城连为一体，又可各自为城。五城相连的静江府城，平面布局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即南北长，东西窄。旧城在南，东、西、北各建有一城，除北侧的城比较规则外，东、西两城均不规则。最后在北城之北又修筑一城紧附于北城，接近方形，原来的北城变成了中城，以独秀峰为中心。像这样五城相连的城，除甘肃天水城外，恐怕仅此一例了。

依据城图，府治在旧城之中，紧附于东墙，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北墙无门，东、西、南墙各一门，建筑宏丽。从建筑物的布局来看，以最后修成的北城建筑物最密集，可见人口重心也在全城的最北部。这可能同漓江在东，桃花江又绕西、南两面，北部地形最为开阔、交通便利，有密切关系。纵贯全城的只有一条干道就是明证，其他横向的道路，均与这条干道构成“丁”字形街。南北干道以东的横街有12条，以西仅有6条，证明东半部人口多，经济发达。这是由于漓江在东，从秦开灵渠起，漓江就是水上交通的大动脉。南宋时居民区仍以坊相称，静江府城坊的多少、具体分布，图上均未显示，已不得而知。估计也是由街道分割的居住单元，商店已沿街布设，应该与平江府城的结构大体相似。

（22）宋代太原城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潘美在阳曲县唐明镇修筑的太原城，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土城。城由内外两重构成，内城称子城，外城称罗城。子城开设四门，南门而外，其他三门依次叫子北、子西、子东。罗城也有四门，东门朝曦、南门开远、西门金肃、北门怀德。

宋太原城在布局上体现了唐以后城市发展的特点，城内坊市已没有唐代以前明确的界限，市场沿街分布，有人认为今天“太原城区西南的米市街、南市街、柴市街、菜市街、麻市街，这些地方就是宋代的米、柴、菜日用品的市”。宋太原城大部分街道都呈丁字形，这种丁字形的街道给城内布局打下深深的烙印，一直影响到今天太原城市的交通和建设。元好问有诗云：“君不见系舟山上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据说，“当这城修筑的时候，为了钉破‘龙脉’，只修丁字街，不修十字街。因为‘丁’、‘钉’同音”，认为丁字街是封建统治者相信风水有意所为。但另据史料，唐明镇在潘美筑城之前就已形成街衢巷陌，具有一定规模。唐明镇原有晋文公庙，宋平太原后三年，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后筑子城，“南门有河东军额因唐旧也，鼓角漏刻在焉”。太原城“父老相传，今振武门内四神阁即唐明镇之前街，大关帝庙乐楼下之砖洞，其后街也”。这就说明，潘美筑太原城是利用了唐明镇的原有建制，稍加整治而已，丁字街可能为唐明镇的旧有建制。

马崇鑫：《试论桂林宋代摩崖石刻〈静江府城池图〉在地图史上的意义·附图》，《历史地理》1988年第6辑。

郝树侯编著：《太原史话》第2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郝树侯编著：《太原史话》第2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老学庵笔记》卷9。

《永乐大典》卷5201《太原志》。

道光《阳曲县志》卷15。

宋太原城在布局上因势利导，并州州署就利用了原有的晋文公庙故址，位于城的北部，后来修筑子城，将州署包入，形成了政府衙门集中的地区。一般居民散布于外城，市场沿街分布，主要集中于城的南部。宋太原城军事地位重要，驻有重兵，淳化三年（992年）修筑的南关城，东西墙接大城，用来驻扎军队。为了防止洪水对城的袭击，宋太原城西沿汾河筑有堤防，并广植柳树，形成以堤防、柳树、水面，包括彤霞阁、林华堂、四照亭、水心亭等设施的“柳溪”风景区，据记载，“每岁上巳，太守泛舟郡人游观焉”。

（23）宋代汉阳城

唐代的汉阳城北宋末年被水冲毁，南宋末年，由于汉阳商业迅速发展，“平时十万户，鸳瓦白贾区”，在江滨形成了专门的市场区，才重修了汉阳城。南宋所修的汉阳城，城周7里，设8个城门。该城东南枕大江，北控莲湖，西抵凤栖山麓，城中有南湖、道观湖，城南有韩家湖，蓄水量都比较大，城内用水很充足。宋代汉阳城的仓廩本来多设在城内，后来为防止被敌人利用，移至军衙之侧，只有一个小仓布设在城外龟山山麓。城中的平民百姓，“尽在小山之下，大别（即龟山）之上”。此小山位于汉阳军城以北，说明汉阳城的居民区在龟山与这个小山之间的区域。南宋时汉阳知军事黄干屡次上书，坚请筑城，但他力主只围绕郡治中的一座小山周围筑城，认为沿龟山山麓筑一座大城，耗费巨大，并以“后堂隍周密，则敌不可窥，门墙罅隙，则盗不可拒”，作为他修筑小城的根据。他的本意是“先筑内城以固根本，次包外险以为捍卫”，后代筑城却只采纳他的提议修筑内城，所以汉阳城规制十分偏狭。

（24）元代广州城

元初平毁城池，广州也不例外。根据《元史·地理志》和《南海志》，子城尚存，其布局与宋代相仿。但城外变化较大，如放干城北水库，浚深城内西侧西城南濠，扩大了游览区，港口有很大发展，海外贸易兴盛。城内的主要变化是把宋代的清海军楼改挂“广东道”扁额，郡学、县学毁于兵火，破烂不堪。证明元代的广州，除海外贸易发达外，城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25）元代泉州城

元代的泉州城为全国第一大港，城内街道格局仍沿袭宋代，“分在城为东、西、南三隅，辖17图”，拓展了宋代的翼城，形成城南第三个十字街。城市不断向晋江口河段发展，形成外商聚居区。城内经济区集中在聚宝街一带，南北向平行的三条街道和小巷内；城郊经济区则向南发展，形成繁华的商业市场，有圆通港、东桥澳、码头、仓库和修理船舶的风炉埕等。衙署仍布设在城北一带，总管府即宋代州治，前有谯楼，即威远楼，都转运盐分司

光绪《山西通志》卷163《祥异》；《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宋）胡寅：《南纪楼诗》。

《宋史》卷46《度宗纪》。

黄干：《申两司筑城略》，《古今图书集成》卷1131。

黄干：《申两司筑城略》，《古今图书集成》卷1131。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323—324页。

道光《晋江县志》卷21。

在肃清门外，脱脱木孙衙在府治西忠厚坊内，杂造局在府治东。

（26）元代安西路城

元初，长安城的范围仍依唐末韩建“新城”，沿用京兆府的名称。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封他的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镇守其地。至元十六年（1279年）遂改京兆府为安西路。元代的安西路城是元朝中央政府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安西王所部士卒竟达15万人之多。这就说明，安西一名也正好揭示了它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后来由于发生了安西王的叛逆事件，安西国被废除，皇庆元年（1312年）改安西路为奉元路。这次改名，除含有尊奉大元的意义外，是否与安西路城的奉元王祠有关，已难知晓。

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所绘的《奉元城图》，虽然因辗转传绘，也有失实的地方，但终究是元代人亲眼看到的情景，应该是十分可贵的。根据该图所绘的方位，奉元城四面仅各一门，南门偏东，北门偏西，东西两门也不完全对称，城内建筑也看不出对称的格局。市场集中在城的西北隅，有马市、羊市和秦川驿等。东北隅有城隍庙、察院等。西南隅有千斯仓、马站、养济院屯田府等。东南隅有太白庙、三皇庙、宣圣庙等。另外，图内的旧景风街即今东门大街，旧安上街即今南门大街，广济街即今同名街，开元寺即今开元商城，敬时楼即今鼓楼所在地，钟楼即今迎祥观，奉元路门即清代的西安府，今省文化厅招待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游历过这座城市，据亲眼所见：“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凡人生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马可·波罗的记述历历如绘，展现了元代奉元城之的繁盛状况。奉元城之所以如此繁华，大约同元代的大一统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有密切关系。元代时由于驿路畅通，途经这条道路上的商人、传教士络绎不绝，盛况空前，当然也会助长奉元城的繁荣。

奉元城东北郊的安西王宫是至元十年（1273年）创建的，位于东西大道之侧，恰好是龙首原东去之余脉，与唐大明宫在东西一条线上。龙首原再次被加以利用，充分证明它在西安地区宫殿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安西王相赵炳为兼营司大使，“遍访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址”，才选择了今鞞儿塚作为宫城城址。这一选择也符合西安地区城址转移的基本趋势，即地势高敞，交通方便，又容易解决供水问题。安西王宫东临浐河，无论对解决水源和控制东西交通都是十分方便的。元代曾疏凿唐代的龙首东渠，并把它引入安西王宫。

安西王宫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设计精巧，富丽堂皇无与伦比。它“毳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新元史》卷114《忙哥剌传》。

《元史》卷60《地理志》。

夏鼐：《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考古》1960年5期；《考古学与科技史》1979年。

《元史》卷60《地理志》。

嘉庆《咸宁县志》卷4。

《马可·波罗行记》（冯译本）中册，第431—43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类编长安志·序》。

《类编长安志》卷8《泉渠·龙首渠》。

殿中峙……包络原野，周四十里”，宫殿“壮丽视皇后”，比起元王朝的皇宫来也不逊色。安西王“威仪之盛”，也几乎与当朝皇帝无异。马可·波罗看到了这座壮丽的王宫，他说：“宫甚壮丽，在一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五里……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皆以金绘饰……军队驻扎宫之周围，游猎为乐。”

经过实际勘查，安西王宫的遗址在今西安城东北3千米处，南距秦孟街120余米，当地群众称为“达王殿”，又称“斡儿朵”。“斡儿朵”即蒙语“宫殿”或“行宫”之意。王宫之所以修在长安城外，显然同缩小后的长安城范围太小有密切关系。根据实测，安西王宫东西二城基南北各603米，南城基542米，北城基534米，周长2.28千米。城的形制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城的四角向外突出，成半圆形，可能是原来建有角楼。城的北面无门，东、西、南各有一门，也仅有一个门道。东西二门宽各5米，南门宽达12米，应以南门为正门。在城的中央，有一高大的夯土台基，高出地平面2—3米，被称为殿台子，可能是正殿的遗址。

（27）明清广州城

明代合宋代三城为一城，并把城向北扩展，在城南因宋南城建筑新城。明代把城向北扩展，因元城低隘，故辟东北山麓，沿越秀山向北展出。新城的修筑，完全是为了把城外新兴的商业区包入城内。扩大了广州城，北上越秀山，南至海，东到今大东门，西限西濠，西关发展为十八甫商业区。随着三城合一，城内布局也有较大变化。

主要军政机关设在城中部偏北处。如广东布政使司、广州府、广东都司，以及位于都司东的左卫、前卫，都司西的右卫、后卫等，都在惠爱街以北。街南还有断事所、按察司、宝泉局、五羊驿、永丰仓、盐仓等。番禺县县学位于城的东北隅。文庙位于城的东南隅。察院、军器局、南海县及其县学位于西城中部。永丰仓、光孝寺位于城的西北隅。钟楼位于城的东南隅。布政使司所在也就是越王宫，位于今财政厅一带。广东都司所在也就是清代的广东巡抚衙门，即今人民公园。街道格局大都为东西、南北向，但“丁”字形街道很多。商业区主要在沿江一带的新城区，以濠畔街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最多。

清代的广州城位于越秀山与珠江之间，东西以濠水为界，基本因袭明代规模。但珠江沿岸沙地日广，故增建翼城。由于珠江沿岸商业繁荣，人口大增，在明城的東西两侧修建翼城，犹如鸡翼，故又称鸡翼城。清代广州发展最快的为西关平原，即由西濠到小北江之间的低洼地得到了开发。清代西关最早的商业区为十八甫，即沿西濠和大观河兴起的原明代商业街圩。也就是从西城墙外的西北角起，沿西墙外向南一直到达西南角，再折向西南到达今天大观河边，呈东北、西南走向，伸延数里。清代广州的织造业很发达，其主要机房区也在西关。据说，明末清初已有机户2500多家，形成专门的纺织手工业区域，街道也多以织造为名，如锦华大街、经纶大街、麻纱巷等。其分布区主要在第六、七、八甫和上九甫一带，即位于城外西南地区。随着工

《蒙兀尔史记》卷76。

《马可·波罗行记》（冯译本）中册，431—432页。

马得志：《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考古》1960年5期。

商业的发展，富商大贾和资本家在西关开辟了高级住宅区，即宝华路、宝源路住宅区，位于伴湖东南一带。这一带的街道经过规划，均为东西、南北向，犹如棋盘，十分整齐。清代在城西南的西濠口以北，形成官办洋商的特殊区域，即十三行。十三行的名称明代已有，即后来的卖办资产阶级。他们垄断对外贸易，十分富有。十三行街是洋行兴起后开辟的新街，大都呈南北向，直达珠江沿岸，显然是为了对外贸易方便。其中怡和大街、同文街、同兴街、靖远街等，仍为今同名街或路。

清代在西关另外开辟的一个区域就是沙面。沙面位于西关平原南侧，为珠江岸边的河滩地。由于水路交通方便，遂成为广州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后来的英、法租界就在沙面，英在西，占地 211 亩，法在东，占地 53 亩。东西大街三条，南北小街五条。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使沙面成为一个特殊的区域。

清代广州的发展主要在西郊，是和西郊平原广阔、交通方便有密切关系。

（28）明清泉州城

元明之交，泉州遭到破坏，十分萧条，城内空地很多。明代的泉州建树甚少，城内格局可能仍依前代。

清代“增在城北隅，为四隅。城内及附城分四隅十六图。旧志载三十六铺，分增二铺，合为三十八铺”。泉州府治在行春门内，即东墙中段里，晋江县在府治西，原来位于城西北隅的府治衙门旧址变为提督衙门，镇抚司位于它的西南。街道格局依旧，变化甚少。

（29）明清苏州城

明代苏州城市平面布局因袭过去，县署仍在城的北部，居民区多在城的东部。各个商业市场，如鱼行、丝行、荐行、茶馆、酒肆等大都集中在子城西北角的乐桥和利市桥一带。明代时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区扩大，商业市场以乐桥为中心，向西延伸，逐渐移向养育巷、道前街一带，阊门则成为苏州的经济枢纽。清雍正二年（1724 年），析长洲，置元和县。苏州府署由城北移向西南（今府前街道地区），胥门成为封疆大吏进入苏州的第一水埠，因此在胥门设有“接官厅”，官署也设在距离胥门接近的地区。

清代的苏州城平面格局未变，但城郊发展很快，阊门（西墙北面门）一带形成新的商业和手工业区，门外上下塘街一带更是踹布业集中的所在。盘门（南门）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租界地，也形成一个特殊的市区。

（30）明清扬州城

明攻占扬州后，张德林奉命筑城，截宋大城西南隅，后称“旧城”。其东、西、北三面有城濠相绕，南以运河为界。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又在旧城东边，即宋大城东南隅筑城与之相连，称为“新城”。新城东南以运河为濠，北濠与旧城北濠相通，西以小秦淮与旧城为界。

明清扬州城的水陆交通仍很发达，其中水路交通主要由市河、濠河等水系构成，它们都与运河相通，皆可行舟。这些众多的河流把扬州城区分为许多街巷，从而形成密如蛛网的城市陆路交通。旧城因市河与城河平行或垂直，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 363—402 页及附图。

道光《晋江县志》卷 21。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故城区街巷也多与之平行或垂直，既有纵向的主干道，又有横向的支巷，横平竖直，方整宽敞。新城内的大街较少，小巷却密密麻麻，布局比较零乱，街巷多弯曲、幽深。由于住户密集，扬州全城街巷布局呈“多而密，短而窄，曲而幽”的特点。

明清扬州城的功能分区比较明显。明初旧城西部主要为扬州府治、察院、都府、扬州卫镇抚司、府学、城隍庙等官衙、寺庙和文教机关所在地。而沿市河两岸，由于交通便利则主要为居民区和工商业区。旧城外运河岸上的两淮盐运使署附近，也成为繁华的工商业和居民区。万历年间，由于东城的建立，扬州城市已形成粗略的功能分区轮廓，“处新城者皆富商大贾”，“旧城多缙绅家，而出入闾里，止沽浆及舆皂之徒，以是群居饮博往往而有”。到了清代，这种功能分区更为明显。盐商聚居区主要分布在新城河下街一带。早在元至顺年间，已有盐商为运盐方便开始在这里建造仓屋。明中叶以后，盐商开始大批群居于此。今北河下的北端，东关南部及徐宁门附近都是盐商聚居的中心，商民众杂，人户殷盛。

扬州城的商业区比较集中，旧城有在城市，东、南、北三关市。旧城外有田家巷市、井巷口市、钞关市。其中田家巷市位于河下北端，井巷口市在徐宁门附近，它们和钞关、东关分布于新城四个角落，成为后来商业区构成的基础。雍正年间，两城主要有十三市，旧城有开明桥和太平桥市。位于新城的有九市，即东关街、埂子街、徐宁门、缎子街、新盛街、辕门街、砖街、使益门和缺口门诸市。在两城间还有大、小东门二市。新城城南也是繁华的商业区。

康乾以后，新城商业区迅速拓展，尤其是乾隆巡幸的路线，“由天宁门城内东入彩衣街，左折运司街、教场、辕门桥、多子街、埂子上，出钞关，右折花觉街，入九峰”的小东门外新城御道，成为扬州商业最为繁华的地段。特别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北部教场商业区形成，使扬州商业由南向北连成了一片。其中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为小东门、小秦淮等地附近，名肆大店，鳞次栉比。小东门街“市肆稠密，居奇百货之所出，繁华尤甲于两城，寸土拟于金”。农副产品交易主要在四郊，如便益门鱼市、凤凰桥米市、天宁门花市等。另外，手工业的布局与商业区大体一致，即前为商店，后为作坊。尤其是专业市场区更是如此。

（31）明清武汉三镇

元代的武昌城遭到了严重破坏，明初拓修武昌城，扩大了城区。扩大后的武昌城东至今大东门、小东门一带，北达沙湖之滨，南临巡司河岸，西迄于江，城周20余里，并在城的外围保留十余丈的空地，目的是为了阻滞敌人接近城墙。明洪武时，楚王季淑登临蛇山，“下顾军民之居，则见灶井排连，人烟稠密，而闾阎扑地”，反映城内房屋骈联，建筑密集；“俯瞰江汉之渚，则见商贾辐辏，桅樯比栳，而船舰迷津”，反映明代初年南市仍很兴旺。楚王季淑在蛇山中峰高冠山南麓，修建楚王府城。楚王府城坐北朝南，“前临

万历《江都县志》。

雍正《江都县志》。

焦循：《扬州足征录》。

《扬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楚王季淑：《长春山记》。

大朝街（今复兴路），左阅马场，右长街宫（今解放路一带），广二里，袤倍之，瓦石为城”。楚王府城辟有正阳、端礼、东华、西华、厚载等门，府内还有梳妆台、金鱼池、长春寺、御菜园等。楚王府城的建成，在武昌形成城中有城的局面，楚王府成为武昌城的核心，各级官僚衙署都环布在府城东西，集中蛇山南麓及西麓。楚王府的东边为演武厅，即后来的阅马场，是操练、检阅军队的地方。明代湖广布政使司在汉阳门内，都司署在文昌门内，府署在蛇山西麓。居民区主要集中在城北、城东。明代武昌城的市场格局与南宋时差别不大，以南市为主，但到明代末年，由于鹦鹉洲逐渐消失，南市的商业走向衰落，原南市地域主要演变为居民区。

清代武昌城基本沿袭明代的形制和规模，城周约 20 余里，东西宽 5 里，南北长 6 里，由于地形的影响和制约，整个城垣呈不规则的浑圆形。在城周围环布的 40 座兵营，也主要分布于城的东部、南部。清代武昌城的官署衙门，仍以蛇山为依托，但不像明代那样猥集蛇山南麓、西麓，皇殿与清军府在蛇山南麓，藩司与武昌府在蛇山北麓。总的来说，行政衙门集中在山北，军职衙门则集中在山南今阅马场一带。明楚王府城在明末毁于兵燹以后，到清代同治年间，只剩下正阳、端礼、东华、西华、厚载几个城门和梳妆台、金鱼池等几个遗址。因此清代武昌城既不存在城中之城的现象，也不像明代武昌城那样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都以楚王府城为中心。清代江夏县治也在武昌城内，位于城西南一隅。江夏县学、县城隍庙等都位于蛇山以北。武昌丰稔仓，位于城西北角地势较高的地方，管理粮食的机构——粮道就设在附近，大致位于今粮道街一带。武昌城内的市场，主要集中于长街（今解放路），城外的南市已经完全衰落，演变为居民区，城北门外的塘角市场一度兴旺，但也好景不长，中心市场由城外移入城内，今司门口一带成为商业中心。

南宋汉阳城毁于元代，明代初年重修汉阳城，城周 6 里，地跨凤栖山，在城的东、南、西三面各开辟一座城门，北门旋开旋废。明代汉阳城的官署衙门集中于城北，背山面泽，座北朝南。朝宗门与凤山门之间有东西向干道相通，并与通南纪门的南北向干道相接，沟通了城内外的交通联系。城北为官署集中区，城南为仓库、祠庙、医酋斋等机构所在地。城北又以汉阳府治为中心，向东西展开，形成主要的行政区。汉阳城规模很小，布局也较简单。城内市场主要沿横贯东西的干道（今显正街、西大街一线）和南北向干道（今北城路一线）两旁布设，临街设店形成商业街。居民区均位于城外。因为“此城成于创造之初，单砖甃砌，未筑里墙，不通人行”，每遇贼警，险要不足。

明嘉靖三年，千户朱凤奏修汉阳里城，顺应地势，形成城中之城。汉阳里城北依龟山，位于城北中间位置，辟设一座城门，大致与鼓楼、南纪门成一条直线，但汉阳城区并不是以这条线为中轴线进行对称布局，因为汉阳里城修建较晚，只不过巧妙地利用了鼓楼与南纪门的相对位置。鼓楼大概位于汉阳城的中心位置，城内的东西干道和南北干道在鼓楼附近相交。汉阳城的东南部大部分为郎官湖，为城内官宦、士民、工商游玩之所，今天的莲花湖，就是古郎官湖的一部分。明代初期汉阳城外江滨地带，尤其是龟山以南的汉水入江口附近，由于航运条件较好，形成市场。汉水成化年间改道以后，港口、市场北移，但汉阳江滨仍是重要的市场之一。

同治《江夏县志·疆土·古迹》。

嘉靖《汉阳府志·创置志·城垣》。

清代汉阳城的布局仍保持了明代汉阳城的基本格局。汉阳内城囊括了汉阳府、经历司、粮厅、刑厅、照磨所等机构在内。内城西边有府学、衙门、汉阳县治，东边为武昌道、分司、城隍庙，城北几乎全为官署机构占据。汉阳城的西南为县学、医学、阴阳学所在地，通济仓设在城的西南角，因为这里靠近凤栖山麓，地势高亢干燥，易于防湿避潮。汉阳城的东南为郎官湖，但面积已大为萎缩，仍为城内商民游憩之所。汉阳的免溺堤（又名杨柳堤，明正德年间修），清代也成为商业街，“襟江而带湖，盖汉镇居民入城孔道也，舆马之所践，负贩之所息，春秋祈赛士女之所追逐，舍路无由”，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十分兴盛。清末因修建拦江堤，杨柳堤被废弃，改建为条石街道，称为高公街（即今晴川街）。清雍正年间，自龟山尾至汉水南岸修建郭公堤，把月湖隔成东西两半，后也逐渐形成街道，现为联系汉江桥与钟家村的纽带。明末清初的汉阳鹦鹉洲一带，更是平时以堤为街，汛时以街为堤，堤与街巧妙地结合为一体。此外拦江堤、月湖堤、腰路堤等也先后演变为街道。随着汉口商业的兴起，汉阳的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作坊散布于城内外，相对集中在几条交通干道附近，多以临街设店、屋后开作坊的形式出现。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汉阳创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厂址在龟山北麓，今武汉国棉一厂的厂址上，长六百丈，宽一百丈，南枕龟山，东临大江，北滨汉水，与汉口隔汉水相望，既能很便捷地将钢铁制品运至汉口，藉汉口以为销场，又便于将矿渣、煤渣运往汉口后湖，填筑湖身，以免后湖水、汉口上流水浸淹之患。汉阳铁厂充分利用了汉阳兼得长江、汉水航运方便，又紧临商业中心汉口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汉阳城区向工业中心转变的先声。

汉口最初的居民点出现在汉江河堤上，因为汉江堤防减缓了汉口的渍涝灾害，堤防本身相对地势较高。初期的汉口城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居民区、港口建筑和商业市场。由于拥有天然良港和优越的交通条件，汉口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明末崇祯年间修建袁公堤，为汉口城区向西北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代汉口的主要街道为汉正街，建于嘉靖年间，为汉口最古老的街道。

清代时汉口对外贸易出现了飞跃，城市建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东濒长江，南临汉水的地理形势，对汉口的街道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街道顺应江河形势伸展，形成数十里的长街。“汉泉风俗最繁华，二十里嚣尘百万家”，“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等著名诗句，都反映了汉口街道沿江沿河布设，成为长街，如汉正街、长堤街等。汉正街西起硃口，东止集稼咀（接驾咀），长达3194米，西段最窄处2.3—3.5米，下段宽达5—6米；长堤街长3559米，宽不足4米，它的雏形为袁公堤（即长堤）。当时在今民众乐园西南侧的贤乐巷一带，为一个很大的土塘，汛期渚水成湖，到乾隆年间，在长堤南侧形成独特的半边街（今统一街附近），同半边街交叉的为东西向的打铜街。相传在清代的米厂和大码头外，还有两条街道，

（清）陈国儒：《重修杨柳堤记》。

魏玉林：《汉阳铁厂的建筑》，《武汉春秋》1983年5期。

皮明麻、李权时：《武汉通览》第111页，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到清道光年间早已崩坍。汉口的东西向街道又宽又长，南北向街道数量多，但又短又窄，仅供沟通各东西向干道之用。大街小巷纵横交织，“四通八达巷如滕，路窄墙高脚音腾”，墙高巷深，颇具特色。当时居民按横向，把汉口主要街道分为下路（又称下街，含循礼、大智二坊）和上路（又称上街、含居仁，归义二坊），又依纵向分汉口为三路——正街（汉正街）、中路（以大夹街为主）、中路后（以长堤街为主）。

当时汉口有八个码头，分别为：艾家咀、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咀、大马头、四官殿和花楼。

清代在汉口设置仁义、礼智两个巡司管理汉口，礼智司辖区自金庭店至茶庵，下置循礼、大智二坊，仁义司辖区自硃口至金庭店，下置居仁、归义二坊，四坊所属范围，即为市廛鳞集、人烟稠密之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被帝国主义辟为通商口岸，英、德、俄、法、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英租界南起今江汉路，东达于江，北到今合作路，西迤中山大道，面积达800亩；德租界自通济门沿江起（今一元路），至李家墩（今六合路）止，面积600亩；俄租界在英租界以北，到今蔡鄂路，计414余亩；法租界在俄租界北，共372亩；日租界位于今六合路以北，面积622亩。这样，今江汉路以北，黄埔路以南，中山大道以东，长江以西，面积达数千亩的广大土地，相继沦为租界区，成为国中之国，而获得畸形发展。20世纪初叶，租界区已成“危楼杰阁，车马殷阗，万里航船，衔尾碇泊”的繁盛之区。在租界地盘的选择上，为了实现掠夺资源和倾销商品的需要，帝国主义者选中了三镇中作为物资集散地、商业向称发达的汉口。汉口各国租界的分布相对集中，沿长江西岸相互连接，每个租界都占据一段江岸，拥有长江航运之便。当时汉口能同时享受长江、汉水航运之便的老城区，而没有剩余的地盘，若将租界设于老城区以西汉水沿岸，则势必深居堂奥之嫌。而老城区以北的长江沿岸，既近长江水运之利，又兼得京汉铁路之便，且当时多为荒芜之区，故成为帝国主义设立租界的理想选地。汉口的租界区与老城区风格迥异。老城区长街窄巷，犹如九曲回肠，以木屋、板房居多，作坊、商号错杂其间，且多古旧建筑；租界区街道宽畅，建筑石柱红砖，阳台明窗，以高层西式楼房居多，洋行、教堂、领事馆遍布，与老城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成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现在这一带仍是港口、码头、仓库的集中区域，一些具有西欧风格的建筑物至今还保存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改汉口同知为夏口厅，汉口始为独立建制，脱离汉阳县的管辖，在城区布局上也改变了以往单一商业市场、港口仓储及居民区的布局形式，开始向小而全的方向发展。到宣统元年（1909年），在铁路以南，西达硃口，东达刘家庙，南至汉江的空间内，形成了以5条东西向横马路、30条南北向直马路为骨架的交通网络。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刺激，“由其运输之便，货物起卸之利，仓库特设于汉水沿岸，遂至形成为自然市场”。各个市场还出现了专业化的地域分工：油市场在打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1。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1。

萧致治：《汉口租界》，《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4期。

张寿波：《近代汉口工商业一斑》第3页，宣统三年刊。

水野幸吉：《汉口》第249—250页，光绪三十四年。

扣巷河街，薪炭市场在集稼咀，棉花市场也在打扣巷附近，米市场在沈家咀，杂粮市场在汉水上流的杨家河等等。汉口也存在一些作坊与市场合为一体的街巷，汉口的半边街和打铜街，就集中分布着许多铜器作坊和市场，如铜锣坊、徽锁坊、铜境坊、红铜坊、铜盆坊、喇叭坊等；汉口的花布街、白布街、青布街等为土布作坊和集散市场的集中地域。

1929年建成中山公园，成为汉口市第一个公园。在当时汉口市政府前还建成府前公园。后来又在汉口湖北街转角处建蠡园，接近市中心，成为市民游乐的主要场所。

（32）明清济南城

明清济南城基本上承袭了前代城垣，城周十二里四十八丈，受地形因素的制约，城垣略成正方形。开四门，南门名历山门，西门名泺源门，北门名会波门，东门名齐川门。北门是水门，城内大明湖水出北门入护城河。东、西、南三门皆有瓮城，设重关。

从历史沿革看，由于济南城市东西两子城长期并存，官署也相对集中于两子城范围内，形成西南和东部两大官署区，而两子城以外的地方则成为普通居民区。随着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高，各级官署相继迁入，传统布局被打乱，因此只能是见缝插针，或强占民居，或迁移寺院加以改造来安置日益增多的官署衙门。明初，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大兴土木，济南府沿用了元代的旧府治。洪武三年（1370年），“敕海内郡县皆建公署以骇众观”，于是“因今驿舍之在浮图开元寺者祓而耸之……为屋千余楹，屋瓦鳞集，器用毕具”，若除去城北大明湖，新建的济南府治恰好在城区中心，即今天省政协所在地。以济南府为中心，官衙错列布置，散处四周，如按察司和运署司在府治东部近城墙处，历城县治在府治北，布政司在府治西北，山东都指挥使司在府治西，巡抚都察院在府治西南隅。而民居则交错其间。

天顺四年（1460年）封皇子朱见麟为德王，移藩于济南，在城内府治西面占据了包括今珍珠泉在内的大片土地修建王府。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这座王府被破坏，清代经过整修后成为巡抚都察院。今天的省人大会议址就是德王府所在地。明清济南既为山东省会，又是京师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驻有重兵。根据《历乘》统计，明崇祯年间，济南驻军共有7000余名。军队驻扎在城南。明朝巡抚杨俊民在南门外二里处创建演武厅和武场，修建军舍，“厅后有堂，堂侧有厢，厅前为露台，台之前为将台，厅、台之间为教场”。南门外至今有南营、教场、演武厅、后营房等地名。军队的指挥机关也设在城内南部，南门内有参将府（在府馆街）、武库（在武库街）等。城北部的大明湖是园林风景区，在明清时期多次整修，创建了一大批亭台楼阁等园林建筑。明清济南府儒学修建在湖的南岸，《府志》称“规制宏丽，儒林之巨观也”。另外至道书院（后改为学道书院）也在湖岸上。清代济南府有广丰、广储两座粮仓，都建在城东南隅。以济南府治为中心形成繁华的商业区，同时东、西、南三城关均形成商业街市，其中西关不仅商业最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嘉靖《山东通志》卷15《公署》。

嘉靖《山东通志》卷15《公署》。

燕相：《重修演武厅记》。

康熙《济南府志》卷16《学校》。

兴盛，店铺林立，而且也是手工业最集中的地区。

由于济南北郊多水，南面近山，东西往来必穿城而过，深刻影响了城市道路系统。但东西二城门并不相对，无直道相通。西门大街向东延伸至东城墙根，与东门内南侧马道相接，东门大街向西延伸至鹊华桥，过桥就是大明湖。南北二门也不能直接贯通，南门大街和西门大街呈丁字形相交，以西门大街、东门大街和南门大街为全城的主干道。次级道路就是沟通南、西、北三城门的马道以及南北向街道。据乾隆《历城县志》记载，济南城有五处马道，南门内外各一条，皆在门东侧，东门内外各一条，皆在门南侧，西门内外各一条，皆在门南侧，北门内有一条，在门东侧。这几条马道，多与顺城街巷相通，形成城内的环形道路。城南则“历山千佛诸峰，蜿蜒相接，山径曲折，车马不通”。而北部河道纵横，北门为水门，只有水路交通，故陆路交通多取道西门。从南方的泰安，西南方的张夏，西北方的齐河来济南，都要经西门入城。明清济南最重要的水运码头在西关。泺水自古有舟楫之利，以趵突泉为重要码头。直到齐王刘豫开凿小清河，趵突泉又成为小清河源头和盐运的重要码头。泺水不仅作为小清河的上游，而且沟通大清河，承担着繁重的海盐运输任务。

近代，济南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发生了变化。同治年间，修筑石圩，确定了济南城区的新边界。城区轮廓大致成菱形，长对角线穿过齐川、泺源二门。城市重新呈现“母子城”形态，老城成为内城。石圩“门七，曰岱安，曰永固，曰永绥，曰永靖，曰永镇，曰济安，曰海晏”。外城的布局未经过统一规划，显得零乱，斜街曲巷很多。三条关外大街构成外城的骨架，城区沿关外大街布设，城门的位置和关外大街的走向基本上决定了外城的轮廓和布局大势。街道的走向受关外大街和护城河走向的制约，以水源和城门为中心呈辐射状。从城市总体职能结构看，老城是城市的核心，以政治职能为主，外城以经济职能为主，市场活跃，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手工业街巷。商业区的分布呈多层次，其中心在老城区，围绕官署分布。外城区以农贸市场为主。手工业重心在外城区，西门外是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商埠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和“提掣工商”的背景下开辟的，位于城西郊。开埠后“准各国洋商华商于划定界内租地而居”，商埠内设有华商贸易处、华洋贸易处、西人住家处、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和菜市等。商埠一开始就有统一规划，完全抛弃了封建城市的高墙深垒，封闭保守的布局方式，采用现代城市的开放格局。街道规划合理，经路走向顺应山脉和河流，平行于胶济铁路。纬路相间南北垂直。这样既避免路线斜交锐角和交叉过多的矛盾，又能得到平坦而且较适宜排水的地面。道路网能基本上顾及到老城区和对外交通道路的衔接，如经一路东接迎仙桥，西通齐河大路；经七路东接杆石桥，西通长清、泰安大路等。

随着城市经济的日趋活跃，老城区布局也发生变化。为加强老城内外交通联系，清光绪末年，济南老城增开四门，即坤顺、乾健、艮吉和巽利。八座城门的分布以西城墙最多，达3门。泺源门水陆辐凑，交通繁忙，故开坤

孙点：《历下志游》之六。

乾隆：《历城县志》卷5《地域考》。

《续修历城县志》卷3《地域考》。

顺门为其分流。老城内居民区向北推进，泺源门偏南，给北部居民出入城市造成不便，故开乾健门，与齐川门相对。城东南部官僚旅邸聚集，又是粮仓和贸易市场四隅头的所在地，故开巽利门，与泺源门相对。

（33）明清南阳城

明洪武年间，南阳卫指挥佥使郭云来宛，重修宛城。重修的宛城，城内街道坊巷颇为整齐，东西南北四门，都有通街大道。有通洧、通贤、护卫诸街。永乐二年，按亲王府仪制，在通洧街兴建唐王府，营造宫室。明成化《河南总志》记载：“唐王府在南阳城内通洧街，永乐二年，以南阳卫改建”。通洧街即今天的和平街，唐王府正好位于南阳城的中心，它南依南阳府、县治，东邻南阳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大街长春街，尽占优势。王府城几占南阳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王府城的建成，使南阳成为城中有城的格局。明代，亲王以嫡长袭而封，诸子封郡王。从明唐宪王（藩王）琼烜起，宪王、庄王两世分别于成化年间，在南阳城内建郡王府九座，九府俱在城的东、西、南三面，“邸第下天子一等”。另外，城内还有端王朱璜诸子七座王府，加上位于城西南隅的南阳府、县治，和位于城东北隅的南阳卫及其所属机构，南阳城的“邸第相望，将军、中尉、宗室半居民”，南阳城几乎成了一座王府城。就是大校场也被设在城东门外，今天仍称作校场。城内市场沿街设铺，以南长春街为最盛。

南阳城东关，因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成为南阳城关最繁华的商业区。城区内道路呈东西南北纵横交叉的网络系统，与内城相似。主要街道有豆腐街、书院街、官驿街等。以官驿街为主的东关南部和以豆腐街为主的东关北部，是东关南北两个商业集中地。官驿街因靠近白河码头，客商众多，商业主要为客栈、小吃馆等。豆腐街主要经营豆腐。商业区内无高大突出的建筑物，主要为一些民居住宅。明代南阳城南关商业也比较活跃，居民也逐渐增多，但远不如东关发达。城的西、北二关为一些零散的建筑和民居，还谈不上有市场。

明代，南阳城区寺观、学校众多，成为南阳城平面布局的一大特色。由于藩王府占地广阔，寺观、学校只能是见缝插针，甚至建于城外。建于城内的寺观、学校有南阳府城隍庙、八腊庙、弥陀寺、崇善寺、南阳县学等。原在城内的南阳府儒学因迫近唐王府而于永乐七年迁建于东门外。

清代曾三次修葺南阳城。城仍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区道路呈三经四纬的网络结构，这些道路将城区划分为12个方块，城区平面结构呈棋盘形。城的西南仍为南阳府和南阳县治所在地，南阳府衙占地广阔，建筑众多，富丽堂皇。整个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围绕南阳府治、县治周围有南阳镇总兵署、左营都司署、城守千总署和察院。明代位于城东南西三面的诸多王府，清初废弃，有些被改为官署。如位于城东门内的文城王府，清代为左营游击署、右营千总署、都司署；原明唐王府内的承运殿，清初改为府学。城的西北隅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嘉靖《南阳府志·官署》。

光绪《南阳县志》卷1《藩王表》。

光绪《南阳县志》卷1《藩王表》。

嘉庆《南阳府志》卷3《建置》。

嘉靖《南阳府志·官署》。

原明代的假山，仍为南阳城内一个制高点。

清代，白河航运繁忙，南阳商业兴盛，城内商业沿街设铺。城的东北隅、东南隅因靠近南阳城两大繁华商业区，商业比较繁荣。如城东门内以北有江浙会馆，为江浙商人的总会所在。清代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也在城的东北隅，今天的粮行街就是清代粮行的所在。城东南隅的长春街，南门大街有干道直通白河码头，商业尤为兴盛。在东门内以南还有当铺，其资本雄厚，经营范围广，生意非常兴隆。

由于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城外居民日益增多，同治二年，南阳知府傅寿彤环城筑郭，并划郭为六段，俗称六关，即大东关、大南关、小东关、小西关、大北关、大西关。六关主要为民居。大东关和南关各有自己的白河码头，商业比较繁华。大东关的南部仍为宛城驿所在，以官驿街为主构成大东关南部主要的商业区。小西关、大南关、小东关合称南关。由于南关码头过于繁忙，便在寨门内侧建一新街，新街成为水陆货物重要的集散地，商业尤为兴盛。由于南阳丝绸业的发展，在新街的东端沿南北走向出现了一条专门经营丝绸的街道，铺面相接，生意兴隆，因此亦叫丝绸街。南关不但是清代南阳城最繁华的商业区，而且也是南阳城手工业集中分布区，丝织业最为兴盛，南关新街两旁，“轧轧机声响彻街巷”。清末，又在新街北建蚕厂和面粉厂。在城区寺庙分布中，尤以南关为最多，远远胜过城内和其他诸关。

南阳城外西南的卧龙岗，相传为诸葛亮隐居之地。岗高清爽，上有松柏相映，下有白河如带，环境幽雅。岗上的诸葛书院、武侯祠历史悠久。直到今天，卧龙岗仍是南阳的旅游胜地。

（34）明清太原城

明初太原城扩建后，共开设8座城门，每面两个。东宜春门、迎晖门，西振武门、阜成门，南迎泽门、承恩门，北镇远门、拱极门。每座城门都筑有瓮城，城东门外有先农坛，城西有河神庙，北门外有社稷坛、厉坛，南门外有神祇坛。

明清太原城，钟楼偏居东南，鼓楼是全城布局的中心。鼓楼东北也就是全城的东北部，为明代的晋王府及下属机关集中区，占据高地。晋王府城由宫城和外城组成，宫城有三个城门：东华门、西华门、南华门，北部没有设门，可能是因为多大风的缘故。宫城之外有东西南北四面萧墙，这是晋王府的外城。晋王府城内为王府服务的机构繁多，有长史司、审理所、典膳所、奉祠所、典宝所、纪善所、良医所、典医所、工正所、群牧千户所、仪卫司等。晋王的后代又在王府周围修筑了一些王宫府第，如庆成、宁化、临泉、方山、广昌王府等。

明清时期，鼓楼以北主要为政府机关所在地，以太原府为中心，呈环状分布。明布政使司署在府治东，即元代的行中书省治所；按察使司署在府治西南，后移鼓楼东南；清代的都察院署在府治东等等。

鼓楼以南直到大南关一带是明清商业市场集中的地方，“城三面惟南郭

民国《河南省志》卷4《汝阴道·南阳县》。

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卷3《建置》。

（清）米至亨：《南阳中学乡土地理》。

《南阳城市历史地理述论》（油印稿）。

成化《山西通志》卷4《宗藩》。

数千家之市”。这里著名的集市与街名多合为一体，诸如帽儿街、活牛市街、柴市巷、前后铁匠巷、靴巷、剪子巷、帘子巷、麻布街等等，这里商业繁华、人口密集。明代南关一带商业发达、人口繁盛，形成新的居民点和集市区，景泰初巡抚朱鉴筑南关城。大南关一带曾是宋代最初建城的地方，商业集市代代相承，加上交通便利，所以商业长盛不衰。

明清太原城是山西省省会所在地。明太原城为九边重镇之一，城内设左、右、前三卫，位于城的西半部。明太原城北部军事地位重要，镇远门外筑有北关城，驻扎军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北关又筑新堡，“以居营兵”。清顺治六年（1649年）在城西南角筑起一座周八百四十三丈四尺的满城。满城开有两个东门，驻扎八旗兵，位置在今天水西门街和大南关一带。这里地势低洼，屡遭水患，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在城东南角另建新城。现在大南关的旧城街和火车站一带的新城街就是因新、旧满城而得名。明代位于城东北的晋王府城，清顺治三年（1646年）被大火焚烧殆尽，留下一片废墟，雍正年间在这里建成营房4千余间，驻扎精骑营。精骑营以北有演武场、火药库，形成军事区，今天的精营街、教场街、营坊街、营西街都因此而得名。

明清时期太原城东南一带以太原府儒学、贡院、书院、考棚为主形成文化区。太原府儒学位于府治东。贡院在迎泽门东、承恩门西，面城背水，占地47亩多。考棚在承恩门内东侯家巷。顺治十七年（1660年）建立的晋阳书院，一名河汾书院，位于北门附近。乾隆十三年“以北门逼处闾闾，不免嚣杂”，于是移于城区东南三立祠，又名三立书院。

明清太原城四面各有两个城门，但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并没有街道直通。城市的主要干道有入镇远门的大北门街“涂（途）容四轨”，入迎泽门的大南门街“涂容三轨”，直抵黑虎庙，入振武门的水西门大街“涂容四轨”，入阜成门的旱西门大街，入承恩门的新南门大街。主要干道大都与城门相连，这不仅说明城门交通地位的重要，而且城门对城区干道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干道中以水西门大街和大南街在城区西南十字相交。次一级道路勾通主干道，把城区内各功能区分隔开来，如柳巷、三道巷、都司街、棉花巷等。鼓楼虽是全城的中心建筑，俯视城内大街小巷，但没有大街和城门直通，除大南门、水西门外，从其他城门均难于直达鼓楼。明代太原城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拓展后，原来的丁字街并没有多少改变，影响城区的交通。八个城门中，迎晖门（小东门）、拱极门（小北门）交通能力最差。交通地位最为重要的是迎泽门和镇远门。明代晋王府城占据城区东北大片地方，阻碍街道的延伸，迎晖门、拱极门交通能力最差，也与此有关。

明清太原城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一定的功能分区：宫殿区、官衙区、工商区、文化区。这些功能区与城区地理条件的关系十分密切。宫殿区位于城的东北部，地势高爽，容易形成气势宏伟的建筑；官衙区，主要集中于鼓楼之北，位于城的北部，便于控制全城；工商区，主要集中在大南关一带，这里交通地位重要，人口云集，是商业贸易的最佳场所；文化区，位置在城区东南，这里人烟稀少、环境幽静。由此可见，明清太原城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

道光《阳曲县志》卷15。

《晋乘搜略》卷27。

道光《阳曲县志》卷8《礼书》。

区，以及道路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区地理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35) 明清宁夏城

元末塔尔巴哈台参政放弃宁夏府路城的西半部，主要是为了防御红巾军以及周围响应的小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明洪武初年的宁夏镇城承袭了元末塔尔巴哈台所守的东半城。明正统以后，宁夏镇城才恢复了元宁夏府路城的规模，仍为周长十九里三分。

正统以前的宁夏镇城范围只包括秦落院、副总兵宅、都察院和右卫衙门在内的以东部分，并以这些建筑物所在坊的西缘南北一线为界。在这条南北线以东有一座好像城楼的建筑物，与清和门之间的笔直街道构成东半城的中轴线。城的西半部主要是寺观、草场、手工业作坊、仓库和习射地，还有许多民房，多为正统以后所设置。正统以后，西半部也设置了许多王府，人口不断增多，但城的中轴线仍与西夏兴庆府、元宁夏府路城相同，仅街道格局有所变化。在太监宅与永祥寺之间，有一条与中轴线平行的南北大街，在振武门与光化门之间的大街以东，还有两条与它平行的南北大街。

城内的庆王府、寿阳王府、巩昌王府、弘农王府及帅府、总兵官宅、按察司、都察院、各卫衙门等机构均分散设置。这些重要机构的修建，事前并没有进行统一规划，而是见缝插针，故比较分散。庆王府建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座落在四鼓楼南，“萧墙高一丈二尺，周二里”，形状为正方形，布局整齐。嘉靖《新志》记载：府内建有逸乐园、迎宾馆等多处园林，仅设置的服务性机构就达13处之多。

镇城内的居民区主要有熙春、泰和等32坊。不过这时的坊只是居住区的名称，与唐代的坊市制度已有严格的区别。

宁夏镇城因为是军事重镇，所以城内为军事服务的手工业十分发达，有很多制造兵器的作坊，主要分布在城的西部，杂造局、兵车厂专门制造头盔、长枪、腰刀、弓箭，神机库制造贮藏枪炮……

宁夏镇城的商业非常繁荣，从这里通向各地的墩堡、深沟高垒都是商旅通行的安全道路。因而城内集市贸易十分活跃，全城共有六大类集市，即熙春、泰和等六坊的胡麻、糟糠、杂物市场；毓秀坊的苏杭杂货、鱼肉、瓜菜、五谷市场；感应坊的米市；清和坊的果品、颜料、山货贸易市场；修文、乐善等十九坊内的猪肉、羊肉市场；永春、迎薰等四坊的骡、马、猪等牲畜市场。从镇守宁夏的太监在城内拥有三座店铺来看，城内的固定商业店铺很多。镇城南关还设有“税课局”，所征收的商税“充边兵赏劳激劝之用”。

宁夏镇城还是明代宁夏地区的文化中心。城内有儒学、东号两所官学。儒学生员为军余子弟，规模很大，有房屋几百楹。天启元年（1621年）这里还特设商学，“以惠商人”。另外，城内还有养正书院（后改为揆文书院）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明史》卷117。

嘉靖《宁夏新志》卷1。

嘉靖《宁夏新志》卷1。

嘉靖《宁夏新志》卷1及《宁夏城图》。

嘉靖《宁夏新志》卷1。

嘉靖《宁夏新志》卷1。

《古今图书集成》第107册《方輿汇编·宁夏卫部》。

和朔方书院。

尽管明代的宁夏镇城是一座军事重镇，风景却非常优美，还是一座景色佳丽的园林城市。城外借四周湖塘建有丽景园、金波湖、南塘等风景区。城内修有乐游园、撷芳园、永春园等园林 50 多处。丽景园在城东门外，园内有台池、楼阁、花圃，景色迷人。金波湖在丽景园的青阳门外，“垂柳沿岸、青杨蔽日，中有荷菱，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南塘在城南门外，“植柳千株，濠以短墙，注以河流。周方百亩，菰蒲频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船，人目之如西湖，居民喜为乐土”。这些园林把宁夏镇城装扮得十分秀丽，显示了北国江南特有的风光。

清代的宁夏府城，顺治、康熙两朝屡有修筑。它的规模、布局在乾隆三年（1738 年）前与宁夏镇城是相同的，“周回十九里三分，高三丈六尺，城根阔二丈，外面包砖，四面共计六门”。乾隆三年的特大地震，使府城成为一片废墟，城墙、建筑物和园林全部被毁。乾隆五年重建府城，改建工程于六年竣工。新建的宁夏府城周长二千七百五十四丈，即十五里多，东西长四里五分，南北宽三里一分。

位于府城西北的满城，周长六里多，兴建于雍正元年（1723 年），乾隆三年被地震毁坏后，于乾隆五年向西迁 15 里，在今天火车站附近重建。新建的满城周回七里多，是一座方形的城。城墙的高度和厚度与府城相同，每面各开一门，门上有城楼，门外有瓮城，上布有炮台。城外有护城河，城内街巷整齐划一，东西、南北大街，把满城分成四大块，八旗军分片镇守。镶黄、正白镇东北部，正黄、正红镇西北部，镶白、正蓝镇东南部，镶红、镶蓝镇南部。整个满城是一座军营，城内设有火药局，城东门外有八旗教场，各旗都有军械库。

新建府城布局与以前相似，城内主要街道的格局也与明宁夏镇城相同。城西部马营、永祥寺、草场，以及城内马神庙、鼓楼、城隍庙、永静寺等建筑物的布局也与过去相仿。城内四鼓楼（今鼓楼），最初兴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1917 年重修。玉皇楼（今玉皇阁）大约是嘉庆后修建的。城外的海宝塔，被乾隆三年地震震坏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当地人民捐资重建。承天寺塔被震毁后，嘉庆时重新修复。

清代宁夏府城内，明代的豪华王府已不复存在，往日的坊市也被街巷所代替。据《宁夏府志》记载，城内街巷共有 127 条；街道的命名多以街巷内的建筑物、寺庙、衙门、市集贸易的主要商品，以及离城门的远近而定。

嘉靖《宁夏新志》卷 2。

嘉靖《宁夏新志》卷 2。

嘉靖《宁夏新志》卷 2。

《故宫档案·兵部右侍郎五十五第等奏折》。

《宁夏府志》卷 5。

《宁夏府志》卷 5、6。

《宁夏府志》卷 5、6。

《朔方道志》卷 4。

《宁夏府志》卷 6。

《宁夏府志》卷 6。

《宁夏府志》卷 6。

乾隆三年地震后，新建府城的商业也很繁荣，贯穿城内东西、南北的大什子街，“通衢四达，百货杂陈，商贾云集”。城内有米粮市、羊市、炭市、猪市、东西柴市、骡马市、查子市、青果市、蕃货市、木头市、故衣市、箱柜市等 17 类大市场，南关内仍设有课税局。

清代宁夏府城的文教事业也有新的发展，在明代儒学的基础上建有宁夏府学，并重新设置商学。雍正三年（1725 年）在府城东北建宁夏县学和宁朔县学。嘉庆四年（1799 年），城内又添设满营学校。另外，城内还有社学、银川书院等。

清代时，府城内的穆斯林人数大增，回族修建的建筑物也越来越多。清真寺由明代的一座发展为三座，除宁静寺西的礼拜寺外，在什字街北、镇远门南又修建了两座，府城已成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

新建府城的格局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也有一定变化。同治二年（1863 年），起义民众从振武门攻入城内，事后因此而封闭了振武门。振武门与光化门之间的道路也就不通了。民国初年，城内的街巷由原来的 127 条变成了 121 条，名称变化不大。1938 年，在马营的基础上修建了中山公园，成为城内最大的游乐胜地。

1913 年，宁夏府改为朔方道。1944 年，朔方道城更名银川，这是银川得名的开始⁽¹¹⁾。

（36）明清西安城

在西安城发展的历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就连它的名称也是明初才有的。明洪武二年（1369 年）三月，大将军徐达进兵奉元路，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一名和元代的安西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安定西北的意思。

由于西安既是控制西北、西南的咽喉，又是对付元朝余孽扩廓帖木儿的前哨阵地，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镇守其地。洪武三年，朱元璋遂封其次子为秦王。为了让秦王就藩，同年即在西安府城东北隅营建秦王府。秦王府城周长九里余，城墙包砌砖石，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南为端礼门，北为广智门，东为体仁门，西为尊义门。“宫殿轩敞，川园亭池极一时之丽观”。当时称

《宁夏府志》卷 6。

《宁夏府志》卷 6。

嘉庆《一统志》卷 264。

嘉庆《一统志》卷 264。

嘉庆《一统志》卷 264。

嘉庆《一统志》卷 264。

《宁夏府志》卷 2。

《朔方道志》卷 4。

《朔方道志》卷 4。

《朔方道志》卷 2。

《宁夏纪要》第 2 章。(11)《银川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明史》卷 124《扩廓帖木儿传》。

《明史》卷 116《秦王嵬传》。

《明史》卷 42《地理三》。

康熙《咸宁县志》卷 2。

为“王城”，后讹为“皇城”，也就是今天西安城内的“新城”。

今天的西安城墙是明洪武三年到十一年间修建的，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城“周四十里（此数字有误），高三丈，壕深二丈，阔八丈，门四，东长乐、西安定、南永宁、北安远”，“四隅角楼四，敌楼九十八座”。嘉靖五年（1526年），巡抚王荃重修城楼。隆庆二年（1568年），巡抚张祉给城墙外侧包砌了一层青砖。崇祯末年，巡抚孙传庭又修了南、北、西关城，今西安城的规模到此已完全具备。

明初修建的西安城，除西、南两面仍依韩建“新城”的位置外，北、东两面向外约扩展了三分之一。

扩大以后的西安城，其城内布局大致仍依旧城，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十七年（1384年）分别修建了鼓楼和钟楼，其位置与元代的敬时楼（鼓楼）和钟楼无异。万历十年（1582年）移钟楼于今天的位置，一无所改，按原样重建起来，才使城内格局有所变化。从此以后，四条大街以钟楼为中心辐射出去，使城市建设有了明显的中轴线（并不在正中）。当然，由于迁就旧城的格局，城内主要建筑物已无法对称布设。布政使司和西安府治东西一线，均在西大街以北，大致位于今社会三路与北院门大街之间。西安府署即元代的奉元路址（今省文化厅招待所），布政使司署即元代的行省治所（今社会三路）。巡抚院署在布政使司署西北，即今北院门西安市政府所在地。按察使署在鼓楼以西，也就是元代的御史台所在地，即今化觉巷南段偏西处。贡院在安定门内以北，今为儿童公园。长安县署在按察司署以西，即今西安教育学院所在地。咸宁县署在布政使司署东南三里许，即今县门北街以北处。从城内重要机关的布设可以看出，明代西安城的重心是在西半部，东半部虽然向外展出，但仅有秦王府和咸宁县署，说明新建的西安城与元奉元城之间的依存关系。

清代占有西安后，城内布设仍依明代之旧，但在城的东北隅修建了一座满洲驻防城，在城的东南隅修建了汉军驻防城，以及在钟楼西南修建了总督部院署等。

顺治六年（1649年）以明秦王府城改筑为满城。但满城的范围远比秦王府城为大，把秦王府城完全包入城内，改为八旗教场。满城的面积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北墙和东墙也就是西安城的城墙。只有西墙是从钟楼的东北面起，沿北大街经西华门、后宰门街西口到北门的东侧；南墙是从钟楼的东南角起，沿东大街经端履门、大菜（差）市到东门的南侧。城周长7千米左右，东西广2千米左右，南北1.5千米左右。满城共计6门，除在今后宰门街西口、西华门、端履门、大差市各开1门外，钟楼的东穿洞是

康熙《咸宁县志》卷2。

雍正《陕西通志》卷14《城池》。

雍正《陕西通志》卷14《城池》。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31；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5《地理考下》引《钟楼碑记》。原碑存钟楼内西墙上。

雍正《陕西通志》卷15《公署》。

雍正《陕西通志》卷14。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4《地理考上》

它的西门，东城门是它的东门。满城内的基本格局，从嘉庆《咸宁县志·图》和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图》来看，街巷十分密集，将军署在今后宰门街以南，右翼署在今南新街以西，左翼署在今西安市体育场附近，火药库和兵库在今城的东北角，东岳庙在今东门以北等等。

由于西安城的东南地势最高，为了加强对西安城的统治，满清统治者也曾在今大差市向南筑墙，直抵今城的南垣，作为它的西墙，该墙以东即汉军驻防区。乾隆四年（1739年）在西墙上开门一座，曰通化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汉军虽然被调出城外，但火药库仍设在这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所设立的军装局，仍位于汉军驻防城以西，即今东县门西安市第八中学内。这就说明，对城东南隅这个制高点，统治者总是要千方百计加以利用的。

清代还在今钟楼西南的南院门修建了总督部院署。顺治初年，陕甘总督曾由固原移驻西安。乾隆二十四（1759年）又移治兰州，总督部院遂为行署。光绪十四年（1888年）又把北院的巡抚部院署移于总督行署，谓之南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之役，北京失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遂以北院为行宫。然事出仓促，行宫惟终南仙馆植有花木，并有水池和小方壶堂等建筑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于南院巡抚署外甬道左右建楼十楹，招商居住，署外甬道遂成为西安城内最主要的商业区之一。清代西安城的重心仍在西半部，西大街附近为官署所在，也是西安城内主要的商业街。与西大街相通的许多街巷，也都是手工业的聚集地，如竹笆市、广济街等。东关为西安城东出大道的必经之地，商业也很繁荣，成为西安城四关中最繁华的所在。

西安城的东南部还是明清两代的文化区，这里有文庙、碑林、关中书院（今西安师范）、府学、县学、陕西高等学堂（今东厅门西安市20中学）等。

（37）民国西安城

在民国时期，尽管对西安城市建设建树甚少，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以来的格局，但由于满城的铲除和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城市布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11年10月22日（阴历9月1日），西安与湖南同时响应辛亥革命，在西安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军攻克满城，使禁锢了二三百年的西安城东北隅，又重新与全城打成了一片。可是满城在这次战火中被彻底焚毁，成为一片瓦砾堆，破烂不堪，荒无人烟，反而成为西安城内的一个死角。后来又拆毁了满城城墙，加宽了东大街。

直到1921年冯玉祥第一次督陕时，才在原秦王府城（即八旗教场）修盖

《西安光复的回忆》，《西安晚报》1961年10月10日。

嘉庆《咸宁县志》卷6《纪事沿革表下》。

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13。

嘉庆《咸宁县志》卷13《衙署志》；嘉庆《一统志》卷227《西安府一》。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8《衙署志》。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8《衙署志》，卷4、5《地理志上、下》。

王桐龄：《陕西旅行记》第23页，文化学社，民国17年。

房屋，驻扎军队。1927年陕西省政府从北院门移至王城（当时名红城），同时改名新城，今新城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从此以后，新城就成为西安城的行政中心，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先后设在这里。从1928年起，原满城区被辟为新市区，西安市政府在这里规划道路，拍卖荒地。首先开辟了东、西、南、北四条新街，沟通了新市区与城内主要大街的联系。后来在北新街一带陆续盖起了“一德庄”、“四皓庄”（今尚平路以东）、“五福庄”、“六谷庄”（尚平路以西），以及“七贤庄”（北新街东）等新村，成为西安城内新的住宅区，今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所在地，就是当时租用资本家所盖新房的一部分。这里所以被选作新的住宅区，除地皮广阔以外，主要还是距离新的政治中心新城北门较近，又有革命公园（1926年刘镇华围城时死难烈士的公墓）、森林公园（今西安市体育场）足资游玩的缘故。

新市区的东半部，随着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区。根据《陕行汇刊》的统计，1942年3月以前，设在新市区的崇孝路（今东一路）、崇悌路（今东二路）、崇学路（今东三路）、崇礼路（今东五路）、崇耻路（今东八路）、新化巷（今西一路西段）、尚俭路、尚仁路（今解放路）、尚德路和红十字会街的新式工厂就有16家。当时西安的新式工厂共有64家，设在新市区的就占了25%以上。若再加上火车站附近的10家，新市区及其以北的新式工厂就占了49%以上。譬如，当时规模最大、资本最雄厚的大华纱厂（250万元），就设在新市区以北的火车站附近。另外，从火车站直通东大街的尚仁路，是新市区的主干道，交通便利，新市区的工厂均布设在附近。

满城被拆除后，开辟和整修了东大街，使东大街成为西安城内最宽畅的街道。当时，张凤翔凭借官府的力量修盖了东大街的街房，其高低尺寸及南北距离均完全一致，各房檐下都有走廊，门面以九间为一组，整齐划一，甚为壮观。由于东大街新房林立，街道宽畅，又距火车站和汽车总站（今西一路东段）均较近，终于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西安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它集中了当时城内最主要的行业，如绸缎、茶叶、纸烟、药房、干鲜鱼类、水果、五金等，以及最著名的饭馆和旅馆，如义仙楼、曲江春、长乐楼、王顺楼、西来堂、北平饭馆、西北饭店、长安公寓、关中旅馆等，生意兴隆，气象一新。原来的商业中心西大街、南院门、东关等反而有所逊色，有些逐渐萧条下去。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失守，大批难民拥入西安，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尚仁路一带。他们为了谋生和支援抗战，大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新市区的尚仁路（今解放路）就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西安城内的商业重心就完全集中到城的东半部。东大街和尚仁路均距火车站较近，商业发展迅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1927年12月《陕西省政府公报》。

《陕西省政府施政成绩报告》1933年7—12期。

《陕行汇刊》10期。

《全国铁路发展简史》（铁道部编印）。

陈光堉《西京之现况》第5页、31页，启明学社，民国22年。

根据《陕行汇刊》统计。

陈光堉《西京之现况》第5页、31页，启明学社，民国22年。

《陕行汇刊》卷8。

民国时西安不仅市政建设进展缓慢，而且还是一座大兵营。市中心的钟楼、鼓楼，以及小雁塔、东西南北四个城楼（北门为箭楼）上都驻有军队。胡宗南的官邸就在东仓门（今东仓巷）一号，他的参谋部就设在小雁塔。然而，在市政建设方面却连吃水、照明都未能解决，其他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了。全城照明仅靠一家小小的西京电厂，灯光昏暗不堪，而吃水却只有西瓮城的一口甜水井，广大人民依旧饮用咸水。市内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连今解放路还基本上是草棚毛庵。街道坎坷不平，一下雨泥泞不堪，十分难走。

中国的地方城市，虽然不像首都那样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的，但在城市平面布局方面也有许多特点，对当前的城市建设仍有参考价值。

首先是衙署占据重要位置。在地方城市中衙署是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所在地，往往占据有利地形或位于城的中部，既居高临下，又便于居中指挥。唐扬州城的衙署位于蜀岗之上，宋平江城（今苏州）的衙署位于全城的中部子城内，就是典型代表。县城也不例外，譬如陕西神木县衙位于城的东北隅，居高临下；山西太谷县衙位于城中部“丁”字形干道的北侧，平遥县衙位于城中部偏西地区，便于居中指挥，都体现了衙署在城市布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其次是城市多沿河道和交通干线扩展。中国县级以上城市都毫无例外地分布在水陆交通干线之上，而且多数在河流的沿岸，因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就沿河流或交通干线展开。景德镇、兰州、武汉、重庆、天津、上海等都是沿河流扩展的城市；平遥、太谷、太原、西安、郑州等都是沿陆路交通线扩展的城市；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等都是沿水路交通线扩展的城市；泉州、广州、青岛等都是沿海港扩展的城市。

第三是街道多为东西、南北向。由于中国地方城市的格局受到首都布局的影响，街道多呈“十”字、“井”字或“丁”字形，为东西、南北走向。这与中国城市的形制多为方形和矩形有关，街道与城墙的走向大体一致。当然，这种街道格局也使城市显得整齐、大方，使居民区比较容易安排。同时，“天圆地方”这种观念，也要求街道东西、南北端直，因此，端直的街道格局也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第四是居民区多为方形或矩形。中国城市的居民区犹如城的形状一样，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均被街巷所分割。唐以前称为里坊，里坊有围墙，直到现在，位于新疆吐鲁蕃以西的唐代交河古城遗址，坊墙仍历历在目，进入坊墙后，才能看到院落的门户。唐以后的居民区已沿街巷布设，但作为住宅的院落来说，仍为方形或矩形，显然同中国古老的房屋结构有密切关系。

第五是城市平面布局多按功能分区。也就是说有官衙区、手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园林区、居民区等。当然，每个城市未必都整齐划一，把城市严格区分为不同功能区域，但相对集中、各有不同特色的区域也就成为不同的分区。譬如官署区、市场区、文庙、居民区，是县级以上城市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市场在唐代以前有固定区域，只有扬州例外，唐以后沿街布设，但并不是每条街都成为商业街。文庙是县级以上城市必须建立的，而县学、府学也往往在它的附近，形成文化区。

第六是交通干道多呈辐射式，由城区向四周放射。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是由城墙固定的，随着市区的扩展，通向四周的干道就以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去，城区就成为城市对外联系的中心。近代以来的大城市，这种辐射式交通网就更加明显。城市愈大，辐射的范围就愈广，城市的腹地也就愈大，

也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就是中、小城市也各有自己的辐射范围，构成中国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

城市平面布局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所谓城市规划也就是依据城市的基本形态，框定城市的平面模式，使城市的范围、各种功能区都跃然纸上，限定和指导城市的发展。中国的首都和许多地方城市都是经过精心规划而建成的，遗留到今天的城市平面图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西安碑林的《唐长安城图》，苏州文庙的宋《平江图》，桂林鸚鵡山《静江府城池图》（即桂林图），都是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典型代表。

八、中国城市的水源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人口集中的所在，城市供水历来受到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不仅城市如此，就是原始社会的居民点也要靠近水源，现在已经发现的关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无不分布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就说明这一点。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除平原开阔、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外，主要是为了就近取水方便。河流的二级阶地一般高出河面 10—20 米，既不易受到洪水的冲击，又能就近取水，自然最为方便。就是凿井技术发明以后，原始社会的许多遗址还是分布在河流的沿岸，证明依靠河流供水仍然是重要的供水形式。中国最早的水井就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仰韶文化遗址和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已处于原始社会的中后期。由于水井的出现，人类的聚落才可以远离河流、湖泊。但水井水量有限，大的城邑仍分布在河流、湖泊沿岸，夏、商、周三代的城邑就是证明。夏代先后建都的地方有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晋阳（今山西临汾，即平阳）、安邑（今山西夏县）等 10 处，主要位于颍水、汾水、沁水、河水等沿岸。商代先后建都的地方有商（今河南商丘）、亳（今河南郑州）、殷（今河南安阳）等 11 处，主要位于睢水、洹水、河水及其支流沿岸。周代在迁都丰京以前，先后建都的地方有郃（今陕西杨陵西南）、豳（今陕西长武、彬县一带）、岐（今陕西岐山、扶风交界地区的周原）等 11 处，加上丰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沔河西岸）、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沔河东岸），合计 13 处，主要有郃、豳、岐、丰、镐 5 处，位于渭水、泾水、沔水、畴沟河沿岸。由此可见，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大都位于河流的沿岸，显然同就近解决供水问题有密切关系。至于它们为什么不断迁都，历来有不同说法，恐怕主要还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但迁来迁去，都离不开河流，正好证明河流在解决都城供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周是中国城市产生的具体时代，中国城市产生以后，一直对解决水源问题非常重视。这也是中国城市兴旺发达、延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当前又提出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是中国城市宏观布局的重要原则，值得重视。

1. 河流与城址选择

水源丰富是中国城市城址选择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水源丰富指地面水和地下水而言，而以地面来水为主，即既有河流，又降水充沛。也只有地面来水丰沛，地下水的开采才有保证，因为地下水往往要地面水来补给，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地下水就会发生危机，供不应求。正因为如此，中国城市的城址多数都在河流的沿岸，几乎少有例外。

都城城址与河流 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多数在河流沿岸，已如上述。从秦以后，各统一王朝的都城也毫不例外都在大河的沿岸，就是分裂割据王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148 页；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 4 期。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及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民国二十四年版。

马正林：《夏人迁都及原因》、《商人迁都及原因》、《周人迁都及原因》，《中学历史报》1992 年 10 月 1 日，12 月 1 日，1993 年 1 月 21 日。

牟海省、刘昌明：《我国城市设置与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协调研究刍议》，《地理学报》1994 年第 4 期。

朝的都城也绝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或靠近河流，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都城发展的必然规律。首都是全国或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建设宏伟，园林如画，用水量巨大，如果没有地面供水，仅靠地下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都城城址必须选择在河流沿岸，就几乎成为不可抗拒的规律。

在今西安建都的有 10 个朝代，亦有 11 朝、12 朝、13 朝、14 朝之说。但只有四个城址，即西周丰镐，位于沔河两岸；秦都咸阳，横跨渭河南北；汉都长安，位于渭河以南、龙首原以北；隋唐长安，位于渭河、龙首原以南，灞、浐河以西，沔、潏河以东，都在河流的沿岸。城址愈转移，愈靠近渭河的重要支流，城市供水也愈加充沛。在这四座城址中，只有秦咸阳引用渭河，这就是引渭水入兰池的渠道。兰池遗址即今咸阳市东的杨家湾。其他城市都不引用渭水，而是引用渭水的支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洛阳建都的有 6 个朝代，号称 9 朝古都，即加上隋唐的东都和后梁初年，亦有 13 朝之说。但只有三个城址，即东周的王城，位于洛水以北，涧水（即谷水）以东，瀍水以西，也就是今天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洛阳城，位于洛水以北，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东 1 千米处；隋唐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横跨洛水南北，都离不开洛河。

在今南京建都的有 8 个朝代，有三处城址，即六朝的建业城和建康城，南唐的江宁府城，明初的南京城。这三处城址均位于今南京市、长江岸上，互相重叠或相距不远，但也有一定差异。六朝的城址位于今玄武湖之南的南京市中部，靠近湖泊和秦淮河。南唐时城址南移，横跨秦淮河，靠近长江。明南京城规模宏大，包上述城址于城内，不仅横跨秦淮河，而且更靠近长江。

在开封建都的有 6 个朝代，只有一座城址，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市。战国时魏国的大梁城东部、南部与今开封城重合，只有西部、北部迤出今开封城。梁、晋、汉、周和北宋的开封城，大致即今开封城，而北宋的开封外城早已不复存在。上述城址基本重合，位于黄河之南、汴水岸上。

在杭州建都的有两个朝代，只有一座城址。吴越的城最大，南宋次之，今杭州城较小，是元末奠定的。城的范围虽缩小，但城址却不断向东展出，更加靠近钱塘江。

在北京建都的有 5 个朝代，三座城址。早在商代，北京地区的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燕建都于今房山县琉璃河（今名大石河）岸上的董家林，蓟建都于今北京西南部的广安门一带。西周时分封的燕国也建都于董家林一带，强大后灭掉蓟国，遂迁都于蓟，蓟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都城，也就是北京最早的城址，位于灏水（今永定河）以北的洗马沟岸上。辽的南京城和金的中都城都是蓟城的延续和发展。元代把城址转移到蓟城东北，另建大都城，横跨高粱河。明代把元大都城北墙内缩，南墙展出，另建北京内城，中叶时又建北京外城，城址南移，不仅横跨高粱河，更靠近洗马沟和灏水。

六大古都的城址很典型，其他古都也不例外，城址均位于河流岸上。譬如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就是如此。

西晋灭亡后，南方为东晋，北方为十六国。“十六国”一名，起源于北

《括地志》卷 1 引《三秦记》。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10 页图，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

魏崔鸿著的《十六国春秋》一书。十六国是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实际上还有代、冉魏、西燕等国，不少于20个国家。前赵、前秦、后秦建都长安，也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西安，无需再述。成汉建都成都，位于长江（即岷江）岸上；后赵、冉魏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距离漳水不远；前凉、后凉、南凉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位于谷水（今五羊河）岸上；前燕建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17.5千米处），位于漳水岸上；代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距离黄河不远；后燕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位于泲水岸上；西秦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位于黄河岸上；北凉建都张掖（今甘肃张掖西），位于弱水岸上；西凉建都酒泉（今甘肃酒泉），位于北大河岸上；南燕建都广固（今山东淄博西），位于淄水岸上；北燕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位于渝水（今大凌河）岸上；夏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位于无定河岸上；西燕建都长子（今山西长治），位于浊漳水岸上。几乎无一例外，都在河流的沿岸，或距河流不远。

南北朝时的北朝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朝指宋、齐、梁、陈，共计9个朝代。北朝建都的城市有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长安和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南朝就是建康（今江苏南京）。其中长安、洛阳、建康均为六大古都中的城市，只有平城位于浑水（今桑干河支流）岸上，邺位于漳水岸上，也都在河流的沿岸。

五代十国指5个朝代和10个国家，5个朝代为梁、唐、晋、汉、周，10国为前蜀、后蜀、楚、闽、南汉、南平、北汉、吴、南唐、吴越。五土建都开封和洛阳，南唐建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均为六大古都中的城市。前、后蜀建都成都府，位于长江（岷江）岸上；楚建都长沙府，位于湘水岸上；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建福州），位于建阳溪（闽江）岸上；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东广州），位于浚水（今珠江）岸上；南平建都江陵府，位于长江岸上；北汉建都太原府，位于汾水岸上；吴建都江都府（今江苏扬州），位于长江岸上；吴越建都西府（今浙江杭州），位于钱塘江岸上。共计11个城市，无一例外，均位于河流的沿岸。

以上三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多的时期，都城都毫无例外位于河流的沿岸，其他时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中国的都城离不开河流，已成为一条基本规律。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城市供水和水路交通问题。

其他城址与河流 其他城市就是指都城以外的城市，即省、府州、县城。中国历史上的省级城市较少，其次为府州级城市，最多的为县级城市。省级城市以数十计，府州级城市以数百计，县级城市以数千计。

今天的省级城市大都为历史名城，从这些城市的位置也可以看出省级城市选址与河流的关系。上海、天津、重庆为直辖市，也可以按省会城市对待。除北京外，全国共有31个省级城市，这就是上海、天津、重庆、石家庄、太原、济南、郑州、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合肥、杭州、武汉、南昌、长沙、福州、广州、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成都、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拉萨、台北。南京、杭州、西安为六大古都中的城市，其余28个城的城址都位于河流的沿岸，或靠近河流。上海位于黄浦江岸上，天津位于海河岸上，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岸上，石家庄位于洮河

岸上，太原位于汾河岸上，济南位于小清河岸上，郑州位于贾鲁河岸上，呼和浩特位于清水河岸上，沈阳位于太子河岸上，长春位于伊通河岸上，哈尔滨位于松花江岸上，合肥位于南肥水岸上，武汉位于长江岸上，南昌位于赣江岸上，长沙位于湘江岸上，福州位于闽江岸上，广州位于珠江岸上，南宁位于邕江岸上，海口位于南渡江岸上，贵阳位于南明河岸上，昆明位于盘龙江岸上，成都位于岷江岸上，兰州位于黄河岸上，银川位于黄河岸上，西宁位于湟水岸上，乌鲁木齐位于乌鲁木齐河岸上，拉萨位于拉萨河岸上，台北位于淡水岸上，几乎无一例外。

府州级城市数量众多，明代有 140 府，193 州，羁縻府 19，州 47，合计 399 个府州。清代全国有府州厅县 1700 有奇，估计府州厅（省辖厅）级城市可能与明代相仿佛，也就是三四百数。这些城市的城址绝大多数也位于河流岸上，下面以陕西省为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清代陕西省有府州级城市共 12 个，除西安外为 11 个城市，即榆林、绥德、延安、富州、同州、彬州、乾州、凤翔、汉中、兴安、商州。榆林位于榆溪河岸上，绥德位于大理河岸上，延安位于延水岸上，富州（今富县）位于洛水岸上，同州（今大荔）位于洛水岸上，彬州位于泾水岸上，乾州位于漠谷水岸上，凤翔位于雍河岸上，汉中、安康均位于汉水岸上，商州（今商州市）位于丹水岸上，也无一例外。

清代全国的县级城市有 1500 左右，雍正时陕西省有 59 个州县，以关中地区为例，同样可以证明县级城市的选址也多在河流沿岸。雍正时西安府辖有耀州（今耀县）、长安、咸宁、咸阳、兴平、临潼、高陵、户县、蓝田、泾阳、三原、周至、渭南、富平、礼泉、同官（今铜川）等 16 州县；凤翔府辖有陇州、凤翔、岐山、宝鸡、扶风、眉县、麟游、汧阳等 8 州县；同州府辖有华州、朝邑、合阳、澄城、韩城、大荔、华阴、蒲城、潼关、白水等 10 州县；乾州辖有武功、永寿等 2 县；彬州辖有三水、淳化、长武等 3 县，共有 39 个州县。其中长安、咸宁、咸阳、兴平、渭南、宝鸡、眉县、华州、华阴、潼关等均位于渭水岸上，耀州、同官位于同官川岸上，临潼位于潼水岸上，户县位于涝水岸上，蓝田位于灞水岸上，泾阳位于泾水岸上，淳化、三原位于冶谷水岸上，周至位于黑水岸上，富平位于石川水岸上，礼泉位于甘谷水岸上，陇州、汧阳位于汧水岸上，凤翔位于雍河岸上，岐山位于潢河岸上，扶风位于沔水岸上，麟游位于杜水岸上，朝邑、大荔位于洛水岸上，合阳位于金水岸上，澄城位于县西河岸上，韩城位于涇水岸上，白水位于白水岸上，武功位于武亭水岸上，永寿位于漠谷水岸上，三水（今旬邑）位于三水河岸上，长武位于鸦儿沟岸上，只有高陵、蒲城二县不在河流岸上，证明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城址同样离不开河流。高陵、蒲城二县地处大平原的中心，为适应中心位置的需要，城址离开河流也是应该的。

陕西省府州县级城市的城址多数在河流沿岸，可以说是全国府州县级城市的一个缩影，具有代表性。进一步证明府州县级城市的城址选择，与省级城市一样，同样离不开河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2. 城址与河流关系密切的原因

中国城市的城址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城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第 101—104 页，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市城址选择的普遍规律。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实体出现于中华大地，它具有不同于农村的特殊功能，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址都是经过精心选择以后才定下来的。既然经过精心选择，其城址就必须符合城市发展的一切必要条件，对地理条件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在中国，只有河流沿岸地理条件最优越，城址多选择在河流沿岸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

土地平坦 中国的大平原都在东部，而西部则多大山、高原，从总体上说，平原少，山岳、高原、丘陵多，这对中国城市城址的选择具有极大的制约性。但山高水高，中国的河流遍布祖国大地，几乎无处不有处处有，大小河流无计其数，《水经注》记载的 1252 条，恐怕也不是全部。河流沿岸大都有平坦的土地，只是面积有大有小而已。这就为城址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具备一块平坦的土地才能筑城建邑，兴起城市，对西部的城市来说尤其如此。从古到今，把县级以上城市修建在山顶之上的确实为数甚少，山西的保德县、陕西的吴堡县城等原在山顶之上，现在也下到平川，只有陕西佳县城仍在山顶之上，这在全国来说恐怕仅此一例了。县级以上城市都需要较大的地理空间，而河流沿岸的平地恰好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国多数城址都选择在河流的沿岸，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城市城址选择规律的具体表现之一。

物产丰盈 中国的河流沿岸不仅土地平坦，而且往往又是物产丰盈的所在。河流沿岸土壤肥沃，是最早的农业地区。农业经济虽然不是城市兴起的支柱产业，但中国的城市一直未能同农村脱离关系，城内居住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因此，中国城市就多集中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兴起。城市人口众多，粮食销量十分可观，就近供应是中国多数城市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方法。农业经济发达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城市兴起的重要支柱。当然，物产丰盈不仅仅指农业，河流中的水产也应包括在内。

供水方便 城市离不开水源，没有水源的城市是无法生存的。而靠近河流是城市解决水源的主要途径。原始社会的村落遗址多数都在河流沿岸，目的就是为了解取水方便。村落的人口较少尚且如此，城市出现以后，成为人口密集的所在，城址选择就更要接近水源，就近解决供水问题。河流犹如条条银白色的乳带，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供养了城市。小城市可以采用地下水，而大城市仅靠地下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建国以来西安等大城市供水的经验教训都是证明。由此可见，有了深井技术开采地下水尚且不能满足需要，而在没有深井技术的情况下，大城市供水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国的多数城市离不开河流，就是为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

交通便利 城市是全国或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址必须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区，不言自明。交通条件有陆路和水路交通之分，而河流及其沿岸往往二者兼得，既陆路交通方便，又水路交通方便。中国的陆路交通线，在平原地区以距离近、最为便捷为原则，形成许多习惯线。而在山岳、高原、丘陵地区，则沿河流展开，伸展到很远的地区。同时，许多河流又有舟楫之利，是水路交通线的干道。正因为河流及其沿岸是水陆交通最便利的所在，城市城址离不开河流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交通是城市兴起的杠杆，中国所有城市都位于水陆交通线之上，河流既有水路之利，又为陆路交通提供了方便，城址与河流自然会结下不解之缘。

《大唐六典》卷 7。赵永复认为总数当超过 3000 条，见《历史地理》第 2 辑 115 页。

3. 湖泊与城址

中国的湖泊数以万计，仅 1 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就有 2800 多个，面积 8 万多平方千米。著名的大湖有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太湖、巢湖、青海湖、赛里木湖、呼伦池、松花湖、镜泊湖、滇池、洱海、纳木湖、罗布泊等。其中青海湖、赛里木湖、纳木湖、罗布泊等为咸水湖，湖水难以引用，湖岸也就无法兴建城市。其他都为著名的淡水湖，湖岸也少有城址，却是值得研究的。像岳阳位于洞庭湖岸上，昆明位于滇池岸上，巢县位于巢湖岸上，洪泽、盱眙位于洪泽湖岸上，高邮位于高邮湖岸上，微山位于微山湖岸上等，实在很少，与湖泊星罗棋布的形势极不相称。实际上岳阳、洪泽、盱眙、高邮、微山诸城市，都是洞庭湖、洪泽湖、高邮湖、微山湖膨胀以后才位于诸湖岸上，原来并非如此。譬如今天的岳阳就是西晋的巴陵郡，而西晋时巴陵郡距洞庭湖还有相当距离。后来由于洞庭湖的膨胀，巴陵才位于洞庭湖岸上。在上述县级以上城市中，真正位于湖岸上的只有巢县和昆明。今天的巢县即南朝的蕲县，位于巢湖岸上。昆明市即元代的昆明县，位于滇池岸上。巢湖、滇池都为地质构造时期的断陷湖泊，湖盆深陷，范围清晰，既有入湖之水，又有出湖河流，水位比较稳定，巢湖与长江相通，滇池与金沙江相通，水位稳定就成为自然之势。位于湖岸上的巢县、昆明城址稳定，当与不受湖水水位升高的威胁有密切关系。

从总体上说，位于湖岸的城市比较少，几乎屈指可数，其原因就是中国多数大湖沿岸不适宜于兴建城市。首先是湖面盈缩不定，洪水威胁城市安全。中国的著名大湖几乎都有这个问题。像鄱江湖、洞庭湖、洪泽湖等，都是湖面盈缩最剧烈的湖泊。注入鄱阳湖的大河主要有赣江、抚江等，为江西境内诸河的蓄洪湖，可减轻长江汛期洪水的压力。这是由于鄱阳湖口地势较高，长江很难倒灌入湖。但由于湖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南部沉降明显，湖区不断向南扩大。汉代的鄱阳湖只有湖口一段，南宋时周回达 200 余里，明清时更扩展到 500 余里，今天又有缩小的趋势。注入洞庭湖的主要河流有湘、资、沅、澧等，并受长江灌注，南北朝时“湖水广圆五百余里”，元明时周回达“八九百里”，而现已分割成许多小湖，只有岳阳市西南的湖体较大，仍保留了洞庭湖的名称。洪泽湖本来是淮河以南的几个小湖，称为破釜塘、白水塘。明清两代修筑高家堰，“蓄清敌黄”，借湖水济运，终于使洪泽湖膨胀成今日的规模。仅以此三湖为例，就可以证明大湖水体盈缩不定，威胁城市安全，是大湖沿岸城市稀少的根本原因。其次是水质差，无法解决城市供水问题。像青海湖、赛里木湖、纳木湖等，水体广阔，但却是盐湖，无法饮用。青海湖面积达 4583 平方千米，为中国第一大湖，湖岸上没有一个县级以上城市，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青海湖周围地势虽高，但较平坦，自然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湖岸上未能形成城市，只能用水质差来解释。

4. 水源与城市发展

水源是城市兴起与发展的生命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没有水源的城市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历史上被废弃的城市很多，除战争破坏外，由于缺水而终止了生命的城市也不在少数。尤其是位于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城市更是如此。西汉时位于今新疆地区的许多城邦国家，后来销声匿迹，未见于史册，

《水经注》卷 38《湘水注》。

嘉靖《常德县志》卷 2《地理志·山川》。

成为废墟，固然原因很多，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河流改道，水源奇缺，绿洲消失，城址废弃。内地的城市也有这种情况，譬如西汉的美阳县，位于陕西扶风法门镇，东临美阳河。由于河流下切，地下水愈来愈深，供水困难。东汉时美阳县只好迁址，迁于今武功县西北重建。中国历史上县级城市的迁徙最为频繁，除自然环境变迁、人为破坏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源不足，城市无法延续和发展。水源对城市发展所以如此重要，因为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对城市来说也不例外。

城市人口众多 城市是人口最集中的所在，现在如此，古代亦然。县级城市规模较小。但就一个县来说，也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中国的县城大多在1平方千米左右，人口也就是数万人。县级以上城市规模都比较大，尤以首都规模最大。从春秋战国起，中国首都的规模绝大多数在10平方千米以上，尤其是统一王朝的首都更多在数十平方千米以上。人口数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和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几乎代代都有。这么多的人口集中在一起，既要吃水，又要生活用水，没有充足的水源是不可想象的。缺少水源的城市寸步难行，更不要说向前发展了。

城市建设宏伟 中国的县级城市数量众多，县级以上城市为数也不少，建设宏伟则是每一个城市的基本特色。县级城市财力有限，市政建设也有一定限度，而县级以上城市，尤其是首都的建设宏伟壮观，则无一例外。城市基本建设除石、木、土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水了，水资源丰富。不管是土木结构、石木结构、砖木结构，离了水都是无法建成房子的。城市是建筑群集中的地方，城市建设中用水量巨大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一个城市的建筑群能够拔地而起，水源丰富正是建设宏伟的基本条件。

城市风景区壮阔 中国的县级城市未必都有专门的风景区，但县级以上城市，尤其是首都则有众多的风景区。中国城市的著名风景区，无不取山水之美，叠山理水，依托山水，把自然美和人工美巧妙地结合起来，山水交相辉映，相谐成趣，造成犹如天仙胜境的壮丽风景区。古今中外，没有水的风景区只能死气沉沉，谈不上天仙胜境。中国城市要建造最壮丽的风景区，就必须解决水源问题。事实上，中国城市的著名风景区都有丰富的水源。丰富的水源是城市披上绿色盛妆、壮丽无比的基本条件。

城市水路交通方便 中国城市往往都是陆路交通的中心。县、府州、省级城市也就是一个地区的陆路交通中心，而首都则是全国陆路交通的中心。但是许多城市千方百计开辟水路交通，使城市成为水陆交通的中心。尤其是地处内陆的城市更是如此。汉、隋唐建都西安时期，先后四次开凿漕渠，把长安的水路交通与全国水运干线贯通，使长安成为全国水运网的起点。就是西安失掉国都地位以后，渭河水运一直断断续续维持到本世纪30年代，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以后，渭河水运才彻底衰败下去。由此证明，城市靠近河流，开辟水路交通，使城市成为水陆交通的中心，将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内陆城市尚且如此，位于河网地区的城市不言自明。水源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生命线，由水路交通也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有水路交通的城市和没有水路交通的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城市风貌各异，二者是大有分野的。因此，凡能开辟水运交通线的城市，无不力争开辟水运交通线，使水源在城市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5. 中国城市的供水

由于水源对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大小城市无不

重视城市供水问题，只是在开辟地面水源和地下水源上略有差异而已。中国的都城规模宏大，人口众多，历来以开辟地面水源为主，地下水源为辅。一般城市则恰好相反，以开辟地下水源为主，引用地面水源为辅。这是由于首都往往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选择城址的余地较大，可以争取到地面来水；一般城市则不然，选择城址的余地较小，人口也少，仅用地下水供水已能解决问题，不一定都要争取地面水供水。因此，中国的都城供水与一般城市的供水采用不同的供水形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1）中国著名都城的供水

地面水供水 中国的著名都城无不以地面水供水为主，地下水供水为辅，使城市水源丰沛，供水源源不绝。下面仅举数例，以窥豹之一斑。

西安 西安是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建都的地方，城市地面水供水系统十分完备，开创了中国都城地面供水为主的先河，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供水问题，为中国都城解决水源树立了样板。

周代丰镐横跨沔水，自然靠沔河供水。秦咸阳横跨渭水，引渭河水开凿兰池，兰池位于今咸阳市东杨家湾。从当地地形判断，兰池既为风景区，秦始皇曾微行夜出，“逢盗兰池”，又是咸阳的人工蓄水库，可能供给咸阳县东南地区用水。作为咸阳重要组成部分的阿房宫，位于西安西郊大古村和赵家堡之间，恰好西临漓水，东濒漓水，“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为阿房宫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秦咸阳地面水供水不足是它向渭河以南转移的根本原因。

西汉长安城开辟了中国都城地面水供水的新格局，第一次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都城的供水问题，是亘古以来的重大事件，开始了中国城市供水的新纪元。西汉初年，长安的水源主要来自城西漓水，同时凿井，引用地下水。到了中叶，长安城人口大增，才不得不大规模地开辟水源，开凿渠道，引用地面水。

由于龙首原呈西南、东北走向横卧在长安城南，从长安城的东南引水自然受到阻隔，因此，只有从长安城的西南着眼才能解决长安城的水源。长安城西南有漓、沔、泾三条河流。在这三条河流中，漓、沔为渭河的支流，只有泾河为沔河的支流。沔河为渭南大川，洪水量大，西汉不选作水源，完全是为了长安城的安全。泾河距离长安城较远，又有细柳原的阻隔，选作水源是最为合适的。细柳原北侧又有良好的库址，能够拦蓄丰富的水源。开源和拦蓄是长安城解决水源的成功经验，创造了人间奇迹。

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发谪吏穿昆明池”。“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由此证明，西汉开凿昆明池完全是为了解决长安城的水源。昆明池位于长安城西南，即今斗门镇东南的一片洼地，经过实测，面积达10平方千米。

昆明池的水源来自泾水。西汉中叶，在今长安县西堰头村修筑石閘堰，《水经注》称为“石碣”，堰泾水北流，穿过细柳原，流入昆明池。经笔者调查，泾河在西堰头村向北弯曲，距离细柳原最近，又可利用河道向北弯曲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卷1引《秦记》。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卷1引《秦记》。

《汉书》卷6《武帝纪》。

《汉书》卷24《食货志》

的自然之势，顺势拦截，导引北流，故在此筑堰当了无疑义。石閼堰是一座滚水石坝，当洩水平水期可尽拦截入昆明池，洪水期则漫顶而过。它的高低与昆明池的水位基本相平，设计十分科学。《雍录》认为“并城疏为三派，城内外皆赖之”。经黄盛璋先生考证，昆明池实际上有四个口，四条渠道。南侧之口与渠为进水口和进水渠，西侧之口与渠为溢洪闸和溢洪道。经笔者调查，西口闸门就在堰下张村，闸门石堰犹如一道长堤，至今巨石仍不断被挖出。在昆明池北还修了一道土堤，称为“眉坞岭”，位于落水村之南。北口和北出的渠道，东口和东出的渠道才是长安城的供水渠道。

从昆明池北出之渠，《水经注》称为昆明池水，流经今南丰镐村、镐京乡之东，秦阿房宫遗址之西，在三桥镇西南注入竭水陂。竭水陂位于今车张村西南，是一座调蓄水库，既可控制水流，防止昆明池水直泄入渭，或威胁长安城，又可抬高水位，引水入城。从漓水陂北出之水有二：一条从陂北部东出，称竭水陂水，东北注入漓水；一条北出，东北绕建章宫东南，于凤阙（今北双凤、南双凤村，建章宫东阙）南注入漓水，仍称昆明池水。漓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称为漓水枝津，一水西北流进入建章宫太液池（今太液池苗圃），为漓水正流。漓水又北出太液池，北经神明台东（今孟家寨北），又出宫入渭。在章城门西南引漓水入城之水，《水经注》称为漓水枝渠，“飞渠”入城。“飞渠”也就是渡槽，入城后在未央宫前殿西汇为沧池，然后出池北流，经未央宫、武库、长乐宫之北称为明渠，在清明门（东墙中门）附近出城注入王渠，即护城河。从王渠东出之水，与昆明故渠相会，再东北流与漕渠相会而东。

从昆明池东出之水，《水经注》称为昆明故渠。昆明故渠流经今河池寨北，又东北横绝漓水，又东北经汉明堂（今大土门）南，又东流而北屈，在安门（南墙中门）之东注入王渠。在霸城门（东墙南门）之南，又从王渠东出，与漓水支渠会。昆明故渠又东北至今张家堡西北与漕渠相会而东。笔者实地调查，昆明故渠与王渠相会，再东出王渠与漕渠相会的渠道历历在目，纠正了《水经注》记载的错误。长安城南部地势较高，把渠道布设在东南和西南十分得当，有利于自流供水。

昆明池选址得当，闸坝设置和渠道布设也恰到好处，为长安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石閼堰、竭水陂、飞渠的设置，都可以称为奇迹。汉长安城把开辟水源与储备水源，把城市供水与风景区的建设，把供水干渠与运输渠道相结合，对今天的城市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隋唐长安城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远远胜过了周丰镐、秦阿房宫和汉长安城，因此，水源十分丰富，城市供水渠道密如蛛网。隋唐长安城恰好东距灞、浐，西距漓、沣，南距洩河等均不甚远，为开辟更多的水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把开辟水源与储备水源相结合，湖泊星罗棋布，水域十分广阔，使长安城的水源更加充沛。唐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兴庆宫的龙池、大明宫的太液池、东内苑的龙首池、太极宫中的东、西、南、北四大海和山水池、东西市放生池、永崇坊放生池、永宁坊池、宣义坊池、安业坊池、大荐福寺放生池、兴化坊池、崇仁坊池、修德坊万花池等等，大都与引水诸渠相通，起着调蓄水库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唐长安城的水源所以充沛，是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同开辟更多的源流和大量滞蓄有密切关系。

隋唐长安城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仅可以从东西两面同时引水，而且地形有利，向北自流供水势若建瓴。同时还充分利用低地布设渠道，使供水诸渠密如蛛网。主要供水渠道有龙首渠、黄渠、清明渠、永安渠和漕河。

龙首渠是从今秦沟村堰济水入渠，亦名济水渠。隋开皇三年（583年）开凿。这是解决城东半部以北和兴庆、大明，以及皇城、宫城东部用水的主要渠道。龙首渠北流至长东坡分为二渠：东渠北流，绕城的东北角折向西流，入东内苑龙首池，再出池东北流，绕过龙首原头，再西北注入大明宫太液池；西渠曲而西南流（应为西北），经通化门南（应为北）入城，又分为三支：一支南流入兴庆宫龙池；一支西南流入皇城，又曲而北流入宫城，注为山水池和东海；一支西北流入大宁坊太清宫。

黄渠是从大峪引漓水经少陵原北流，至戎店分为二支：一支西北流，经大兆、曹村、鲍陂、东五村、五殿陂（即五典坡），至春临村西北入曲江；一支北流经新庄、三兆、缪家寨至黄渠头又分为二支：一支西入曲江，一支继续北流。黄盛璋先生认为北流的黄渠未见于记载，以地望度之，恐非黄渠故道。出曲江之黄渠，一支西北流入晋昌坊慈恩寺；一支东北流入升道坊龙华尼寺。流入慈恩寺的一支还可能继续北伸，一直到永宁坊，与永崇、永宁坊池相通。黄渠主要是为增加曲江池的水源，同时也供给城东南部用水。唐长安城东南部地势较高，如果不抬高曲江水位，从曲江池引水入城，城东南一带的供水就会发生困难。

永安渠亦名汶渠，隋开皇三年（583年）开凿。它是从今香积寺西南引汶水经赤兰桥、第五桥，由丈八沟西北东流入城。入城地点已经探明，是从南山门口村东南角以30度斜度入城，向北流去。它流经大安、大通、敦义、永安、延福、崇贤、延康六坊之西，又经西市之东，又北流经布政、颁政、辅兴、修德四坊之西，然后北流入苑，注入渭河。渠水丰沛，两岸垂柳依依，是长安城西半部南北向的供水干渠。“宫松叶叶墙头出，渠柳条条水面齐”，就是反映“渠水皆在城西”的情况。

清明渠也是隋开皇初年引漓水西北流，屈而东流入城。其引水地点在今朱坡东南，循坡而西，经牛头寺（今杨虎城将军陵园）下，穿韩符庄，西过韦曲，至渠北村（地点不详），西北流入京城。《唐两京城坊考》和嘉庆《长安县志》等书，都认为清明渠至丈八沟后，才折东入城。经黄盛璋先生考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清明渠在永安渠之东，丈八沟又在永安渠之西，历

郭声波：《隋唐长安龙首渠流路初探》、《人文杂志》1985年3期。

《唐两京城坊考》卷4。

嘉庆《咸宁县志》卷25。

《长安志》卷9。

《唐两京城坊考》卷2。

嘉庆《长安县志》卷14《山川志下》。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资料》，《人文杂志》1958年1期。

《长安志》卷10。

王建：《早春五门西望》。

张礼：《游城南记》。

史上没有二渠入城前相交叉的记载。今韦曲以南的滈河，实际上也就是清明渠的故道。清明渠的入城地点在今北三门口村以东 200 米处，正好是唐长安城安化门的紧西。清明渠入城以后经大安坊东南，又屈而经安乐坊之西，又北经昌明、丰安、宣义、怀贞、崇德、兴化、通义、太平诸坊之西，又北经布政坊之东，屈而东南流入皇城，经大社北（皇城西南角）、将作监内侍省东（皇城西北角），从永安门（宫城南墙西门）入宫城，注入南海、西海和北海。清明渠除供给城内西部用水外，还供给皇城、宫城西部用水。

漕渠是唐天宝二年（743 年），京兆尹韩朝宗从今韦曲西南引滈水西北流，再北流东折入金光门。以运输南山木材而开凿的。永泰二年（766 年），黎干又把漕渠从西市向东伸延，经光德、通义、通化、开化、崇义诸坊，北至务本坊国子监东，由皇城东南角折北逾景风、延喜门入苑。渠阔八尺，水深一丈。漕渠亦称漕水、漕河，也就是今天的滈河，漕、滈音近而转。所不同的是唐代的漕渠从丈八沟向北去，至金光门折东入城，而今天的滈河则从丈八沟折向西北去，然后北注于渭。漕渠虽然是为运输薪炭而开凿的，但与永安、清明、龙首诸渠相通，实际上是长安城内横贯东西的供水干渠。

唐长安城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引水入城，渠道密如蛛网，使西安地区诸河大都被加以利用，为解决西安城市发展中的供水问题，奠定了东、西两个方向供水的格局。

洛阳 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朝代建都的地方，又是隋、唐等朝代的陪都，城市供水历来受到重视。

东周的王城位于谷（即涧水）、瀍二水之间，距离谷水最近，当以谷水为主要水源。

东汉、魏晋的洛阳城，位于瀍水之东，是东周下都城的延续和发展。它北倚邙山，南临洛水。为了解决漕运和城市供水问题，建武五年（29 年），王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也就是说，引谷水东流，经过洛阳城下，在今巩县附近东注于洛。这条渠道历史上称为阳渠。阳渠的开凿，本来可以解决洛阳的供水和漕运问题，由于水源不足和坡降太小，未能成功。建武二十四年（48 年），张纯重开阳渠，从洛阳西南堰洛水东北流，横绝谷水，流经洛阳城南，又东南流，在今偃师县南再会注洛水。由于增加了水源和增大了坡降，漕运畅通，公私称便。由此可见，阳渠是东汉洛阳的主要供水渠道和漕运的必由之路，也是洛阳的护城河。

曹魏建都洛阳时，曾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令博士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成为新的游乐场所。谷水被引进皇宫，除开辟游乐场所外，也同样有解决城市供水的意义在内。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资料》，《人文杂志》1958 年 1 期。

《唐两京城坊考》卷 4。

《唐两京城坊考》卷 4；《新唐书·地理志》的时间为大历元年。

嘉庆《长安县志》卷 14《山川志下》。

《后汉书》卷 52《王梁传》。

《后汉书》卷 65《张纯传》。

《洛阳历代城池建设》21 页。

《三国志》卷 3《明帝纪·注》引《魏略》。

北魏的洛阳城规模宏大，紧濒洛水，以洛水为主要水源。洛水上有永桥，桥南有四通市、四夷馆和四夷里，证明洛水已横穿市区，不仅有舟楫之利，而且也能为城市提供水源。

隋唐东都城址西移，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城及其附近郊区。隋唐洛阳城规模宏大，洛水横贯全城，伊、洛、瀍、涧（即谷水）尽为所用，水源极其丰富。洛水以北主要靠谷水、瀍水、泄城渠、漕渠供水；洛水以南主要靠通济渠、通津渠、伊水、运渠供水，形成完整的供水渠网。实际上是以洛水为基干，所有渠道均与洛水贯通。洛阳城址的西移，就是为了争取更充沛的水源，控制各个河谷，成为水陆交通的中心。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沟通了南北水路交通，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先驱，其水运中心就是洛阳。

邺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西南 17.5 千米处。除曹魏建都外，还有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建都。历史上称为邺城北城。

邺城位于漳水之南，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大兴水利，就曾修建了引漳十二渠，邺城一带，“咸成沃壤”。曹魏建都邺城后，曹操即循旧迹，开凿渠道，引漳水入城，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他“竭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磴，磴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磴就是滚水坝。堰漳水东注，伏流从铜雀台下入邺城，谓之长明沟，横贯全城，皇宫、街里皆用此水，“东出石窦堰下，注之滹水”。邺城供水充沛，由此可见一斑。

曹操在开白沟运河的同时，还引洹水北流，绕邺城西、北两面与漳水相通，使邺城的航运、供水更加充沛。洹水即安阳河，位于邺城之南，“洹水又东，枝津出焉，东北流迳邺城南，谓之新河”，就是指曹操所开的运河。这条新河又分为南、北二水，南水东北流通白沟；北水北流，“迳东明观下……又北迳建春门……其水西迳魏武玄武故苑。苑旧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孟梁、钓台、竹木、灌丛，今池林绝灭，略无遗迹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可见新河北水不仅有舟楫之利，而且灌注玄武池，解决了邺城供水和风景区的用水问题。曹魏邺城壮丽无比，“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苔亭，巍若仙居”，显然同城市供水充沛有密切关系。

平城 平城是北魏的都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如浑水（今御河）纵贯全城。今大同盆地为高寒地区，水源较缺，但在北魏建都平城期间，还是尽量引用地面水，以解决城市供水问题。

平城城址恰好位于“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的地方，使二水能够纵贯平城全城。“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历诸池沼……又迳平城西郭内……屈迳平城县故城南……其水夹御路南流……出郊郭……一水南迳白登山西……其水又迳宁先宫东……其水又南迳平城县故城东……其水自北苑南山历京城

[日]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第 40《图》。

《水经注》卷 10《浊漳水注》。

《水经注》卷 9《洹水注》。

《水经注》卷 9《洹水注》。

《水经注》卷 10《浊漳水注》。

内……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郦道元所描绘的如浑水分为东、西二水纵贯平城，历历在目，平城水源充沛，不言而喻。有人认为“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是指从西而出之水，向东来会如浑水的河流，完全没有根据，也不符合《水经注》的惯例。《水经注》中的“水南出”、“水西出”是指从某水相出之水南向或西向，也就是分出之水的前进方向，上之所引“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就是指由北向南流之水，而不是“南出”北流之水。

平城的另一水源就是如浑水的支流武州川水。武州川水从“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出山，“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溉诸园池……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火山水注之。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又东注武州川，迳平城县南，东流注如浑水”。证明北魏为了增加平城的水源，自武州塞口导引武州川水，“枝渠东出入苑”，分为几枝，供给平城园林用水，使平城诸园渠水清流，湖泊星罗棋布，犹如北国江南。

南京 南京是六朝的古都，位于长江南岸的今南京市。江南为水网地带，但六朝时除利用自然河流外，也不断开凿人工渠道，以解决建业和建康城的供水问题。

位于宁镇山脉小盆地的南京城，虽然北滨大江，南有秦淮河，但水源并不丰富，必须开渠引水，才能解决漕运和城市供水问题。吴“赤乌三年（240年）十二月，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仓城也就是建业宫城内的太仓，位于西华门内道北。可见这条运渎是从城西南引秦淮水北流，进入宫城太仓，既解决了漕运问题，又为京城、宫城提供了水源。

赤乌四年（241年），“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注云：“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东发青溪，西行经都古承明、广莫、大夏等三门外，西极都城墙……南出经阊阖、西明等二门，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其北又开一渎……北至后湖，以引湖水，至今俗为运渎。”青溪本为一条南北向的自然河流，为秦淮河的支流，流经建业城东，重新开凿后，与潮沟、运渎相贯通，成为建业城东部、北部的主要水源。潮沟名为“以引江潮”，实际上是从城东北引青溪向西，绕城北墙、再折南绕西墙，在城的西南注入秦淮河。另外还有一条引后湖水入潮沟的渠道，“俗为运渎”。由此可见，孙吴所开凿的运渎、青溪、潮沟、“运渎”，以及后湖（玄武湖）、前湖（燕雀湖）等互相贯通，使建业城的供水十分充沛。

为了把都城与富庶经济地区相沟通，六朝时还开凿了两条运河，即破岗渎和上容渎。赤乌八年（245年），“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

《水经注》卷13《灑水注》。

要子瑾：《魏都平城遗址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3期。

《水经注》卷13《灑水注》。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22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郭黎安：《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中国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邱阁。”也就是说，这条运河西接秦淮河，东到云阳（今江苏丹阳）西城，凿开茅山之麓的岗身，使建业以东的水网互相贯通，既便于通航，又为建业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埭也就是坝，蓄水通航，相似于后世的船闸。梁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遂废之。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岗。”上容渎位于破岗渎之北，从句容县东南向西南、东南分流，设埭更多，故陈重开破岗渎。从破岗渎和上容渎交替使用说明，这条运河是首都和吴、会漕粮基地的主要交通线，也是与六朝首都渠道贯通的重要供水线。

开封 开封是梁、晋、汉、周和北宋的首都，地形平坦，河流密集，城市供水十分充沛。

开封城址位于豫东平原，北临黄河，城市供水以地面水为主。到了北宋，四大运渠横贯开封城，不仅使开封成为全国水运的中心，而且城市供水也源源不绝。

汴河也就是隋代开凿的通济渠，唐宋称汴河，唐代曾改名广济渠，但一般仍以汴河相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横贯开封城的中部，从外城西墙开远与顺天门之间入城，再入里城，经开封府、大相国寺之南出里城，趋向东南出外城。这是解决西城、东城和里城用水的主要渠道。

五丈河亦名广济河，“自新曹门北入京”，横穿外城东北部，经开宝寺北（今铁塔），从外城东墙北段出城。这是外城东北部供水的主要渠道。

蔡河亦名惠民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自东南陈州门出”，环绕外城南部，经过里城朱雀门南，太学之北，贡院之东，繁塔寺之西，曾“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为外城南部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天源河亦名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除供宫苑洒扫和灌溉宫中花竹外，还“南注晋王第”。后来又导引“历天街，东转缭太庙，入后庙，皆甃以礲甃，植以芳木，车马所经，又累石为间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可见天源河是皇宫、里城的主要水源。天源河是从今郑州以西导京、索诸水，水流清冽，故成为皇宫的主要水源。

由于北宋开封城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都城中水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杭州 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首都，城市供水主要依靠西湖。

杭州位于西湖与钱塘江之间，隋初始称杭州，州治位于凤凰山麓的柳浦，就是现在的江干一带。今天的杭州市就是在隋代杭州城的基础上向西湖以东的平原不断扩展而发展起来的。隋城所以位于今市区南部地区，就是因为山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赤乌八年《注》。

《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

《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

《宋史》卷94，《河渠志·金水河·蔡河》。

《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

《宋史》卷94，《河渠志·金水河·蔡河》。

麓富于井泉，解决了当时湖东平原不易解决的饮水问题。今杭州市区大部分土地是由浅海发展而来，土地咸卤，又易受到咸潮的内侵，当时尚难解决饮水问题。

唐大历年间（766 - 779 年），李泌任杭州刺史，开凿六井，引用西湖水，使西湖成为杭州的主要水源，湖东的大片平原得到迅速开发。六井即小方井（今小车桥附近）、白龟井（今龙翔桥西）、方井（白龟井东南）、金牛井（方井东南）、相国井（今井亭桥西）和西井（相国井西南）。从此以后，六井就成为杭州市区的主要水源。在吴越、南宋建都杭州时期，西湖不仅是主要的名胜风景区，而且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水源地。除专一撩湖外，还“修湖六井阴豆水口，增置斗门水闸，量废水势，得其流通，无垢污之患”。纵贯全城的大河，又称盐桥运河，市河位于大河之西，又称小河，西河位于城西部，茅山河位于城东部，四条南北向的河流，均与西湖和城外运河贯通，既解决了航运问题，又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湖水溢于桥下暗沟，注于曲阜桥下，流出西河”，证明西湖暗沟除供给城市用水外，也为运河提供了水源。

另外，杭州从隋代起就是江南运河的终点，江南运河又与城内诸河贯通，使杭州城的水源更为丰富。

北京 北京是金、元、明、清建都的地方，今天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金代的中都城位于今北京市西南广安门一带，城市供水主要利用洗马沟水系。金人扩建中都城时，有计划地把发源于城西一片天然湖泊（即今莲花池）中的一条小河圈入城内。同时开凿护城河和引入宫苑，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为了漕运，金代又从今石景山重开车箱渠（三国时刘靖开），引芦沟河（今永定河）入北护城河，称为金口河，又从护城河引水向东，注入潞水（今潮白河），称为闸河。这条运河的开通，本来可以解决漕运和为中都提供丰富的水源，但由于芦沟河洪水凶猛，又不得不闭塞金口河口，另找水源。这就是后来高粱河和玉泉山水源的利用。

元代的大都城城址转移到金代中都的东北，使大都城的水源更为丰沛。这就是充分利用了高粱河水系。高粱河水系中的瓮山泊，也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为明清北京城的水源奠定了基础。

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为了解决大都的漕运问题，实地勘察，由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会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东南流入大都，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然后循金代运河东至通州（今河北通县）高丽庄入白河。这就是通惠河。今天已在王府井大街东侧发现了元代大都城内南北向运河的遗迹。为保证通惠河有充足的水源，在大都西北修了长达 30 千米

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267 - 269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国六大古都》270 页。

《梦梁录》卷 12《西湖》。

《梦梁录》卷 7、卷 12。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第 19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 5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元史》卷 64《通惠河》。

《西安晚报》1998 年 4 月 16 日第 8 版报导。

的白浮堰，使西北诸河、泉水尽入积水潭。积水潭位于大都城的中部、红门阑马墙之北，既是漕运的码头，又是大都的人工蓄水库。并与西御园的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相通，为宫廷提供水源。

除此而外，为了宫廷园林的用水，还开凿了一条叫金水河的渠道，从玉泉山引水入城，使大都城的供水更加充沛。

明初北京城就是元大都城的改建，由于扩大了皇城，供水渠道又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白浮泉已经断流，主要靠汇集玉泉山诸泉的瓮山泊供水。自积水潭南下的渠道已被圈入皇城之内，出皇城经南城墙水关，会护城河东注。积水潭仍然为主要的蓄水库，并与西苑太液池（即今北海、中海和南海）相通，为皇城、宫成（紫禁城）提供水源。

清代北京城的供水格局依如明代，直到乾隆时才发生了变化。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增加运河水量，开拓瓮山泊，把西山碧云寺、卧佛寺的泉水经玉泉山麓也导入泊，建成了北京西北最大的人工蓄水库，这就是今天的昆明湖。从瓮山泊到昆明湖，使北京城的水源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北京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昆明湖为乾隆皇帝赐名，周 30 余里，“置桥闸，以时节宣，……万世永赖之利也”。由于乾隆时把西山和玉泉山诸泉水尽导入昆明湖，使昆明湖水量剧增，成为北京城巨大的人工蓄水库，成功地解决了北京城的供水问题，也为今天的城市供水提供了榜样。

地下水供水 中国的著名都城尽管以地面水供水为主，但并不排斥开采地下水，为城市供水提供多种水源，使城市供水更加丰沛。

周、秦、汉、隋、唐建都西安期间，城市供水以地面水供水为主，以地下水供水为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为一个城市范围很大，湖泊只是一个点，渠道只是一条线，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只有以地面水供水为主，地下水供水为辅，才能满足城市供水的需要。不仅西安如此，其他著名都城也有相似的情况。秦咸阳供水比较困难，采用密集的井群，解决城市供水问题，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汉长安考古中，在未央宫椒房殿（前殿遗址北 200 米）遗址中，发现西汉用弯形砖砌的水井一眼，证明皇宫中有水井，那么离渠道较远的居民区的水井就更多了。汉长安城内外有九市，《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可见市与井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人对“市井”有不同解释，颜师古认为“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尹知章则云，“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不管怎么解释，市场有井则毫无问题，证明汉长安城井的分布十分普遍。这是由于凿井比开渠容易得多，是解决小范围供水的最好方法。

隋唐长安城范围广阔，人口众多，渠网密集，湖泊星罗棋布，但也有不少水井。最典型的的就是醴泉坊。该坊“本名承明坊，开皇二年缮筑此坊，忽闻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醴泉坊在永安

侯仁之：《步芳集》第 26 页，北京出版社 1962 年版。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第 32 页。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第 33 页。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第 33 页。

嘉庆《一统志》卷 2《京师二》。

《长安志》卷 10《醴泉坊》。

渠西侧，引水方便，仍撮得“甘泉浪井”，距离渠道较远的坊，水井更多，自不待言。兴庆宫（原为隆庆坊）中的龙池，也因“旧井忽涌为小池”而形成，证明隆庆坊也有井。

开封位于华北大平原上，在北宋建都期间，有四条运河流经开封城，是六大古都中水源最丰沛的城市，但地下水供水也很普遍。宋代皇宫大内就有井，直到明代水甘甜。另外，仅相国寺东门街巷（内城御街以东）就有小甜水巷、第一条甜水巷、第二甜水巷、第三条甜水巷等四条甜水巷。醴泉观，在东水门里。浴室院，在第三条甜水巷。上述醴泉、甜水巷，都是水源旺盛、清水甘甜的井泉所在。开封城内，供人役使的各种杂工都有，也各有自己的特长。“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就是专门打井的民工。另外，“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者，举意皆在目前”，随叫随到，十分方便。既有打井、淘井的专业户，证明开封的水井是很多的。由此可见，即使在地面水供水充分充沛的城市，地下水供水也是城市供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废弃。

南宋杭州主要靠西湖供水，但井泉也很多，故《梦梁录》有专章记载井泉，据说“杭城内外，民物阜蕃，列朝帅臣，常命工开撩井泉，以济邦民之汲，庶无枯涸之忧”，可见凿井汲饮也是普遍现象。仅见于记载的著名水井如吴山井、天井、四眼井、乌龙井、沙井、八眼井等四五十眼，未见记载的就更多了。譬如祥符寺中，“吴越王于寺内开井九百九十眼，后改创军器所壅塞，仅存数井耳”，就是典型例证。

泉主要在市郊，“城外两赤县有冷泉、醴泉、温泉，并见武林山”。另外还有玉泉、真珠泉、灵泉、金沙泉、萧公泉、法华泉、参寥泉、颍川泉、喷月泉、白沙泉、虎跑泉等三四十处，皆水源旺盛，甘冽可口，既为一方名胜，又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元明清的北京城，尽管不断开渠引水，使城市供水从未间断，但遍布全城的水井也是城市供水的重要源泉。今天北京城内的无数条胡同，就是居民区的地域名称。据考证，“胡同”一词来自蒙文，也就是蒙文“水井”的意思。如果此说可靠，则遍布全城的胡同，也正好是水井遍布全城的确凿证据。事实上，直到现在，北京胡同中仍有不少水井存在，就连明清故宫中的“珍妃井”，也供游人凭吊。据说这眼井就是光绪皇帝的爱妃——珍妃被暗害的地方，成为历史的见证。

中国著名都城的供水，都以争取地面水供水为主，以地下水供水为辅，开创了中国大城市供水的基本格局，对今天的城市供水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供水

地面水供水 中国著名的地方城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尽量争取地面水供水，不断开凿渠道，引附近河水入城，以解决城市供水问题。

蓟城 蓟城也就是今北京的前身。三国时，刘靖于嘉平二年（250年），

《大唐六典》卷7《兴庆宫》。

《历代宅京记》236页。

《历代宅京记》236页。

《梦梁录》卷11《井泉》。

《梦梁录》卷11《井泉》。

北京史研究会编：《北京胡同丛谈》46页。

在梁山（今石景山）修戾陵遏，堰灑水（今永定河）东流，注入高粱河，再出高粱河东流，注入潞水（今潮白河），称为车箱渠。车箱渠主要是为灌溉农田而开凿的，但流经蓟城西北，又与高粱河贯通，当与蓟城供水也有一定关系。

成都 成都城为战国时张仪所筑，“以象咸阳”，自古以来就是成都平原的中心，也是水利条件最优越的所在。《水经注》说：“江水又东迳成都县……具有二江，双流郡下，故扬子云《蜀都赋》曰，两江珥其前者也。《风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也就是说，李冰修筑都江堰，使江水分流为二，犹如耳环一样绕过成都城的两侧，为成都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两江就是郫江和检江，前者绕成都城北、东两则，后者绕成都城西、南两侧。另外，“张仪筑城，取土处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顷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堤池，城东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绝”。这些位于城东、北、西和西北和五大湖，犹如一链明珠镶嵌在成都城外，“津流径通，冬夏不竭”，使成都城的水源格外充沛。实际上，五大湖与两江贯通，成为成都城的天然蓄水库，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供水问题。城南锦里位于江岸，“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矣”。证明成都最早解决了手工业用水问题，蜀锦所以名扬天下，也和成都城市供水丰沛有密切关系。

晋阳 晋阳位于今太原市西南的晋水之阳。“《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沼水分二派：北渎即智氏故渠也……其渎乘高，东北注入晋阳城，以周灌溉……东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渎于石塘之下伏流，迳旧溪，东南出迳晋阳城南。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

从上文可知，晋水被储蓄以后，分为南、北两渎，北渎即智伯旧渠，成为晋阳城的供水干渠；南渎为晋水故道，成为蓄水库的排水渠道。由于晋阳城有自己的蓄水库，并有横贯全城的干渠，供水丰沛当了无疑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城中出现了“太液池”、“九曲池”等面积可观的水面，美化了城市环境。这条曾入晋阳城中“通流街衢公馆”的渠道，直到明代“渠道俱存，而水不行”。

唐代晋阳城规模扩大，城区拓展到汾河以东，城市供水也有新的变化。由于东城一带地多盐碱，井水无法食用，贞观十三年（639年）并州长史李勣“乃于汾河之上引决晋渠，历县经廛，又西入汾水”。这项称之为“晋渠”的引水工程要架设渡槽，跨越汾河，水工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晋渠

《水经注》卷14《鲍邱水注》。

《水经注》卷33《江水注》。

郑连第：《六世纪前我国的城市水利》，《水电科学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12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版。

《水经注》卷33《江水注》。

《水经注》卷33《江水注》。

《水经注》卷6《晋水注》。

嘉靖《太原县志》卷1。

《新唐书》卷39《地理志》。

除供水外，东城居民“取晋渠用剩余水，抑斗掣灌”，用来浇灌农田园林。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并州长史马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面平易受敌……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渚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马燧引晋水入城除供水外，主要为了军事目的。唐代这两次引水工程，都使用了很高的水工技术，满足了城市的供水。

历城 历城即今济南市，战国时称历下，历城因位于历山之下而得名。济水从城北流过，宋末升齐州为济南府，“济南”之名始流行于世。

历城的主要供水为泉水，泉源旺盛，溢流为河，为历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趵突泉位于历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俗谓之为娥姜水”，这就是泺水的源头。“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即指趵突泉。泺水“北流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湖水引洩东入西郭，东至历城西，而侧城北注”。也就是说，从大明湖东出之水，进入历城西北部，又北流出城，成为历城西部的供水干渠。另一条供给城东部用水的渠道则为历水。“陂水上承东城历祀泉下，泉源竟发，其水北流迳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迳历城北，西北为陂，谓之历水，与泺水会。”证明历水发源于历祀泉下，北流汇为流杯池，又分为二水，一水北注，一水西流汇为陂，再与泺水相会，为历城东部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水经注》以后，济南城的供水有了新的变化，应该是河流变迁的结果，最明显的就是趵突泉水不再注入大明湖。

寿春 寿春位于淮河之南，战国时楚国曾迁都于此，由于军事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今为安徽寿县。

相传楚相孙叔敖曾在寿春以南修建芍陵，既发展了农田灌溉，又为寿春城提供了水源，芍陂实际上就是寿春的人工蓄水库。“陂水上承涧水于五门亭南……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肥水又左纳芍陂洩。洩水自黎浆分水，引洩寿春城北（南），迳芍陂门右，北入城……洩水又北迳相国城（刘裕筑）东……又北出城注肥水。（肥水）又西迳金城北，又西，左合羊头溪水。水受芍陂，西北历羊头溪，谓之羊头涧水……侧迳寿春城西……北注肥洩。”不难看出，寿春城处在水网中心，南有芍陂，东、北有肥水，西有羊头溪水，纵贯全城的就是芍陂洩。城东还有东台湖，城北有船官湖、横塘等，湖、河贯通，水网密集，寿春城供水充沛自不待言。芍陂洩和羊头溪水都是引芍陂水北流为寿春城提供水源的人工渠道。船官湖就是航船停泊和修造的场所，证明肥水为淮水支流，寿春的水运交通也十分方便。由于寿春

嘉靖《太原县志》卷1。

《旧唐书》卷134《马燧传》。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水经注》卷8《济水注》。

《水经注》卷8《济水注》。

《水经注》卷32《肥水注》。

郑连第：《六世纪前我国的城市水利》。

水利发达，河网密集，在南北战争中往往会堵水灌城。但寿春城防坚固，防洪设施是城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万无一失。

武汉 今武汉市是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其中武昌、汉阳兴起较早，汉口晚到明代才兴起，但后来居上，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镇（景德镇、朱仙镇、佛山镇、汉口镇）之首。

武汉三镇夹长江、汉江鼎足而立，长江、汉江既为武汉三镇通航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为武汉三镇供给了丰富的水源。长江、汉水既拥有便利的航道和天然良港，充足的水资源，又能满足城市用水的需要。武汉城区附近较大的湖泊有东湖、沙湖、南湖、墨水湖、月湖、紫阳湖、莲花湖等，为城市供水储备了丰富的水源。武昌市区的主体部分位于东湖、沙湖、南湖与长江所围绕的区域内。汉阳市区则受月湖和墨水湖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制约，显示出武汉城区与湖泊的密切关系。像月湖、沙湖、紫阳湖、后湖、墨水湖、东湖、南湖之滨都分别成为汉口、汉阳、武昌城区的主要地域，正是为了供水方便。由此证明，武汉三镇的供水是以两江和主要大湖为水源，城市供水源源不绝。

南阳 南阳即今河南南阳市，秦汉宛县，王莽改名南阳县。南阳城位于洧水（今白河）之侧，洧水“南迳宛城东……又屈而迳其县南，故《南都赋》所言，洧水荡其胸者也”。洧水绕城东、南两侧，不仅为南阳城提供了舟楫之利，而且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水源。距城三里的石碛，实际上就是洧水上的滚水坝，使“洧水环流，为一城之胜”，既可“以御水患而障城郭”，又可以抬高水位，使城市供水源源不断。

怀远 怀远有旧、新二城，旧城位于汉延渠旁，为西汉农都尉冯参修建，唐仪凤二年（677年）被洪水冲毁。次年西迁到唐徕渠东、今银川老城城址上重筑新城，称为怀远新城。怀远县城由汉延渠畔迁到唐徕渠畔，除唐代银川平原的经济重心已由汉延渠两岸转移到唐徕渠畔，而要求政治中心（县治）也同时西迁外，主要是今银川老城东距黄河达14千米，西离今银川火车站以西的荒滩也有11千米，位置适中。在这里建设新的城市，既可避免黄河的威胁、重蹈覆辙，又可防止贺兰山山洪的袭击，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这里不仅是银川平原南北的中心点，也是平原东西两面地势最开阔的所在，交通十分便利。另外，今银川老城位于唐徕渠东、红花渠西，两渠构成天然的护城河与供水源，使城市防御和供水有充分的保障。加之两渠淤泥的堆积，这里地势较高，选作城址是再好不过的了。正因为怀远新城城址优越，西夏建都和元、明、清几代建府，城址再未转移，使这里成为唐以后银川平原、宁夏地区，乃至大漠南北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证明银川城位于两条干渠之间，可以左右逢源，城市供水一直很充沛，为城市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梁书》卷18《康绚传》。

《武汉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水经注》31《洧水注》。

《读史方輿纪要》卷51《南阳府》；《南阳城市历史地理述论》（油印稿）。

《水经注》卷3《河水注》。

《银川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扬州 扬州即今扬州市，不过今天的扬州城仅是宋代扬州大城的南半部，唐代的扬州罗城比宋代的扬州大城更大。

唐代的扬州罗城主要靠运河供水，运河纵贯全城，不仅航运方便，而且水源丰富。当时扬州城内的运河，自齐浣开伊娄河把它的流向基本固定下来。杜亚于贞元四年（788年）因官河填淤及侨寄衣冠、工商等侵衢造宅，行旅拥滞，又疏浚了运河。宝历二年（826年）王播又因扬州官河水浅，从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自东屈曲，至禅智寺桥通旧官河。运河自南而北过扬子津纵贯罗城到蜀冈下，沿邗沟故道折向东，再横贯罗城到禅智寺，接湾头通扬运河，再折而北去。另外，沈括在《梦溪补笔谈》中记载了城内自南而北的两条水道和折而向东的一条水道。纵贯南北的两条，据考证，一条直对衙城（即子城，位于蜀冈上）南门、偏宋大城之西，宽约30米，即官河；一条直对衙城东濠，纵贯宋大城南、北两门，宽约15米；东西向的一条紧邻蜀冈，与古邗沟相会东去。这三条运河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由于有纵向和横向的运河通过城内，扬州城的供水自然以运河为主要水源。

明清时扬州城内仍有纵向的三条运河，今天仅有一条城河纵贯城的西部。城河以西的运河，即唐代的运河，今为汶河路；城河以东的运河，今为国庆路。这种巨大变迁主要是城市供水发生根本变革的缘故，即由地面水供水改为地下水供水，运河自然被废弃。同时，京杭大运河从扬州城东通过，已成为扬州水路交通的主干道，城内也无需再留更多的运河。

苏州 苏州即今苏州市，是太湖平原最早兴起的著名城市。城址以运河为骨架，自春秋吴国建城至今，历时两千余年，城址从未转移过。运河既是航道，也是城市供水的渠道。

苏州城的运河体系有三横四直，实际上支渠很多，密如蛛网。运河体系不断变迁，清代的三横四直是：第一横河，自阊门水关桥起，经至德桥、张香桥至娄门；第二横河，自吴县学前渡子桥，经太平桥、顾庭桥至城河；第三横河，自孙老桥起，经织里桥、望门桥至葑门水关。第一直河，自皋桥起南行，经黄牛坊桥、来远桥南下稍东至盘门水关；第二直河，自单家桥起，经都亭桥、查家桥西行至杉渎桥转南至葛家桥，西行至新桥；第三直河，自齐门赌赛桥起，经北新桥、跨塘桥往东与第一横河交汇，南行经任蒋桥、顾家桥稍西行与第二横河交汇，南行过金母桥、夏侯桥与第三横河交汇至仓桥南行往东，经帝师桥、砖桥至葑门水关；第四直河，自华阳桥起，经通济桥、苑桥西行会第二横河，过尽市桥、望信桥，自此稍东南行会第三横河，过望门桥出葑门水关。

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重修了城内河道，开通了联系全城水系的城心河道，城心河西自普济桥，南行第二直河，由范庄前玄妙观往东，经四通桥至悬桥，穿过第三直河，又东至新桥，过第四直河，往东入城濠，出娄关。城心河居城中心，开通后，三横四直河水，左右逢源。明清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第二直河淤塞。现在苏州城内只有三横三直河道轮廓，全长25千米。

《旧唐书》卷146《杜亚传》。

《唐会要》卷87《漕运》。

《广陵通典》。

《扬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苏州内城河道伸入市区，奠定了苏州城市的格局。苏州的街道与河道平行，凡属横河，街道大多在它的北岸；凡属直河，则街道位于其东，水道陆衢相结合，成为苏州城市的有机系统。

商业街也沿河分布，河道交叉处与道路交叉的桥头及渡口等处，往往形成交通及商业中心。居住区的布局沿河道成带形发展，住宅前门临街，后门滨河，河与路之间为带形居住地段。河道既是饮水之源，也是洗衣淘米所在；既是交通航道，又是城市生活空间的延伸。但是，历代城市建筑的兴废也使市区地面有不同程度的抬高，形成中间高、四周低的龟背地形，造成内外城河水体不易自然交换。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内河面狭窄，如今最窄处不足2米。许多河段堵塞，河流流量小，流向又顺逆不定，造成苏州市排水困难。但是，由于现在采用地下水供水，除几条运河仍为航运干线外，大部分运河已不受到重视。而且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下沉，后果十分严重。

西安 西安即今西安市。唐以后失掉了国都地位，城区也随之缩小，地面水供水也不受到重视。但由于地下水咸卤，曾多次争取引用地面水，解决城市供水问题。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陈尧咨首先疏凿龙首渠，导泾水入城。但陈修复的只是唐代的龙首西渠，元初又淤塞。元代在疏凿龙首西渠导水入城并灌注兴庆池的同时，还疏凿了龙首东渠，导泾水入安西王宫。宋元两代的龙首渠，渠首已高悬泾岸，进水十分困难。

明成化年间，项忠、余子俊在疏凿龙首渠时，把渠首由秦沟村上移至留公，供水充沛。龙首渠入城后分为三派：一从玄真观南流转羊市过咸宁县府（今县门北街）西流，转北过马巷口；一从真武庵（东门里往南）北流；一从羊市分流过书院坊西入秦王府（今新城）。与此同时，还在城西开凿了通济渠。通济渠是从丈八沟（亦名丈八头）引渭河水北流，至南窑头又转向东北流，从西门入瓮城。入瓮城内南流，由水门出瓮城外，沿城而南过一敌楼，复入城，东南流至白鹭湾，折而东北流，至牌楼南又正东流入地下砖渠，分三派：一从长安县府（今西安教育学院）东流过广济街，又东过大菜市（今大差市）、真武庵出城，注入东城壕；一从广济街北流，过钟楼（今迎祥观），折而西，过永丰仓前入贡院（今儿童公园）；一从广济街直北过麻家十字街口，汇入莲花池（今莲湖公园莲湖）。通济渠的三派主要供给西城用水。

清代对龙首、通济渠还多次疏浚过，但上游截水灌溉，入城之水甚微。加之康熙时西瓮城甜水井的凿成，水源旺盛，对引用地面水已不是十分迫切，故对渠道的疏凿多不及时，时修时坏，不能正常供水。清末，龙首、通济二渠水仅注入城壕，护卫城墙，入城之道早已淤塞。

地下水供水 中国著名地方城市除开渠引水外，地下水供水也从未间断，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宋史》卷284《陈尧佐传·附》。

雍正《陕西通志》卷39《水利一》。

雍正《陕西通志》卷39《水利一》。

雍正《陕西通志》卷39《水利一》。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57。

而且，随着凿井技术的发展，愈到近代，则多数以地下水供水为主，以地面水供水为辅，成为中国地方城市供水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地方城市财力有限，开渠不易，加之城区地面来水较少，就更不愿从较远的地方寻找水源，开渠引水。

宋代重建的太原城，就采用地下水供水为主的方针。宋代废毁晋阳城后，于晋阳城东北的唐明镇另建新城，也就是北宋以后的太原城。地下水是宋以后太原城的主要水源，太原城市位于东西山之间，西有汾河，地下水极为丰富，且埋藏浅、水质好。太原城内著名水井有丹井，位于晋府东城门内，上有楼，味极清冽；龙王庙井，在文庙西北隅大新街龙王庙前，“有数孔，味极甘美，为晋省第一”；星聚泉，在学宫前；八角井，在恭将府街北；东园水井；水西关太平寺清初建有甘泉井，“清冽逾常”。直到1941年前，太原市内北仓巷、松花坡等街有水井11处，以地下水为主要供水形式。

此外，汾河也是城内水源之一。宋代并州知州陈尧佐因汾河屡涨，有冲破太原城的危险，于是筑堤引汾水潴成周五里的湖泊。清代太原知府王觉民“募挑文昌庙后积土引水入长海子，又循南城墙古水口，疏导入汾”。汾河也成为供水水源，但不占主要地位。

今济南市自古以来地下水就十分充沛，水源十分丰富，尤其以多泉著称于世。在老城区约2平方千米的区域内，泉眼密如繁星，泉水竟发，溪流横生，有“七十二名泉”之说，实际上数以百计，故济南别名“泉城”。泉水深刻地影响了济南的地表景观。发源于舜井的历水曾经长期纵贯城市中部，到宋代才逐渐淤平。历史时期地势低洼的西部吞纳了众多泉水和南部山区径流，汇成浩瀚的鹊山湖，范围北至鹊山，东抵华不注山，水面颇为壮观。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的古大明湖位于秦汉历城县城的西面，是一南北狭长的湖泊。唐《酉阳杂俎》记载的历城北面的莲子湖据称方圆有二十里。今济南城内的大明湖在唐以前还不存在，是在修筑了济南城墙后潴集城内诸泉之水才形成的。直到唐代，鹊山还处于湖水环抱之中，李白在诗中写道：“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大小河流串连着星罗棋布的泉群和湖泊，宛有江南之胜。金元以后，由于刘豫开凿小清河以资盐运，导水东流，湖水才逐渐消落。湖泊和泉群为居民生活和城市的兴起、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同时对气候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由此可见，由于济南地下水丰富，到处是甘冽的清泉，才获得了泉城的雅号。大明湖和流经市区的河流，都是以泉水为源头，趵突泉汹涌突喷，直到现在仍是济南市的主要名胜风景区，《水经注》的形象记载，脍炙人口，使游人回味无穷。

康熙《阳曲县志》卷2《山川》。

道光《阳曲县志》卷15《文征》。

道光《阳曲县志》卷1《輿地图上》。

光绪《山西通志》卷29《水利》。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酈道元：《水经注·济水》。

《济南市志资料》第4辑。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一》。

李白：《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西安城内地下水咸卤，但当地面供水断流后，便以地下水供水为主。康熙年间西瓮城甜水井的凿成，解决了官府和富豪人家的供水问题，而绝大多数居民依靠咸水井供水。直到建国前，六个辘轳一个井就成为西安的一大景，沿街叫卖甜水者到处皆有。尽管西瓮城甜水井水源旺盛，但仅此一井，无法改变居民饮用咸水的状态。

杭州尽管依靠西湖供水，但凿井也很普遍，已如上述。南宋以后的杭州城，主要靠井泉供水。建国后，虽然杭州采用深井供水，建成了完整的自来水网，但普通井水供水仍不可忽视。1981年，为解决群众饮水问题，杭州市恢复了一般水井1280口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北宋以后的开封城，也以井水供水为主。但“城中井水悉苦卤难饮，汴人率于城外汲水饮之。惟周王府太庙井水甘，盖宋大内旧井也”，证明开封在明清两代以井水供水为主，但甜水井少，苦水井多。

实际上，中国的地方城市绝大多数以井水供水为主，尤其是小城市更是如此。因为在近代大工业兴起以前，城市供水主要是生活用水，用水量有限，一般多凿井就可以解决问题。加之中国的城市绝大多数都在平原地区，地下水源丰富，能够为城市供水提供水源。另外，凿井比开渠简单易行，容易收到功效，故多以井汲为主要供水手段。

在没有大工业的近代以前，中国地方多数城市以地下水供水为主要手段，应该说简单易行，是一种成功的供水形式。尽管一些著名城市也争取引用地面水，但并不占中国地方城市供水形式的主流。就是有地面供水渠道的城市，由于渠线经过的地方有限，井汲仍是普遍现象。由此可见，中国丰富的地下水源为中国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基础，同时也积累了城市供水的丰富经验。

近代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和深井技术的发展，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开凿深井，大规模地开采地下水，作为解决城市供水的主要手段。中国城市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始于上海、天津的租界区，建国后扩展到全国所有城市。由于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作为凭藉，大规模地开采地下水，确实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加之地下水水质优越，易于开发，也为城市建设节省了大量资金。

但是，地下水资源是有限的，地面来水和地下水资源又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充足的地面来水，地下水就会枯竭。由于没有把握这种辩证关系，无限制地开采地下水，丢掉了开渠引水的优良传统，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这就是井越打越深，水位下降漏斗区越来越大，造成地面不均衡下沉，严重威胁建筑物的安全。首都北京市尽管有官厅、密云水库，仍是严重缺水城市。1981年时，北京市有多类机井4万眼，年开采地下水约25亿立方米，城郊区已形成1千平方千米的水位下降漏斗区，地下水位平均下降4.3米，中心区最大降深20米左右。现在北京市早已终止官厅、密云水库的农用灌溉用水，供水仍然十分紧张。解决北京供水的途径，不外开源和节流，也就是说既要节约用水，又要扩大源流。扩大源流的办法，就是修建水库蓄水，以及在平原地区进行地下水回灌，补给地下水。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供水问

《杭州市修复水井一千余口》，《人民日报》1981年1月15日。

《历代宅京记》236页。

张光斗：《北京的水资源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2月9日。

题，还是要在开发地面水上做文章。

大连为海滨城市，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造成海水内侵，地下水咸苦，农田禾苗枯死。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恢复地面水供水。青岛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青岛也是缺水城市，1993年山东引黄济青工程发挥了极大的效益。黄河水进入青岛，不仅解决了城市供水问题，也阻止了海水内侵。天津引滦入津工程的成功，更引人注目。因为滦河是一条大河，开渠引水工程量大，但天津人民不畏艰险，在短期内建成了这一大型引水工程，解决了天津的水荒。西安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地下水下降漏斗区达五六十平方千米，地裂缝愈来愈多，使许多建筑物处于危险状态。仅1960年到1978年，地面累计沉降25-40公分，市中心的钟楼下沉11公分，东南郊达到40公分。尽管开足马力，西安的供水严重奇缺，每当炎夏，城东南部一带全天断水，每日缺水达三四十万吨，已严重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因此，西安市政府才不得不下决心从周至黑河引水进城，以解决燃眉之急。黑河位于西安市周至县境，距离西安市85千米。黑河引水工程从1986年开工，已完成80千米的主要干渠工程、曲江水厂以及市区管网，目前石砭峪、田峪河已向市区供水，大大缓解了供水的紧张状态。将来黑河金盆湾水库建成后，可保证最大日供水量80万吨，平均日供水60万吨的需要，等于把目前的日供水量提高了一倍。黑河引水工程造福子孙万代，利国利民，为西安城市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强的基础。

建国后，随着深井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开采地下浅层水，而且可以开采地下深层承压水，使地下水供水的水源更为丰富。然而，四十余年来的经验证明，无限制、过量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后果十分严重，这就是地面不均衡下沉，威胁建筑物，海滨城市造成海水内侵等，已经到了非改变供水形式不可的地步。现在许多缺水城市已经猛醒，只有恢复地面水供水的老传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供水问题。因为地下水要靠地面水来水补给，断绝了这个基本源流，地下水供水就成为无源之水，总有一天要发生危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青岛等城市已经恢复地面供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值得其他城市效仿。上海虽然没有开渠引水，但黄浦江水源充沛，每年冬天采取回灌的办法，以地面水补充地下水，不仅使地下水丰富，而且还使地面略有回升，解决了地面下沉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城市供水应以地面水供水为主，既可以避免过量开采地下水带来的麻烦，又可以使城市供水十分充沛，扩大城市水域，把城市绿化、装扮得更加美丽。虽然开渠引水工程量大，花费也大，但从长远看却是一劳永逸，造福万代，还是值得的。靠近大河的城市，必须以大河为源流，解决城市供水，像历史上的兰州就一直靠黄河供水，黄河横贯全境，为兰州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今天的兰州市要持续发展，应该继续以黄河为源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供水问题。济南泉源旺盛，流经市区的河流也以泉为源头，但必须截流储蓄，建设人工蓄水库，才能满足城市供水的需要。不然，继续过量开采地下水，失去趵突泉美景的怪事还会发生。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目前约有30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的缺水

中央电台 1993 年 3 月 3 日晚新闻报导。

中央电视台 1993 年 4 月 11 日晚新闻报导。

《当代西安城市建设》第 111—114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而中国的城市多数又在河流沿岸，应该以河流为城市供水的基本源流，彻底改变依靠地下水的供水方式。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将是一次巨大的革命，也是中国城市生命力强盛的具体表现。河流日夜奔腾呼哨从城市旁边而过，呼唤着为城市提供水源，如若不加以拦截利用，让其白白流掉，实在太可惜了。每个有条件的城市，或者可以创造条件的城市，都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拦截河水，为城市发展开辟水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后走过的曲折道路教育了我们，城市供水再也不能仅仅依靠地下水供水这一唯一形式了，要广开水源，以地面水供水为主，为中国城市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九、中国城市的园林

城市园林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的园林历史悠久，在世界园林史上享有盛名。周代都城丰镐的灵囿、灵沼、灵台也就是最早的宫廷园林，距今已有 3000 年的历史。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都城和地方著名城市，无不建造园林，使中国城市园林丰富多采，成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的主力，占有光辉的地位。世界古典园林三大体系，也就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西亚北非气候干燥，多沙漠景观，人们在自己的庭院中经营一块绿洲，树绿花香，流水潺潺，便成为“天国乐园”（伊甸园），显得特别珍贵。后来又不断运用水法，使园林更为壮观，并影响到后来欧洲园林的建造。古希腊人仿造波斯人造园，引种名花异卉，发展成为四周住宅，中间绿地，精心规划的柱廊园。这种造园手段被罗马所继承，并发展为大规模的山庄园林。这种山庄园林为规则的轴线布局，并有绿篱和几何花坛。罗马园林又发展成为欧洲的古典园林。欧洲古典园林的特点是布局方整端正，重台叠馆，喷泉池沼，中轴线是全园的轴心和主体。

以山水为主的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的造形截然不同，形成独特的风格。这就是主要表现自然美，布局灵活多变，使人工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造成巧夺天工的奇异效果。西方园林讲求几何数学原则，而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把自然美表现得活灵活现，给人以无限美好的享受，进入园林，犹如到达天仙胜境，使人心旷神怡，豪情满怀，妙不可言。也就是说，西方园林以建筑为主，而中国园林则以自然景观为主，形成不同的造园风格。中国园林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隐建筑物于园林之中，浑然一体，意境更新，观赏效果更为奇异。

中国城市园林不管是皇家园林的宏大，还是私家园林的精巧，都以表现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为特色，给人以无限美好的享受。在造园要素中，主要是山水地形、花草树木、园路与建筑的精巧布设、灵活运用和浑然一体，巧夺天工，意境无穷，造成青山流水意不尽，步步引人入胜的效果。在造园手法上，借景与对景并用，山石流水处处生情，楼阁风采奇异，园亭点景恰到好处，廊桥形态各异而趣味无穷，楹联匾额名家撰写寓意深刻，使园林处处生辉，情趣盎然，使人感受到博大精深，意境无穷，风光无限美好的乐趣。

中国城市园林源远流长，造园手法独特，园林艺术极佳，园林理论也由来已久，明代末年由造园家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就是中国造园理论的典型代表作。该书共分三卷，详细论述造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包括《兴造论》、《园说》两篇专论外，第一卷主要叙述《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对造园的基本格局阐述了完整的概念，提出了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科学理论。第二卷专叙栏杆和栏杆格式，叙述了 17 种式样，并绘制成图。第三卷叙述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的原则和要求，并以图相示。计成的造园理论，实际上是

《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文化·艺术》第 234 - 235 页，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园冶》卷 1《园说》，喜咏轩丛书戊编。

《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文化·艺术》236—238 页。

计成：《园冶》，喜咏轩丛书戊编。

中国历代造园技术的总结，是中国园林科学的奠基石，也是东方园林科学的集大成，值得研究，使东方园林之花开放得更加鲜艳。

1. 中国著名都城的园林

中国历史上建都的城市以数百计，著名都城也无不造园。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都城的园林以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风景优美、造园技术精巧而闻名于世，代表了东方园林的主流。中国都城的园林也就是皇家园林，为皇帝和皇族的游乐而设置，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布局和建筑以后才形成的，博大精深，变化无穷，妙不可言，形成中国园林的独有特色，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奇葩。

(1) 周丰镐园林

西周的国都丰镐位于今西安西南的沔河两岸。不仅都城规模宏大，布局整齐，而且园林也别具一格。丰镐虽然横跨沔河，地形平坦，但比较而言，沔河以西地势较高，河流密布，池沼众多，南对圭峰山，造园的地理条件更为有利。因此，在西周建都丰镐的二百多年间，丰京（沔河西岸）主要是周王祭祀和游乐的场所，而镐京（沔河东岸）则主要是政治中心。当时，除沔河西岸的低平之地为农业区外，向南去的原区及其秦岭脚下一带，仍为森林区，为发展园林提供了有利条件。周代沔河西岸的园林区范围有多大，已难确知。其主要设施有登高瞭望的灵台，王家动物园灵囿，观鱼游乐的灵沼等。

周代丰镐的园林，以森林、草丛和有利地形为基础，稍加雕凿，具有粗犷、豪放、野趣。“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灵台也就是一个高台建筑物，据说“王文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故建此台，“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祲象也就是妖气，证明灵台主要是为了观察吉利与邪恶，以顺应天时地利。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台。灵台高大，除观天象外，在周代园林中也是登高瞭望，观赏秦岭雄伟、沔河两岸田园风光的重要建筑物，也符合中国园林高低有致的造园原则。沔河西岸低平，灵台突兀高起，自然使人有凌空腾跃之感。灵台实际上是周代丰镐园林的主脊，以高屋建瓴之势统帅全园，开创了中国都城园林高低错落有致的先河。今沔河西岸灵沼乡东南灵台村的灵台遗址，仍很高大，也可能就是周代的灵台。由灵台的位置证明，周代丰镐的园林主要位于丰京之南，尽得山川地利。

灵沼即水池，也是灵沼河的源头，位于今沔河西岸的灵沼村。今天沼已干涸，但池址依稀可见。“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源贯通，全园生动”。中国园林以山水取胜，“水随山转，山因水活”，使自然之美达到奇妙的意境。没有水源的园林死气沉沉，不言自明。周代丰镐园林以沔河为大川，并利用灵沼和灵沼河，使全园河渠清流，池沼闪光，景色明媚如画。“王在灵沼，于物鱼跃”，正是对灵沼景色的生动描述。物，满也，表示灵沼中“水鱼盈满其中，皆跳跃”，有似于今天杭州西湖中的花港观鱼，其乐无穷。

灵囿也就是王家动物园，与今天的城市动物园相比，范围广阔，据说周代“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丰镐园林中的动物园有百里之大，一里为1800尺，一尺约等于19.9厘米，则百里为35.82千米，约有1283.07平方千米。也就是说，丰京以南1千多平方千米的地区，都是周代的灵囿所在。因为丰

《诗·大雅·灵台》。

陈从周：《园林谈丛》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年版。

《诗·大雅·灵台》。

京以南的原区和秦岭脚下，当时森林茂密，正好是动物出没的所在。由于这个动物园中的动物都是野生的，与今天城市动物园中的动物都是圈养大不一样，范围太小是不行的。“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可见麀鹿优游，十分自在，白鸟肥壮，乐得其所，犹如今天的自然保护区。类似自然保护区的动物园，除范围广阔外，森林茂密，杂草丛生，水源丰富也为必备条件。周代的野生动物园为后来的自然保护区开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周代的丰镐园林以山川、水池、植物等自然风光取胜，人工建筑物很少，开创了中国园林以自然美为主的先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也是中国园林区别于西方园林的最大特点。

（2）秦咸阳园林

秦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以东 15 千米处的窑店镇、长陵车站、萧家村东一带。秦始皇时代更把咸阳的范围扩大到渭河以南，兴建了以阿房宫为中心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

秦咸阳的园林建设沿袭周代的特点，以山川取胜，主要有两处，即兰池和上林苑。

兰池位于今咸阳市东杨家湾一带，是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咸阳原雄伟耸峙，原下的低平之地一平如砥，又临近渭河，可以开渠引水，开凿规模宏大的兰池，倚原临河，风景独秀。秦代在兰池旁兴修有兰池宫。“始皇三十一年，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可见兰池是皇帝的游乐场所。这里山川壮丽，又有兰池和兰池宫，自然是游乐的理想所在。秦始皇微行夜出，不去别处，而直奔兰池，证明兰池的自然风光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这是刘宋裴景仁对兰池的记载，证明兰池是引渭水为池，并以蓬莱、瀛洲仙境为蓝图，兴建了兰池风景区。蓬莱、瀛洲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是著名的天仙胜境。既然兰池以此为蓝图，其环境之幽雅，风景之佳丽，可想而知。秦咸阳背原临河，缺少广阔的水域，兰池风景区的建成，既为皇帝游乐提供了场所，也为咸阳城增加了无限美好的风光。

上林苑位于渭河以南，除修建了以阿房宫为中心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外，其余地方均为皇家禁苑。《三辅黄图》说，“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证明汉上林苑是秦上林苑的延续。汉上林苑在武帝时大加扩展，范围远较秦苑为大。应该说汉武帝以前的上林苑也就是秦代的上林苑。秦二世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可见上林乃为游猎之场所，范围当也不小。可能是北滨渭河，南抵秦岭，东向灞、浐，西向沣、镐一带伸延。与周代的灵囿相比，范围要广大得多。由于秦代的农业区与周代相反，渭北为粮仓，渭南为游猎区。在郑国渠未开以前，“漆沮所经之地可能是沼泽纵横，草木丛生（尤其是芦苇），麋鹿成群，是最佳的猎场”。这是因为周人建都渭南，自然以渭北为猎场，而秦建都渭北，又开郑国渠，

《诗·大雅·灵台》。

《三辅黄图》卷 1《秦宫》。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卷 1 引《秦记》。

《史记》卷 87《李斯列传》。

辛树帜：《禹贡新解》第 146 页，农业出版社 1964 年版。

渭北农业得到发展，而渭南就成为上林苑。就连周代的都城丰镐也成为“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农田。秦代的上林苑除有部分农田外，主要为森林草地，并有广阔的水域，即上林诸湖。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野兽出没，景色宜人，自然是游猎的良好场所。可见秦代的上林苑与周代的园林一样，也是以自然风光为主，人工建筑物很少，尽量保持自然美和各种野趣情调，使人有来自自然，回归自然之美的享受。

（3）汉长安园林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城西北5千米处的汉城乡一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过总体规划、布局整齐、宏伟壮观的大城市。城市园林发展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建造了许多形式各异、别致新颖的园林。

首先是皇宫与园林相结合，使园林成为皇宫的一部分。未央宫区有沧池，长乐宫区有酒池，建章宫区有太液池。皇宫中的园林，都是以人工湖为中心，布设楼台亭阁，既有广阔的水域，又有精巧别致的建筑物，交相辉映，相谐成趣，为皇帝提供了绚丽的游乐场所。

沧池位于未央宫前殿的西边，为漓水枝渠“飞渠”入城所汇，湖址清晰可辨。今未央宫前殿遗址以西的低洼地区也就是当年沧池的所在。“未央宫中有沧池，言池水苍色，故曰沧池”。沧池的范围很大，有“沧池潏沆”之称。“潏沆”就是指广阔无边的大水。沧池周围也就是未央宫中的大殿，殿阁倒映池中，景色绮丽，另有一番情趣。尤其是沧池中的渐台，也就是湖水中的岛屿，位于全池的中央，四面临水，楼阁耸峙，为沧池中的主要风景点。渐，浸也，言为水池所渐。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追杀王莽，王莽逃往渐台自保，被斩于“室中西北隙间”，证明台上有不少建筑物。隙，隅也，也就是房子的西北角。

酒池在长乐宫中，《庙记》曰：“长乐宫中有鱼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树，秦始皇造。汉武帝行舟于池中，酒池北起台，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

《水经注》认为，“殿之东北有池，池北有层台，俗谓是池为酒池，非也”。这就证明，长乐宫中除鱼池、酒池外，还有其他水池。虽然酒池的位置难于确指，但池上有肉炙树，池北有台，皇帝曾行舟池中，并于台上观看“牛饮者三千人”都是事实。武帝时“以夸羌胡，饮以铁杯，重不能举，皆抵牛饮”，可见台上有阁，台下还有广场，与酒池构成一组风景区。酒池中能够行舟，证明池水很深，既是皇帝行舟，必然有文武大臣、三宫六院相陪，湖面广阔当了无疑义。酒池的水源当来自长乐宫北的明渠，池的位置可能就在长乐宫的北部。

太液池位于城西建章宫的中部偏北地区，今西安西北郊的太液池苗圃即

《诗·王风·黍离》及《序》。

《三辅黄图》卷4、5。

《西京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三辅黄图》卷4、5。

《西京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汉书》卷99下《王莽传》。

《三辅黄图》卷4。

《水经注》卷19《渭水注》。

《三辅黄图》卷4。

其遗址。太液池范围广阔，“周回十顷”。1顷为100亩，折合69亩，则10顷为690亩，折合0.47平方千米。“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据说“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菜、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并刻金石鱼龙、奇禽、异兽。这就说明，太液池高岸环周，一泓荡漾，犹如“沧海之汤汤”。池中的渐台，自然是登高瞭望之台，而三山则象征东海中的天仙胜境。并以金石雕凿“鱼龙、奇禽、异兽”，使仙山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太液池中精心设置的渐台、三山和奇形怪状的动物，不仅为太液池的风景区增添了无限美好的风光，而且使人犹如进入天仙胜境一样有神秘之感，可见奇妙无穷，幻觉丛生，别有一番情趣。把人间园林升华到神仙天堂，是太液池的一大特色。池边雕胡（菰之有米者）、紫葢（葭芦之未解叶者）和绿节（菰之有首者）繁茂，与池水交相辉映，景色宜人。池周平沙上的鹈鹕、鸕鹚、鸂鶒、鸿鹄等，“动辄成群”，使太液池更加生机勃勃，呈现出自然风光的动态美。池中备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等，供皇帝嬉游。太液池风景优美，山水如画，是皇帝游乐的胜地。汉成帝常“以秋日与赵飞燕戏于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以云母饰于鹈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夹云舟而行。以紫桂为柁柂，及观云棹木，玩撷菱蕖……每轻风时至，飞燕殆欲随风入水”，成帝“结飞燕之裾”，游东至极。可见太液池是西汉三大宫中国园林风光最优美的所在，堪称皇宫园林的典范。

其次是广开上林苑，使长安城呈现在自然乐园之中。秦上林苑的范围较小，汉武帝广开上林苑，使上林苑成为方圆数百里的自然风光游乐区，汉长安城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区。由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西至黄山（宫名，在今陕西兴平），南猎长杨（宫名，在今陕西周至），东游宜春（苑名，即后来的曲江池）”，不断游猎于上林苑中，“入山下骑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驰骛禾稼稻稌之地，民皆号呼骂詈”，才广开上林苑，把渭河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划入上林苑，成为游猎区，只用属县“草田欲以偿户、杜之民”。东方朔力谏不能广开上林苑，认为“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不能因为游猎“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汉武帝不予理采，仍然把上林苑的范围大大扩展。

汉武帝时的上林苑，“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

《三辅黄图》卷4。

王达：《试评〈中国度量衡史〉中周秦汉度量衡亩制之考证》，《农史研究集列》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三辅黄图》卷4。

《汉书》卷25下《郊祀志》。

《三辅黄图》卷4。

《西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99页引《西京杂记》。

《三辅黄图》卷4。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其中宜春为宜春下苑，即曲江池。御宿指樊川，即潘河川道，因刘邦封名将樊哙于此，故名。一说由于皇帝“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川”。昆吾为地名，有亭，地址不详。其余鼎湖（位于今陕西蓝田焦岱镇）、长杨、五柞（均位于今陕西周至县境）、黄山（位于今陕西兴平市境）均为宫名。由此可见，汉上林苑北濒渭河，南抵秦岭，东到蓝田，西至周至，“方三百四十里”，或“方三百里”，范围十分广阔。

上林苑既为皇帝射猎的场所，必然森林茂密、杂草丛生，野兽经常出没。主要动物有熊罴、豪猪、虎豹、狐兔、麋鹿（四不象）、牦牛、青兕、白鸚鵡、紫鸳鸯等，“奇兽珍禽”，到处皆是。所谓“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皇家动物园。长杨宫中还有射熊馆，长安城东的灞、浐交会处有虎圈，即秦虎园，建章宫西南有狮子圈等等。据说“汉兽圈九，彘圈一”。上述动物除圈养外，绝大多数都是散布于上林苑的森林草丛中。近年来在白鹿原上的薄太后墓中发现大熊猫遗骨，证明汉上林苑中也有大熊猫的活动。这与当时气候温暖，“渭川千亩竹”的形势相适应。

上林苑中草木畅茂，奇花异果比比皆是，汉武帝时，“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其美名，以标奇异”。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破南越后，从南方引进了许多亚热带植物，种植于上林苑中。其中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桔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已珍惜之。”由此证明，西汉的上林苑还是南北植物交会的植物园，自然风光尤为壮丽。

“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清流、湖泊星罗棋布，犹如天上的繁星，晶莹明亮，闪闪发光。上林苑中最大的人工湖就是昆明池，除此而外，还有漓池（漓水源头）、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大壹池、郎池、饮飞外池、影娥池、鹤池、盘池、滌池等，水域十分广阔，为上林苑增添了无限美好的风光。许多湖泊具有独特风光，构成独立的风光单元。如“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

《汉书》卷 87 上《杨雄传》。

《三辅黄图》卷 4。

《雍录》卷 6。

《长安志》卷 11。

《三辅黄图》卷 4 引《汉宫殿疏》。

《三辅黄图》卷 4 引《汉旧仪》。

《汉书》卷 87 下《杨雄传》；《三辅黄图》卷 4。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137 - 138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三辅黄图》卷 4《上林苑》。

《三辅黄图》卷 3《扶荔宫》。

《汉书》卷 57 上《司马相如传》。

《三辅黄图》卷 4《池沼》。

有四百六十二条，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焕然”；“ 饮飞具缙缴以射鳧雁”，故以名池；“ 武帝凿池以玩月，其旁起望鹄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琳池南有桂台以望远，池中“ 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名曰低光荷”等等。池中大都有游船，形式多样，景色各异。昆明池池大水深，池中有“ 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还有可载万人的豫章大船，“ 上起宫室，因欲游戏”。“ 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帝御豫章观临观焉”。影娥池中有“ 宫人乘舟弄月影”的游月船、触月船、鸿毛船、远见船，“ 载数百人”。淋池中原有桂楫松舟，一豆槽，后改为文梓船，“ 木兰为桹，刻飞燕翔鹄，饰于船首，随风轻漾，毕景忘归”。特别是炎夏盛暑，上林诸池，大都是游乐消暑的良好去处，游船荡漾，人流如潮。

上林苑中还有许多离宫别馆，有的宏伟壮丽，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奇异别致，与自然风光争丽竞辉，融为一体，把上林苑装扮得格外艳丽，妩媚多姿。主要的离宫有建章宫、长门宫、储元宫、犬台宫、葡萄宫、宜春宫、扶荔宫、宣曲宫、鼎湖宫等，皆金铺玉户，豪华壮丽。著名的观有豫章观（亦名昆明观）、飞廉观、青梧观、射熊观、白杨观、龙台观、涿木观、细柳观、霸昌观等，形式各异，为登高瞭望的理想场所。除此而外，还有台、榭、楼、阁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园林融人工于自然美之中的基本特色，上林苑的布景应该是一个典型。上林苑是皇家园林，到处绿树成荫，百花飘香，渠水清流，池陂连漪，殿阁台榭林立，与宏伟的长安城争奇斗异，壮丽无比，真是“ 植物斯生，动物斯止，众鸟翩翩，群兽駉駉……林麓之饶，于何不有……嘉卉灌丛，蔚若邓林……”确实壮观至极。

第三是苑中有苑，形成独立的小景观。上林苑是一个大的园林区，再依据地形、水源，设置独具风格的小景区，构成园中之园。最典型的有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西郊苑、乐游苑、宜春下苑等。譬如，御宿苑也就是樊川风景区，南倚神禾原，北倚少陵原，灞河横贯其间，“ 汉武帝为离宫别馆，禁御人不得入。往来游观，止宿其中，故曰御宿”。苑中有梨园，出产大梨，皮薄味美，远近闻名。思贤苑、博望苑，都是为太子所立，以广宾客，故“ 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褥甚丽”，以建筑物取胜。乐游苑即今大雁塔东北的乐游原，突兀高起，宛似馒头，又“ 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而成为上林苑中的一个特殊区域，景色奇异，引人入胜。宜春下苑即曲江池，以“ 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而形成胜景。曲江池秦称 洲，汉武帝凿为名胜风景区，

《三辅黄图》卷4《池沼》。

《三辅黄图》卷4《池沼》。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103页引《洞冥记》。

《三辅黄图》卷4。

《三辅黄图》卷3。

《三辅黄图》卷5。

《西京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三辅黄图》卷4。

《三辅黄图》卷4。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91页引《西京记》。

“名为宜春苑”。宜春苑就是以水流屈曲的湖泊为基础，以汉武泉为水源，建立楼台亭阁。同时少陵原紧环四周，并借景于秦岭，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风景区。不难看出，汉代巧用地形，充分发挥各种自然条件的优势，造成园中之园，为后来中国城市园林的发展树立了样板。

西汉长安城的园林，奠定了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基本格局，是东方园林的鼻祖。

（4）汉魏洛阳园林

汉魏洛阳园林豪华壮丽，有许多在北魏时仍然多次重修，享有盛名。根据《水经注·谷水注》和《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规模宏大，布设佳丽，有自己的特点。

《东京赋》中的“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复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螭；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采冽清”，就是对东汉洛阳园林的精彩描述。由于谷水流经洛阳城内，并与阳渠相贯通，形成许多重要湖泊，而这些水面广阔的湖泊，正是洛阳园林的主景和基础。

濯龙园位于汉魏洛阳城的西北隅，正好位于北宫之西。一说濯龙为殿名、池名，并非园名。魏明帝大规模修造芳林园，齐王芳改名华林园。北魏仍称华林园，位于洛阳城的东北部。该园历经汉、魏、北魏的建设，成为洛阳城中最为豪华壮丽的园林。园中以大海为主景，大海也就是汉魏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九华台。北魏于台上造清凉殿，于海中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钓台殿，并作虹霓阁，乘虚来往。海西南有景山殿。山东有羲和岭，岭上有温风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馆，并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东有临涧亭，殿西有临危台。景阳山南还有百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柰（果名）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可见华林园是以广阔的水域，巍峨的山峰，茂盛的百果林为基础，再衬托以豪华壮丽的楼台亭阁，使园林景色如画，成为皇帝划船游乐的主要场所。而且各个海池，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连阳渠，亦与翟泉相连，即使遇到旱灾，谷水仍注之不竭，“至于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以海池、山峰、奇花异木和珍禽异兽构成的华林园，犹如一个巨大的自然保护区，各种自然景色交相辉映，美如画卷。“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与汉代的长安上林苑十分相似。

位于洛阳城东北隅的翟泉，也是一处重要名胜。泉“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周回三里。曾为春秋时诸侯会盟之地。汉魏时为步广里，即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91页引《太平寰宇记》。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18页《图》。

《东京赋》薛综《注》及《洛阳图经》。

《昭明文选》卷20《华林园集诗注》引《洛阳图经》。

《魏书》卷93《茹皓传》、卷64《郭祚传》。

《水经注》卷16《谷水注》。

杨銜之：《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建春门内御道南》；《历代宅京记》卷8《洛阳中》。

《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建春门内御道南》。

《水经注》卷16《谷水注》。

《水经注》卷16《谷水注》。

《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建春门内御道南》。

贵族居住区。因泉“水犹澄清，洞底明静，鳞甲潜藏，辨其鱼鳖”，情趣盎然，自然为贵族所喜爱。可见翟泉清洌见底，一泓荡漾，引人入胜。

北魏设置了单一的宫城后，又发展了洛阳的园林，把皇宫建设与园林相结合，在宫城的西北隅设置了西游园。该园位于宫城西门千秋门内道北。园中有魏文帝所筑凌云台，台上有八角井，北魏孝文帝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可见此台高大雄伟，耸峙入云，是登高了望，一览洛阳无余的最好去处。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即观高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海即魏文帝所穿灵芝池，“广长百五十步，深二丈，上有连楼飞观，四出阁道钓台，中有鸣鹤舟、指南舟”。由于灵芝钓台耸峙入云，“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并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九龙吐水乃曹魏引谷水所为，而且还使博士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十分别致。以上四殿，皆有飞阁向灵芝（台）往来。灵芝台也就是皇帝避暑的胜地。不难看出，西游园是以广阔的水域和耸峙入云的台阁为基础，形成独具风格的风景区，是皇帝登高瞭望和避暑的良好去处。

洛阳的风景区大都位于城的北部，除城的北部为主要宫殿区外，显然同城的北部靠近谷水、阳渠有密切关系。充足的水源是造园的基础，洛阳园林风光优美，有似于西汉长安的上林苑，同样是以水域广阔，森林茂密，竹林青青，楼台亭阁壮丽为基本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说，洛阳园林继承了西汉长安园林以自然美为造园的基本形式，而进一步发展了人工美与自然美的巧妙结合，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使园林风光处处生辉，把中国园林的造园技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5）曹魏邺城园林

曹魏邺城即邺都北城，有一条东西向的街道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除中间为皇宫、东部为贵族居住的戚里外，西部即为铜雀园。

铜雀园因铜雀台而得名。曹操在邺城西墙北段筑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石虎更增二丈……又于屋上起五层楼……又作铜雀于楼巅，舒翼若飞。南则全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三台为全城的制高点，为军事目的而设置，冰井台中有冰室，有数井“藏冰及石墨”，另外还有粟窖、盐窖等，“以备不虞”。三台与铜雀园相连，也是铜雀园的组成部分和登台观赏全园风光的理想所在。铜雀园既有高台建筑，又引漳水入园，“谓之长明沟”，使铜雀园清水长流，绿树长青，景色秀丽。正如《魏都赋》所说：“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蔓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有睥吕梁……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园林风光十分优美，充分利用河渠、绿树、高台，构成别具

《元河南志》三《千秋门》；《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瑶光寺》。

《太平御览》卷67引《晋宫阁名》。

《三国志》卷3《明帝纪》裴注引《魏略》。

《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瑶光寺》。

奈良县立檀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中国之都城遗迹》第34页《图》，1983年。

《水经注》卷10《浊漳水注》。

一格的邺城园林，高低错落，尤为壮观。另外，城西的玄武苑，苑有玄武池，池有鱼梁钓台，竹木灌丛等，也是游乐的胜地。城北的华林苑，城西的灵芝园、灵芝池，也都享有盛名。

（6）六朝建康园林

六朝的建康城位于今南京市区，属于江南水网地带，造园的地理基础十分优越。六朝时代的建康城，修造了许多精美的园林，主要有西苑、华林园、乐游苑和玄武湖。

孙权迁都建业后，“城建业太初宫居之”。太初宫为孙策府第，位于东晋以后建康宫西南。宫西门外为“运渎东曲折内池”，以池为中心，开辟了西苑，成为皇帝游乐的场所。

华林园位于建康城内东北隅，一说位于台城内，也是孙吴旧宫苑，晋武帝更筑立宫室。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重修广之”。该园也是以山水取胜，筑有景阳、武壮诸山，开凿天渊池，构成园内主景。在池旁建景阳楼以“通天观”。又筑景阳东岭，造光华殿、凤光殿、兴光殿、醴泉堂、层城观、一柱台、射棚等，同时还开凿了花萼池、筑疏圃，使山水与殿、堂、台交相辉映，光采夺目。大明时紫云出景阳楼，因改名景云楼。又造琴堂，因有双树连理，改名连玉堂。同时又建造灵曜前、后殿，以及芳香堂、日观台等，使华林园更加豪华美丽。梁时又在园中造重阁，上名重云殿，下名兴光殿，以及朝日明月之楼，“登之，而陞道绕楼九转”，既耸峙入云，又新奇别致，堪称一绝。陈时又造听讼殿、临政殿，使华林园殿阁林立，几乎与皇宫无异，成为后来离宫与园林相结合的典范。华林园历经“吴、晋、宋、齐、梁、陈六代，互有构造，尽古今之妙”，成为六朝建康城内最大的离宫园林。

乐游苑位于建康城外东北覆舟山南，山北临后湖，即玄武湖。晋时为药圃，卢循曾筑药园垒于此处。宋元嘉中移郊坛出外，以其地为北苑，并兴建楼观于覆舟山，后改名乐游苑。覆舟山上除楼观外，还有许多亭观。大明中又于苑中“盛造正阳殿”。梁侯景之乱，“悉焚毁”。陈时更加修葺，并于覆舟山上立甘露亭。可见乐游苑以覆舟山为主景，以山下的建筑物、苗圃和山北的后湖为客景，形成山、湖、绿树、建筑物交相辉映的格局，景色瑰丽，引人入胜。

玄武湖即后湖，位于建康城北。一名蒋陵湖，一名秣陵湖，亦曰后湖，因在台城后得名。湖周40里，东西有沟与秦淮河相通。吴时名后湖，后废。东晋疏浚，称北湖。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复筑北堤，南抵城东7里白塘，水面广阔。元嘉二十三年（446年），黑龙见，乃立方丈、蓬莱、瀛州三神山于湖上，改名玄武湖。一说黑龙可能是长江里游来的鳄鱼。刘宋时大阅水军于湖上，号昆明湖，俗呼为饮马塘。同时，又于湖侧作大窦（即闸门），引水入华林园天渊池，贯串宫掖，注入城南堑，成为建康城供水的重

《水经注》卷9《洹水注》。

《历代宅京记》卷12。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太平寰宇记》卷90《升州》。

《建康实录》卷12《太祖文皇帝》注引《舆地志》。

《建康实录》卷12《太祖文皇帝》注引《舆地志》。

要水源。由于玄武湖水面广阔，又与乐游苑、华林园三足鼎立，成为建康三园的主体。以广阔的水域取胜，是玄武湖风景区的主要凭借。另外，由于玄武湖位于建康城北，紧临台城，容易引水灌城，又是兵家必争之地。

（7）隋唐长安园林

隋唐长安城的风景区除宫廷和私人宅第中的湖泉佳景、茂林修竹外，还有专门供游乐的场所，这就是禁苑、曲江池、骊山华清宫和樊川别墅。

禁苑，也就是隋代的大兴苑，位于长安城北，是皇帝游猎的地方。“东距浐，北枕渭，西包汉长安城，南接都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苑周有高大的围墙环绕，苑内宫亭相望，楼阁相属，各有特色。浐水西岸的望春宫（亦称望春楼、望春亭），其遗址就在今长乐坡，坡下即广运潭。天宝二年（743年），陕郡太守韦坚指令东南漕船云集广运潭中，货物繁多，船形各异，成为一时的奇观。另外，九曲宫、鱼藻宫、元沼宫、咸宜宫、昭德宫、光启宫、含光殿、骥德殿、白华殿、会昌殿等，大都以其形状或吉利的名称命名。如九曲宫中有“殿舍山池”，曲折多变，犹如九曲回肠而得名，鱼藻宫、元沼宫因临鱼藻池和碧池而得名，骥德殿就在飞龙院东南，因名马而得名，而含光、光启则显然是取义光明的意思等等。苑中林木葱郁，景色宜人，有柳园和柳园亭、桃园和桃园亭，以及梨园和葡萄园等。宫殿、林木之中又有鱼藻池、碧池、清明渠、永安渠、龙首渠、漕河点缀其间，亭阁倒影，水光明媚，游乐其中，美不胜收。另外，禁苑还起着外郭城的作用，有利于宫城的安全。因为宫城位于长安城北部中央，有了禁苑的围墙，恰好被围在中心。

由于禁苑一带地形平行，无法利用山川之胜布设风景区，因此，后来风景区的发展主要是在长安城东南一带。这里终南耸峙，河流密布，既有高大雄伟的山原，又有突然凹陷的低地，取其自然之美再加以人工的雕凿，建设风景优美的游乐胜地，实在是理想不过的。曲江池、骊山华清宫和樊川三大风景区就是自然之美大放异彩的典型代表。

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城外，是距离长安城最近的名胜风景区，并有夹城与兴庆、大明宫相通，道路便捷，封建皇帝经常出入这里，寻欢作乐。因此，盛极一时的“曲江饮宴”，一直被传为历史佳话。曲江池是少陵原头突然凹陷的一块低洼地带，南北长而东西窄，犹如一个葫芦形的瓢，仰口镶嵌在原面上。它的遗址就在今曲江池西村，面积约0.7平方千米。从曲江池西村向北去的公路，大致即唐代通往慈恩寺的黄渠的遗迹。

作为名胜风景区，曲江池兴起很早，秦称 洲，汉为宜春下苑，但主要还是因为水流屈曲，而被称为曲江。曲江池虽然不像杭州西湖那样有山峰环绕，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但少陵原紧环四周，秦岭突兀耸起近在眼前，不似西湖而胜似西湖。然而它发展成为长安附近最大的名胜风景区，主要还是在唐代。唐代开元年间，为了把曲江修建成优美的游乐胜地，开凿了一条引

《读史方輿纪要》卷20《江宁府》。

《唐两京城坊考》卷1。

《新唐书》卷134《韦坚传》。

《长安志》卷6。

《游城南记》。

潘水入池的黄渠，使曲江水量剧增，遂一反常态，顿时佳景倍于往昔。黄渠源远流长，为曲江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对发展曲江风景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代的曲江风景区以曲江水面为主景，充分利用周围地形特点，设置楼台亭阁，与宏伟的长安城南墙和耸峙入云的秦岭相协调，共同构成曲江客景，造成沿池观赏、景随影转，步步入胜的格局。从曲江池周围的地形特点来看，以池南地势最高，因此，供皇帝和妃嫔游乐的紫云楼、彩霞亭就设置在这里。紫云楼高耸入云，登楼远眺，曲江池烟水明媚，花卉环周，与水滨的长安城争丽竞辉；芙蓉园芬香浓郁，秦岭挺拔秀丽，犹如快要刺破青天；黄渠从山脚下弯曲而来，把曲江风景区与秦岭山脉连成了一个整体，湖光山色，格外壮观。池的东岸是皇帝及三宫六院从夹城进入曲江的主要通道；西岸有杏园和曲江亭子，是举人、进士聚会的场所。这里地势稍低，但有黄渠与慈恩寺相连，是曲江宴会和去雁塔题名的适中地点。另外，其他楼台亭阁无计其数，并有盛开的荷花、杏花、芙蓉和翠蒲新柳点缀其间，显示出百花争妍、亭榭竞辉和池水明媚的奇异景色。

唐代的曲江饮宴以春秋佳节、京城伏假和杏园关宴最为繁华。所谓春秋佳节主要指中和（二月朔日）、上巳（三月三日）、重阳（九月九日）三大节。每逢这三大节，百官游宴曲江池，进入曲江观光的人流如潮，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上巳节皇帝赐宴臣僚于曲江，京兆府大陈筵席，太常、教坊乐队演奏，池中彩舟与日光争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每年炎夏，唐朝政府的文武百官三日一上班，他们大都进入曲江池消暑度假，使曲江顿时繁华，热闹非凡。

最负盛名的还是曲江关宴，通过关试后的进士会同年于曲江亭子。然后列名于慈恩寺塔，称为雁塔题名。及第进士春风得意，于杏园、曲江亭大摆筵席，“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皇帝登紫云楼垂帘相视，百官公卿倾城纵观，并乘机挑选女婿，“车马阗塞”，盛况空前。

然而，到了唐代末年，曲江池已经衰败不堪，楼阁亭馆已大都被拆毁。北宋时张礼所看到的曲江池已被辟为农田，中间仅有一个很小的水池用于灌溉。

骊山位于唐长安城东，是秦岭山脉向西伸出的一个支阜，东西 10 千米，南北 6 千米，最高处海拔 1300 米。西绣岭和东绣岭古柏苍翠之色弥漫山谷，奇花异卉处处飘香，是骊山的主要风景区。“骊山晚照”就是指西绣岭盛夏傍晚时，雨过天晴，彩虹映山峰，松柏葱笼，青翠欲滴的奇异景色。骊山风景如画，自古即为名胜，山脚上温泉潺湲，更为风景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骊山温泉见于记载很早，远在秦始皇时代就已沐浴治病，

《游城南记》。

《旧唐书》卷 17《文宗本纪》。

《剧谈录》卷下。

《唐摭言》卷 1、3。

《唐摭言》卷 1、3。

《南部新书》庚。

《游城南记》。

《三秦记》。

并修起了离宫别馆，使风景区初具规模。唐代的华清宫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在骊山修建汤泉宫，高宗咸亨二年（671年）改名温泉宫。玄宗天宝六年（747年）才正式定名华清宫，取“温泉迸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之义。华清宫尽有河山之胜，成为一座几包骊山的庞大宫殿建筑群，比起长安的三大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山前洪积扇上，以温泉为中心的主要建筑物有御汤九龙殿（亦称莲花汤）、御寝飞霜殿、杨妃赐浴汤芙蓉汤（亦称海棠汤）、太子汤、少阳汤和长汤十六所等。汤池繁多，莹彻如玉，石面还隐起鱼龙花鸟之状，随水波游移，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山上的主要建筑物在西绣岭，第一峰最高，居两绣岭之间，上有翠云亭、羯鼓楼；稍西为第二峰，上有老母殿（即骊山老母，传说中用黄土造人的女娲氏）、望京楼；再下为第三峰，上有朝元阁、长生殿。整个华清宫殿阁林立，高低错落，豪华壮丽无比，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住宿、游乐的地方。“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正是这种盛况的生动写照。

唐玄宗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出游华清宫，岁尽始还长安。这是由于华清宫既是一座人间天宫，又有温泉的缘故，唐玄宗和杨贵妃可以在这里优游宴饮，享尽人间富贵。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些精彩的诗句，正是唐玄宗、杨贵妃华清游乐的真实记录。“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也就是骊山上的长生殿。长生殿本来是唐玄宗斋戒的地方，但也被利用来观赏明月，与杨妃情长绵绵。杨妃生日时，更在长生殿“张乐”演奏，以唱“新曲”。新曲无名，而杨妃爱吃荔枝，适逢“南方进荔枝，因名荔枝香”。由此证明，唐玄宗与杨贵妃去华清游乐，并非都是冬天，骊山也确有长生殿。

华清游乐宴饮之盛和规模之大，更是曲江饮宴难于望其项背的。唐玄宗出游华清宫，百官府署偕行，杨氏五宅俱从，等于把唐朝的中央政府完全搬到了骊山，轰动整个长安城。“千乘万骑被原野，云霞草木相辉光”，“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饮暮有赐”，就是这种出游场面的精彩描述。杨氏五宅（杨钺、杨钊和三夫人）家别为队，队各一色，“川谷成锦绣”，“香闻数十里”，更是豪华无比，竟使灿烂的阳光为之减色。可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政局动荡不安，皇帝已很少出游华清宫，这座人间天宫便遭到人为的拆毁。到了宋代，“汤所馆殿，鞠为茂草”，已经破烂不堪。

今天的华清池就是在唐代华清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景优美，中外游客赞不绝口。华清池的东边有始皇陵和兵马俑坑，犹如锦上添花，堪称世

《初学记》卷7。

《玉海》卷158《华清宫》。

乾隆《临潼县志》卷2《纪事》。

《新唐书》卷22《礼乐志》。

乾隆《临潼县志》卷8《艺文》。

《新唐书》卷76《杨贵妃传》。

《新唐书》卷207《鱼朝恩传》。

《南部新书》辛。

界旅游胜地。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奇迹之一，而新近发现的唐代华清宫建筑和汤池遗址，位于温泉水源的西北不远处，更为华清池增添了异彩。除清理出木质出水道、砖块和诗石等文物外，还有用青石条铺砌的浴池，用方砖铺地的房子遗迹，用水磨方砖铺砌的走廊，而且保存很好，为唐代华清池和汤池找到了实物证据。现已建成唐华清宫汤池博物馆，共有五座汤池供游人参观。

樊川位于唐长安城的南郊，即今长安县的韦曲、杜曲一带，东南起自江村，西北至于塔坡，为一东西长约 15 千米的带状盆地。这里本名后宽川，因刘邦封名将樊哙于此，故名樊川。这里南望终南山，挺拔秀丽，耸入云霄，北倚少陵原，犹如锦绣屏风，雄伟壮观，青翠起伏的神禾原逶迤在它的西南，宛似银链的灞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横贯其间。用“江山美如画”来形容樊川，量不为过。元李好文盛赞樊川“近蜀之饶，固自若也”。《水磨赋》更称这里为“仰终南之云物，俯灞水之清湍，乔林隐天，修竹蔽日，真天下之奇处，关中之绝景也”。其富庶程度胜过了“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天府取之而不竭，陆海探之而无底”。从汉代以来樊川就是韦、杜诸贵族聚居的地方。到了唐代，“韦杜二氏，轩冕相望，园池栉比”，完全成为一个别墅区。樊川山青水秀，为发展成长安城南一个风景秀丽的别墅区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直到今天，每当春暖花开，樊川桃红柳绿，河渠纵横清流，稻畦菜园交错，麦田郁郁葱葱，与终南神秀、少陵壮阔、神禾摇曳共同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形成难于用语言表达的奇伟壮观。

唐代的樊川别墅，几乎可与长安城中的皇宫相媲美。因为韦杜贵族多为当朝近臣，有钱有势，能够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的别墅。韦安石、杜佑等曾官至宰相，唐中宗的韦皇后还想效法武则天，夺取唐朝的最高权力，故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在韦杜贵族的经营下，樊川的园池、山庄、别业、郊居、山林、闲居、池亭、别墅盛极一时，成为长安城南的主要别墅区。这些佳丽的别墅以山原川谷为基础，造成山表其外，冈固其里，尽有茂林修竹之胜。长安城中的显贵经常出入樊川，或长期闲居，过着人间天堂的生活。“杜曲花光浓似酒”，“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就是反映这种场面和浪荡公子的无理取闹。

樊川别墅倚原面水，夹灞河遥遥相望，布设极为精巧。他们都引水灌园，顺着深岩曲径，使亭榭楼阁回转，远景近影相参，造成“青山意不尽”，步步引人入胜的格局。这些别致的园林有何将军山林（在今韦曲西塔坡）、韦安石别业（在今韦曲）、韩愈送子读书处（在今韦曲东韩店）、郑谷庄（在今韦曲东南，郑虔之居）、杜佑瓜洲别业（在今瓜洲村）、杜佑郊居（在今

《华清池的新发现》，《陕西日报》1982年8月3日。

《雍录》卷6。

《长安志图》卷中。

《长安志图》引《水磨赋》。

《长安志图》引《水磨赋》。

《长安志图》卷中。

《全唐诗》卷225。

《长安志图》卷中。

《关中胜迹图志》引《雍胜略》。

朱坡西)、驸马郑潜曜之业(在今南樊村与三府衙村之间)等等。其中杜佑郊居林泉佳丽为“城南之最”。园中有千回百折的九曲池、别具一格的玉钩亭、每朵七叶的七叶树等奇景。何将军山林恰好东靠原而西临灞,“出门流水注,回首白云多”,“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韦安石别业更“林石花亭,号为胜地”。郑驸马之业位子神禾原边的莲花洞,虽无楼阁之胜,却有“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清琅玕”的特色。由此可见,樊川别墅不仅盛极一时,而且精巧别致,各有特点,把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另外,屹立在少陵原边的牛头(今杨虎城将军陵园)、华严(现存两塔)、兴国、兴教(今兴教寺)四寺,和雄峙于神禾原边的云栖、禅定、洪福、观音四寺,是唐代著名的樊川八大寺。这些寺院殿宇繁多,景色葱郁,与小巧玲珑的别墅交相辉映,使锦绣花簇的樊川犹如披上节日的盛装一般,更加妩媚多姿。

唐长安城以山水为主布设风景区,在城市风景区的建设上独具匠心。它娴熟地利,巧用地形,使自然之美更加增辉,形成了一代新风格。

樊川历经宋元,仍为长安城南一个名胜风景区。有宋陈谏议别墅、元廉相别墅、胡相别墅、赵氏别墅等,幽栖秀丽,保持了樊川别墅的基本特色。陈氏别墅中的三桂亭,以其三子同登第而得名。它位于灞水之阳,临灞耸峙,神秀异常,显然也是再现了唐代樊川别墅的固有风格。

(8) 北宋开封园林

北宋开封的园林主要有艮岳、金明池、琼林苑、宜春苑和玉津园。这些园林尽量利用地形平坦,水域广阔的优势,建造了壮丽的园林,成为平原地区园林的典型代表。

艮岳位于里城的东北隅,亦名万岁山,是宋徽宗时为了享乐而人工筑造的园林。宋徽宗大兴工役,“大率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皆越海渡江,凿城郭而至”,运至开封里城东北,建造了景色别致、规模宏大的园林。该园周10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有书馆、八仙馆、紫石岩、龙吟堂等建筑物,各具一格,景色生辉。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囡囡亭、绛霄楼等。山之西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泓、濯龙峡、跨云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上下设两阁,阁下有平地,凿大方沼,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为凤池,东出为雁池。另外还有许多亭、阁、馆等建筑,山、池、亭融为一体,十分壮观。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涧,支流别为山庄,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穷极

《游城南记》。

《游城南记》。

《全唐诗》卷224。

《关中胜迹图志》引《雍胜略》。

《全唐诗》卷225。

嘉庆《咸宁县志》卷4。

雍正《陕西通志》卷73《古迹二》。

《艮岳记》,《丛书集成初编》1508本。

《宋史》卷85《地理志》。

巧妙，而景龙江外馆舍尤精。景龙江外还有许多宫、池、馆、舍，都极尽天工之巧，犹如人间天堂。艮岳作为皇家园林，集全国财力，大规模地筑造假山，开凿湖池，修建宫殿、亭馆，引植奇花异木，豢养名禽异兽，成为一座人造的天堂乐园。金人围城时，放走的山禽水鸟达十余万只。鸟兽之多，可见一斑。园中景色葱蔚，移枇杷、橙柚、桔柑、榔栝、荔枝树，以及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羞草等，使艮岳具有北国江南的风光，所谓“奇华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正是真实写照。耗尽民脂民膏的艮岳，与北宋王朝同归于尽，其太湖石只能在今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山看到遗留而已。

金明池和琼林苑均位于城西顺天门外，前者在路北，后者在路南。金明池周回约九里三十步，池（东）西直径七里许。池南岸西去百余步，有临水殿，为皇帝游幸之所。再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数百步，桥面三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面石甃，“河间云水，戏龙屏风”，大殿倒映池中，景色壮丽无比。游人环池漫步，“荷盖相望”，情趣盎然。桥之南立棂星门，门对街南宝津楼，楼下阍仙桥水殿。此池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柳”，随风摇曳生姿，引人入胜。北去直至池后门，则为汴河西水门，可见金明池的水源来自汴河。金明池之西，建筑物甚少，但垂杨蘸水，环境安定，是垂钓的良好地方，故“多垂钓之士”。池中还有虎头船、龙船等多种游船，游人划船观景，绚丽多姿，心旷而神怡。金明池一泓荡漾，与细柳、垂杨、莲荷、楼桥、大殿融为一体，成为开封城西最主要的名胜风景区。

琼林苑与金明池隔街相望，以植物茂盛著称。苑大门牙道，古松怪柏成行，两旁还有石榴园、樱桃园，各有亭榭。苑东南隅，筑有华咀冈，高数十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从闽、广、二浙移植。苑中还有月池、梅亭，牡丹茂盛。可见琼林苑虽然与金明池南北相对，但景色各异，前者以奇花异木取胜，后者以广阔的水域和豪华的建筑物为优，形成不同风格的园林。

金明池、琼林苑与城西景耀门外的宜春苑、城南南薰门外的玉津园，号称皇家四大园。实际上，除四大园外，开封公、私园林之盛也是空前的。像州东宋门外快活林，曹、宋门之间东御苑。州南奉圣寺前孟景初园。州北李驸马园。州西过板桥，有下松园、王太宰园、杏花冈，金明池角南去蔡太师园，南洗马桥西巷南去药梁园、童太师园。州西北元有庶人园、创台、流盃亭榭数处等等，不下数十处。“太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到处“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输暖轶，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开封确实是一座锦绣繁华的乐

《宋史》卷 85《地理志》。

《宋史》卷 85《地理志》。

《艮岳记》，《丛书集成初编》1508 本。

《艮岳记》，《丛书集成初编》1508 本。

《东京梦华录》卷 7。

《东京梦华录》卷 7。

《东京梦华录》卷 7。

《东京梦华录》卷 6。

园。

北宋开封园林既有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官园，也有小巧玲珑、布设精妙的私园，集中国南北园林特点于一城，应该是中国园林造园技术的巨大发展。北宋开封园林的这种发展趋势，同开封地形平坦、开阔，水源丰富，有密切关系，为修筑假山、开凿湖泊、创造独具风格的园林提供了有利条件。

（9）南宋杭州园林

南宋杭州经济繁荣，自然环境优越，山川胜景比比皆是，公私园林也得到空前发展。最主要的有闻名全国的西湖胜景，以及东御园、庆乐御园、富览园等，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壮丽的画卷。

西湖位于杭州城西，旧名钱塘，“自古迄今，号为绝景”。今实测湖岸周长 15 千米，湖面 6.03 平方千米，水面 5.66 平方千米。西湖周围群山耸峙，湖水清冽明静，山色湖光奇妙无穷，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风景区，天下“绝景”之说，正是写实。以西湖为主景，群山为远景的西湖风景区，南宋时景点极多，各有特色，美不胜收。映波桥侧竹水院，“涧松茂盛，密荫清漪”。西林桥里湖内，“俱是贵官园圃，凉堂画阁，高台危榭，花木奇秀”。西冷桥外孤山路，有圣延祥观，“御圃在观侧”，内有井、泉和香月亭。亭侧山椒，环植梅花。苏公堤，乃苏东坡浚湖所筑，“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建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第一桥映波桥西先贤堂，堂之外堤边，有袁公桥，“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环合，景象窈深，惟堂滨湖，入其门，一径萦纡，花木蔽翳，亭馆相望”。第二桥名锁澜，桥西建湖山堂，“栋宇雄杰，面势端闳，冈峦奔赴，水光滉漾”。后又增建，成为西湖“堂宇之冠”。第三桥名望仙，桥侧为三贤堂，即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的祠宇。正当苏堤之中，“前挹湖山，气象清旷；背负长冈，林樾深窈；南北诸峰，岚翠环合，遂与苏堤贯联”，融山、湖、堤为一体。北山第二桥名东浦桥，通灵隐三竺梵宫，“游玩往来，两岸夹植花柳”。北山第一桥名涵碧桥，过桥出街，东有广化寺，“建竹阁，四面栽竹万竿，青翠森茂，阴晴朝暮，其景可爱”。孤山桥名宝祐，旧呼曰断桥，桥里有梵宫，桥外东有森然亭、放生堂，有二亭，均滨湖，“为祝网纵鳞之所，亭扁泳飞”。钱塘门（杭州城西门）外玉莲堂，“堂宇爽闳，花木森林，顾盼湖山，蔚然堪画”。丰予门外耸翠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江花坞”，为游览之最佳场所，门外还有望湖亭三处，是游览者观湖赏景休息的良好去处。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丰予渔庄、清波聚景、长桥庆乐、大佛、雷峰塔下小湖斋宫、甘园、南山、南屏，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别映湖山”，风景如画。南宋时，画家已把西湖胜景按四时特点归为十大景，即苏堤春晓，麴院荷风（清改为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清改为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映月（现称印月）。这十大景，大体概括了西湖美景的主要形象，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西湖风光“淡妆浓抹总相宜”，实在妙不可言，美不胜收，令人陶醉、向往，以人间天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的西湖，由于白堤、苏堤的纵横交错，西湖已被分隔成几部分，除大部分湖面仍称西湖外，白堤和孤山以北称为北里湖，苏堤以西称为西里湖，

《梦梁录》卷 12《西湖》。

《梦梁录》卷 12《西湖》。

《梦梁录》卷 12《西湖》。

玉带桥以北到岳坟沿岸称为岳湖,花港观鱼以南称为南湖。西湖水深平均 1.5 米,流域面积约 21 平方千米。

西湖园林集中国园林特点之大成,山青水秀,以自然之美取胜,又融人工美于自然美之中,恰到好处,二者相依为命,相得益彰,壮丽无比。今天的西湖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园林风景区,中外游客翘首相望。

西湖风景美不胜收,而杭州公私园林之盛,比之北宋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皇宫称大内,也是宫殿与园林相结合,“禁中及德寿宫皆有大龙池、万岁山,拟西湖冷泉、飞来峰”。也就是说,把西湖胜景浓缩于大内,其“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

其他公私园林遍及城内外,均以西湖为中心,“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各有特点。以在城万松岭内贵王氏富览园、三茅观东山梅亭、庆寿庵褚家塘东琼华园、清湖北慈明殿园、杨府秀芳园、张氏北园等最为著名。内侍蒋苑使园林“亭台花木,最为富盛”,“数亩之地,观者如市”。城东新门外有东御园,即富景园;五柳御园,即西园。城西清波、钱湖门外有聚景御园(旧名西园)、张府七位曹园。南山长桥西有庆乐御园(旧名南园)、净慈寺前屏山御园、云峰塔前张府真珠园、白莲寺园、霍家园、方家峪、刘园。庆乐御园,有“十样亭榭,工巧无二”。真珠园内高寒堂,华丽无比。北山有集芳御园、四圣延祥观御园、下竺寺御园。其中四圣延祥观御园,“西湖胜地,惟此为最”,“湖山胜景独为冠”。园有凉台,“巍然在于山巅”。有诗云:“水明一色抱神洲,雨压轻尘不敢浮”,秀冠西湖,溢于言表。钱塘门外有柳巷、杨府云洞园西园、刘府玉壶园四井亭园、杨府水阁,以及具美园、饮绿亭、裴府山涛园、赵秀王府水月园、张府凝碧园。孤山路口,有内贵张氏总宜园、德生堂、放生亭、新建公竹阁。涌金门外有张府泳泽园、慈明殿环碧园(旧是清晖御园)。城南嘉会门外,有玉津御园,山川壮丽,有“江山秋日冠轻烟,别院风光胜辋川”之说。玉津园沿用北宋开封城南玉津园旧名,说明两园有许多相似之处。嘉会门外的包家山,有张侯壮观园、王保生园。山上有桃花关,因两带皆植桃花而得名,为城南春游之胜境。城北北关门外,有赵郭家园。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城(一作滕)诸园,“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为都城赏花、买花的场所。

杭州位于东南水网地带,周围多低山丘陵,山水秀丽,具有造园的一切有利条件,因此,园林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风景之佳丽,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优越,是杭州园林壮丽的基本条件。

(10) 元大都园林

元大都城选择了高粱河水系,水源丰富,地形平坦,为建造园林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要园林有宫城以北的御苑和宫城以西的西御苑。

宫城以北的御苑位于宫城北门厚载门外、萧墙厚载红门之里。内有水碾,

《杭州旅游地图册》,陈桥驿文字说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武林旧事》卷 4《故都宫殿》。

《梦梁录》卷 19《园圃》。

《梦梁录》卷 19《园圃》。

《都城纪胜·园苑》;《梦梁录》卷 19《园圃》。

《都城纪胜·园苑》;《梦梁录》卷 19《园圃》。

引水自玄武池，灌溉种花木；还有熟地八顷，建有五座小殿，为皇帝耕田的场所。

西御苑位于宫城以西，以太液池（今北海、中海）、万岁山为中心。万岁山，亦名万寿山，位于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华岛，也就是今北海公园的白塔山所在地。山高数十丈，皆叠玲珑石筑成，“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绕其后，并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妙趣横生，成为奇观。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桥北有玲珑石，建木门五座。左右皆有登山之径，萦纡万石中，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东有灵圃，圃中有奇兽珍禽。山顶有广寒殿，山之半有仁智殿，二殿左近有玉假山、石笋等。广寒殿东有金露亭，西有玉虹亭，皆金壁辉煌。太液池周回若千里，植芙蓉。仪天殿在池中园抵上，“当万岁山”。犀山台在仪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药。太液池西北为兴圣宫，西南为隆福宫，皆殿阁林立，“极尽巧奇”。后苑（兴圣殿北）中有金殿，“殿楹窗扉皆裹以黄金，四外尽植牡丹百余本”。又西有翠殿，“左右分布异卉幽芳，参差映带”，清雅美丽。

西御苑以太液池、万岁山为主景，建有豪华壮丽的殿、阁、亭、台四五十座，与山水争丽竞辉，构成无数奇观异景，步步引人入胜，真是巧夺天工，极尽辉煌壮丽之能事。

元大都园林数量较少，但却充分发挥了地理上的优势，以山水为主，建造了规模宏大、秀丽无比的园林。

（11）明南京园林

明南京城前倚大江，并有宁镇山脉作为凭藉，建造园林的条件很优越。由于明初崇尚节俭，公私园林并不发达。主要的园林有钟山之阳植物园、城西南诸山寺庙园林和私家园林。

钟山之阳的植物园，以漆、桐、棕树为主，各有数千万株，主要为解决海运和战船所需漆、桐油和棕而种植，但也是风景优美的场所，为南京城增添了无限美好的风光。

城区的狮子山（城西北）、四望山（城北10里）、马鞍山（城东南35里）、清凉山（城西部）、鸡鸣山（城北部，覆舟山西南）、聚宝山（城南聚宝门外）等，共集中了数十座寺庙，著名的如静海寺（狮子山）、鸡鸣寺（鸡鸣山）、报恩寺（聚宝山）等，都是俯瞰全城、远望大江、景色葱郁、风景如画的游乐场所。

私家园林也受到限制，多在距离住宅较远的地方造园。这些私家园林主要集中在凤凰台、杏花村一带，即今中华门内西南隅。这里原为宋代的教场，有比较广阔的地盘，又接近秦淮河，水源丰富，为私家造园提供了有利的地理基础。而私家造园最多的当数中山王徐达及其后代所造的园林，据说有十余处。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元故宫遗录》。

《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元故宫遗录》。

《大明一统志》卷6《南京·苑圃》。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明初的南京城，低山丘陵与河渠湖泊相间，造园的地理条件极为优越。尽管造园受到限制，园林较少，与规模宏大的南京城并不相称，但以山峰和绿波万里的树木花卉为主要景色的南京园林，却独具特色，使全城成为一个庞大的植物园，这在中国都城园林中也是少有的。

（12）明清北京园林

明清北京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都城，园林发展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既有小巧玲珑的御花园，又有规模宏大的西苑和西郊诸园，集中国南北园林之大成。同时，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结合得更加巧妙，使诸园更富有诗情画意，景色优美，意境高雅，巧夺天工，情趣盎然。

御花园位于紫禁城的北部玄武门里，是皇帝游乐小憩的场所。面积很小，仅有7千多平方米，也压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因此，园林也左右对称布局。主要景点有古老松柏、花卉、石景等点缀其间。园内还建有钦安殿，位于全园北部中央地区。东北隅造有假山，皇帝、后妃登高瞭望，全园景色一览而无余。该园虽然左右对称布局，但富有变化，以小巧玲珑和高低错落取胜，使很小的空间，展现最大的景观。左右对称的建筑物西边有位育斋、澄瑞亭、千秋亭、养性斋，东边有摘藻堂、浮碧亭、万春亭、绛云轩，十分别致。由于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变化无穷，充分发挥地理上的优势，极尽造园艺术之能事，使御花园成为南园北用的典型。

西苑位于紫禁城之西，也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御园。经过明清两代的建设，西苑豪华壮丽，风景如画，皇帝也多在此游憩、接见外宾和处理朝政。“西华门之西，为西苑，榜曰西苑门，入门为太液池。”太液池源出玉泉山，从德胜门水关流入，汇为巨池，周广数里。也就是今北京的北海、中海和南海。这是西苑风景区的主景，其他景点都以太液池为中心，向四周展开，景景相连，步步入胜，构成一幅幅壮丽的画卷。

太液池南北4里，东西二百余步，旧名西海子。上跨石梁，中流架木。瀛台在南，五龙亭在北，蕉园、紫光阁东西对峙。沿岸垂柳依依，古槐挺拔，盛夏荷香满苑，不似西湖，而胜似西湖，有“新蒲古柏晓阴阳，太液昆明接上林”之称。

西苑的殿、阁、亭、台都围绕太液池布设，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景点，交相辉映，把西苑装扮得犹如人间天堂，无比壮丽。

循池东岸南折临池面北为勤政殿，门内正中南面为涵元殿，东为藻韵楼，西为绮思楼，正北为香宸殿。殿后南向曰瀛台，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临水为迎薰亭。由殿、楼、台、亭共同构成一组景点，西临太液池，殿、阁、台、亭耸峙，林木茂盛，“郁葱玉树映朱楼，太液芳波净不流”，正是真实写照。

循池岸而南为日知阁。这里建有水闸，池水由此达织女桥，有春及轩、交芦馆、芸斋。另外还有蕉雨轩、清音阁、云绘楼、同豫轩等建筑物，而瀛台之南隔池则为宝月楼（即今新华门）。这里以水渠连接的阁、轩、楼、馆、

《北京风物志》第74页，北京旅游出版社1984年版。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日下旧闻考》卷21《国朝宫室·西苑一》。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斋，构成渠水清流，楼阁相望，别具特色的景点。

由太液池西南循池而北，明代有高台数丈，中作圆顶，名曰平台。后废台为紫光阁，向北，为皇帝观看斗龙舟，御马监勇士“走解躡柳”的地方。清代则为皇帝观看“校射”的场所，称为“队自花间入，镞从柳外分”，可见紫光阁被花柳拥簇，格外壮观，自成景点。

西苑门循东岸而北为蕉园。中有明代崇智殿旧址，南有万善殿，东为延祥馆，西为集瑞馆。松桧苍翠，果树分罗，别有情趣。

金鳌玉桥横贯太液池，两端立二坊，西曰金鳌，东曰玉，为西苑往来大道。桥有九门，各具特色。站在桥上，池水荡漾，殿阁林立，松柏苍翠，百花争妍，令人心旷神怡。桥东有承光殿，围以圆城，十分别致；桥西有玉照宫，为明代近侍学习宫戏的地方。两宫殿隔太液池遥遥相对，更为金鳌玉桥增添了光辉。

五龙亭在太液池北，中曰龙泽，左曰澄祥、滋香，右曰涌瑞、浮翠，五亭耸峙，倒映池中，巍若仙居。

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也就是今北海中的白塔山，辽代以来即为名胜。岛上山顶古殿，相传为辽太后梳妆台，历金、元、明、清皆有宫殿，为游乐胜地。岛上多叠奇石，巉岈岬岬，乃宋开封艮岳石之遗留，周围景色如画，不似蓬莱仙阁，胜似蓬莱仙阁。

西苑园林，历经元、明、清三代的精心经营，融中国南北园林为一体，既气势磅礴，秀若天成，又各自为园，小巧玲珑，妙趣横生，美不胜收，应该是集中国南北园林之大成的一个典型。

西郊诸园亦即三山五园，是清代在北京西郊建成的规模宏大的园林区，其景色之壮丽，比之杭州西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山即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即畅春园、静宜园、静明园、圆明园、清漪园。三山风景优美，泉源汹涌，并分别修建了三大园，即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万寿山的清漪园，使山、泉得到充分利用，园林与山峰争辉，格外壮观。

畅春园位于南海淀大河庄之北，缭垣一千六十丈有奇，为明代国戚李伟的别墅。康熙时因故址改建为畅春园。所以赐名畅春，“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由于该遗址内水源丰富，地形高低相间，可“依高为阜，即卑成池”，依据自然形态，修筑成园。

畅春园有宫门和二宫门，各五楹，小河环绕宫门，气势不凡。中路自宫门至绮榭，主要建筑物有春晖堂、寿萱春永（皇太后寝殿）。照殿、倒座殿。循山而北，有河池，立玉润（南）、金流（北）二坊，并有瑞景轩、延爽楼、鸢飞鱼跃亭、观莲所、式古斋和绮榭。河池、山峰与殿、轩、坊、楼、榭呈现在翠绿的海洋之中，有“湖映千林绿，山围一苑青”之称。从倒座殿云涯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4《皇城二》。

馆东南的剑山到园东垣内的恩佑寺，为畅春园东路。主要建筑物有剑山上的苍然亭，山下的清远亭，大东门土山北、循河西上的渊鉴斋、佩文斋、葆光斋、兰藻斋、清籁亭，临湖的太朴轩，苑东垣内的恩佑寺。东路湖山壮丽，河渠纵横，建筑物精巧秀丽，被誉为“白日光中云五色，明波濯处锦千端”的地方。自玩芳斋至苑西垣内的紫云堂为畅春园西路。主要建筑物有玩芳斋、凝春堂、迎旭堂、乐善堂、红蕊亭、流文亭、集凤轩、天馥斋、雅玩斋、紫云堂。西路松柏苍翠，河渠清流，堂斋别致，令人神往，有“几年成翠幕，一径转苍垠”之称。园内筑东西二堤，长各数百步，东曰丁香，西曰兰芝。西堤外别筑一堤，曰桃花。东西堤之外，大小河流数道，环流苑内，出西北门五空闸，东转西流，注入圆明园。

畅春园之西有西花园，前有荷池，为皇子居住地。

圆明园在挂甲屯之北，南距畅春园一里左右。这是清代北京西郊五园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园林，实际上由圆明园、长春园（圆明园东墙外）、万春园（长春园南墙外，原名绮春园）三园构成，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成，占地五千余亩，达 108 景，集中国南北园林之大成，把中国园林建设推向了顶峰。

圆明园河湖相连，由河湖分割不同的景区，依据河湖、山峰、地形等自然之势，因势利导，兴修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形成各有千秋的风景区，景景相连，争奇斗异，实在是一幅壮丽无比的画卷。主要有四十景，十八门。

大宫门前辇道东西皆为湖，即前湖。二宫门为出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殿东为勤政亲贤殿，该殿最后为九州清晏殿，构成园门以三大殿为中心的主要景点，有“万井膏腴方被泽，一园草木已含晖”的美称。镂月开云在富春楼之后，后有池一区。池西北为天然图画楼，迤北为竹深荷静，又东渡河为苏堤春晓。碧桐书院在五福堂北河外，山阜旋绕。慈云普护在书院之西，前殿南临后湖。上下天光楼西临后湖。杏花春馆在楼西南，馆西为杏花村，南为礪壑余清。由春馆之西度碧澜桥为坦坦荡荡，前为素心堂，后为光风霁月。堂南为茹古涵今，南向。茹古涵今之南为长春仙馆，门殿三重，西为藻园。万方安和在杏花春馆西北，建宇池中，形如卍字，十分别致。度桥稍北，石洞之南为武陵春色，西为全碧堂，东南为小隐栖迟。山高水长楼在万方安和西南，后拥连冈，前带河流。北度桥，梵刹一区为月地居云，前殿方形，后有楼。循山径入为鸿慈永祐，前琉璃坊，左右华表。度桥而东，则汇芳书院，内为抒藻轩、涵远斋。日天琳宇在汇芳书院之南，由四楼构成，东南稻田弥望，河水周环。东北面北楼为澹泊宁静，西门外别院内为多稼轩，东临稻畦。河西为映水兰香，东南为钓鱼矶，北为印月池。东北为水木明瑟，西为柳浪闻莺。西北环池带河为濂溪乐处，后为云香清胜。普济桥迤北对稻塍为多稼如云，前为芰荷香。东北为鱼跃鸢飞，西南为铺翠环流。河南北岸仿农居村市者为北远山村。西南有室，临河西向为西峰秀色，东西船坞各二

《宸垣识略》卷 4《皇城二》。

《宸垣识略》卷 11《苑囿》。

《宸垣识略》卷 11《苑囿》。

《宸垣识略》卷 11《苑囿》。

《宸垣识略》卷 11《苑囿》。

《宸垣识略》卷 11《苑囿》。

所。北峰为安澜园，正宇曰四宜书屋。方壶胜景在四宜书屋之东，临池楼宇壮丽。澡身浴德在福海西南隅，即澄渊榭。平湖秋月有福海西北隅，东北出山口临河为花屿兰皋。蓬岛瑶台在福海中央，西为神仙三岛。接秀山房在福海东隅，南为揽翠亭。山房之南有敞宇，依山临河为别有洞天。洞天迤西为夹镜鸣琴，南为聚远楼。涵虚朗镜在福海东，即雷峰夕照正宇。廓然大公在福海西北隅，平湖秋月之西。坐石临流在澹泊宁静之东，溪水周环轩宇。其正东为面院风荷，南有跨池东西桥九空，枋楔二，西为金鳌，东为玉，风荷北有同乐园。洞天深处在如意馆西稍南，前宇乃诸皇子所居，为四所。以上就是圆明园四十景的概况，被称为御制四十景，各有小序并诗文描述。

圆明园对山、湖、河等有利地理条件的运用恰到好处，山明水秀，步步引人入胜，景随人意，景景妩媚多姿。各种建筑物巧夺天工，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相谐成趣，相得益彰，达到了壮丽异常的程度。

圆明园之东的长春园和长春园之南的万春园，也都发挥地理上的优势，壮丽无比，成为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称为圆明三园。

这座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园林，1860年被英法侵略军付之一炬，化为灰烬，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惨重的损失。法国作家雨果在圆明园惨遭破坏后，高度赞美的了圆明园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怒斥英法侵略军的罪行。他说：“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可能有原型的话。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似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假定有一座集人类想象力之大成的灿烂宝窟，以宫殿庙宇的形象出现，那就是圆明园……人们一向把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和东方的圆明园相提并论。”在雨果的笔下，圆明园处处生辉，其壮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神奇的世界现在已经不见了”，雨果愤怒痛斥英法侵略军的无耻行径，“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会被人们叫作法兰西；另一个——叫作英吉利”。

清漪园在万寿山麓，圆明园西2里许，滨临昆明湖。昆明湖碧波荡漾，万寿山耸峙入云，为清漪园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基础。清漪园虽不能同圆明园相比，但湖光山色绮丽，也是西郊诸园中最为壮丽的园林之一。

清漪园大门东向，门内为勤政殿，殿后北达怡春堂，西为玉兰堂，北为宜春馆，馆西为乐寿堂。乐寿堂后折西为方池。循城北折而西为园之西门。怡春堂后，城关以北为惠山园，内池数亩。惠山园西为云绘轩，东为迎绿轩，后为随安室，又西为花承阁。界湖桥之北为景明楼，楼西南湖中为藻鉴堂，堂西湖岸为畅观堂。西北湖中圆城为四门，其上为治镜阁，阁北湖岸为延赏斋。各种建筑物或倚湖靠山，或漂于湖中，山随水转，水依山明，令人心旷神怡。

清漪园湖光山色处处生辉，1860年也遭到英法侵略军的破坏，焚烧了主

《宸垣识略》卷11《苑囿》。

摘自《报刊文摘》1994年12月5日第4版。

《宸垣识略》卷11《苑囿》。

要建筑物，园中4万多件珍贵陈设被抢掠一空，残破不堪到了极点。

玉泉山下的静明园和香山前的静宜园，倚山抱水，尽有河山之利，其景色之壮丽不亚于畅春、圆明、清漪诸园。由于山峰耸峙，玉泉潺湲，青翠无比，在某种程度上说，比之上述诸园有过之而无不及。静明园的主要景点有廓然大公殿，位于南门内，北临后湖；虚受堂西山畔有玉泉趵突，上有龙王庙；乘香云径在清凉禅窟之北，南有静怡书屋；山顶为玉峰塔影，前为香岩寺，后为妙高堂；北峰上有妙高寺、妙高塔、该妙斋；碧云深处以南为翠云嘉荫，后为翠云堂，东为甄心斋等等，各种建筑物与山峰、玉泉共同构成奇妙的佳景，引人入胜。静宜园的主要景点也是围绕山峰、河湖展布，著名的有勤政殿南北配殿、月河殿；虚朗斋前的流觞曲水，画禅室、学古堂、郁兰堂、伫芳楼；瓔珞岩上为绿云深处，东稍南为翠微亭，亭东为青未了亭；瓔珞岩西的香山寺，前有石桥，桥下方池为知乐濠；采青轩西南为欢喜园，东西各有枋榭；林北为雨香馆，为洒兰书屋，其南为林天石海等等。自勤政殿以迄雨香馆为内垣，凡景十二。自晞阳河以迄隔云钟为外垣，凡景八。不难看出，香山峰峰耸峙，绿树成荫，河湖相连，各种建筑物点缀其间，绚丽如画自不待言。

静明园和静宜园也在1860年遭到英法侵略者的破坏，付之一炬，仅有部分残垣断壁而已。

清代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充分利用了北京西郊山脉、河流、湖泊等地理优势，建成了中国园林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园林，完全符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原则，使自然之美达到了宏大、清雅、深邃、奇妙、变幻无穷和秀美无比的地步，不是天仙胜境，胜似天仙胜境，把中国园林建设推向了顶峰，在世界园林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然而，它们早已不复存在，今天仅有部分遗迹供人们凭吊而已。

今天北京西郊的颐和园，不属于三山五园，是清代末年在清漪园旧址上重建的园林。光绪十二年（1886年）到二十二年（1896年），整整用了十年时间，西太后为了自己的享受，不顾民族安危（甲午战争前夕），动用海军军费数千万两白银，修建了颐和园，结果换来的却是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今天回到人民怀抱的颐和园，成为人民游憩的良好场所，也是北京最为壮丽的园林。

颐和园凭藉昆明湖和万寿山，布设楼台亭阁，尽有河山之胜。从东宫门进园为仁寿殿，以殿为中心，布设一组建筑物，构成当时的帝后政治活动区。殿西倚奇石堆砌的假山，庭院宽广，松柏青翠，古槐成荫，十分高雅。殿后（北）有三座大型建筑物，以长廊相连。这就是乐寿堂及其以东的颐乐殿和德和园大戏楼。它们共同组成生活区的主体，尤其是乐寿堂前临湖后倚山，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格外壮观。生活区以西就是颐和园的主要景区，可分为万寿山前山、昆明湖、后山后湖三部分。

万寿山前的主要建筑都是从湖边起，一直到山顶，逐级升空，步步入胜。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寰垣识略》卷11《苑囿》。

《寰垣识略》卷11《苑囿》。

《北京风物志》第75-78页，北京旅游出版社1984年版。

从“云辉玉宇”牌楼起，有排云门、玉华殿（东）、去锦殿（西）、芳辉殿（东）、紫霄殿（西）、介寿堂（东）、清华轩（西）、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智慧海。智慧海也就是一座琉璃阁，位于万寿山顶，登阁俯瞰全园，一览而无余。在半山坡上，还有多处楼、台、亭、阁，与大殿争妍竞辉，妙趣横生。

前山湖岸还有一条长廊，五彩缤纷，把大殿、湖、山连为一体，十分别致。这条精心设计的长廊，长达728米，分为273间。间间彩绘，展现不同的故事奇景，游人沿廊漫步，既可休息，又可欣赏精美画卷、奇妙传闻。

后山后湖是精心设计的江南园林，展现江南风光。后湖与万寿山以长桥相连，桥北即苏州街，是反映江南风土人情的街市，别有风趣。沿湖有绮望轩、嘉荫轩、妙觉寺、平台亭、眺远斋，其东端就是被称为园中之园的谐趣园，园内湖水涟漪，沿湖有涵远堂、知春堂、洗秋、引镜、知春亭、澄爽斋、瞩新楼等景点，以及涵远堂北的霁清轩、清琴峡等，共同构成谐趣园的瑰丽佳景。谐趣园小巧玲珑，与颐和园的宏伟壮观形成鲜明对照，各有千秋。大园之中布设小园，也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一大特色。

昆明湖清沏如镜，一泓荡漾，与万寿山相得益彰，是颐和园造园的主要地理基础。湖中长达150米的17孔桥，犹如一道彩虹，漂浮在湖面上，把湖东岸与南湖岛连接起来，岛上建有涵虚堂。湖西部的长堤称为西堤，把昆明湖一分为三，分别称为西湖、昆明湖、南湖。沿堤建有六座石桥，最著名的为汉白玉雕砌的玉带桥，位于西堤的西北部。湖中景点还有知春亭、龙王庙、景明楼、凤凰墩、藻鉴堂、治镜阁等，漂浮在水面上，倒映湖中，景色绚丽无比。

颐和园尽有山水之利，占地4350亩，昆明湖就占有全园总面积的四分之三，是西郊诸园中水域最广阔的园林。颐和园不仅山水俱佳，而且建筑物多具有诗情画意，巧夺天工，妙情横趣，美不可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遗留到今天的唯一最完整最壮丽的园林。

中国王朝的都城无不建设园林，仅从以上数十例就可以看出，园林规模宏大、布设精美，充分利用了山川优势，是各个园林的基本特色。

规模宏大 都城是皇权的象征，皇帝为了游乐而不惜财力人力兴建园林，强占民田，任意划定范围，园林的规模就不能不大。像西汉长安上林苑这样周回达数百里的园林固然不多，但周回数十里的园林却比比皆是。唐长安禁苑、樊川、曲江池，南宋杭州西湖，清北京西郊园林区都是例证。中国都城园林规模之大，在世界都城史上也是仅有的，规模宏大就不能不成为中国都城园林的主要特征。

布设精美 中国园林造园的重要原则就是特别讲求精妙，一切布设要巧夺天工，胜过天仙胜境。蓬莱仙阁只是幻觉，但中国都城的园林，无不以蓬莱仙境为楷模。从西汉建章宫的太液池，到清代北京西郊的昆明湖，都有想象的蓬莱佳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认为，中国园林把幻想艺术推向高峰也不无道理。每一座建筑物的选址、奠基、造型，以及与周围环境和邻近建筑物的配合，都要恰到好处，达到处处生辉的程度。全园是一幅壮丽的画卷，每个

《北京风物志》第75-78页，北京旅游出版社1984年版。

《北京游览图》，北京出版社1954年版。

《北京风物志》75页

景点都相对独立，显示各自的特点，做到大中见小，小中见大，景景相连，步步入胜。

充分显示山川美 中国园林以表现山川自然之美为造园的基本特征，以各种自然条件为造园的基础，因此，在选址、造型上特别讲究。尤其是中国都城的园林规模宏大，更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使自然之美在人工雕凿下达到无比秀美的程度。各种建筑物在园林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山川浑然一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融融相通，更加生辉。唐长安的曲江池与少陵原，南宋杭州的西湖与群山，清北京西郊的昆明湖与万寿山，都是典型例证。各种建筑物完全融合在山原大湖之中，成为自然之美的一部分，少了它们，好像自然美就缺少了什么，成为残缺不全的美。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巧妙结合，千衣无缝，正是中国园林造园的高明所在，这就叫作“宛自天开”。

2. 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园林

中国著名地方城市也大都兴建园林，尽管园林的规模不如都城园林的规模宏大，但许多城市园林历史悠久，造园艺术高超，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地理条件，兴建了无数壮丽的园林。在这些园林中，有些小巧玲珑，有些巍峨壮观，有些弯曲瘦长，有些水天一线，有些园小景大，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布设无限的景观，巧妙借景，使主景、客景、远景融为一体，变幻无穷，人随景转，景如人意，步步入胜。因此，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园林，在世界园林史上也享有盛名。

(1) 苏州园林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冠江南”。苏州是我国著名的“园林之城”，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既有田园之美，又有山水之秀，品种繁多的花卉应时开放。苏州历来就是江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城市园林起源早，造诣高深，在我国园林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苏州园林起始于春秋时代，在吴国建都后，吴王阖闾就利用苏州郊外一带的自然山水，“笼西山以为囿，度五湖以为池”，兴建了规模浩大的姑苏台等离宫别馆。吴王夫差五年(前491年)，扩建了姑苏台，又“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勾玉槛，宫之楹楹，珠玉饰之”。夫差还在吴县建有梧桐园，在嘉兴建有会景园。这些园林穿池凿地，建亭营桥，多植花木，充分利用自然山水的有利形势，尽量加以雕凿，使其展现奇异光彩。

汉代刘濞为吴王时，除了在郊野嗣葺吴苑外，还在城内效法皇宫御苑，建造长洲茂苑。六朝时，孙权在苏州建造了芳林苑、落星苑等。东晋士族顾辟疆兴建了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辟疆园，这是苏州最早的私家园林，其园尽有林泉之胜，号称吴中第一。随着佛教的兴盛，佛寺丛林也有了新的发展。

隋唐时代，随着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南移，苏州城市经济繁荣。世族豪门聚居吴中，文人墨客荟萃苏州，使苏州园林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自然山水园向写意山水园过渡。当时虎丘灵岩、石湖和洞庭东、西山等处，已成为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

五代钱氏统治时期，苏州园林建造出现了一个高潮。钱镠以杭州为都，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

苏州是其重要据点，贵族官僚在此营建府宅园林盛极一时。钱元璪建造了南园、东庄和金谷园，规模宏大。其中南园“酳流为沼，积土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南园注重造景，乔柯古木，流水奇石，景色漪丽。近戚中吴军节度使孙承佑也大建园池，“崇阜广大”，“杂花修竹”。苏州现存历史最早的园林——沧浪亭，就是在其遗址上经历代改建而成。

宋代时造园之风更盛，朱勔在盘门内建造了乐园和绿水园。另外还有苏舜钦的沧浪亭，史正志的万卷堂（网师园的前身），蒋光鲁的隐园，朱长文的乐圃等。其中以苏舜钦所造的沧浪亭最为著名。北宋庆历四年，苏舜钦贬谪流寓吴中，见孙承佑池馆遗址，高爽静僻，野水萦洄，便北倚筑亭，因感于《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取名“沧浪亭”。南宋时，苏州郊外的石湖、尧峰山、天池山、洞庭东、西山等风景名胜，先后出现了官僚地主的园林和别墅。城区也营建了不少私园。南宋绍兴初年，沧浪亭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得，改名“韩园”。在园中两山之间筑桥，取名“飞虹”，山上有连理木，又有寒山堂、冷风亭、翊远堂、濯缨亭、梅亭等“瑶华境界”。元代时沧浪亭废为僧居。现存沧浪亭保留了明清修葺后的风格。

元至正二年（1342年），僧惟则天如禅师为纪念其师中峰和尚普应国师，建造了狮子林寺，园内石峰林立，玲珑峻秀，山峦起伏，气势磅礴。元末，在苏州割据称王的张士诚造有锦春园，园内假山池塘，厅堂楼阁，争奇斗异，锦帆泾被浚为御园河。

明清时期苏州成为著名的园林城市，据《苏州府志》记载，明代苏州有第宅园林71处，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2.8处；清代有130处，密度为每平方千米近24处。同时，江南一带还涌现出一批造园艺术家。

明代兴建的第宅园林多位于城区。最有名的有正德初年，御史王献臣占用道观废址和大弘寺，在城东北隅，娄、齐二门之间营建的拙政园。拙政园浚治积水成池，具有明代园林疏朗自然的风格，是我国江南园林的代表作之一。嘉靖年间，大官僚徐泰时在阊门外建有私家花园——留园。明代还建有西园、沧隐园、艺园、芳草园等。清代建有怡园、耦园、曲园、残粒园、畅园、五峰园等。其中以叠山名家戈裕良所掇叠的环秀山庄，名闻遐迩。

清末以来，除继续营建会馆园林、第宅园林外，又兴建了公园园林。清末第宅园林有遂园，宾馆园有南园——丽夕阁，仿古园林有朴园，还有近代“中西结合”的宅园天香小筑。1927年，在“吴予城”旧址上修建的“皇废基公园”，也称城中公园（今苏州公园），是苏州现代公园的开端。

苏州园林是我国江南园林的代表，以它独有的特色闻名于世。

苏州园林占地少，融住宅与园林为一体。它既有居住功能，又是多种艺术的综合体。这些园林因洼疏池，沿阜垒山，种花植木，营建亭榭，构成千岩万壑，清流碧潭的幽美画面。山、水、林、石、路因地制宜，使人“不出城廓，而能获山林之怡”。

苏州园林多为私家园林，倚官僚地主、巨商的宅第，水陆交通便利，接近商业中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苏州园林在地理空间上多分布于观前街和城西北地区的横巷中，观前街与东北街之间次之，城东南又次之。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南园》。

民国《吴县志》卷39《輿地考·第宅园林》。

苏州园林总体布局因规模、地形、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凡住宅内园林多设在厅堂或书房后，叠以湖石、花木、亭廊，组成建筑物的外景。小型园林基本上是庭院的扩大，景物相应增加。如畅园面积虽小，但总体布局巧妙，园位于住宅之东，南向临巷辟有园门，全园采用封闭式布局环形游览，水池居中，绕以厅堂、船厅、亭廊、花木、假山，园景丰富，层次多变。

中型和大型园林景物更多，往往单独使用，因此另设园门，直通街衢。同时以厅堂作为全园活动的中心，面对厅堂设置山池花木等，厅堂周围和山池之间缀以亭榭楼阁，或环以庭院和其他小景区，由蹊径和回廊贯通，组成一个可居、可观、可游的整体。

苏州园林把山池作为全园的主要景区，再配以若干次要景点，使之丰富多变，或以山取胜，如环秀山庄；或以水见长，如拙政园和网师园。另外，除重视主景区外，其他较小的配景也题材多样，变化无穷，幽深清雅。有的以花木为主，如牡丹、玉兰、桂花等；有的以水景为主，如水院、水廊、水阁等；有的以石峰为主，如揖峰指柏轩等。当然，也有以峰石、花木、水池等混合景点组成的配景区。园内空间处理有大小、开合、高低、明暗等变化。因此，苏州园林的园门是多以曲廊、小院作为全园的序幕，以衬托园内主景，如留园的园门到古木交柯一带，从住宅进入鹤所到五峰仙馆附近就是这样处理的。

苏州园林划分空间的手法，有墙、廊、屋宇、假山、树木、桥梁等。其中用假山和树木划分，形象比较活泼，用建筑物划分，则较严整；交叉使用各种手法，使景面有开有合、有虚有实，增加了风景层次和深度。拙政园的中部就是代表作。另外，在景物的疏密、空间开朗和幽曲，峭拔山石和明净水面，工艺房屋和自然林木等方面多用对比手法。如拙政园中部池中葱郁的二山与池南岸远香堂、香洲一带的对比；留园中部山池与涵碧山房、曲溪桥一带的对比；网师园小山丛桂轩前后的小院与山石和中部水的对比等等。

苏州园林突出主题，对景设计，借景生情，幽深曲折等方面的布局也恰到好处。

苏州园林空间较小，叠山理水只能因势利导，以达到雄奇、峭拔、幽深、平远的意境。小园仅置少数峰石，小池点缀而已。中型园林有山有池，与屋宇、花木组合若干景区。规模较大的园林，叠造假山，利用山势分割景区，曲折幽深，环池布景。无论土山、土石山、石山，各显千秋，独具风格。

苏州地处江南平原，河港纵横，地下水位高，便于开池引水，因而园林多以曲折自然的水池为中心，辅以溪涧、水谷、瀑布等，配合山石、花木和亭阁，形成不同景色。拙政园原是一片积水洼地，初建园时，利用洼地积水，浚治成池，环以林木，造成一个以水为主的风景园。环秀山庄的飞雪泉与网师园的涵碧泉是天然泉水。狮子林、艺园、怡园、畅园等处水池内挖有一定深度的水井，与地下水相通，在久旱不雨时，池水也不会干涸。网师园、西园、耦园内的水池则与园外河道相通，以利于调节水流，保持池水清洁。园林池形因地势各异，但多以狭长形为主。狭长如带，不但风景有层次，而且在池水交汇和转折之处，以桥梁作为近景或中景，使园景更为深邃。如怡园以曲桥和水门将水池分为三部分，形状狭长曲折，主次分明。园林池面有聚有分，聚则水面辽阔，有水乡弥漫之感；分则潏回环抱，景色如画。如网师园的水池，池面集中，池岸廊榭比较低矮，给人以开阔明朗的印象。拙政园

的水面被池中二山及房屋、曲桥、竹丛、树木划分为几部分，以远香堂北面的大荷池为中心，水面流通环回，空间层次叠重，景物深远。

园林中的建筑陈设和花木配置，是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园林建筑数量多、比重大。一般小型园林建筑密度高达30%以上，如壶园、畅园、拥翠山庄。大型园林建筑密度也多为15%以上，如沧浪亭、留园、狮子林等。这些建筑物的布置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常见的有厅、堂、轩、馆、楼、阁、榭、舫、亭、廊等。而且多围绕山池布置，房屋之间常用走廊串通，组成观赏路线。室内陈设多为几案、桌、椅、凳等，室外廊间除设置各式漏窗外，还在粉墙素壁上以“书条石”作为建筑装饰。园林的花木配置自然多样，与山石、水面、建筑物有机结合，形成自然山林气氛，如拙政园中部二岛，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配合，茂密竹丛与池边芦苇相配合，取得了较好的山林景色效果。

自古以来，苏州园林兴盛，现在有园林69处，为全国城市园林之冠。这主要同苏州位于江南水乡，自然环境优越有密切关系。苏州得天独厚，造园材料丰富，附近的山丘、天平、灵岩、狮子山等处盛产花岗岩及五通石英岩，多奇形怪状，而太湖石更是造园的最好材料。太湖西山等地的石灰岩，经侵蚀、冲刷，皆成空石，以皱、透、漏、瘦、丑取胜。另外，水源丰富，以自然水为源凿池，亭台楼阁临流而筑，花草树木依水而生，使自然之美奇光异彩，精妙、壮丽无比。当然，水陆交通方便，不仅为造园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也使虎丘、寒山寺、西园寺名扬天下，苏州园林风光不胫而走。

（2）扬州园林

扬州山灵水秀，风物佳丽，是我国著名的风光旖旎的园林城市。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湖密布，花木品种繁多。因而古典园林起源很早，造诣高深，风格独特，成为我国古典园林艺圃中的一株奇葩。

扬州的古典园林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的宫苑，《芜城赋》称“藻扈黼帐，歌堂舞阁之甚；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其钓台在雷陂附近。南北朝时，徐湛之又依据蜀冈周围的山形势，在宫城水物丰美的东北角池侧（地当今雷塘附近），营建了风亭、月观、吹台和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隋大业年间，炀帝在扬州大兴土木，顺应蜀冈周围的自然山水形势，于“长阜苑内，依山傍涧，竦高跨阜，随成形置”，建造了归雁、回流、九里、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节、九华和光汾十宫，作为离宫别馆。同时，又把江都城北迤西数十里辟为禁苑，包括西汉吴王的钓台、刘宋徐湛之的园林及戏马台、凤凰楼等，一直延续到甘泉山。一路水光山色，楼台殿阁，相互辉映，苑中搜罗有众多的奇花、异草、珍禽、灵兽。苑西北还有萤苑，秋夜出游，聚萤放之，灿若星光。

唐代时扬州园林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私家园林最盛。私家园林主要分布在城内，大都是利用庭园隙地，叠山理水，栽花种树，构筑亭台而成。它们多与住宅融为一体，往往以姓氏命名。著名的如青园桥裴湛家的樱桃园，楼阁复重，花木鲜秀。今南门城外的席氏园，也构筑精巧，景物优美。同时，由于受六朝士大夫崇尚清谈、寄情山水思想的影响，唐代扬州园林的结构已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太平寰宇记》卷120《淮南道一》。

《太平寰宇记》卷120《淮南道一》。

从宫廷园囿中脱颖而出，具有寄情山水的新意。如赫氏园有“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凉月照窗欹枕倦，澄泉绕石泛觞迟”等景物，就是唐代扬州园林寄情山水的典型代表。

宋代扬州私家园林见于记载的有郑兴裔的矗云亭，郭杲的羽挥亭，满泾的申申亭与朱氏园、丽芳园、壶春园和陶谷建的秋声馆等，多花草水木之盛。但宋代的官衙园林，也十分昌盛，比较突出是贾似道镇守扬州时在州宅之东辟的郡圃，规模宏大，亭台楼阁众多。它利用囿内山水形势，因山为亭、观，因势为回廊、曲径，因水为桥、长堤、雕栏，极尽自然之美。另外，欧阳修在蜀冈上建的平山堂，“取江南诸山，如同到此堂下，拱揖栏前，若可攀跻一般之意”，曰“平山堂”，称为淮南第一堂。

元代扬州园林比较著名的有瓜洲江风山月亭，路学采芹亭，以及明月楼、瞻云楼、居竹轩、平野轩及崔伯亨家园林。其园林结构深受元代书画风气的影响，多以平远山水或单一题材为主，绝无崇山峻岭与平流涌瀑。如平野轩即以“平野风烟望远”为主题，并辅以“雪筠霜木”布设而成。它们主要是从平淡之中取得意境，不出元代画风格局。

明代造园技艺突飞猛进，城市山林大量涌现，名园迭出。当时的著名园林有皆春堂、江淮胜概楼、竹西草堂、康山草堂、行台西圃、学廨首蓿园及荣园、休园、影园、小车园、偕乐园等等。这些园林，景物简单，意在重趣，而不在构筑。但也有些园林规模较大，像郑侠如营造的休园，占地50余亩，多至十数景，结构复杂，营造技艺高超，小亭听水，阁势峥嵘，其争奇斗巧处，足与造化比肩，成为明代扬州园林的杰作。这些园林除竹西草堂远在城东北3里外，其余全在城垣内外的边缘。如休园在新城流水桥畔，影园在旧城外西南隅河中长屿上，康山草堂在新城东南一隅，偕乐园在新城广储门外对河。

清代为扬州造园全盛时期，大小园林遍布城内外各地。《扬州画舫录·序》云：“增假山而作陇，家家住青翠城闉；开止水以为渠，处处是烟波楼阁”，正是对扬州园林昌盛的形象描绘。当时有“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轻”之谓。清初，有八大名园如画卷之称。这八大名园指王洗马园、员园、卞园、贺园、郑御史园与筱园等。从它们的分布来看，这些园林已从城市山林的圈子拓展到湖上。如东园在保障湖南莲性寺偏东，卞园与员园在保障湖偏北小金山后，其余的也均在瘦西湖四周。乾隆时，两淮盐商更是穷尽财力，建造园林，祈盼游幸，赐额以争宠，扬州园林盛极一时，城市山林，遍布街巷，湖上园林，罗列两岸，其中以瘦西湖水道两岸的湖上园林最盛。瘦西湖原名炮山湖，一名保障河。清代诗人以为北郊佳丽，全在此湖，十里波光幽秀明媚，堪与杭州西湖媲美，而清瘦又过之，故名瘦西湖。乾隆十八年（1753年），瘦西湖仍“长河如绳，阔不过二丈许”。后来园工巧匠依河流土阜的自然形势，利用湖岸的自然景观，因地制宜，随形置景，安排了一座座的园林，构成了一个山环水绕，游程曲折，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30《古迹一》。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30《古迹一》。

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10《古迹下》。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30《古迹一》。

《扬州画舫录》卷31《城北录六》。

水折景换，亭榭与水树交相辉映，仪态万千的湖上胜境。乾隆南巡时，湖上园林从城东3里尚方寺的竹西芳起，一直沿着漕河向西延伸到蜀冈中峰大明寺的西园。另由大虹桥向南，延伸到城南古渡桥附近的“九峰园”，大小园林60余座。尤其是从北门城外的“城湮清梵”到蜀冈脚下的“平山堂坞”，“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几无一寸隙地。

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瘦西湖上著名的二十四景已经建成，即卷石洞天、绿杨城郭、西园曲水、虹桥揽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浦薰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留踪、蜀冈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楼小市、平岗艳雪、香海慈云、梅岭春深、水云胜概。而穷极华丽的宫廷园林，一在南郊三汊河，即塔湾行宫；一在城北天宁寺外，为天宁寺行宫。

清末民初，扬州园林日趋走向庭院化，大都是小山细水，成为庭院的点缀。30年代，扬州出现了一些新的绿化景点，如徐园、熊园、叶林（劳动公园）、皂庄、草地公园（后废）、平园、萃园、小苑、匏庐、逸圃等。同时，在小东门北小秦淮西侧还建有小型公园。建国后，扬州园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重现了“扬州园林甲天下”的美妙奇景，游人络绎不绝。

扬州市区地势平坦，既无名山，又无大川，不能借天然景色造园，主要依靠高超的技艺塑造名园胜景。造园之妙在于因地制宜与相互借景，所谓妙在因借，精在体宜。以有限的空间，构筑无限的意境，变化万千，新意层出，园因景胜，景因园异。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法是叠石法，有“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之称。园中的假山堆迭，以小石拼镶及分峰用石，旱园水做，因地制宜。另外，扬州的园林还利用各种山水画法，以达到闹中取静，浅中求深，小中见大，似远实近的意境。

扬州园林既有江南园林明媚秀丽，柔美轻盈的特点，又揉合了北方园林雄伟典雅的特征，清秀中见刚健，清新中见古朴，独具特色。这里堂庑亭台的高敞挺拔，假山的沉厚苍古，花墙的玲珑剔透都具有诗情画意。从总体看，扬州园林主景与客景错落有序、层次分明、相互映衬、引人入胜。

扬州园林的布局，主要受周围微地貌条件的影响。譬如利用蜀冈，在冈上植万松，形成“万松叠翠”之景。并利用中、东、西峰的山势及飞瀑，筑听泉楼、架栈道，形成“双峰云栈”。又如瘦西湖，主要依据水域、土阜，利用桥、岛、堤岸、水势的划分，给狭长的水面安排了众多的园林，造成景物连绵、疏密有致、变化多姿、步步入胜的格局。

扬州园林与苏州园林一样，是中国地方名城中国园林最发达的城市，既有苏州园林的小巧玲珑，又有北方园林的巍峨壮观，在某种程度上说，扬州园林更胜苏州园林一筹。

（3）济南园林

济南气候温和，饶有山河湖泉之胜，地形地貌千姿百态，具有极为丰富的风景名胜资源，以及品种繁多的观赏植物。因此，济南城市园林起源早，风格异于南北，不仅在山东早期的城市园林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北方城市中

《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

《园冶》卷1。

《扬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也一花独秀。

济南园林兴起很早，春秋时代已见于记载。《水经注》记载了北魏济南城的三处园林，在东城和西城之间。即今珍珠泉一带，人工穿渠凿池导引历水形成早期市内园林——流杯池。另两处在西郊，一处位于风景优美的古大明湖（今五龙潭），在西南湖滨建有一座华美的浮图大明寺，附近有接待来往客人的“客亭”，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湖水涟漪，林木幽深。另一处在泺水之源的趵突泉，这里“泉源上奋，水涌若轮”，声若隐雷，势如云沸，风景极佳，在泉畔建有娥姜祠。另外《酉阳杂俎》也记载了历城北郊的三座园林，即使君林，是北魏郑愬三伏天避暑的地方；莲子湖，据称“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渔船掩映，洲岛错落；房家园林，是北齐博陵君房豹的私园，园中“杂树森声，泉石崇邃”，当时人称“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盛期，济南古典园林也趋于成熟。见于记载的园林多分布于西、北二郊，市内园林稀少。例如，杜甫挥毫写下“海古此亭古，历下名士多”的历下亭在西郊五龙潭，李白泛舟的“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的鹊山湖在城北20余里的鹊山下，“含笑凌倒影”的华不注山在城西北济水南岸，鹊山湖亭在湖北岸鹊山脚下，都不在城内，属于“郊园”性质，多天然野趣。

北宋济南城市园林建设达到鼎盛时期，由于城内大明湖形成，园林建设的重心遂由近郊移进城内，改变了园林散处西、北二郊的格局。宋代济南园林营造中，有诗人、画家直接参与造园，将诗情画意写入园林之中。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曾巩，他围绕大明湖做百花洲、百花堤、百花台、百花林、北渚亭、阅武堂、环波亭、芍药厅、水香亭、静化堂、仁凤厅、凝香斋、芙蓉台等景观，既不失自然之美，又极富艺术情趣。近郊园林也有发展，在西郊依托名泉新建了一批亭台阁榭，曾巩主持修建的趵突泉历山、泺源二堂就是例证。

金、元二代，济南城市园林建设持续发展。金人在趵突泉畔建胜概楼，“楼下寒泉雪浪惊，楼前山色翠屏横”。元赵孟俯在洛口以东修建砚溪村，景色幽雅；张养浩在城北10里处构造别墅云庄，有云锦池、雪香林、挂月峰、待凤石、遂闲堂、处士庵，以及绰然、拙逸、乐全、九阜、半仙五亭，一时传为佳话。另外，西郊还有万竹园，城内大明湖畔新建了天心水面亭、超然楼、鱼乐楼等一大批园林建筑。郊园的分布仍以西、北郊为多，西郊的趵突泉、北郊的华不注山和城内大明湖号称“济南三绝胜”。

明代在大明湖滨修建了尹公亭、青萝馆、水雨亭、云波亭、环波亭、瀛洲亭、涟漪园、芙蓉亭、烟雨亭、小淇园等一大批亭阁。殷士儋在元代万竹园旧址修建别墅通乐园，烟水苍茫，泉石错落，斋阁静深，清幽秀丽。位于东北郊的华不注山，宋、元二代已有寺观建筑，名弥陀寺，“南瞻华不注，东绕大清河”。明代又在山下建华阳宫，后改称崇正祠，华不注孤峰耸峙，

《水经注》卷8《济水注》。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七。

《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二。

《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二。

康熙《济南府志》卷14《建置志》。

苍翠秀丽，宫、祠“据山为胜，泉深谷幽，幡幢钟鼓，震跃林壑”，蔚为大观。德藩王府面向南山，背负百花洲，规模宏大，“园亭山石之胜，甲于全省”。“宫中泉眼以数十计，皆澄泓见底，石子如樗蒲然”。宫中濯缨湖广四十余丈，“名花匝岸，澄澈见底，亭台错落，倒映入波……白云缭绕，下接水光，上浮天际，宫殿隐隐在烟雾中，宛然如画”。

清代在大明湖畔修筑了北渚亭、白鹤亭、见山亭、得月廓、来雁阁等。济南亭榭以历下亭最为古老，康熙时又重新整治，“旁架木梁，通游履浣。弥望极顾，万山面内，重城束外。烟棹月蓑，来往彼间。雨槛门窗，参差湖面”，景色极佳。山东盐运使阿林保在大明湖北岸（今铁公祠内）修小沧浪，有堂、台、廓、榭，尽收湖山美景。私园继续在近郊发展，桂馥于1790年在西郊造潭（五龙潭）西精舍，有倚杖桥、助谈亭、琴床、芳林、水槛等景观，“树色不离门，水声长绕屋”，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图书馆——借书园。此外西郊的图云馆、漪园等也都是著名的私家园林。但近郊园林的分布重心则由西、北二郊转移到西、南二郊。

1904年在商埠区建立商埠公园（即今中山公园），面积约8公顷，有花木亭榭、假山曲径等，采取西式格局，配合一些中式点缀，成为近代公园之始。1953年，大明湖、趵突泉均扩建为公园。1984年兴建环城公园，把四大泉群和大明湖、千佛山、“十里荷香”连成一片，形成独特的城市园林体系。

大明湖园林区是济南城市园林的主体部分，建筑多临水，亭、台、楼、阁、廓、榭借助于湖水创造景色。北宋曾巩筑七桥以接纳诸泉水，淙淙溪流如玉带串连着市区众泉景观，本身又构成“七桥风月”的胜景。修百花堤纵贯湖面，直抵城巅，形成湖区游览轴线，又有分景妙用。同时因借于城楼和城周围的群山，近览湖光波影，远眺城头群山数点如黛似烟，组成一幅绚丽柔媚的风景画。大明湖园林区的最大特点是因水成借，借景城墙和群山。南郊是兼有山林之胜、深谷之幽的寺观园林区。千佛山一带群山突兀，重峦叠嶂，寺观布局取宁静清雅，层叠曲折，依据山势，巧夺天工。

济南园林以自然山水为骨架，而妙趣实在于泉，“济南泉水甲天下”，在东起青龙桥，西至筐市街，南至正觉寺，北到大明湖，面积约2.6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有泉100余处。泉水声、形、色、味俱佳，可闻、可观、可鉴、可尝，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千年玉树波心立，万朵冰花浪里开”，是前人对趵突泉声势容貌的生动写照。济南园林独具匠心，以泉为依托，建楼阁亭榭，栽花植木，穿渠凿池，使泉水穿庭入户，若隐若现，有动有静，千姿百态，形成以泉为特色的园林区，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独树一帜。

济南虽地处北方，但河流湖泉可与江南媲美，从而决定了济南城市园林兼具南、北的独特风格。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济南园林多是利用天然山水而施以局部加工改造的“天然山水园”，那些完全在平地建造的“人工山水园”，绝无仅有。巧借天然，是济南造园手法的一大特色。

嘉靖《山东通志》卷18《祠祀》。

康熙《济南府志》卷18《古迹》。

王世贞：《池北偶谈》卷22。

康熙《济南府志》卷17《古迹》。

《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济南号称泉城，泉源旺盛，水源丰富，为造园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周围有低山丘陵，更使园林锦上添花。在中国著名地方城市园林中，济南园林仅次于苏州、扬州，具有独特的风格，十分典型。

（4）西安园林

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号称八水绕长安，河流众多，水源丰富，地形起伏多变，原原相连，秦岭近在眼前，为建造精美的园林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周、秦、汉、隋、唐建都这里，园林兴起很早，周代的灵囿就是例证。西安历史上的园林十分辉煌，但唐代以后却急剧衰落。当然，由于地理条件的存在，许多园林仍延续发展。

临潼华清池位于临潼县南的骊山脚下，是西安附近的名胜风景区。这里不仅有闻名的骊山，而且还有温泉，园林历史悠久，风景别具一格，是我国古代园林的优秀杰作。骊山脚下的温泉，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妃嫔游乐的胜地，并在这里兴建了许多壮丽的离宫别馆。唐代的华清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骊山西距西安城 30 千米，位于东西大道之侧。它是秦岭山脉的一个支阜。山形秀丽，林木花卉繁茂，自古以来即为名胜。东绣岭和西绣岭孤峰突起，耸峙入云，斜向渭滨，每当夕阳西下，轻烟四起，山峰更加瑰丽，有“渭水秋天白，骊山晚照红”之称。骊山晚照早被文人学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骊山除山峰奇秀，风景优美外，山脚下的温泉则更是它成为游憩胜地的主要自然凭藉。

今天的华清池，就是在唐代华清宫部分遗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建筑物多为清代以来所修建。整个华清池分为东西两院，各有特点。东院建有贵妃池、望河亭、五间厅、九虹桥、棋亭、新浴池等。西院建有飞霜殿、宜春阁、晚霞亭、九龙汤、晨旭亭、龙吟榭、迎宾馆等，皆雕梁画栋，朱柱彩绘，突檐飞起，十分壮观。飞霜殿南的九龙池，龙口喷清流，岸边柳丝依依，游人沿池观赏，但见碧波荡漾，楼阁亭榭倒映池中，清风拂面，垂柳起舞，令人心旷神怡。九龙汤、贵妃池，相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当年沐浴的莲花汤和芙蓉汤（又名海棠汤）。飞霜殿也沿用唐代旧名，据说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住宿的地方。今殿虽非唐代旧殿（原殿址即五间厅所在地），但仿唐代建筑形式，宽敞大方，是供游人休息的地方。五间厅是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宿的地方。今五间厅三号房间玻璃窗上的弹孔犹在，游人至此观赏，可以想见当年枪林弹雨的情景。龙吟榭以南是 1979 年新建的温泉宾馆，设计新颖，构思巧妙，吸收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优点，有如当年的华清宫再现眼前。室内华砖铺地，设备齐全。室外朱柱排列，门窗木雕套花。屋顶飞檐伸展，屋脊纵横盘旋，宛似条条游龙。整个建筑清新幽雅，朴实大方，壮丽无比，获得了世界设计银质奖章。今天以唐华清宫五座汤池为基础而修建的温泉博物馆，完全为仿唐建筑，胜似当年的华清宫。

骊山松柏苍翠，游人从华清池盘旋而上，首先就可到达兵谏亭。由此再继续攀登，分别可到达老君殿和老母殿。前者原供奉老君汉白玉雕像（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位于西绣岭第三峰上，相传是唐代朝元阁的所在，《长恨歌》中所说的长生殿，就在它的近旁。后者位于西绣岭第二峰上，是传说中创造人类，在骊山炼石补天的老祖宗女娲氏的祠宇，人们尊称她为骊山老母。登上西绣岭的最高峰，即第一峰，也就是烽火台的所在。据说周幽王宠爱褒姒，为博得褒姒一笑，曾在骊山乱点烽火，戏弄诸侯。后来犬戎入寇，

幽王点燃烽火，诸侯却无一来救，结果幽王命丧骊山，褒姒被虏而去。褒姒一笑失天下的故事就发生在此。

华清池是西安城东最为秀丽的地方，外宾慕名而来，游人络绎不绝。它的东边有被誉为世界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和高大雄伟的秦始皇陵，使华清池更加锦上添花，骊山尤为光彩夺目。它们共同构成了华清池的美丽风光，使中外游客翘首相望，以饱览骊山风景区为快事。

兴庆宫公园位于西安城的东南，西安交通大学的对面。它是在唐代兴庆宫部分遗址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是当前西安公园中风景最为秀丽的一所。兴庆宫公园以兴庆宫的名称命名，实在具有诗情画意，使文物古迹更加绚丽多彩。

兴庆宫公园是 1958 年全市人民通过义务劳动，迅速建成的一所大型公园。在布景设点上，山水照应、古迹新建、林荫果园、花坛草丛、路径屈曲、桥梁多样、旧名新题等，都有周密安排。游人漫步其间，犹如当年的兴庆宫再现眼前，大有北国江南之感。公园以兴庆湖为中心，景环水随，倒映湖中，把各个楼台亭榭、曲廊回径、垂柳翠竹、林木佳果连成了一个整体。各个风景点相连成趣，步转景随，生机盎然，引人入邃密佳丽之中。园中主景就是大湖水面，以环湖林荫大道贯通，使游人环湖观赏，悠然自得，心情爽快。客景就是土山和各个建筑物，凌空腾跃，攀登俯瞰，全园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饱览而无余。

花萼相辉楼位于大湖的西边，金碧辉煌，雄伟壮丽。座落在中央大岛上的沉香亭，虽非唐时旧物，但耸立在高台之上，四角攒顶，碧色琉璃，朱柱彩绘，壮丽辉煌。仰望沉香亭，人们不禁吟咏李白的“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联想唐玄宗与杨贵妃观赏牡丹的情景。曲桥西端的南薰水榭与中央大岛、芙蓉岛形成三角对峙，虽不是“水绿南薰殿”，却也别具风格，成为层次分明、高低错落的一组建筑，引人漫步在群芳之中，欣赏翠竹绿树、湖光山色。湖滨的东展室和缚龙堂茶社，供游人参观展览和休息。茶社不是当年的“龙堂”，而旧名新题，赋予了它新的意义；碧檐回廓之下，湖光反照，清新幽雅，品尝名茶，别有风味。

园中大湖曲流环绕，桥梁纵横，有洁白如玉、突兀高起的迎宾桥，小巧玲珑、秀丽飒爽的牡丹桥，曲径回转、栏栏相连的曲桥，以及矗立柳丝花卉之中的芙蓉桥、进水桥、东风桥等，各具特色。游人信步所至，脚下湖水涟漪，桥头柳暗花明，景色绚丽娇妍，令人顿释倦意。园林花卉把公园装扮得锦绣团簇，春夏秋冬，百花盛开。春光明媚牡丹怒放，盛暑炎夏合欢笑开，秋高气爽金桂飘香，隆冬冰雪腊梅吐艳，一年四季鸟语花香，使游人沉浸在无限美好的幸福之中。

屹立在兴庆宫公园东南隅长庆轩畔的阿倍仲麻宫（中国名字晁衡）纪念碑，仿唐柱式建筑，用房山汉白玉精工雕刻，庄严肃穆，贴金大字闪闪发光，成为中日友谊的象征。

革命公园位于西安城内西五路的北侧，西安市体育场的对门。它是西安城内开辟最早的公园之一，面积广阔，风景优美，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客。1926 年春，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部属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十万余人，由河南入陕，企图一举攻下陕西国民军控制的西安。

刘镇华围城达八个月之久，给西安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仅守城军民死

于此难的就不下 5 万人，占当时西安人口的四分之一。为纪念坚守西安死难军民，1927 年 2 月，由国民联军总部发起，创建革命公园。在城的东北隅选择园址，负土筑冢，建立烈士祠和革命亭。这就是当时命名并一直保留到今天的革命公园。

今天的革命公园整修一新，成为全市人民游憩的胜地。公园大门内有喷水池，池中的太湖石形状别致，相传为唐宫廷遗物。池北不远就是革命亭，亭共三层，下两层为正方形，最高层为八角形，角檐飞起，肃穆庄重，屹立在公园的中心。在公园的东南角，建有王泰吉、王泰诚烈士纪念塔。革命亭东南和西南有东大冢和西大冢。周围槐树成荫，松柏长青。座落在公园北面的假山和横跨大湖的曲桥，形态奇异，倒映在湖水之中，影随水转，游人至湖心亭，妙趣横生，别有兴味。位于公园东西两侧的展览馆和棋艺室，是成人欣赏书画和对奕的良好场所。在公园东北、东南和正南所建成的儿童玩具场、电动转马和大型观风车，则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使他们欢乐至极。

革命公园林木茂盛，花卉繁多，草坪广阔，道路曲折，游人沿环形林荫大道或宁静幽邃的羊肠小径信步所至，观赏楼台亭阁、名花异卉，十分清新幽雅。与兴庆宫公园相比，革命公园的历史意义更加浓郁。它的位置优越，全市人民利用节假日，总是首先到此一游。

莲湖公园位于莲湖路中段南侧，是明代引通济渠水灌注低洼地带而形成的大莲花池，本世纪 20 年代辟为公园，仍以莲湖相称。

今天的莲湖公园位于闹市区，以大湖水面为依托，布设了湖心亭、滨湖亭、图书楼、展览室、儿童游乐场等，小巧玲珑，水域广阔，是划船游乐的良好去处。湖面占全园面积的三分之二，约 50000 平方米，分为东、西二湖，东湖供游人划船，西湖则莲花飘香，别有情趣。西湖保持了明代以来莲湖的基本特色，莲花与亭楼争辉，为公园增添了无限美好的风光。

莲湖公园的范围较小，但周围大楼林立，可以借景，群楼之中一泓荡漾，情趣更为别致。莲湖南侧，正是唐长安宫城的正南门——承天门遗址的所在，使游人既可观赏自然景色，又可回味历史传闻，其乐无穷。莲湖公园与兴庆宫公园一样，都与唐长安城有密切关系，历史意义深远，对游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5）成都园林

成都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润，河湖纵横，古树名木繁多，四季有不谢之花，为建造秀丽的园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古以来，号称“公私富实，上下佚乐”的成都，其游赏之胜，甲于西蜀，园林之美也在全国享有盛名。

秦成都城有万岁池、千秋池、柳池、天井池等，“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奠定了成都最早的园林区。

三国时，蜀汉宫廷园林极尽侈丽，“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以山川为基

《鸡肋篇》卷上。

《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1984 年版。

《蜀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

础，修建楼阁台榭，极尽富丽精巧之能事。城内“百果甲宅，异色同荣”，到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显示出成都园林的固有特色。

隋蜀王杨秀筑城、修宫，除宫室华丽外，大城之西湖面广阔，据说有龙出现，因名摩诃，成为蜀王的宫苑区，为成都城增添了新的风景区。唐代中叶，摩诃池成为泛舟游览的胜地。杜甫有诗云：“湍駉风醒酒，船回雾起堤。高城秋自落，杂树 肤相连。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教惊白鹭，为伴宿青溪。”风光明媚，生机盎然，正是真实写照。唐代开辟新南市后，在郫江、锦江汇合处建合江亭，与锦江北岸的张仪楼、蔽花楼构成一条线状游览区。后来又在亭旁修建楼台亭阁，种植竹木花卉，称为合江园。

成都西浣花溪一带也是著名的园林区，兴起于隋唐，兴盛于五代、两宋。这里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并有田园风光之美。主要景点有杜甫草堂、草堂寺、浣花夫人祠、青羊宫、二仙庵等，清新幽雅，楼观亭台与古柏劲松、奇花异卉争丽竞辉，形成别具风格的园林区。前后蜀时，这一带成为皇家宫苑，“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景色壮丽无比。宋代时游人更盛，有“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之称。

宋时成都西北部成为官署区，风景园林也盛极一时，著名的有城西北郊的麋枣亭，城内亭阁，景色最为壮丽。

明清时成都园林意境更高，已达到精深完美的程度。其中寺观园林以文殊院、青羊宫为代表，坛庙祠宇园林以杜甫草堂、武侯祠为代表，名胜园林以望江楼为代表，别致新颖，各有特色。譬如，杜甫草堂，门之后为祠三楹……楹如祠之数。引水为流，架桥其上，以通往来。引桥之下，菱莲交加，鱼鸟相乐，名花贵果争辉，渠岸柳丝依依，十分古朴典雅，新奇别致，融祠宇与园林为一体，园以草堂为名，可谓名副其实。

成都园林既具有北方园林空间开阔，布局严谨，气势宏伟的特点，又具有江南园林小巧玲珑，灵活多变，风光明媚的优势，融南北园林特点于一身，并具有地方文化艺术特色，在中国城市园林中独树一帜。这显然同成都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人文景观众多有密切关系。成都地区平原广阔，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为造园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基础。成都自古以来就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人文景观比比皆是，诸如杜甫草堂、青羊宫、武侯祠、望江楼等，都别具一格，使成都园林大放异彩，成为全国城市园林中一花独秀的特殊区域。

(6) 上海园林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中国近代公园最多的城市，1868年，外国商人的“娱乐事业基金会”，在上海外滩修建的“公花园”，俗称外滩公园，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公园。到1949年前，上海修建公园14处，总面积66公顷，占地990亩。现在上海市有公园二三十处，仍然显得太少，

《蜀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

《蜀梲机》卷2。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13。

《成都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第289—2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第289—2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与这样千万人的大城市很不相称。豫园虽不属于近代公园，但却是上海市历史悠久、最为辉煌壮丽的园林。

豫园位于上海市豫园路，是中国南方最著名的园林之一。同时也是豫园商场，即老城隍庙市场，以小、土、特、多著名，风味小吃也誉满全球。它与豫园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豫园是明嘉靖、万历年间曾任过刑部主事，南京工部主事和四川布政使等官职的潘允端修的私家园林。造园技艺高超，有“虚实互映，大小对比，高下相称，曲折有法，前后呼应”之称。《豫园记》云，园内堂馆轩榭、亭台楼阁达 30 余处，并有湖池溪流，山峰奇石，名花异木相衬托，园林风光佳于江南。经历明清两代，豫园不断易主和遭到破坏，直到建国前夕，已破破烂烂，无景可观。1956 年，人民政府重修豫园，使这座古老的园林恢复了昔日的秀丽美景。

从南门进入豫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三穗堂、仰山堂，隔湖即为大假山，山后为萃秀堂，东南为鱼乐榭，共同构成一组别致有序的景区。大假山峰峦叠嶂，涧溪幽深，泉流瀑布，登高可俯瞰全园景色，使人心旷神怡。仅有 10 米多高的大假山，却能如此巍峨壮观，其叠石造山之奇妙，由此可见豫园精巧之一斑。

与豫园西北部以大假山为中心的景区相对应，东北部则为以点春堂为中心的景区。这里有点春堂、快楼、和煦堂、藏宝楼等建筑物，堂与楼之间均有水池相隔，布局和谐，别有情趣，步步引人入胜。

玉华堂、会景楼景区是 1959 年重建的，以玉华堂前的玉玲珑最为精妙。相传这块奇形怪状的玉石为北宋花石纲的遗物，其珍贵可想而知。

位于大假山与点春堂景区之间的九狮轩，凭藉广阔的湖面和绿地，生机盎然，与大假山、点春堂三足鼎立，成为豫园中的开阔地带，使人有天宽地平、江山无限美之感。

内园在豫园东墙出口处之南，以静观大厅、假山、不系舟、观涛楼、还云楼、延清楼、耸翠亭等，共同构成小巧玲珑的园林，成为豫园的园中之园，具有江南园林的基本特征。

今天豫园外的荷花池、湖心亭、九曲桥，本来是豫园的中心，但现在只能是豫园的园外景区。这里荷花池水域广阔，湖心亭别具一格，九曲桥十八弯曲，景物虽少，但奇巧别致，站在湖心亭前向四面观望，大湖清湖涟漪，令人心旷神怡。

久经沧桑的豫园已旧貌换新颜，仍为江南名园之一。

上海为近代公园的发祥地，今天的虹口公园等，也都景色佳丽，成为全市人民游憩的胜地。虹口公园有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革命家鲁迅墓地和鲁迅纪念馆，吸引了更多的游人。

（7）天津园林

历史时期天津的园林有府衙园林、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和公园四种类型。

明正德年间，户部郎中汪必东建“浣俗亭”，地址在城中户部分署衙内。汪沆诗称“浣俗亭开十亩地，傍池杂树带花移”。可见浣俗亭有一定的规模。清康熙时，道署内渡瀛书馆前，芦苇甚盛，薛柱斗“因砌花墙以围之”。清

军厅署内的“二思堂”和盐分司署东的“中稳园”，也是比较有名的府衙园林。康熙时兵备朱士杰在西门外演武厅右月堤上建“宜亭”，绕亭四周，夹植杨柳，形成“堤上青青柳万行”的胜景。

清乾隆皇帝多次巡幸天津，建有两处行宫。“柳墅行宫”在城东南海河东侧，占地50亩。“津门胜地柳如林”，“宫门深闭花千树”，园林风光绮丽。“望海楼”位于三岔河口北侧，楼西是香林院，再往西是望海寺，有南、北运河“二水交并抱寺流”，海河“东南淼淼向瀛洲”之称。

清初藏富于商，私人营建园林的风气很浓。所谓“安氏辟沽水之堂，张家构问津之园，禹门则浣花寄吟，蔗村则艳雪流唱”，正是对私家园林的生动描述。问津园、一亩园、思源庄在城东北锦衣卫桥附近，为张霖及其后人所建，统称“遂闲堂”。人称“沽水园林之盛，张氏首屈一指”。尤其是一亩园，“务极幽胜”，有垂虹榭、红坠楼等。“七十二沽草堂”在锅店街，为梁洪独处之地，有“艳紫嫣红花朵新”的美名。盐商安尚义父子所修“沽水草堂”，更有饶水竹台榭之胜。查日乾的“水西庄”位于城西三里的卫河南岸，“水木清华，为津门园亭之冠”，园内建有揽翠轩、枕溪廓、数帆台、藉香榭等，皆因景得名，堪与江南水乡媲美。查氏还在庄东辟“介园”。乾隆南下驻此，正值紫荆盛开，遂易名“芥园”。其他私家园林还有位于城东南隅的康园、城西北隅的杞园、城西二里的问莲浦、水西庄附近的浣花村和杨园、城东南四里的怀园和郭园、鼓楼南大街西侧的水西园等，不下二十余处。

开埠后，租界内建造了风格不同的外国园林，包括维多利亚花园（今解放北园）、大和公园（今八一礼堂）、久布利花园（今土山公园）、皇宫公园（今复兴公园）、意国花园（今一宫）、法国花园（今中心公园）、俄国花园等。

清末，在河北建河北公园，1928年改名中山公园。1906年在北站东约半里建植物园，1931年改为宁园，占地60公顷，四面环水，水面积达1/3，是建国前天津最大的公园。另外还有距城南10里的青龙潭、西沽桃花堤、八里台荷花、南开丽生园等，风景也很优美。

天津园林建设，多以水体为主，或与河水相通，或直接以淀洼为造园基础。因此天津园林中多曲径、回廊，“曲曲回廊近水开”是对天津园林的真实写照。“津门极目无寸山”，人造“假山”、“亭阁”则比比皆是。花草树木以杨柳、芦苇为主。近代公园，受思想文化影响，更各有特色。

（8）广州园林

广州是我国著名的海港城市，自然环境优越，园林也兴起很早。尤其是南汉建都广州时，广州园林得到很大发展，直到今天还有遗迹可寻。

据曾昭璇教授考证，南汉离宫数百，多有池苑相配合，最主要的园林有南宫药洲、玉液池、明月峡、黄鹂港、宝石桥、甘泉苑、芳春园、流花桥、芳华苑、显德园、华林园、西园、昌华苑、望春园、苏氏花园等，皆雕梁画栋，花石湖洲取胜，具有江南园林的特色。像南宫药洲就是以湖、洲为主景，

吴锡麒：《南归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乾隆《天津县志》卷7。

《天津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65—2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版。

花、石相配，叠石取胜，故有“石洲”之称。

宋代时有“羊城八景”的名称，即扶胥浴日、石门近照、海山晓霁、珠江秋色、菊湖云影、蒲涧廉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而在城内的只有位于城西北隅的光孝寺一处，其余均在城外。真正称得上园林的大约只有菊湖一处。菊湖位于宋广州城北，今越秀山南。当时这里是一片洼地，积水成湖。由于湖面广阔，烟波浩渺，水静如镜，晴空云彩映入湖中，犹如朵朵盛开的菊花，景色奇异，故有菊湖之称。这是以菊湖为主景，以越秀山为客景的自然风光游览区。元代时菊湖消失，连名称也逐渐鲜为人知。

随着广州城的扩大，明代的“羊城八景”主要在市区。根据乾隆《广州府志》，八景为粤秀松涛、穗石洞天、番山云气、药洲春晓、琪林苏井、珠江晴澜、象山樵歌、荔湾渔唱。其中粤秀松涛、药洲春晓也是著名的园林。粤（越）秀山冈峦起伏，位于广州市区，明代遍植马尾松，松涛万里，蔚为奇观，显然是以森林茂盛、绿波壮观而成为游览胜地。越秀山山峰奇秀，披上绿色盛妆，自然会成为广州市区最著名的风景区。

药洲位于西湖中心，南汉时即为名胜。由于有西湖作为凭藉，登洲可赏湖光山色，并有“水中云影带流沙”的奇景。九曜石位于湖滨，又称“石洲”，奇石有的高大雄伟，有的小巧玲珑，与湖光山色争妍竞辉，成为西湖的著名风景石。西湖于成化后湮没。今天的九曜石仍保留数块，成为重要的文物。

清代的“羊城八景”，范围大为扩展，广州附近主要名胜均被列入。其八景为粤（越）秀连峰、琶洲砥柱、五仙霞洞、孤兀禺山、镇海层楼、浮丘丹井、西樵云瀑、东海鱼珠。其中越秀山仍为主要园林，由于清代成片开发，越秀山所有山峰和附近丘陵，都森林茂密，景色宜人，成为著名的风景区，故称“粤秀连峰”。禺山位于今中山四路一带，为广州城内的最高点，清代建有禺山书院（今文化局），西侧为藩府，另外还有关帝庙、城隍庙，林木苍翠，游人如织，也是广州城内的重要园林区。

建国以后，广州公园发展很快，主要有越秀公园、麓湖公园、流花公园、荔湾湖公园、东山湖公园、晓港公园、文化公园、醉观公园、南湖旅游中心和华南植物园等，都是景色优美的所在。其中越秀公园以越秀山为依托，并有北秀湖、南秀湖、东秀湖陪衬，楼、堂、馆、室点缀，景色绮丽，成为广州公园的佼佼者。

（9）泉州园林

泉州建城后，泉州州署宽敞，并有园林点缀其间。泉州最早的园林首推水园东湖，湖在东城边，广袤四十顷，唐代即在湖中建有东湖亭、二公亭，缀以亭榭虹桥，湖光山色，十分壮观。湖东有灵山圣墓，是回教徒共同景仰之地，因建筑风格特殊而成一景。唐时城内有詹厝山园林。詹厝山位于城西五塔巷，因堆土成山，故名。欧阳詹是福建登科第一人，在土山前建亭，以供登临吟咏。

五代时泉州开始营建人工园林。云台别馆、海印寺等别具风格，均位于郊外交通要道上，以招揽中原流寓公卿名士。留从效受封“晋江王”，治泉

《广州历史地理》第 303—316 页。

《广州历史地理》第 361—369 页。

《广州历史地理》第 403—408 页。

《广州交通游览图》，广东地图出版社 1993 年版。

17年，建有郡圃、南园及别关别墅。

宋代泉州繁荣，登科为官者辈出，第宅高大，官署华丽，园林里叠石为山，池榭增辉。五老亭是积善院内的建筑之一，位于府治西南。这是宋皇祐年间郡守陆藻与郡内五大夫相会的地方，故有此名。东街金池巷是泉州第一个状元、宰相梁克家的园林，今天还留有池塘。梁家在泉州建有相府，并有花园、金池、假山，十分豪华。南宋状元曾从尤建有山仔池，位于西门曾井巷，现仍留有一口古井。南门外宗正司在开元寺粉墙后，建有芙蓉堂、天宝池、忠厚坊，现在这一带仍为园林区，遗迹不少。节度推官厅在州治西，虽为官衙，也有幽雅的水园、纳凉轩、莲池等。

元代蒲氏棋盘园规模宏大，位于南城，内有假山一列，充作棋盘衬托，又作观棋倚靠，建有凉台，为官员活动及对垒场所，后有池水，中有瀛洲。孙家园亭座落笋江水滨，这是一处贵族园亭。

明代泉州多小园。假山池水成景居多，东街菜巷的温陵书院、承天寺的傅家池亭、泉州后城街的芹圃、胜果铺的水心亭、新门街文胜宫的朴园、涂门街清真寺口的瓯安馆即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笋江水榭，它位于浮桥临江高石处，楼阁临江悬空而建，十分壮观。明代另外还在城北清源山一带开辟景点，山峰逶迤，川流如带。如何乔远的镜山山房、泰清隐庐就是例证。

清代以施琅四园为最，因他以平台之功备受宠爱，园林规模宏大，部分遗迹尚存。其中位于子城东南城壕旧址的苑斋夏园，亭、台、堂、林圃、山、池俱备，布置佳丽。乾隆屡次下江南，全国建园之风大盛，如泉州桂坛巷的范志山园、泉州州顶的督署园、今关帝庙的振村逸园、象峰一带的龚氏亦园、泉州通政巷的鳌园、南门青龙街的苏家园等，都争奇斗异，豪华壮丽。

民国时期，泉州富侨最多，讲究住宅宏阔点缀花木，但以自娱为主。如位于城区北门街的层园可为代表。

泉州园林多集中在城内，与住宅联系，规模较小。园林布局以小空间内短距离欣赏为主是城市山林的特点。

泉州园林风格独特，构思巧妙，手法细腻，以小石堆大山的做法，是园林特色，表现出“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境界。

泉州园林以自然山水为骨架，融人工建筑于自然美之中，东湖水园，巧借自然，云水碧波，以山水取胜，就是典型例证。人工建筑往往与开敞的山水地貌相结合，如笋江水榭和棋盘园，水榭就建在晋江江流景观的一块巨石上，尽有河山之胜。棋盘园扼今城南东鲁巷地段，面向晋江最开阔处，为蒲氏花园，独具匠心。以叠山理水再现自然，形成幽闭的空间，房屋组合得宜，正庭前必置石庭，成为泉州小园建设的主要特色。

(10) 承德园林

位于河北省北部的承德市，群山环抱，河流纵横，森林茂盛，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具有造园的一切有利条件。清代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既是行宫，又是规模宏大的园林区，其景色之壮丽，不亚于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

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避暑的离宫，又名热河行宫，位于承德市区北半部。同时，也是风景秀丽的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山庄占地达8400余亩，超过了圆明园的规模，尽有河山之胜。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

何乔远：《闽书》第152《畜德志·蒲寿庚》；《元史》卷210《占城传》。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年)开始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完工,历时近百年。山庄分为宫殿区、苑景区和外八庙三部分,有机组合成一幅壮丽无比的画卷。

宫殿区位于山庄南部,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已毁)四组建筑。正宫正门称避暑山庄门,以澹泊敬诚殿为正殿,俗称楠木殿。另外还有四知书屋、烟波致爽、云山胜地等殿堂。松鹤斋位于正宫的东面。万壑松风在松鹤斋后,有纪恩堂、鉴始斋等建筑,雄踞冈上,又临大湖,十分壮观。东宫位于松鹤斋东面,有勤政殿、清音阁等建筑,今仅有遗迹而已。

苑景区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湖区在宫殿区以北,湖中洲岛错落,使湖面又有了澄湖、镜湖、上湖、下湖、银湖、内湖、半月湖的称谓。主要建筑群有水心榭、文园狮子林、天宇咸畅、月色江声、如意洲、烟雨楼、环碧、戒得堂等,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形成一个巨大的游览胜境。湖北为平原区,沿湖自东而西为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濛濛间想、水流云在四亭,以北为万树园,林木苍翠,景色如画。平原西部还建有文津阁,藏有四库全书。山区在西北部,除遍布苍松外,也曾有许多建筑,与耸峙的山峰争丽竞辉。

外八庙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陆续建成的,共有寺庙11座,现仅存7座。外八庙主要分布在山庄的东面和北部山麓。在武烈河(即热河下游)以东从南向北有溥仁寺、溥善寺(已毁)、普乐寺和安远庙,与山庄隔河相望。武烈河以西、山庄东北有普宁寺、普佑寺(已毁)。狮子沟以北,也就是山庄正北自东而西有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庙、殊像寺、广安寺(已毁)、罗汉堂(已毁),与万里松涛融为一体,笼罩在青色翠绿之中。其中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顶,闪闪发光,与日月争辉,格外壮观。庙宇整个建筑外观犹如一座城堡,内部为正方形结构,中央大殿,四周配殿,并有长廊贯通,最高处有对称的亭阁,十分辉煌壮丽,有小布达拉宫之称。

避暑山庄融宫殿、园林、寺庙为一体,集中国南北园林特点于一身,其规模之宏大,景色之壮丽,都是空前的。北方的四合院、镇江的金山亭、苏州的文园狮子林、嘉兴的烟雨楼、杭州西湖的芝径云堤等都在仿照之列,并有用石块堆砌的“虎皮墙”,别具一格。这里森林茂密,绿草如茵,麋鹿成群,更是其他南北园所不及。今日的避暑山庄面貌一新,设施齐全,是旅游度假的最佳去处。

外八庙既有喇嘛寺庙形式,也有汉族庙宇形式,更有仿北京天坛祈年殿形式的圆亭子,不具一格,与周围自然环境浑然一体,为山庄增添了无限美好的风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被誉为“紫塞明珠”,名副其实,蜚声中外,联合国已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11) 凤翔园林

凤翔县位于陕西省关中西部,县城以东的东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园林之一,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

东湖原名“饮凤池”。相传周文王时有凤凰来此池饮水,遂以为吉祥之兆,取名“饮凤池”。今凤翔城南有秦雍城,城东南为秦襄泉宫,“穆公冢在其下”。隋代也曾于城内建岐阳宫。周代的饮凤池可能为上述都城或宫室

的风景区。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引凤凰泉水注入凤池，疏浚扩展，种荷树柳，置亭设阁，改名东湖，遂为一方名胜。凤凰泉位于凤翔城西北，东西绕城分流，犹如凤凰展翅飞翔，凤翔城即以此得名。两水在东湖西南的凤尾桥合流，从五孔桥眼飞流而下，酷似凤尾，桥也因此得名。

从北宋算起，东湖的历史已有900百余年。后来虽几经沧桑，屡修屡坏，但终究被保留下来，成为我国北方园林的优秀代表。明嘉靖，清道光、同治、光绪，民国9年、12年，曾多次重修，建筑物不断增多，湖体也有所扩大。清光绪年间开辟了南湖，称为外湖，原湖则称内湖，统名东湖。湖的面积约14公顷。曾在东湖先后建立起来的著名亭阁有宛在亭、君子亭、喜雨亭、凌虚台、会景亭、莲池亭、三公祠、苏公祠、不系舟、洗砚亭、来雨轩、一览亭、八卦亭、鸳鸯亭、春风亭、小娇亭、望苏亭、雁南亭等。其中喜雨亭、莲池亭、会景亭、凌虚台，都是当年苏轼修建或同苏轼有关的建筑物。明代的东湖“莲盈二三亩，余三方植竹万杆，翠盖红芳，摇金戛玉”。前者出污泥而不染，后者傲霜斗雪，挺拔独秀，因在湖南岸建亭，以莲花、翠竹喻君子，故亭以“君子”名。湖中景物为纪念苏轼而修建的有苏公祠，位于湖北岸三公祠（周、召、太三公）旁；洗砚亭相传为苏轼当年曾在此吟诗作画；因苏后来去江南作官，疏浚过西湖，故修雁南亭、望苏亭，遥望江南，以表思念之情。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东湖进行了疏浚、整修，恢复了东湖的主要建筑物。修复后的东湖，古柳环周，水明如镜，荷花吐艳，莲叶飘香，亭台楼阁五彩缤纷，并增设展览室、娱乐室、茶社等。千年东湖，重放异彩，游人倍增。十几棵古柳仍然合抱难围，垂丝依依。新植杨柳也添枝吐丝，生长茂盛。重建的长堤、石桥，把主要风景点连成一个整体，游人沿堤观赏，指点江山如画。

东湖二期修建工程，除恢复南湖外，向西扩展，并以西门、坡道、百鸟朝凤为一轴线，形成左右对称的格局，而且将陆续兴建百鸟朝凤、土山、花木、展厅、儿童游艺场、花坛、草坪等，逐渐把东湖改造成建筑物较稀，湖面宽广，花木草地占有更大比例的游乐胜地。

今天，湖北文化馆内所藏苏轼腊梅菊竹画石刻两块，《普门寺诗》石刻两块，临摹吴道子画五幅，石刻两块，都是稀世珍宝，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客。

（12）同里镇园林

同里镇位于江苏苏州以南的太湖之滨，是江南著名的水乡，镇内运河纵横，来往船只如梭，园林也别具一格，引人入胜，退思园就是典型代表。

退思园是清光绪十一到十三年（1885—1887年），任安徽“凤、颖、六、泗”兵备道的任兰生，解职返里后修建的园林，故名“退思”。此园位于同里镇中心，占地10亩，西部为住宅，东部为园林，园林又分外园、内园两部分。实际上住宅与园林融为一体，成为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宅分三组建筑，十分考究，最西边有门厅、茶厅、正厅，中间有下房、走马楼，东边有迎宾室、岁寒居、旱船、座春望月楼等。建筑物高低错落，组合得宜，与园林争辉。园林以水池为中心，有曲桥、回廊、亭、台、楼、阁、轩等，并有棋、琴、书、画相配合，十分佳丽、精妙，有“大观园”之称。池西北有揽胜阁和轩；池西有九曲回廊、水香榭和闹红一舸；池南有半亭、辛台、桂花

厅、天桥、菰雨生凉；池东有眼云亭、三曲桥、琴房；池北有退思草堂、回廊，绕池一周，穿堂过厅，曲廊回径，犹如进入天仙胜境，天下秀明，尽收眼底。“座春望月楼”前踏月，“菰雨生凉”内纳凉，“桂花厅”内品茗，“岁寒居”内围炉，“琴房”内操琴，“眼云亭”畔奕棋，“辛台”临窗作书，“揽胜阁”扶栏学画，真是春花娇妍，荷风习习，金桂飘香，竹梅傲雪，春夏秋冬，处处佳丽。

退思园凭借江南水乡，建筑物与假山、水池巧妙配合，布设得宜，处处生辉，也是江南园林的优秀代表。

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园林，除避暑山庄属于皇家园林外，其他都是因势利导而修建的公、私园林。其基本特征是因地制宜、不具一格；小巧玲珑，风景独秀；假山、人工湖多为主景。

扬州瘦西湖就是由河道改造而成，以瘦取胜，配以亭、榭、桥，构成山环水绕、曲折多变、湖转景移、仪态万千、步步入胜的格局，可算因地制宜、不具一格的典型。苏州园林以小巧玲珑闻名海内外，叠山理水之精妙，更为全国园林之冠。假山、人工湖是造园的基础，上海豫园、凤翔东湖、退思园等，无不如此。当然，以崇尚自然之美的中国园林，如果造园的地理条件能尽有河山之胜那是最好不过了。否则就必须人造假山，开凿湖池，再现自然之美，使自然美升华到理想的境界，即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

总之，中国城市的园林，不管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以山水名胜为造园的基础，以风景秀丽闻名海内外，把自然美和人工美巧妙地结合起来，浑然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园林体系，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地位。当然，就南北园林而言，也还有一定差异。这就是南园小巧玲珑，北园宏大壮阔；南园多水，北园多建筑物；南园多诗情画意，北园多工匠技巧；南园名称多寓意深刻，北园名称多地名、建筑物等，也体现了南北地理条件和文化上的不同，反映在造园上也就有了各自的特点。

园林是美化城市和为市民提供游憩场所的必要手段，自古以来受到重视，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等闲视之。没有园林的城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缺少绿化地和游憩场所的城市必然死气沉沉。广阔的绿地不仅能增大城市空间，协调与周围建筑物的色彩，而且把自然美与人工美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同时，绿化地也是美化城市环境、净化城市空气的重要一环，必须与城市建设同步进行。

园林、绿化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取得更大的成就，使每个城市都有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

十、中国城市的规划

中国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大都经过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规划设计，然后才施工建成的。也就是说，从城址的选择、划定范围到平面布局，都是经过事先精密安排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是同步的，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城市就进行过整体规划，而且最早使用平面设计图。平面设计图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显然同进行过规划和使用平面图有密切关系。当然，也有人把中国都城规划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商和西周为初期形态，东周至两汉为密封式形态，曹魏邺城到隋唐长安为棋盘式封闭形态，北宋开封到元明清北京为开放式街道布局形态。这种观点只能视作是对中国古都规划模式的概括，并不反映整个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因为唐代的扬州城已成为开放式城市，“十里长街市井连”，而西周的城市也并非看不到整齐规划布局的影子。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和东周王城的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西周的城市已进行过规划，而且最早使用了城市平面图。事实证明，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都受规划思想的指导，有自己的规划原则和城市平面图。

1. 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各种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规划者必须依据地理条件、城市性质和可能，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规划，尽可能满足各个城市的不同需要，使城市能发挥它的不同作用，并显得庄严、大方、坚固、壮丽，一切都井井有序。当然，中国城市中从未经过规划而杂乱无章的也不乏其例，但对多数城市来说还是布局井然，应该说都是经过周密规划后才建成的。

关于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直到目前尚无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有一些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说法。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所研究的城市，目前主要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应该从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时期的主要思想体系，来探讨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才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解剖中国城市的特点。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达时期，把“天命”作为统治其他部族和广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统治者就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称为“天子”。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仍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周人崇尚“天命”，必须把“天”的意志摆在首要地位。因此，在城市规划思想中突出“天命”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最典型的的就是明堂、宫室、宗庙的规划建筑，都是“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也说是说，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样的，必须“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以表现“天命”最高，“天”是真正的主宰神。圆屋，正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2期。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3《明堂庙寝通考》。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3《明堂庙寝通考》。

是原始社会以来，“天圆地方”概念的具体体现。太室之外的其他堂室，一律为方形，即代表了“地”。明堂始于周，“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阴馆，周人曰明堂”。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大戴礼》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授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记》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根据王国维《通考》附图，太室居中，青阳、总章太庙分居东西，明堂、玄堂太庙分居南北，构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正方形。既然明堂、宫室、宗庙的布局是一个模式，那么，“天圆地方”的思想就应该是中国奴隶社会城市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城市规划就有了明确的中心点，然后对称布局，明堂结构就是典型例证。《周礼·考工记》虽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宫室居中，对称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模式。这种结构形式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早周的宗庙或宫室就是这样布局的。考古工作者在岐山京当凤雏村发现的早周的宫室遗址，其平面布局就是殿堂居中，有东厢、西厢、后室、门房等对称布局。丰镐的布局虽然得不到考古上的证实，但东周王城考古却可以成为佐证，即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相仿佛。尤其是周原早周都城的发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早周都城位于岐山县贺家村与凤雏村之间地下1.5米深处，东西长700米，南北宽550米，接近方形，宫殿位于中央。有了中心，自然也会对称布局。对称的概念虽然来自对人体对称的认识，但运用在城市规划中，却是从周代开始的。

当然，阴阳五行思想、风水思想等，都起源很早，应该说，对中国城市规划都有影响，但在奴隶社会时还不是主流。中国奴隶社会的城市，尽管处于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但也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而建成的，这就是以“天命”思想为指导的中心对称布局模式。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于没有统一的或主要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规划上也就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一时期兴起的城市很多，使中国城市得到很大发展，而城市的形制多式多样，不具一格。由于注重实际，因地制宜建设城市就成为普遍接受的规划原则。

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思想文化都有发展，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占

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三辅黄图》卷5。

《三辅黄图》卷5。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3《明堂庙寝通考》。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西安晚报》1995年4月27日头条新闻报导。

据统治地位。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尽管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被董仲舒发展了的儒家思想，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信条。秦汉以后的城市规划思想当然也受这种等级制度的制约，以体现封建统治者的尊严。首都规划中以皇宫为主体和地方城市规划中突出衙署，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在每个王朝的首都规划中，都毫无例外的以皇宫为主体，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六朝建康、隋唐长安、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都是如此。当然，从邺城开始，中国首都规划中的中轴线已经定型，皇宫无不摆在中轴线上，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有了中轴线以后，不仅可以突出皇宫的重要地位，也为对称布局创造了条件，使城市庄严、肃穆、大方、壮观。地方城市规划虽不像首都那样严格，但把衙署摆在什么地方也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中国地方城市中，衙署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几乎无一例外。居中是为了指挥方便，占据高地就是要控制制高点，以维护安全。

《周礼》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关于首都规划的原则，一直是封建社会中都城规划的指导思想。元代的大都城把这种规划思想发展到顶峰，创造了中国都城的理想楷模，证明这种规划思想能够充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显示皇权的尊严。当然，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也要求皇宫居中，以皇宫为中心对称布局。《周礼·考工记》虽然没有谈到一般城市的规划原则，但中国的地方城市都是封建统治者营建的，必然处处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把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城市规划当了无疑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排除其他思想的影响。像阴阳五行、“风水”等思想，都对城市规划有影响。前者就是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后者就是堪舆学，即观察风向、水文的一种学问，把“风水”作为选择住宅、丧葬的理论根据。上述思想虽然含有封建糟粕，但也有合理的内核，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五行既然能相生、相胜（相克），而且变幻无穷，在城市设计中自然要注意方位，使东、南、中、西、北都能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和安全。这就是“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道理。就连统治者也要居于正位，按照五行原则衣食住行、治国安民，即按中方本图、中方副图；东方本图、东方副图；南方本图、南方副图；西方本图、西方副图；北方本图、北方副图的原则行事。对于“风水”学现在更有新解，认为是古代人们“环境选择”的学问，其核心是“生态”环境，要求在特定小环境内部相互协调，以达到生态环境内部的统一。城市规划就是要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风水”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87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13 页，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管子》卷 14《五行》。

《管子》卷 3《幼官、幼官图》。

刘沛林：《风水模式的环境学解释》，《陕西师大学报》1995 年第 1 期。

学自然会有许多用场。

2. 规划原则

中国城市规划是由许多能工巧匠完成的，他们既受到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各人学识智慧的制约，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都要因地制宜，巧施安排，不拘一格进行规划设计。

中心布局原则 中国城市不论是首都或地方城市，在规划时都要首先选择中心，中心位置确定后，再向四周扩展，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这个中心往往也就是皇宫或政府机关、钟鼓楼所在地。汉长安城先建皇宫，后建城墙，皇宫位于龙首原北坡，虽然不在中心，但修筑城墙时仍然以皇宫为中心，向四面展开。西墙和南墙的曲折，都和未央宫、长乐宫有关就是明显的证据。未央宫和长乐宫虽然位置偏南，但长安城周围就是皇家禁苑上林苑，应该说二宫既占据高地，又处于长安城和园林区的中心位置。中心，有几何中心，也有实际上的中心，汉长安城的皇宫就是实际上的中心。隋唐长安城也是如此，皇宫位于全城的北部中央，从表面来看也不在全城的中心，但实际上是中心，因为长安城北是禁苑，禁苑的高大围墙也起着城墙的作用。北宋开封和元明清北京的皇宫就相对处于中心位置，说明中心布局原则在都城规划中占主导地位。地方城市规划中，中心布局原则也表现得很突出。譬如，唐代的泉州城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宋代的平江城（今苏州）以子城为中心，明清的南阳城以文庙为中心，明清的太原城以鼓楼为中心，明清的济南城以府治为中心，明清的西安城似钟楼为中心，明清的临榆县城（山海关）以鼓楼为中心，右玉县城以钟楼为中心，山西兴县城、上海市南汇、奉贤城等，都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当然有些城市在初建城时，中心不明显，后来设置中心，重新进行规划，使城市总体布局也发生了变化。西安城就是如此。西安城是在五代宋元长安城的基础上发展的，当时的中心是鼓楼，明初把城向北、向东拓展，鼓楼已起不到中心的作用。明万历十年（1582年）把钟楼迁移到了今天的位置，四条大街辐射出去，才使全城有了明显的中心，城市布局也随之改变。

中心位置的选择，是根据地理条件、需要和可能确定的，而不是任意选择的。中心位置选择适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总体规划。选择中心只是城市规划的一种形式，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选择过中心，但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把中心位置作为规划的依据，确实带有普遍性。

对称布局原则 对称的概念起源甚早，作为城市规划原则运用于城市建设也是很早的。中国的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都城就对称布局。《周礼·考工记》所反映的西周都城的对称布局模式，一直是中国首都布局的理想规范，影响达数千年之久。对称就要有中心，这种中心不是建筑物，就是街道。从总体上来说，全城的对称中心多为街道，皇宫的对称中心多为建筑物。譬如，隋唐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以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布局；东汉洛阳皇宫、隋唐长安皇宫、元明清北京皇宫，都以主要大殿作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地方城市中凡有十字街道的城市，纵贯全城的街道往往就是中轴线，明清的山西省大同城就是典型例证。虽然以十字街口为中心，但以纵贯全城的南北大道为主干道，南关、北关范围也很广阔。因此，南北大道是全城的中轴线，主要军政机关和祠庙，大都左右对称布局。譬如，总兵衙门在西，代王府在东，左右对称布局；太宁观在西，关帝庙在东，也是

左右对称布局等等。设有十字街道的城市，尽管不能形成全城对称的格局，但局部对称还是不乏其例。像大同城内西门大街以南的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就左右对称布局，清西安城内的满城驻防，从北向南，为正黄和镶黄、正红和正白、镶红和镶白、正蓝和镶蓝旗，也是左右对称布局等等。由此可见，对称布局的原则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十分深远。

街道分割原则 中国城市规划对街道设置十分重视，街道既是城内交通和城外联系的必由之路，也是选择中轴线和分割不同功能区的界线，是城市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街道的城市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但各个国家对城市街道的规划则采用不同的方法，有圆形、斜形、弯曲形和端直形。中国城市从西周起，就采用端直形，即都城要“九经九纬”。中国都城中的街道大都采用棋盘式端直设置，很少有斜街，隋唐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是典型代表。地方城市的街道设置虽不像都城那样严格，但端直设置仍为主流。这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形状多为方形或矩形，街道设置与城墙平行最为方便。像济南、西安、大同、太原、扬州、银川、苏州等城市都是如此。太原城的“丁”字形街道很多，但仍为端直形，即南北向或东西向。

中国城市的不同功能区，都是由街道分割的。根据地位、需要和地形特点，可以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由于大的区域占地广阔，四周的直街只能到此为止，与顺城或顺墙街相通。譬如，北京皇城周围的街道，苏州子城附近的街道都是如此。

街道的宽窄也根据需要设置，凡是通向城门的街道都宽，顺城街都比较窄，隋唐长安城的街道宽度就是例证。最宽的朱雀门街通向明德门，又是全城的中轴线，宽达155米左右，而顺城街仅宽20—25米左右，差距甚大。

方块居住原则 中国城市中的居民区，大都进行过规划，东魏、北齐以前以里相称，从东魏、北齐邺南城起，主要以坊相称。唐以前里坊为封闭形，从宋代起，已完全成为开放形。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城市居住区的性质有差异，但形态并无变化，即一直是方块式的居住单元。这种居住区是由纵横交错的街道分割的，由于街道端直，并与城墙平行，它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圆形的几乎没有。在方块居住区内，又由许多小街道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小方块。隋唐长安城的坊，先由“十”字街分割（皇城以南诸坊例外）成四大块，再由“十”字街分割成16个小方块，居民在每个小方块内划分大小不同的院落，临街开门。院落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元大都城的四合院，也就是方形或矩形的居住区。地方城市的居住区虽不如都城整齐，但形态大体一致。由此可见，中国城市规划的居住区，形态单一，具有稳定性，这当然同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木构建筑的特点有密切关系。

市场固定原则 中国的城墙兴起很早，因城内或附近设市才发展成为城市，设市是城市的必备条件。中国城市的市在唐代以前规划为固定市场，唐代以后规划为商业区，沿街道布设。唐代扬州城已经有十里长街的繁华区域只是特殊情况，并不代表唐代以前城市设固定市场的规划原则。唐代以前由于市场固定，经济活动很少在市外进行。尽管市场是固定的，但在规划时要考虑交通方便，汉长安城的市主要在城的西北部，接近西去的“丝绸之路”，唐长安城的东市、西市，接近东西城门，交通也较便利。为了出入市方便，唐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各设置“井”字形干道，每面各开两个门，仍然以

交通方便为原则。地方城市规划中的市也是固定的，但随着城区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市场多有迁移。譬如，秦汉时代，苏州的市设在子城东北和西北，唐代由于城区布局的变迁，市场也随之转移。南朝时，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之说，证明市场在城门附近。唐代时城西得到发展，设有蕃坊，市场已向城西转移。

唐代以后以街道为基干形成商业区，但这些商业区仍然相对稳定，极少变动。北宋开封的州桥南街、东西街，南宋杭州的南瓦、中瓦和北瓦，元大都的斜街市，明清北京的东华门外、棋盘街和几个城门附近等，都可以作为代表。这些商业区有许多也是经过规划的，如明北京城门附近廊房的设置，就是为了招商。地方城市也是如此。明清西安城的商业区在西大街和东关，清末才在南院门巡抚署外甬道左右建楼十楹，招商居住，开辟了南院门商业区。直到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重新规划有关街道，商业区才向今东大街、解放路转移，形成今天的格局。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随着铁路、商埠和租界的发展，古老而稳定的商业区才发生变迁，向铁路沿线、商埠和租界区转移，济南、武汉等城市就是如此。

中国城市市场和商业区比较稳定，正是城市经济发展迟缓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具体表现。

3. 规划地图

中国地图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时代“方制万里，画野分州”。颜师古说，方制，制为方域，画，谓为之界。画、划可以通用，可能就是按图划分疆界。现在有文字记载可证最早的地图就是西周初年的洛邑图。周成王派召公、周公营建洛邑，绘制成图，上报成王，即《尚书·洛诰》记载的“伋来以图”。这也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图。近年来考古发掘已为中国早期地图找到了实物证据，这就是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和长沙汉墓出土的地图。

1986年在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出土了7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其时代一说为昭襄王八年（前299年），一说为秦始皇八年（前239年）。7幅图均绘制在26.7×18.1×1.1cm（长、宽、厚）的松木板正反两面。除反映山、水系、沟溪、关隘、道路等地理特征外，并有县、乡两级政区治所位置的标注。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3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时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对长、宽各96cm的正方形图，被称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98×78cm为《驻军图》；40×45cm为《城邑图》。《城邑图》所绘城邑为四方形，标注了城的范围、城门堡、城墙上的楼阁、城区道路等。街道分为二级，有宽有窄，并以象形符号标出宫殿的位置。这就是中国城市平面图的最早实物证据。

从《尚书·洛诰》记载的洛邑图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城邑图》，都可以证明中国城市规划最早使用平面图。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必须有平面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南齐书》卷32《王琨传》。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汉书》卷28《地理志》。

丁建伟：《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地图》1993年4期。

赵荣：《地理学思想史纲》第112页，陕西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图，而平面图正是框定城市范围和分区的主要标志，指导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历来受到重视。

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中国城市图也起源于西周，二者是同步的。由此证明，城市规划与地图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往往先有规划图才建成城市，洛邑的营建就是例证。从西周的丰镐起，直到明清的北京城，都是依据规划图而兴建的著名都城。丰镐如此整齐，不可能没有规划图，只是已无从考证罢了。春秋战国时，地图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城郭之大小”的地图比比皆是。这些地图后来都被收藏在秦都咸阳，刘邦灭秦，萧何尽收藏之，成为西汉长安国家图书馆中的重要图籍。秦咸阳是否有图，不得而知，汉长安有图，毫无疑问。《三辅黄图》就有汉长安城图，只是已经失传罢了。《三辅黄图》中的“图曰”、“旧图曰”等，应该都是指汉长安城图而言。既然有“图”、“旧图”之分，可见还有几种城图，说不定“旧图”就是最早的长安城规划图。东汉末年，杨修绘有《西京图》，其图当有所本，是否《黄图》所说的“图”或“旧图”，已不得而知。三国时，如淳说：“《长安图》，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证明长安城图依然存在。

自西汉以后，中国城市规划多有平面图，都城如此，地方城市也不例外。西晋时裴秀绘制《晋舆地图》，指出洛阳太仓西南“池水名狄泉”，证明该图包括西晋洛阳城图。隋唐长安和洛阳都是宇文恺规划设计的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都城，应该都有规划图。长安城“凡所规画皆出于恺”，筹建明堂时也先绘制规划图，并撰有《东都图记》二十卷。《元和郡县图志》就有长安、洛阳城图，只是与《东都图记》一样，早已佚失罢了。宋人吕大防把长安城图、兴庆宫图刻在碑石上，长安城图残石（1934年出土）、兴庆宫图碑石现均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考古发掘证实，这两幅图都相当精确，显然是依照原图刻石的。吕大防在《题记》中所说的“长安故图”，应该就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时的规划图，或者是这幅图的副本。正如《题记》所说，“予因考正长安故图，爱其制度之密”，又伤唐人冒疾，史氏没其实才制图刻石的。

《云麓漫钞》明确指出，此图是以《旧图》和《两京新记》为本而绘制成的。南宋人程大昌《雍录》中有《阁本大明宫图》、《阁本兴庆宫图》等，证明隋唐长安城图依然存在。直到元代，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还有“城图”的记载，可见元代人还能看到长安城图。

北宋开封外城建成于后周，但宋初重修时，“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纯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可见先有规

《周礼·地官·大司徒》；《管子·地图篇》。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3《杂艺术家》。

《史记》卷10《文帝本纪·注》。

《历代宅京记》卷8。

《隋书》卷68《宇文恺传》。

[日]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吕大防的题记》（杨励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

《长安志图》卷上。

《历代宅京记》卷16。

划图，然后才施工建成的。北宋末年的开封城，“一撤而方之如矩”，十分“引直”，是经过多次改建以后的形态，与原来的规划图有一定差异。北宋开封城的规划图早已佚失，只是得之“耆老相传”而已。

元代的大都城是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划的，使用规划图当了无疑义。刘秉忠就是元代上都、大都城建设的决策人和设计者，应该说两都的建设都是按照规划图施工的，不然如此整齐、完全对称布局就无法实现。明清北京城，更是严格按照规划图来施工的，今天传世的清代北京城图当有所本，就是证明。《大明一统志·图叙》说：“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可见建城立邑必有规划图，更不用说像明代这样规模宏大、建设时间长久的京城了。明初重修西安城时，就首先“规制为图”，地方城市尚且如此，首都有规划图不言自明。

宋代刻石的两幅地方城市图特别珍贵。一幅为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刻在碑石上的宋《平江图》，即苏州城图，现存苏州文庙。碑高2.48米，宽1.4米，是目前古地图中保存最详细、最准确的城市平面图。一幅为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镌刻在桂林鸚鵡山南崖壁上的《静江府城池图》，即桂林城图。图高2.9米，宽2.98米，上方还有高0.31米，宽3.08米的《图记》文字。这两种城图虽然都不是规划图，但在制图时必有依据，说不定也都参照了原来的规划图或有关记载。尤其是《静江府城池图》，实际上是该城竣工时的总平面图，应该是以规划图为蓝图而制定的。

《平江图》的刻图时间晚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对大城的重修时间，但刻图并不是成图，应该说成图在先，刻图在后，因此，《平江图》仍然是南宋重修城池的规划图。该图制图技术之高超和对城区绘制之详细，在中国城市地图史上都是空前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宋时平江府城街巷十分密集，证明城市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是南宋时地方城市发展状态的典型代表。

《静江府城池图》是静江府城的竣工图，但该城的旧城很小，先后有四次扩展，等于在旧城外重筑了四座城池，有李制使城池、朱经略城池、赵经略城池、胡经略城池之别。胡城是最后一次筑城，该城竣工于咸淳八年（1272年）三月，城图是在城池竣工之后一个月内制成的。城图包括旧城和四次扩展的城在内，使静江府城成为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由此可见，静江府城的最后一次修建，是与规划图同步进行的，是在规划图的指导下完工的。像图中就有“城壕广袤，缙钱砖石，灰木工役之数”的记载，显然先有预算，后有决算，最后记入城图。因此，《静江府城池图》既是竣工图，也是规划图，与《平江图》齐名。

元李好文《奉元城图》，即五代宋元的长安城图，成图时间不详。李好文曾于至正元年（1341年）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至正四年（1344年）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那么，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其成书时间必在至正元年与四年之间，已在元代末年。书中有《汉三辅图》、《奉元州县之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禁苑图》、《唐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洪武实录》卷83。

马崇鑫：《试论桂林宋代摩崖石刻〈静江府城池图〉在地图史上的意义》，《历史地理》1988年第6辑。

《元史》卷183《李好文传》。

大明宫图》、《唐宫城里》、《城市制度》、《奉元城图》、《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上》、《唐骊山宫图中》、《唐骊山宫图下》，另外还有咸阳古迹和唐陵图，应该说，《长安志图》就是一本西安历史地图集。这些地图，大都是李好文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绘制的，图记中往往有“今天”怎么样，就是明证。李好文在长安期间，亲自踏勘文物古迹，为制图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像他到汉城地区去考察，对汉长安城是不是“北斗形”、“南斗形”的问题，说“今观城形信然”，经考察后发现，“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就是典型例证。唯独《奉元城图》应该是依据元初的规划图而绘制的，因为元初重修了长安城，并“遍访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踪古迹”，才选择了安西王宫的城址。该图称安西王宫为安西故宫，其方位确切，也符合历史实际。元代重修后的长安城，四角的角台为圆形，有现在西安城的西南角为证，以及考古发现的元京兆府城西北角为证。西北角的圆形半径为 27.5 米，与西南角相仿。然而《奉元城图》的四角为直角形曲折，显然为制图时的疏忽。图中对城门和城内布局的标注应该是可信的，作为元代遗留下来的地方城市图，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今天的西安城是明初修建的。明初在原长安城的东北隅修建秦王府城（即今新城），并把西安城的北墙、东墙向外扩展了三分之一左右。明初重修西安城时，就有规划图，“命中书省考形势，规制为图以示之，使按图增筑”。因为修城时间从洪武三年（1370 年）开始，到十一年（1378 年）才竣工，历时将近十年，没有规划图是不可想象的。《西安城墙史话》一书中所复制的《明西安会城图》，为嘉靖时的西安城图，可能就是明初重修西安城时规划图的副本。这可从尚无北、南、西三关城和钟楼仍在西大街以北得到证明。嘉庆《咸宁县志》所载《城图》，只能反映清代后期西安府城的概况，距明初已相当遥远了。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所载《城关图》，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的测量图，与今天的城图相似，对指导今天西安城市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城市规划最早使用平面图，无论都城或地方城市几乎无一例外。这就为中国城市形状规整、布局整齐和延续发展有章可循创造了条件。《管子·乘马》早就指出选择城址要重视当地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同样是城市规划必须遵循的原则。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充分使用规划图是它的显著特点和优点，今天如此，过去亦然。当前的城市规划图已被列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具有法律效力，是指导城市建设的法定地图。

《长安志图》卷上、中。

《长安志图》卷中。

《类编长安志·序》。

李健超：《〈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西安》，《西北历史资料》1985 年 1 期。

《洪武实录》卷 83。

后 记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欣喜之余，我不能不再说几句话。

我从 1972 年起就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屈指已二十余载。除出版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专著十余种外，还发表了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论文五六十篇。与此同时，还为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共招收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硕士研究生 16 名，进修生 6 名。每位研究生必须选择一个城市，撰写毕业论文。这本《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就是我多年从事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系统总结，概括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就是我与研究生共同研究的结晶。本书使用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和部分研究生参加撰稿，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城市历史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科中的热门话题，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最多。然而，直到现在尚没有一本系统总结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专著问世，与当前中国城市的飞速发展极不相称。为了适应中国城市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合理布局，本人不揣浅陋，特撰写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专著问世。这本《中国城市历史地理》除绪论外，从中国城市的起源、城址、城墙、类型、形状、规模、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十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关键问题，并结合中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解决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基本思路。至于这些问题解决得是否合理，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并敬请各位专家赐正。

本书插入的 58 幅地图，大都来自自己出版的有关书刊，并在图中简要注明了出处，恕不再一一提名。这些地图，均由张慎亮高级工程师清绘、改绘、编绘，既吸收了已有成果，又有所发展，使地图更加醒目，以适应本书的要求。由于插入了众多的地图，使本书图文并茂，读者更加一目了然。

杭州大学陈桥驿终身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阐明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和基本规律，不仅使本书大为增色，而且也使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有了基本的方向，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指导性论述。

本书的出版几经周折，竟然在我的故乡陕西无门，令人十分痛心。在北京大学韩光辉教授、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山东教育出版社邹健副主任愉快地接受了书稿，本书的出版终于有了着落，使我不胜感激之至。在当前出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山东教育出版社为了繁荣学术文化，仍然坚持出版社的根本任务就是出好书，力争“五个一流”（选题、作者、书稿、编校、印刷装帧一流），以更多、更优质的精品图书再创辉煌，令人敬佩。他们以独有的魄力和远见卓识，决心使本书与读者见面，对于这些深情厚谊，我再次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的侯甬坚教授，唐亦功、许正文、艾冲等副教授，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仅表深切的谢忱！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几易其稿，今天终于出版了，但它毕竟是第一次尝试，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马正林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于西安

